



楚汉 / 著

# 中国

## 1959—1961

三年自然灾害长篇纪实



四川人民出版社

著家心血 再现历史

触目惊心 发人深省

中国

1959—1961

三年自然灾害长篇纪实

ISBN 7-220-02537-8



9 787220 025372 >

ISBN 7-220-02537-8/I·461

定价:16.00元

111  
L46  
277



中国

1959—1961

——三年自然灾害长篇纪实

四川人民出版社

---

(川) 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张问渔

封面设计：李法明

责任校对：伍登富

中国，1959~1961——三年自然灾害长篇纪实

楚汉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成都飞鹰彩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11.75 字数 270 千

1996年3月第1版

1996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7-220-02537-8/1·4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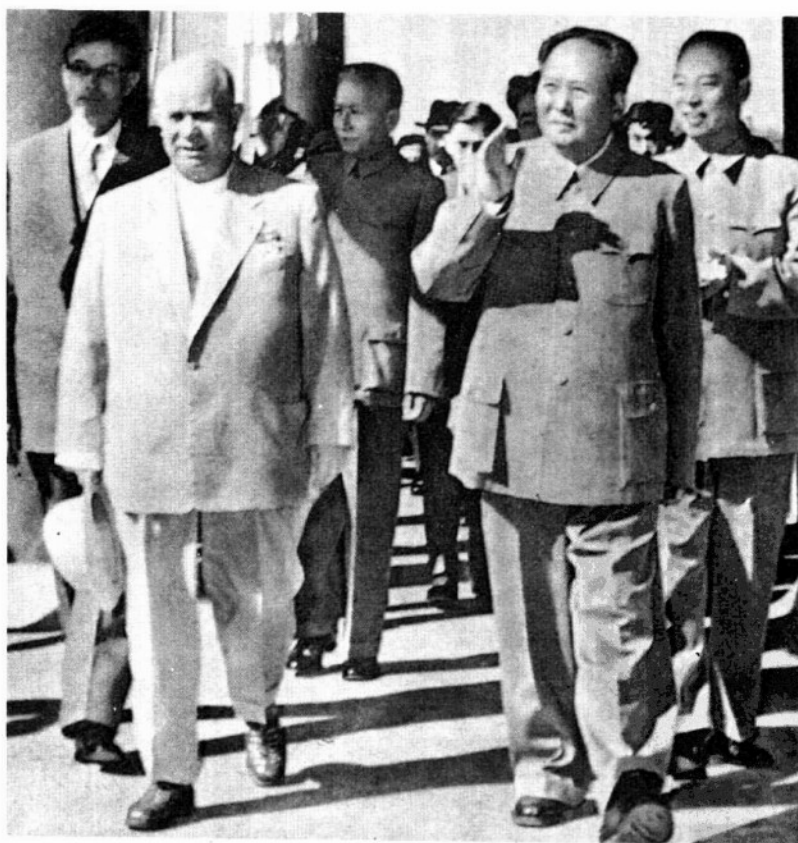
印数 1—10000 册

定价：16.00 元

22411

数字图书馆  
PDG

人民公社成立大会



▲1959年国庆，中国首次阅兵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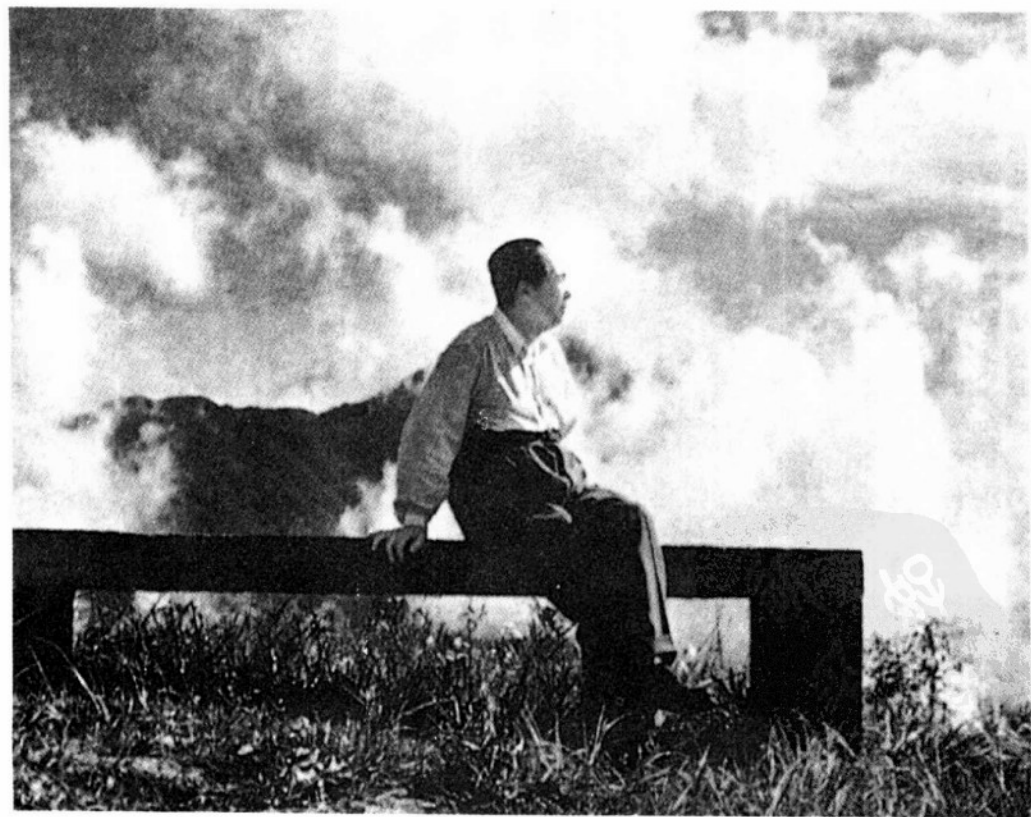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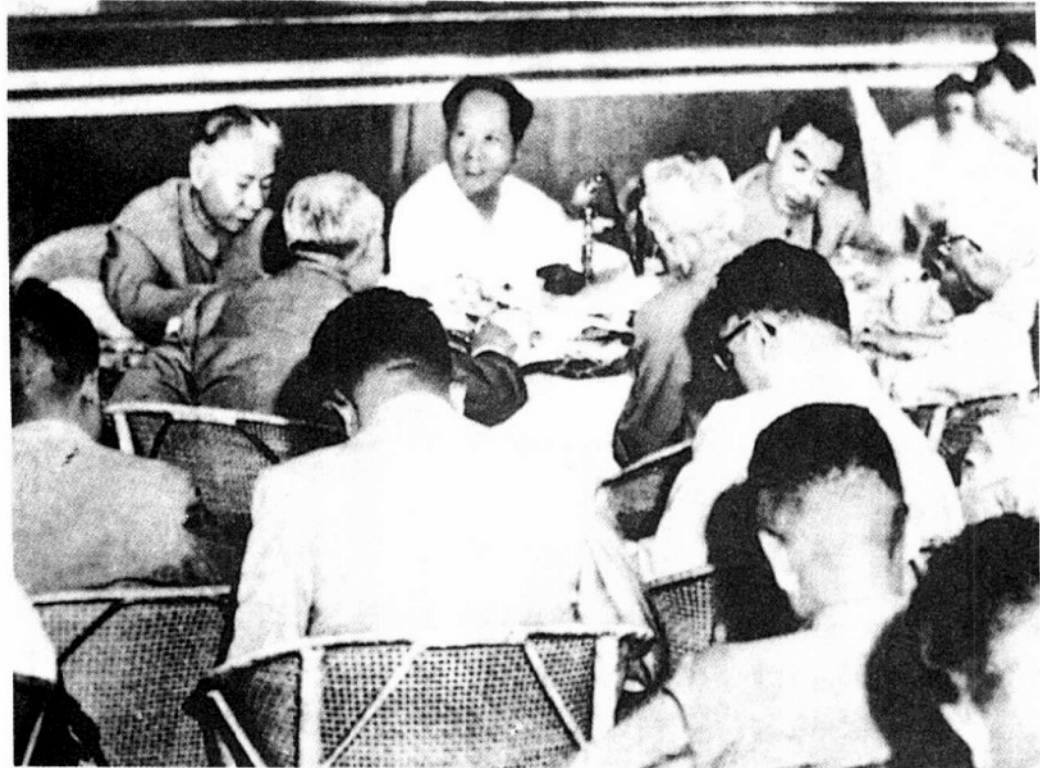


▲青谷村农民举行赛诗会。这是农民王杰三正在朗诵“打场忙”。



▲彭德怀视察河南郑县大营乡红星农业社时，向农民询问生产情况。

▲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会场，毛泽东主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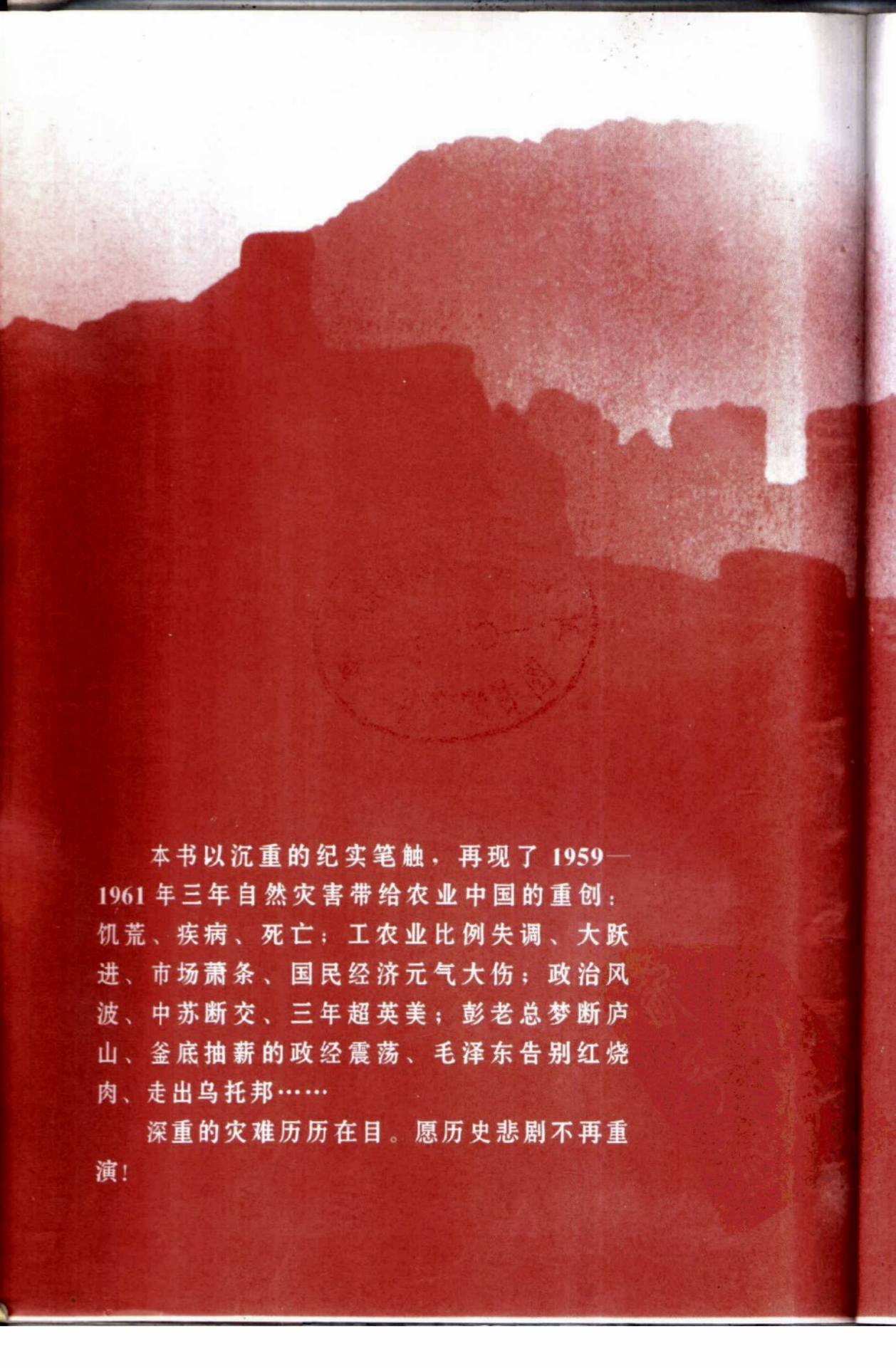
▲毛泽东在庐山



▲1961年底,刘少奇在广州温泉附近山上的树林里拣毛栗子、橡子和苦桔子,寻求解决经济困难时期代食品问题的办法。



▲中央领导人在七千人大会会场



本书以沉重的纪实笔触，再现了 1959—1961 年三年自然灾害带给农业中国的重创：饥荒、疾病、死亡；工农业比例失调、大跃进、市场萧条、国民经济元气大伤；政治风波、中苏断交、三年超英美；彭老总梦断庐山、釜底抽薪的政经震荡、毛泽东告别红烧肉、走出乌托邦……

深重的灾难历历在目。愿历史悲剧不再重演！

# 目 录

中  
国  
，  
1959  
—  
1961

## 前 言

1

## 第一章

红灯，在1959年的日历上闪烁 3

- 春寒料峭
- 1959年的几个不寻常日子
- 三分天灾

## 第二章

在饥饿与死亡的边缘 28

- 数字背后的困顿
- 口号声中的哭泣
- 目击者的口述
- 多灾的年月
- 死亡参数
- 饥饿之中的阴影
- 河南的悲剧

## 第三章

农业大国究竟怎么了 71

- 根部出现了蛀虫



# 目录

中国

1959

1961

SAN NIAN ZI RAN ZAI HAI

三年自然灾害

- 贫瘠土地上的参天大树
- 父母为何只偏爱他
- 赤字·通胀
- “艳若桃花”的伤口

## 第四章

苦果早已种下

105

- 吹牛皮的后果不妙
- 人民公社的风起和整顿
- 人祸难补
- 彭德怀“请为人民鼓咙胡”
- 周恩来万没料到的
- 新“大跃进”出台
- 沉重的钢铁
- 让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
- 农业赔惨了
- 19 亿元赤字的背后

数字如骨  
PDG

目录

中国

1959

1961

第五章 左右倾的庐山 143

- 神仙会
- 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 军事俱乐部
- 扩散的庐山冲击波
- 大跃进：1960

第六章 釜底抽薪的震荡 214

- 重病之下的中国
- 又一次闪电行动
- 甩手丢下个乱摊子
- 风云弥漫的 1958
- 中印边界冲突背后
- 日益加深的毛、赫分歧
- 1958~1959 苏中有约在前
- 冲突在布加勒斯特

PDF

# 目录

中国

1959

1961

SAN NIAN ZI RAN ZAI HAI

三年自然灾害

- 瘫痪的经济大动脉
- “逼上梁山”

## 第七章

走出乌托邦

250

- “上帝”没有预言
- 告别“红烧肉”
- 勇于自责的领导人
- 玉米面糊糊里的营养
- 法官的眼睛最亮
- 正宗的“四川泡菜”
- 耕种南亩，心系人民
- 苦瓜能明目
- 患难见真情
- “耕地不用牛”的时代还很遥远
-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 “沧海桑田”并非传说
- “老大哥”的气魄

PDF  
PDG

目  
录

中  
国

1959

1961

- 地球发抖了
- 而今迈步从头越
- 两副重担一肩挑
- 没有硝烟的战场
- 钢铁长城
- 超越自我
- 黄土地永远是根

第八章

春去春又回

290

- 走出误区
- “跃进战车”被迫停驶
- 勒住病魔的咽喉
- 再补一枪
- 云压得很低
- 梨酸不酸，一尝便知
- “食”不我待
- 注入强心剂

数字水印  
PDG

# 目录

中国

1959

19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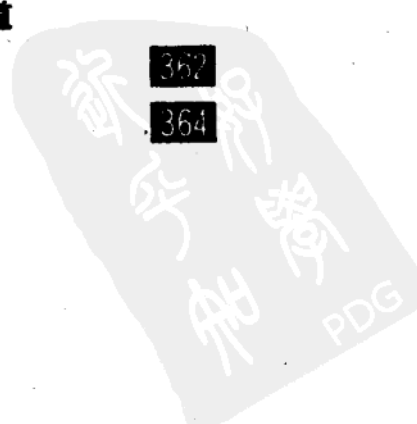
- 喝点减肥茶
- 锅、碗、瓢、盆
- 红灯停，绿灯行
- 算好当家这笔帐
- 各路诸侯会京师
- 不平静的中南海
- 伤筋动骨的再调整
- “航空母舰”与“护航舰”
- “洗澡”
- 一个好汉三个帮
- 媳妇有身孕，丈夫倍体贴
- 发现误诊
- 拨云见日
- 两个“三七开”
- 走出沼泽地
- 三十年以后才知道

参考文献

后记

362

364



# 前 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年历上，记录着从1959年至1961年上千个不寻常的日日夜夜，天灾威胁着人们，饥饿考验着人们，960万平方公里的上空阴云弥漫。中国人民经历了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终于走出困境的艰难岁月。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30多年前的历史早已有过结论，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有明确的表述：

“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1960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的方针，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决策。这是这个历史阶段的重要转变。”

历史的经验不能忘记，认识昨天是为了更好地珍惜今天。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为中国人民展现了美好的前景。我们坚信，历史的悲剧决不会重演！



## 第一章

# 红灯，在 1959 年 的日历上闪烁

- 春寒料峭
- 1959 年的几个不寻常日子
- 三分天灾



## 春寒料峭

历史将永远记住1959年！年轻的共和国10岁生日收到的礼物，是一场长达3年的饥饿与浮躁的洗礼。

毛泽东在神州大地上亲手插起了“三面红旗”。红旗下，他看到了：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

事实上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谷撒地 薯叶枯

青壮炼铁去 收获童与姑

来年日子怎么过

请为人民鼓吹胡

微风习习的北戴河海滨，毛泽东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毛泽东说此话时神采飞扬，气吞万里。可是，当他狂喜地以为通过急行军他已经把6万万中国人民领到了共产主义的门槛前却又忽然发现前面竟是一个海市蜃楼时，毛泽东手中那高高挥舞的指挥棒僵住了，回首望去，他亲手设计建造起来的共产主义宏伟大厦的粮仓里，米粒只剩下了薄薄的一层……

1959年初，全国的战略储备粮食只剩下330亿斤，6亿张嘴一平均，每人就只剩下了50斤。

湖北省。春荒在这片富饶的水乡地区瘟疫般蔓延。曾经为共和国培养出200个将军的红安县，和同样是革命老区的麻城县、谷城县、孝感县，都发出缺粮的呼声。仅仅湖北一省就有170余万人口的重灾区。九省通衢的武汉市，这个拥有2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曾经一度处于供应紧张的状况之中，引起了许多人的怀疑、误解和责难。

河北省。4月底5月初。30多个县发生粮荒，情况严重的10多个县已揭不开锅。

广东省。粮食情况更为严重。5月初全省城镇库存粮食仅够几天之用。令人痛心的是：崖县、南雄、罗定、钦县等地，据不完全统计，不但饿肿了10930人，而且还饿死了134人！

山东省馆陶县。仅到邯郸一地逃春荒的就达13000多人！

6月份。形势全面紧张。据粮食部报告，全国各大、中、小城市和工矿区供应的粮食，都是随调随销，挖了1958年的库存，预支了1959年的库存，全国范围内已几乎无粮可以周转调运。食油的供应，也很困难，许多城镇不但随调随销，而且还经常脱销，以至于中央不得不在5月作出决定，在6到9月的4个月时间内停止对农村的食油供应。

粮食！粮食！到处是张开的口。粮食的盟弟——副食品和生活用品呢，它们的紧张程度比起粮食来竟毫不逊色。

1959年2月，轻工业部党组向中央报告：“纸张、缝纫机、保温瓶、食糖、乳制品、搪瓷面盆、搪瓷口杯、胶鞋，去年二

季度末已经开始感到供不应求，而现在更加紧张。原来认为不紧张的甚至还有富余的产品，如肥皂、火柴、皮鞋等也已出现了脱销，京、津、沪对肥皂采取了限购办法，河北某些地方对火柴也实行了限购。日用陶瓷也十分紧张，沈阳、唐山、山东都曾出现过买不到饭碗的问题。

轻工业和农副业一向比较发达的上海、浙江，副食品和日用工业品的供应也出现了全面紧张的状况。上海、浙江给中央的报告反映：上海的猪肉供应定量4月下旬由每人每月12两降为6两，5月份以后，就连6两也无法满足供应。北京地区居民每天只能吃到1两蔬菜。

浙江省1至5月份的猪肉、家禽、鲜蛋的供应量比1958年同期减少了60~85%，小百货、小五金、小手工业品和日用杂货等的供应，也减少了很多。由于供应紧张，全国大部分地区不得不对许多商品实行凭票限量供应，有些地区实行限量供应的商品竟达到了几十种之多。

基建项目纷纷下马，中央批准的重点项目下马500多个，地方项目5千到1万个，真正建成的只有6个。

1958年新招职工2080万，一年需多付工资五十个亿。

大批工厂停工待料，工人无所事事。

印有MADE IN CHINA的出口商品借箸扫地，出口到瑞士的煤炭，里面三分之一是石头。

外贸逆差7个亿，财政结余用光，银行无奈只得增发钞票。全国各地都亮起了红灯，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俯瞰三十余年前的那一段令人摇头叹息的往事，由果索因，不难得出对灾难原因的清晰认

识。

第一，1958年夏秋粮食征购过多。1958年是历史上少见的大丰收年，但是，由于全民大炼钢铁和其他各种“大办”过多地抽调了农村的劳动力，因而，1958年秋收时，全国各地普遍出现农作物丰产不丰收的情况，大量成熟的农作物果实因无人收拾而烂在地里，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据估计损失至少一至两成。虽然这样，1958年的粮食产量还是达到了4000亿斤。但这一年的粮食征购量却是根据原来公布的7500亿斤的高估产数字确定的，远远多于1957年。这样，高估产引起的高征购，就必然使农民手中的留粮太少，致使1959年春天农村大闹春荒。

第二，农村公共食堂浪费太大。在大办人民公社的过程中，全国农村普遍办起了以生产小队为单位的公共食堂。在当时，农村公共食堂被视为生活集体化的重要内容，被看作是实行供给制的主要方式，而且，还被认为具有节省时间、人力和物力等多方面的优点。但是，事与愿违，大办农村公共食堂，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给广大社员带来了生活的不便，而且，还因为鼓励社员放开肚皮吃饭，以及“日食三餐干的”等，造成了粮食的极大浪费。正像当时有人说的那样，“一日吃了三日的粮”。公共食堂造成的粮食浪费也是农村严重缺粮的重要原因。

第三，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失调。由于大跃进以来一直实行着“以钢为纲”的发展方针，过分强调钢铁工业的发展，忽视以至挤掉了农业、手工业和轻工业，造成了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的严重失调，钢铁工业的畸形发展，而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业、手工业和轻工业的生产却遭受了极大的损失，这种情况，必然会导致市场供应的紧张。

第四，社会购买力急剧膨胀。由于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的不断增长，商业购销中又实行了预付货款和赊销商品的办法，加上国家又拨发了大炼钢铁的损失补贴几十亿元，造成了社会购买力的急剧膨胀。1959年上半年，全国城市购买力比1958年同期增长了30%以上，社会购买力和商品供应量之间的差额高达40亿至50亿之多。这就必然会导致市场供应全面紧张局面的出现。

1959年的春天，春寒料峭，虽然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依然在神州大地上飘扬，但是，长达3年的自然灾害，在这个春天，已开始悄悄地攫住了六万万个身影。

## 1959年的几个不寻常的日子

1月5日。从1958年才开始成为工人阶级成员的2000余万新招职工还没有从元旦的喜庆中冷静下来，就被一个比春寒还要冷几倍的消息震惊了。

1月5日这一天，中央发出了《关于立即停止招收新职工和固定临时工的通知》。通知中说，1958年全国工业和建筑企业共增加新职工2000余万人，相当于原有职工总数的两倍，在新增加的职工中，从农村招收的为1000万人左右，占百分之五十强。为了控制职工队伍的急剧扩大，进而抑制社会购买力的急剧增长，中央要求各个企业事业单位立即停止招收新职工和固定临时工。某些单位确实需要增加新职工，应从本地区内其他单位的多余职工内进行调剂。各省、市、自治区1959年劳动力计划，必须报请中共中央批准，批准以后，要严格按照计划招工。

中共中央1月5日的《通知》发出后，许多省市着手压缩职工人数，精简多余人员。许多才做了几个月城里人的农村新招职工不得不背起行李卷回家了。

2月2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关于市场情况和轻工业生产问题的报告》。报告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切实加强对市场的领导，力争在第一、第二两个季度内，把市场供应基本上调整好，各地区、各部门必须在商业工作中，切实贯彻“全国一盘棋”的精神，严格服从国家统一的调拨计划。中共中央还责成商业部门迅速提出改进商品管理办法的具体方案，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后执行。

从1958年冬季到现在，市场上出现了一些副食品供应严重不足的情况。就此，《报告》提出：（一）粮、棉、油的产量比过去大为增加，但是由于收购少，销售多，粮食全年库存比去年减少50亿斤，油料库存比以往哪一年都紧，许多城市只能供应几天、十几天。（二）有些副食品会长期短缺，必须注意增产副食品，同时还要适当减少农村消费量。（三）一部分日用工业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比较紧张。主要原因是原材料不足。一方面是去年下半年以来农村劳动力紧张，土特产品减少，一方面是供轻工业用的钢铁、五金材料供应紧张。这就要求保证原材料的供应，并积极增加生产。（四）目前市场上排队争购的现象很多，采购人员满天飞。地区之间盛行物物交换，有些商品居然发生了黑市，价格高于国家牌价很多。

4月29日。毛泽东用《党内通讯》形式，给省、地、县、公社、大队、小队干部写了一封信。针对当时农业生产方面存在的实事求是作风，谈了包产、密植、节约粮食、播种面积、机械化、认真化6个问题。毛泽东认为，在包产问题上，生产队

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搞上级的那一套指标，只管现实可能性。在密植问题上，要因地制宜，要由生产队商量决定，不要由上面下死硬的密植命令。粮食问题上，10年以内，切不可讲任何大话和高调。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抓得很紧很紧。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在播种面积问题上，目前几年应当实行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相结合的方针。在作风问题上，一定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毛泽东提出要在4年以内小解决，7年以内中解决，10年以内大解决。

此刻的毛泽东很清醒，这位出身农民家庭的领袖，在受到农业的惩罚以后，开始把翱翔在云端的思想降落在地平线上。

4月30日。陈云写信给中央财经小组，专门谈市场问题。

冷静的经济学家陈云认为，为缓和市场的紧张状态，（一）粮食要省吃俭用，去年夏收和秋收后，估产高了，吃用多了，今年以来，城乡粮食销量进一步增加（这一年度比上一年度要多销粮食180亿斤），库存量下降，到处供应紧张。因此，不管今年粮食增产多少，都必须省吃俭用、控制销量。我国的粮食问题还没有过关，粮食定，则天下定，粮食紧则市场紧。粮食现在仍然是稳定市场的最重要物质。（二）组织猪、鸡、鸭、蛋的供应，改善生活，吃是第一位的，今年市场供应与购买力之间的差额约为四五十亿元。如果能想办法增加10亿元的猪、鸡、鸭、鱼和蛋类供应，在弥补差额上还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使市场紧张状态有所改变。组织上述食品的供应，必须从生产入手，发展养猪养鸡养鸭，国家、集体、个人三种形式可以同时进行，而在目前由农户分散喂养可能是最可靠和收效最快的方

法。(三)要专门安排日用必需品的生产，应该专门拨出一部分原料和材料用于此。原有生产小商品的工厂，如果已经改行，则应该让他们“归队”。(四)对上年多招收的1000多万工人，应该认真精简下来，以便压缩一部分现有的购买力。今后必须严格控制职工人数。增加城市劳动力的计划，必须由中央和省、市党委掌握。(五)在运输紧张的情况下，要优先安排供应市场的物质所需要的运输力量。工业不要和农业、商业争短途运输力量。

陈云是我党杰出的经济学家，他渊博的知识、敏锐的洞察力在我党中是数一数二的。有一段时间他靠边站了，大概是因为毛泽东讲了一句气话：“只有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但4月30日的这封以事实为基础的雪中送炭的信，使得几个月后毛泽东不得不说：“看来陈云是对的。”

5月2日。毛泽东批发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昌黎工作组副组长王绍飞写的《河北省昌黎县最近公社的工作情况及问题》。

王绍飞的信分为四个方面：分配问题、生产指标、粮食问题、大集体和小自由集体的利益兼顾问题。

信中谈到生产指标脱离实际太远，比没有指标要坏得多。因为它伤害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包括基层干部和群众，他们对农业生产有科学的估计，人人心目中都有数。从果乡公社来看，1959年的农业生产用最大的努力可以比1958年增产50%—70%，亩产可达到450斤到500斤，再多没有可能，但上边分配的产量指标是1200斤，距实际很远。

粮食普遍紧张,不少出卖余粮的地区,一日三顿稀饭(施各庄、段店等地),难以支持劳动,也影响干劲。最严重的是乐亭县,每日只能供应半斤粮,现在吃白薯秧的叶子,有些人到果乡公社的地方搞白薯干。

由于粮食方面发生问题,牲畜和猪的发展也受到很大影响。

毛泽东读罢王绍飞的信,沉思良久,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他难以想象事态竟如此严重,终于,毛泽东提起那支心爱的狼毫笔,用潇洒的毛体作了指示:

河北昌黎县的情况和他们所提出的意见,是有普遍性的,各级各地党委都应注意解决,越快越好,如果你们同意,请将此信及附件发给各级党委,一直到生产队的支部书记。

5月7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根据11个省市小麦会议的材料,1959年夏收作物比1958年减少1亿1千多万亩,即减少20%。春播正在进行,但是约有30%的春播地缺乏底肥,由此看来,今年的农业生产任务很有完不成的可能。

《紧急指示》提出了如下的要求:

一、各级党委的第一书记必须在五六两个月内,以抓农业生产为中心,县委书记必须以全力抓农业生产,县委书记必须以三分之二的时间抓农业生产,省委的第一书记必须以二分之一以上的时间来抓农业生产。

二、小麦一般还没有成定局，必须加强后期管理，保证增产，还得准备好秋收工作，做到颗粒归家。

三、扩大春播和夏种的面积，是完成今年粮、棉、油等主要作物的生产计划的决定条件。凡是一切可以春播的土地都要力所能及地种上。

四、养猪头数大量减少的局面必须加以扭转，恢复社员的自留地，做好牲畜配种工作。

五、主席关于农业方面六个问题的意见，应当立即发到生产小队，在群众中普遍地进行传达讨论和执行，贯彻农业生产的八字宪法。

5月10日。当时春荒尚有一个多月至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基本上过去，夏荒的发生也已在意料之中，中央决定把湖北、广东、河北三个省委向中央和主席的报告，转发给各地参考，三省的报告中都较多地谈到了粮食问题，现摘要如下：

#### 湖北省：

最深刻的教训，还是粮食问题。粮食生产的情况，本来是点面悬殊很大，灾情严重，再加上收获粗糙，浪费很多，主要原因是基建规模大，抽调劳动力过多，谷子一般要丢掉一成，有些地方棉花、花生、红苕丢掉两三成。人民公社的一平二调三收款是造成收获上浪费的主要原因，同时又是普遍引起瞒产私分的主要原因。由于农村公共食堂号召“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饭”，从而引起了大吃大喝大浪费。有些地方，吃饭放“卫星”，一天三顿干饭，开流水席。个别地方，还给过往行人管吃管住。这种吃法，农民估计是“一

天吃了三天的粮”。这样大手大脚地搞了三两个月，加上粮食征购任务分配的不尽合理，有些地方卖了过头粮，而我们对征购工作抓的迟了（早稻中稻的征购任务没有抓起来），对销售工作也抓得不紧，与去年同期进行比较，全省多销了9亿2千万斤粮食，这样粮食情况就越来越紧张了。从旧历年到现在，闹粮之风，此起彼伏。真叫假叫，搅在一起，再加上全省有170多万人口的重灾区，春荒相当严重，粮食调运不及时，估计有些地方还有可能发生夏荒。拥有200万人口的武汉市，曾经一度处于供应紧张状态。

### 河北省：

目前我省的粮食局势相当紧张，有三千多个食堂闹缺粮，严重的有10个县。为什么农业大跃进以后，粮食这样紧张呢？固然有因“一平二调”所造成的瞒产私分和虚假紧张情况，但也确有实际困难问题。原来我们预计1958年全省产粮400亿斤，现在落实为280亿斤，去年秋收没有搞好，丢、烂、糟得多，再加上一度放开肚皮去吃，丢失、浪费和多吃了不下百多亿斤粮食。

为了缓和粮食紧张局势，我们研究，应当从安排好群众生活入手，首先解决灾区和缺粮区问题，要一个队一个队，一个食堂一个食堂地进行调查，给食堂算帐，摸清底细，在提高群众觉悟的基础上，对不应该供和供多了的核减下来，对真正缺粮的，要在节约吃粮的前提下，保持最低限度的口粮供应，一定不

能断粮，以稳定情绪。坚决压缩消费指标，城市每人每月吃粮压缩到 30 斤以下，经济作物区每天每人吃粮不超过 1 斤，一般缺粮地区每天每人 14 两，灾区每人每天 12 两，同时发动群众采集代食品，以节约粮食，度过春荒。

### 广东省：

粮食困难不少，但可以过得去，小乱子难于避免，但大乱子不会有。广东到 5 月底 6 月初，有些早熟作物就可以下来，接上夏收也只是五六十天的时间。前一段，我们着重抓农村的粮食安排，因为农村稳定不住，就无法调出粮食给城市。现在看来，这样做大有好处。现在，农村的多数地区已经安排到夏收之前，只有少数地方尚待补课。个别地区（如崖县、罗定、南雄、钦县等）因工作疏忽，饿肿了一些人。但绝大多数是在四月以前发生的，目前粮食工作的重点是给城镇调足粮食，城镇只有几天库存的局面必须迅速改变，粮食出大乱子可能在中等城市与工矿区，广州和港澳的粮食供应问题不大（现在广州粮食库存有大米九千多万斤，够一个多月的供应，现在还在继续调迁）。目前，不仅粮食紧张，副食品、日用品、基本材料供应等也都很紧张。因此，工作中的困难相当大，面对着这些困难，全党必须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密切联系群众，坚决执行中央指示，保证做好工作，始有可能避免出大乱子。

从三省的报告中可以看出，粮食问题极其严重，有的地方还饿死了人。

5月26日。“长铗归来兮，食无鱼。”那些离家“跃进”了一天的人们，披着星星回到家里后，发现不但没有鱼，连生存所需的食油也仅剩眼泪样的几滴。

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采取非常措施解决当前食油供应问题的紧急指示》，指示中讲道，由于食油收购量减少，销售量增加和库存量下降，1959年以来，食油供应出现了四处告急的严重情况：一是出口计划要落空；二是许多城镇随调随销，甚至时而脱销；三是工业和行业用油供应很紧；四是农村用油难以保证，很多地区出现脱销现象。在这种“国家无法面面兼顾，大有顾此失彼”之势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采取非常措施，停止对农村用油的供应，以保证城镇居民、出口、工业和行业用油的需要。在今后5月至9月范围内，除了生产油菜籽的地区、侨汇地区、病号孕妇等特殊需要，大车用油和农业机械用油可适当提供食油外，其他所有农村用油，一律暂停供应。

好苦啊！经历了一天强体力劳动的汉子、妇女们，回到家里只能吃着清水一样的菜汤，加上几块粗拉拉的饼子。孩子们饿得面黄肌瘦，老人们宁可自己不吃也要省下那一份饭给儿孙吃，农村公共食堂里再也没有“日餐三顿干的”那种欢声笑语。每个人面前的汤碗都可以当镜子照。

6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力紧缩社会购买力和在群众中解释当前经济情况的紧急指示》。《指示》中指出：1958年以来，由于各地使用预算外资金和挪用企业流动资金，扩大了计划外的基本建设，多招了大量职工，加上在商业中实行了预

付贷款和赊销商品的办法以及补贴土钢土铁大量亏损等因素，使社会商品购买力急剧膨胀起来，造成市场供应紧张。1959 年全国社会购买力超过社会商品可供量 50 亿元左右。为了缓和市场的紧急状况，中央决定，除了努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增加商品供应以外，必须大力压缩社会购买力。主要措施是：（一）从本年 6 月份起，要求节约公共开支 8 亿元。为把全年的集团购买力压缩到 1958 年的水平，6、7、8 三个月中，除特殊情况外，暂时停止拨发机关、部队、企业事业单位的办公杂支、器物购置等方面的经费。（二）控制企业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本年度要把县以上企业职工人数减少 800 万到 1000 万，从而减少工资方面的支出 15 亿~18 亿元。（三）按照国家计划，严格控制农村货币投放。各地农业贷款指标一律不再增加，农产品预购定金必须控制在指标的范围之内，不许超过。（四）动员城乡居民积极储蓄。在采取上述措施的同时，要由主要负责同志报告目前的经济形势和党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在宣传解释中，应当首先肯定成绩，同时做适当自我批评，应列举具体数字，说明目前市场紧张并不是由于工农业生产没有跃进，而是由于城乡消费量和购买力增长太快。

6 月 13 日。中共中央决定进一步调整五年计划。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调整 1959 年主要物质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并批准国家计委《关于 1959 年主要物质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调整方案的报告》，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根据这个方案安排和组织下半年的生产建设。《指示》指出：中共中央认为，把主要物质的分配方案放在比较落实的基础上，并且根据物质分配方案对基本建设计划加以调整，这是完全必要的。全国的基本建设项目，都必须立即毫不迟疑地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报告中

所提出的各项原则加以削减,以便缩短战线,集中力量完成和提前完成那些最重要的基本建设项目。鉴于材料紧张,基建预备费 18 亿元必须从严控制,不得轻易动用,中共中央还强调指出,必须认清形势,当机立断,否则必将严重地影响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市场供应和重要基建项目的建设速度。同时,对工业生产和物质分配也要作实事求是的调整。

国家计委的报告认为,今年以来,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仍然是很高的,但也存在着必须调整的相当严重的问题:(一)许多工业产品的产量没有完成计划。第一季度统计报表所列的 33 种重要产品中,只有铜、煤、洗煤、机床、卷烟 5 种完成了计划,铜产量只完成原定计划的 66%,钢材只完成原定计划的 76%。(二)运力不足,铁路、公路运输仅能满足各部门要求 80% 左右。(三)物质储备大幅度减少。据 4 月份统计,全国民用煤库存仅够一个半月用的,而去年同期为 4 个月。由于工业生产建设计划订得过高过大,物质分配计划不能完全兑现,使得一些企业处于半停工甚至停工状态,使一些基本建设工程陷于半建半停的状态。根据这种情况,国家计委在报告中对一些生产、建设指标又进行压缩:工业总产值由 1800 亿元调为 1450 亿元;钢由 1650 万吨降为 1300 万吨;钢材由 1150 万吨降为 900 万吨;煤炭由 3.8 亿吨调为 3.4 亿吨;发电量由 410~420 亿度调为 390~400 亿度;基本建设投资由 260~280 亿元缩减为 240 亿元,限额以上建设项目由 1092 个缩减为 788 个。

中共中央指示发出后,各地贯彻得不够有力,截至 7 月 2 日,全国各重点工业企业还有 70% 以上的领导干部没有看到或传达这份中央文件。为此,中共中央在 7 月 7 日又发出《关于抓紧传达中央 6 月 13 日紧急指示的通知》,要求立即严肃检查,

凡未作传达的，至迟必须在7月15日以前认真地作一次传达。

这次调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被动，但有些指标定得仍然过高，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失调现象依然存在。

7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看了李先念、陈国栋关于粮食工作的报告后，提出了几点意见：（一）多种粮，是上策。田头地角，谁种谁收，不征不购。要恢复私人菜园，酌留自留地。（二）农民要恢复糠菜半年粮，有稀有干，粮菜混吃，要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约归己。（三）除灾区外，各地要增加牲口和猪的饲料粮。要在3、5、7年内，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猪。

没有人能体会出毛泽东此时的凄凉心情，建国将近10年了，人民还要糠菜半年粮。公共食堂热火了一阵子，到头来还得恢复私人菜园和自留地，我们把人民领到什么轨道上去了？毛泽东一支接一支地吸烟，陷入沉思之中。

7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粮食工作的指示》。1959年以来，全国粮食由于收购量未完成计划，销售量却大幅度增加，造成库存较上年同期减少。2月25日比上年同期减少12亿斤；4月中旬较上年同期减少66亿斤，全国有十几个省、自治区出现春荒。6月底，全国粮食周转库存减少到难以周转的地步。粮食情况相当严重。为了稳定粮食局势，中央曾在4月21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把城市的粮食销量压缩1/10左右。但粮食情况并未好转。因此，中央再次发出指示，要求对粮食的生产、收购、销售和管理等环节作出全面安排。中央确定：1959年粮食定产为5000亿斤原粮，订购为1100亿斤贸易粮，定销为820亿斤贸易粮，从1959年起到1962年3月不变。中共中央还要求，各个地区在上年借用中央库存的粮食，1959年内应当归还一部

分。各省、市、自治区必须保证完成征购任务，不突破销售计划。

8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迅速恢复和进一步发展手工业生产的指示》。1958年以来，全国10万多个手工业合作社的500多万社员中，过渡为国营工厂的占37.8%，转为联社经营的合作工厂的占13.6%，转为人民公社领导的工厂的占35.3%，保留原来合作社形式的只剩13.3%。由于“转厂过渡”、“经济改组”以及原材料得不到及时解决等原因，全国各地出现了手工业品供应十分紧张的局面。为改变这种局面，中央提出了18条措施，调整所有制和企业规模，规定凡是转为全民所有制以后对生产不利的手工业合作社，要采取适当步骤退回来；由小并大以后，不能保持原有品种和数量的，对人民生活不便的，要适当地划小。手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基本上依靠地方统筹安排，有一些主要原材料由中央统一安排。对手工业按行业、按产品实行分工分级管理，实行经济核算。

这里选取了1959年的十几个有代表性的日子，或许这些闪烁的红灯能画出一条1959年自然灾害降临的轨迹。

### 三分天灾

在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了《书面报告》的讲话，承认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翻开当代中国的气候档案，我们会发现，1959年、1960年、1961年正是自然灾害肆虐最甚的三年。

严重的自然灾害其实从 1958 年下半年就已开始，7 月底至 8 月初，郑州境内黄河流量达  $23000\text{m}^3/\text{s}$ ，黄河郑州铁路桥桥墩被洪水冲毁，交通运输受到了极大的影响。9 月末 10 月初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华南地区，均出现了寒露风天气，使晚稻的抽穗扬花受到影响，空壳秕粒极多。10 月中、下旬，黄淮流域及江淮地区连续三次受南下冷空气袭击，初霜冻比常年提前 20 天左右，棉花等大秋作物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冻害。受冷空气影响，河西走廊在 9 月末，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在 10 月中下旬气温骤降，使辽东半岛、河北、山东、河南大部、江苏和安徽北部的棉花及大秋作物受冻，其中辽东半岛受冻最重。

1959 年。

全国大部地区少雨，干旱范围极广，旱情重。珠江流域和华北的北部洪涝灾害较重。春季冰雹灾害也较重。

干旱。全国出现了大范围干旱。长江、淮河、黄河、汉水流域等广大地区夏秋期间干旱严重。7~9 月份，渭河、黄河中下游以南，南岭、武夷山以北广大地区普遍少雨，总雨量大部分地区只有  $100\sim 300\text{mm}$ ，比常年同期偏少 3 至 6 成。其中湖北、河南、陕西关中和陕南、湖南北部、四川东部等地降水只有  $70\sim 170\text{mm}$ ，较常年同期减少 5 至 8 成！这一带是旱情最重的地区。夏秋期间正是农作物需水最多的时期，而此时雨水却这样奇缺，水乡地区的许多小河小泊都已见底，除有条件进行灌溉的地区外，旱情都很严重。有些地区直到 10 月份干旱还未解除，晚稻、棉花等作物生长受到严重影响，粮食收成锐减。

10~12 月，华南大部地区出现较严重的秋旱，福建、广东和广西这三个雨量充沛的省区，2 个月总雨量仅有  $5\sim 25\text{mm}$ ，比常年同期偏少 7 至 9 成，福建的惠安、厦门、漳州和广东的

梅县、汕头、河源等地居然连续 60 余天无雨, 对农业生产影响极大。此外, 内蒙古大部、甘肃河西走廊、河北北部、陕西北部、辽宁局部地区、吉林中部及黑龙江大部地区,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春旱。

雨涝。珠江流域、华北北部出现特大暴雨。四川盆地西部出现了洪涝。福建、广东、广西大部分地区自 5 月中旬至 7 月中旬持续多雨, 总雨量达 600~1400mm, 比常年同期偏多 5 成到 1 倍。暴雨多, 强度大而且集中, 如 6 月 11~16 日, 广东河源降雨 734mm, 惠阳降雨达 527mm, 雨量之大为历年同期所少见。珠江水位猛涨, 东江流域出现了严重的洪涝、内涝, 早稻的损失很严重。7 月初, 主要雨带移到了华北北部。7 月一直到 8 月中旬, 山西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内蒙古中部和东南部, 总雨量比常年偏多 5 成至 2 倍, 出现了严重的雨涝。以北京为例, 北京 7、8 两月总雨量达 1086mm, 为 1841 年有雨量记录以来同期的最大值, 而且雨量又特别集中, 7 月 31 日这一天就降水 244mm。由于连降暴雨, 使北京、天津、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山西北部、内蒙古局部地区发生严重洪涝和内涝。8 月上旬四川出现大暴雨, 四川盆地西部有 47 个县过程降雨量达 100mm 以上, 雅安日最大雨量为 340mm, 本次降雨使岷江、沱江出现较大洪水。

台风。本年度有 6 个台风在我国登陆, 时间均集中在 7、8、9 月, 地点则集中在广东、台湾、福建、浙江四省。第 4 号台风 8 月 30 日在福建崇武登陆。台风登陆时, 中心附近最大风速达 700 m/s, 中心气压  $930 \times 10^2 \text{Pa}$ , 致使福建、广东东部、江西、浙江、江苏北部沿海及山东半岛等地连降暴雨, 局部地区有大暴雨, 一些地区出现短时涝灾。另外 8 月 23 日在福建厦门至漳

浦之间登陆的台风风力大，摧毁力强，厦门市损失严重。

气温。4月中下旬和5月下旬初，甘肃东部、河西走廊、宁夏南部、陕西关中地区以及黑龙江北部地区出现冻害。9月上中旬在内蒙古中部及甘肃河西走廊、1月中旬在长江下游南岸出现冻害，农作物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河南、云南、陕西、甘肃、福建、宁夏、河北、湖北、江西、内蒙古等省区，降冰雹次数较多，灾情较重。这一年为30年来冰雹灾害较重的年份之一。

1960年。

这一年自然灾害总体情况是：干旱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旱情重。东部沿海地区多台风涝灾，冷空气活动频繁，势力较强，春季还出现倒春寒。

干旱。本年在前一年大面积严重干旱的基础上连续干旱，受旱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这一年的干旱主要发生在春、夏两季，有些地区则是冬春夏三季连旱。北方种植冬麦的地区如河北、河南北部、山东西部、山西、陕西关中、辽宁西部等地，冬春雨雪奇缺，从上年的12月末一直到本年6月，总降水量只有50~120mm，比常年同期偏少3至6成。干旱一直持续到初夏，一般连续着150~180天无透雨，在冬小麦拔节、开花、灌浆的4、5月份，降雨普遍地比常年偏少3至6成，有的地方竟至7至9成。由于降水奇缺，山东省境内的汶河、潍河等8条主要河流断流，黄河下游范县至济南等河段曾有40多天断流！嶙峋的河床清晰可见，同时，许多地方塘库干涸，水井断源，土壤湿度普遍在10%以下。河南、陕西等省也发生了类似情况。这些地方冬小麦的整个生长期都处于干旱之中，旱情十分严重。华南、江西南部、福建大部自上年的10月到本年2月持续少雨干旱，

总雨量只有 50~200mm, 比常年同期偏少 4 至 8 成。广东东部、福建南部沿海降雨量只有 30mm 左右, 比常年同期偏少 8 成以上。3 月份以后大部分地区旱情得到解除, 但广东沿海、海南岛的干旱却持续到 4 月底, 旱期长达 7 个月之久。云南、四川西南部 and 贵州西部一带自上年的 11 月就开始少雨, 出现了冬春连旱的严重情况, 云南北部及四川西昌地区一直到 5 月份的总雨量才仅有 20~50mm, 比常年同期偏少 7 至 9 成, 春旱严重。湖北、湖南、江西大部地区 7、8 月份降水量较常年偏少 3 至 5 成, 部分地区偏少 6 至 9 成, 大部分地区发生春旱, 对正在生长中的中稻、棉花影响极大。

雨涝。从 7 月下旬至 10 月, 由于连续登陆台风的影响, 沿海各省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台风涝灾, 其中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省灾害较重; 8 月份, 吉林、黑龙江两省东部发生雨涝。7 月底到 8 月初, 四川西部 5 天之内连降暴雨, 雨涝中心在安县、绵竹、什邡一带, 过程总雨量双流县为 437mm, 安县为 403mm, 温江、成都、乐山三地市及绵阳地区西部, 雅安地区东部遭受洪灾, 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定损失, 福建南部、广东东部沿海有短时春涝。广西自治区 7 月内暴雨连天, 涝灾严重。

台风。西北太平洋上生成的台风, 有 8 个在我国登陆。登陆的地点主要在广东、台湾、福建三省, 其次在辽宁、山东。本年度的台风多沿着海岸北上, 使得沿海各省及东北的长白山地区出现大片涝区。6 月 9 日在香港登陆后向东北方向移动的第 1 号台风, 使广东、福建、浙江地区出现了暴雨和大暴雨, 如宝安 6 月 8 日这一天的降雨量就达 250mm 之多, 部分农田沦为泽国。第 5 号台风 7 月 28 日在山东半岛登陆后又在辽宁锦州附近

登陆，席卷东三省，所经地区降了暴雨，黑龙江东部地区出现涝灾。第7号台风8月初在福建省连江县登陆后，北上经浙江西部、安徽、江苏北部入海，又转向西北，再次在山东半岛上登陆，所经之地皆大雨倾盆。受灾最严重的要数福建省了。

气温。1月20~26日，由于受强冷空气影响，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过程降温13~17℃，最低气温降到-4~-7，南岭至两广中部最低气温降至2~-2℃，致使油菜、甘薯以及经济作物遭受不同程度的冻害。4月份冷空气活动频繁，月初因受强冷空气影响，出现倒春寒，长江中下游地区已播早稻出现烂秧现象，春播天气气候条件较差；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和东部、山东南部、江苏和安徽两省北部，最低气温下降到了0~3℃，出现晚霜冻害现象，冬小麦发生了不同程度冻害，其中以安徽北部受害最重。5月19~20日这两天，甘肃河西走廊出现冻害。5、6月份黑龙江大部、吉林部分地区气温偏低。秋季，华南大部地区、长江中下游两岸、湖南等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寒露风天气；四川盆地秋雨危害较重；北方冬麦区大部地区，5月21~24日、29~30日和6月1~6日，连续出现三次干热风天气过程，使得冬小麦受到一定程度的危害。

1961年。

这一年的灾情总体状况是：全国大部地区雨水偏少，旱情较重，冬小麦遭受“卡脖子旱”。北方冬麦区遭受较重干热风危害，雨涝范围小，但局部地区灾情较重。

干旱。这一年的3~6月，北方出现了大面积的干旱。河北、山东西北部、内蒙古大部及东北地区西部，总降雨量仅有50~100mm，比常年同期偏少3至6成，尤其是3月下旬至4月中旬，正当冬小麦拔节、孕穗大量需水阶段以及春播大忙期间，大

部分地区雨水稀少, 邯郸、德州、济南、菏泽等地滴雨未落, 冬小麦的生长发育和春播进度很受影响。江淮平原 6 月上旬进入梅雨时节, 梅雨弱、雨期短、旱情处于不断扩大之中; 7 月份降雨偏少, 直到 8 月初, 江苏和安徽两省大部分地区旱情才得以解除, 其余地区干旱则一直持续到 8 月底。河南南部、湖北北部一带, 4~8 月长期缺雨, 总雨量比常年同期减少 4 至 7 成, 加上这一带连续三年受旱灾控制、苦难深重。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大部、四川东南部、贵州东北部 6 月中旬至 8 月也少雨干旱, 中稻生长也受到较大影响。新疆的部分地区冬春无雨雪, 伊犁河流域、巴音郭楞州、昌吉州出现干旱, 其中伊犁河流域旱情最重, 小麦基本无收!

**洪涝。**4 月中下旬珠江流域进入雨季, 5 月中旬就有台风在广东登陆, 台风涝灾严重, 福建南部、浙江北部、江西南部、广东西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省区由于连续受到台风影响, 部分地区发生了洪涝灾害。6 月中下旬, 四川省经历了一次较大范围的暴雨过程, 暴雨中心日最大雨量在 250mm 以上, 过程雨量在 200mm 以上的有 29 个县, 涪江上游和岷江下游出现了较大洪水。7 月中旬以后, 河北东部、山东西北部连降暴雨, 涝灾严重。

**台风。**全年共有 11 个台风登陆。台风登陆地点主要集中在台湾, 其次是广东、浙江、福建。10 月 4 日在浙江三门登陆的台风正值晚稻灌浆、成熟期, 损失惨重。

**气温。**1 月 17—19 日, 广东、广西两省区北部以及福建、江西、湖南、贵州四省南部地区遭受到强冷空气的袭击, 最低气温降到了一 2℃~—5℃, 致使冬甘薯、木瓜、荞麦、芭蕉、蕃茄以及云南的小麦遭受严重冻害, 4 月 9 日、10 日两天, 山西

运城、临汾地区的部分县，小麦受冻达到了 35%~40%。从 5 月末到 6 月初，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安徽北部、陕西中部先后出现 3 次干热风天气，致使冬小麦受害严重，从而减产。

风、雹。春季全国很多地方遭受风、雹之灾。尤以 4 月底至 5 月初的一次大风，危害很大，如新疆吐鲁番盆地风速超过 40 m/s，持续 8 小时之久，为历史上所罕见。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陕西等省，由于风多、风大，有的夏收作物被吹折刮断，有些春播作物的种子、幼苗被砂土埋没或刮走。春夏之交，云南、内蒙古、安徽、宁夏等省区先后出现过冰雹灾害，秋雨连绵也是本年一大灾害。陕西、山西两省南部、河南西部、四川东部、湖北和湖南两省西部秋雨量比常年偏多 2 倍以上，给秋收、秋种造成了极大不利。



## 第二章

# 在饥饿与死亡 的边缘

- 数字背后的困顿
- 口号声中的哭泣
- 目击者的口述
- 多灾的年月
- 死亡参数
- 饥饿之中的阴影
- 河南的悲剧



## 数字背后的困顿

1958年，刚刚解放不久并连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心开始沸腾了，脑子的热度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就在云里雾里的幻想中，建筑着一个理想的强国之梦，建筑着旧社会想也没曾想过的海市蜃楼般的理想大国。

肥皂泡在刚刚被吹起的时候，颜色总是很美，特别是在阳光的折射下，可是，它不久就会破灭，在那一刹那的欢悦过后，留给人的只有那无尽的遗憾。

1958年，经过了严重的浮夸虚报后，全国统计的粮食产量竟高达7500亿斤，看着这上涨的数字，领导人高兴了，欢笑了，觉得中国人民了不起，天大的事都敢想，再难的事情也敢作，“不是做不到，而是想不到”。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事情并非总是循着人们的意愿来发展。后来经过了核实，统计的数字出现了巨大的偏差，粮食的产量实际上只有5000亿斤（其实这个数字也不准确），棉花也不是当时虚报的6638万担，而是4200万担，职工人数也猛增，呈直线上涨的趋势，1958年底全国的职工总数高达4532万人，其中光在“大跃进”中新增的就达2082万人，1959年，虽然中央决定减少1000万至800万人（到8月底已压缩掉507万人），但是，从9月份起，却又重新增加了，到1959年底，竟增加了536万人之多，全国共达到4561万人，比1958年底还要多29万人。

经过反“右倾”和拚设备，拚劳力，拚资源的蛮干，主要的重工业产品产量是拚上去了，1960年1月国家统计局宣告：

1959年钢完成1335万吨（实际上是1387万吨），比上年的好钢增长了67%（实际上是73%），煤完成了3.478亿吨（实际是3.69亿吨），比上一年增长29%（实际上是36.6%），粮食完成5401亿斤，比“核实”公布的1958年的产量增长了14.7%，其他项目以及工农业总产值，财政收入等分别增长了10~50%之多，因而说实现了全面的“大跃进”。

但是，实际上1959年的国民经济存在着极为严重的问题，广大人民的生活极为困难，到1960年和1961年，无数的老百姓挣扎在饥饿与贫困的死亡线上。

据薛暮桥后来奉周总理之命重新核实的数字表明：1958年的实际粮食产量，并非有八届八中全会“核实”公布的5000亿斤，而是只有4000亿斤，1959年的粮食产量，也并非当时公布的5401亿斤，而是3400亿斤，即比公布的数字要少2000亿斤之多！跌到了1954年的水平上（1954年的粮食产量是3390亿斤）。棉花、油料等产量同样有不同程度的虚夸。1960年的油料作物的产量比1957年的产量减少将近一半，比中国共产党掌权后的任何其他年份都要低。甘蔗和甜菜的产量陡然下降，到1962年几乎降到1957年产量的三分之一，到1962年肉类产量只有1957年水平的一半。

——理想之光幻灭了，而在这种幻灭中，有多少百姓付出了无尽的血汗和泪水。

农业生产的大幅度下降，又加之工业生产中轻重比例的严重失调，致使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结构呈现出严重的畸形发展状态。

——老百姓们开始埋怨了，一些高层的领导干部们渐渐地也开始觉醒了，他们从一个个虚报的天文数字背后，从那老百

姓们流泪哀求的眼里看到了祖国即将面临的危机，看到了那数字折射的阴影。

他们在呼吁：他们在向最权威的高层领袖，旁敲侧击地提醒着——

“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容易犯官僚主义，当然也不是铁托所讲的制度上的问题，因为党的威信提高，群众信任，因此行政命令多，马克思在巴黎公社问题上就讲过，无产阶级专政要防止官僚主义，防止的办法有两条：一是工作人员经过选举，群众有随时罢免之权；二是工资等于最高的技术工人的工资。如除四害，虽与人民利益相违背，在一定的时候也可以做到，因为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高。

“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在内。”

诚然，彭德怀讲不出多少高深的理论，他所谈“无产阶级专政后容易犯官僚主义”也只是引用马克思的话。但关于“吃饭不要钱那么大的事，没有经过试验”这句批评，则是根据自己的耳闻目睹感受到的。

继彭老总以后，还有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他也在不停地讲着——是同一声调——这是中南组的会场。

“大炼钢铁，全民上阵，土高炉，小转炉，炼出来一大堆废物，劳民伤财呵！北戴河会议硬要1958年比1957年翻一番，弄出‘一〇七〇’的高指标，不是头

脑发热是什么？”

“公社化运动一股风，轻率地改革所有制关系，好像一夜之间就能跨进共产主义，这是指导思想上的重大偏差，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蠢事。去年武昌会议之后，彭老总来湖南想看看大跃进的真情，我陪他到湘潭的乌石、韶山，还有株洲走了一趟，沿途看到不少公社为了搞集中居民点，房子拆迁一空，还有上千人挤到一块20亩大的田里搞深翻。如此轰轰烈烈，一路上县委书记们偏偏都叫喊严重缺粮，再下去要饿肚皮。后来彭老总还想去平江，我说你去看看，那地方‘共产风’刮得最凶，干部强迫命令也很厉害，哪里是老百姓愿意吃大食堂呢？群众给我写信，多数是‘食堂反对派’，他们总结了六条弊端，叫做不利于节粮、养猪、造林、积肥，而且浪费劳力，吃得不舒服，有什么根据非要说群众有积极性呢？”

这位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仿佛憋了许多的怀疑和焦虑，而今非要一吐为快，可惜，这样的省委书记实在太少，在当时仅是凤毛麟角而已。因为这样的发言，使他也未能逃脱掉类似彭总的厄运。

也是在中南组的会议室里，共和国第二把手不无感慨地说：“去年11月、12月大吃大喝。当时老农已提出了警告，今年不可乐观，像武汉，大家挨饿，给你们调粮。”

听到此言，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立即向国家主席作沉痛的检讨：“嗯嗯！比1954年水灾更困难，500万人口每天每人几两粮，吃稀饭，教训才深刻！什么密植、高产、放‘卫星’，

老老实实地说是在说假话！”

无疑，刘少奇对大跃进失误的认识是极清醒的，他作为共和国的第二把手，又怎能不为人民着想，不为人民而担忧呢？

还有周恩来同志，在庐山会议期间，他心里一直很沉重，他知道眼下全国性的粮荒正在可怕地蔓延，广西、安徽、河南、云南、甘肃等省区已经流行浮肿病，个别地方甚至饿死了人。更令他焦灼的是，全国大城市也缺粮严重。在会议期间，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已经急得开不下去会了，跑来向他诉苦说，白天黑夜都有人把电话打到庐山来找粮食部催要粮食，各地纷纷告急，有很多城市，如沈阳、大连等，都只有几天的库存了，而不少地区的农民不但再也挤不出粮食，反而要靠国家返销，叫粮食部去哪里调粮呵！

他想到，去年各省纷纷拍胸脯，争报高指标，统计出来的数字大得吓人，全国粮食预计产量超过10000亿斤，北戴河会议便据此将1958年粮食总产定为7000亿斤（后经核实仅为4000亿斤），登报向全世界吹牛。从党中央主席肇始，全国提倡“吃饭不要钱”，把五亿农民赶进公共食堂里“放开肚皮吃”。城市里，因大跃进，一下子2900万人进城吃商品粮。如此几头落实，不闹大饥荒才怪呢！可是，更要命的是，今年的粮食指标怎么办呢？

周恩来万分忧虑，他想起了前两天“当众吃南瓜”的事来。那是在庐山大厦里，他去看望文艺团体，当时江西省赣剧团正在排练，周恩来潇洒地走到乐队指挥的位置上：

“来，我指挥大家唱支歌。”

歌声很快把他和演员们融在一起。情绪达到最高潮。

当午饭时间到时，周总理说：

“我就在你们这里吃饭。”

“我们可是吃南瓜呀！”一个娇小的女演员嚷道。那年月，寻常百姓已经不大容易沾荤腥，即使是为这个重要会议服务的专业剧团，也是顿顿大锅菜。

“吃南瓜好啊！”

“莫哄我们喽！总理，你会吃南瓜？”

“我不信！我不信！”那女演员似乎半是激将，半是娇情。

周总理笑着朝餐桌走过去，果然见有盘煮南瓜，便抄起筷子就去夹。

“南瓜好哇，”他边大口吃着，边说：“我们红军过去在江西苏区，就是吃红米饭、南瓜汤。‘天天吃南瓜，打倒资本家’，大家快吃南瓜呀！”

现在想起当时他“当众吃南瓜”，是那样轻松、调侃。他脑子里不时地跑出个陈国栋。粮食部长急得授了主意，向他和李先念请示，是否给毛泽东写个报告，委婉地请求压减当年的征购数。周恩来几番苦思，几经权衡，点头了，但他嘱咐陈国栋要换种方式去说。他似乎已经感到了什么。至于“要不要”

后来陈国栋在《周恩来与粮食工作》一文中回忆此事时，这样写道：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主席问过当年的粮食产量会有多少。由于当时浮夸风、高指标、高征购盛行，我说低了不行，于是我就写了一封信递呈请，用另一种方式去讲。我说粮食产量大概有5000亿斤左右，‘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当时有的地方提出这样的口号，我把这句话借用了），全国按4000亿斤安排，留1000

亿斤余地，余地留得大一点。这样讲，我想主席是会同意的，因为留有余地是主席历来提倡的。我信里提的这个意见，事前向李先念同志报告过，向总理报告过，对这个意见，毛主席没有批评我，还作了批示，批到会议上去讨论，批的内容，我记不清楚了。”

“直到1960年，全国还存在高指标、高收购的现象，全国粮食产量究竟有多少？为了弄清实际产量，我们提出帮助农村社队过秤入仓。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落实产量。谭震林同志当时主管农村工作，他是支持我们搞这项工作的。向总理报告，他也同意。假如没有主要领导人点头，我们是不敢办的。最后产量落实下来，1960年的粮食产量2800多亿斤。这样便产生了进口500万吨粮食的依据。”

一个最古老的农业大国，拥有5亿多农民，终于弄到了要买外国粮食的境地！这是历史的惩罚，也是虚报浮夸所得来的应有的结果。

数字是无情的，它代表着一种事实和结果。然而，那些虚假的数字，它带给人的只能是一种虚伪和欺骗。

## 口号声中的哭泣

工农业发展的停滞与倒退，直接导致了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降低，尤其是在当时极“左”思想的影响下，人民在一阵高过一阵的口号声中麻木了，迷惘了，粮食的供应量在一天

天的减少——

在当时，现代部门劳动力的空前增加对国家实行粮食定量配给以及市场供应的其他食品提出了不寻常的要求。尽管增加的许多劳动力要么是单身男子，要么是家属留在农村地区的合同工和临时工，但当时的城市人口仍增加了3100余万人，国家通过粮食定量配给制度供应粮食的人数增加了2800多万人，符合粮食定量配给条件的人口的比重，在1957年和1960年之间，增加了三分之一，从15%左右增加到20%左右。

投资的大量增加和城市人口的极大增长，这两者导致国家对农村人口提出了空前的粮食需求。

饥饿，在威胁着数以千万计的百姓的生命。

1958年，公粮和义务交售给国家的粮食在1956年和1957年的平均数上增加了1000多万吨，1959年，粮食的收购量竟然高达6740.5万吨的空前高额数字（见下页《粮食收购量占产量比重》图表）。此外，由于粮食产量因受自然灾害的严重破坏和影响，产量与1957年相比还降低了2500万吨。交售量相当于总产量的39.7%之多，如此的征购，农民剩下的粮食寥寥无几，连最基本的生活都难以维持。尽管后来有些粮食又逐渐给农民消费者，但是，国家在1959年购买的粮食和除运销的，仍然占总产量的28%，大大地高于1957年的17%的净收购率的水平。

在征购粮食的过程中，全国各地演出的则是一幕幕催人泪下的不堪回首的场景。那放出高产卫星的人们，刚刚沉浸在肥皂泡般的色彩斑斓的喜悦之中，还没有醒悟过来，便又转入了极度悲泣的痛苦境地，他们领悟到，那虚夸的卫星数字，换来的必将会是腹中空空的代价。在高额征购的逼迫下，他们不得

不把剩余无几的粮食，倾囊而出。那些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的干部们，为了完成征购任务，也不得不用那在旧社会里才使用过的逼债的办法，威逼人们送交公粮，最后，虽然征购的任务是完成了，可是百姓们却绝望了，他们的妻子、儿女们无奈地在那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在风雨中奔波乞讨；他们不得不在旧社会时曾有过的那样——去吃树皮，吃野菜，吃草根；他们也不得不把那还没有长成的牲畜，一头一头的宰杀，以挽救奄奄一息的无数骨肉亲人的生命。

### 粮食收购量占产量比重

单位：原粮万吨

年 份	产 量	收 购 量		收购量占产量%	
		合 计	其中： 净收购	合 计	其中： 净收购
1952	16,391.5	3,327.0	2,819.0	20.3	17.2
1953	16,683.0	4,746.0	3,588.5	28.4	21.5
1954	16,951.5	5,181.0	3,158.5	30.6	18.6
1955	18,393.5	5,074.5	3,617.5	27.6	19.7
1956	19,274.5	4,544.0	2,870.0	23.6	14.9
1957	19,504.5	4,804.0	3,387.0	24.6	17.4
1958	20,000.0	5,876.0	4,172.5	29.4	20.9
1959	17,000.0	6,740.5	4,756.5	39.7	28.0
1960	14,350.0	5,105.0	3,089.5	35.6	21.5
1961	14,750.0	4,047.0	2,580.5	27.4	17.5
1962	16,000.0	3,814.5	2,572.0	23.8	16.1
1963	17,000.0	4,396.5	2,892.0	25.9	17.0

年 份	产 量	收 购 量		收购量占产量%	
		合 计	其中: 净收购	合 计	其中: 净收购
1964	18,750.0	4,742.5	3,184.5	25.3	17.0
1965	19,452.5	4,868.5	3,359.5	25.0	17.3
1966	21,400.0	5,158.0	3,824.0	24.1	17.9
1967	21,782.0	4,935.5	3,774.0	22.7	17.3
1968	20,905.5	4,869.5	3,786.5	23.3	18.1
1969	21,097.0	4,667.5	3,382.5	22.1	16.0
1970	23,995.5	5,443.5	4,202.0	22.7	17.5
1971	25,014.0	5,302.0	3,982.0	21.2	15.9
1972	24,048.0	4,829.5	3,392.0	20.1	14.1
1973	26,493.5	5,612.0	4,100.5	21.2	15.5
1974	27,527.0	5,807.0	4,395.5	21.2	16.0
1975	28,451.5	6,086.0	4,394.5	21.4	15.4
1976	28,630.5	5,825.0	4,072.0	20.3	14.2
1977	28,272.5	5,661.5	3,756.0	20.0	13.3
1978	30,476.5	6,174.0	4,271.0	20.3	14.0
1979	33,211.5	7,198.5	5,170.0	21.7	15.6
1980	32,055.5	7,299.5	4,797.0	22.8	15.0
1981	32,502.0	7,850.5	4,877.5	24.2	15.0
1982	35,342.5	8,807.0	5,502.0	24.9	15.6

注: 1. 本表按生产年度计算, 年生产年度是从当年4月起到下年3月底止。

2. 收购量是社会收购量。净收购即净商品粮, 是收购减去返销农村的数量。

人们疑惑了——开始对虚夸厌烦！

历史弯曲了——在这里出现了停滞，甚至是倒退。

在那阵阵的口号声中，开始夹杂着隐隐的哭泣！

人们开始回忆过去，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错误，当初又是怎么进行的决策——

1958年，由于粮食产量有所增加，计划制订者便欣喜若狂，于是决定缩减粮食的总播种面积，而给棉花、食用油籽以及其它非粮食作物分配稍高的份额。结果，1959年的总播种面积比1957年少10%，粮食的播种面积实际下落了13%，然而，1959年的单位面积的产量和1957年，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别，总产量因而下降了13%，约2500万吨。

尽管1959年减少播种面积的错误在一年中曾被部分地区扭转了，但是，总产量仍然继续下降，产量减少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在人民公社制度下，造成的农业管理不善，而最明显的是许多在大跃进时期兴办的灌溉工程设计拙劣，极不科学，尤其是在华北地区，造成了大片的土地盐碱化，不长庄稼。农业劳动力的大量减少，特别是自然环境条件的恶劣变化，给广大劳苦人民带来了极为沉重的灾难。

然而，在当时的报刊上却从来不这么说，它仍然在持续地做着—一个富有的天国之梦；仍然任那响当当的口号轰鸣。

1960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展望60年代》，宣布了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在1959年提前3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的号召已经胜利实现，在文章里这样说道：“我们不但对于1960年的继续跃进和更好的跃进，充满了信心，而且对于整个60年代的继续跃进，也充满了信心。”

元月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社论：《开门红，满堂红，

红到底》，社论中说道：我们已经圆满地实现了“1959年红到底”，现在正满怀信心地为“1960年开门红”而奋斗，我们努力的目标不但是开门红，而且还是满堂红，红到底。从全国范围来说，就是要各个企业、各个行业、各个地区今年第一季度的平均日产量，不低于或略高于去年第四季度的水平，并且在这个基础上稳定上升，实现月月红、季季红；不但要做到产量红，而同时做到质量、品种、成本和安全样样红，全面跃进。

接着在元月26日，中共中央又提出了今后3年和8年的宏伟设想。这个3年和8年设想所体现的，依然是要尽可能地赶上和超过英国，早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8年以后的要求与任务，则是赶超美国和向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了。当时毛泽东对超英赶美的时间打算是：“我们的任务是经过一二十年几十年的努力，在主要产品方面首先超过英国然后超过美国。”他并说：找一个国家来比赛，这个办法很有意义，第一步按主要产品产量来赶，第二步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来赶。因此，作为1960年经济发展计划指导思想的东西，仍是1958年以来的建设社会主义急于求成，急于过渡，以及对社会主义模式的机械死板的理解。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致使我国的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广大的劳动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 目击者的口述

在《求索》杂志1984年第5期上，登载杨献珍同志的口述材料：1959年1月，杨献珍曾带几名同志到河南，去看望一下他们下放在那里的干部，并想了解一下他们的工作学习情况。

到郑州以后，在省委招待所里住了几天，许多老同志听说他来了，便纷纷到招待所里去看他，在闲谈中那些老同志反映了下面的一些弄虚作假的情况，其中有密县人民的粮食不够吃，营养不足，全县普遍发生了浮肿病，饿死了不少人，卫生部还派人来调查，确属事实。他听后，感到十分震惊。

在那时，河南省党代表大会刚刚开过，省委把大会的简报和发言送了他一全套，让他了解关于党代会的情况和全省的状况，杨献珍同志便通知了他们下放在河南禹县、长葛、密县、登封等四个县的干部，要他们集中在登封县开会，以便听取他们的汇报，了解他们下到基层的工作和学习情况。

在省委送给他的那一大堆文件里，放在最上面的一份，便是他第二天要去的那个县的县委书记在省党代会上的发言记录。他非常高兴，便立即取下来阅读了一遍，其中有这样精彩的句子：“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的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于群众脸上无光……，”如此等等，一连串的总有七八个不虚报，就不能如何如何，最后的结论，当然还是要搞大跃进，必须虚报。当时杨献珍同志看了，心里一直纳着闷，不懂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到第二天，省委派了一名干部送他到登封县，于是他召集下放的干部开会，请他们汇报学习和工作的情况。那些干部都是做了多年的地方工作的，很富有地方的工作经验。在他去时，那些干部已经在当地学习了四个多月，把当地的情况摸得很清楚，可是，在开会时，由于省委送他来的干部也在场，所以那些干部的发言情绪都不很高，尽说些无足轻重的话和那些不关痛痒的问题。他当时很迷惑，可是到了深夜，那些干部便都来找他，纷纷向他反映了他们几个月来，在基层所看到的真实情

况，他们所看到的和当时报纸上宣传的，完全是两回事。例如：有两个同志反映，他们所在的城关公社，社长的娘来找儿子要粮吃，说家里早已没粮，已揭不开锅了，可是社长说没有粮食可给了，后来社长的娘只好又哭着回家去了。若要是真粮食的话，他娘来要总是要给一点罢，但是，他没有粮了拿什么给呢？他们所在的公社，那些社员们早就已没有粮吃了。报了千斤省的地方，怎么刚刚才秋收完，就没有饭吃了呢？这显然说明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这在当时，整个河南省，有许多地方都是这种情况。

在他们所在的那个县里，还有中央组织部的一位下放干部参加了该县的县委工作，当县委书记，杨献珍就向党校的下放干部说，你们可以把情况报告给那位县委书记嘛？可是，他们说，县委书记什么都知道，但他也没有什么办法呀，只好让老百姓把红薯藤晒干，再磨成面粉，做成糊，以喝稀糊来充饥。

河南省某公社放小麦卫星，“小麦亩产7320斤”。这个公社的党委书记，还被北京某高级理论机关的负责人聘请到北京，给科学界的人士作报告，后来这篇报告竟然还在一个科学界的刊物——《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发表了。题目为《揭开“7320”之谜》，作者捏造了许多“根据”和“理由”，把虚构的“7320”说成是真实的，并且还讲了一系列的论证。不仅如此，这位公社党委书记还到处作报告，胡吹他的亩产7320斤小麦的“伟大成绩”。

根据杨献珍同志的口述材料所说，后来在1975年，他被放逐到陕西潼关时，还曾听到那里的人说，这位公社党委书记在潼关也作了这样的报告。

然而，事实终归是事实，科学的东西最终会被历史所证实！

也就是这个放高产卫星的公社，人们的日子过得最苦，出外到处逃荒要饭的不计其数，饿死的人数，至今无法统计，谁也难以说得清楚到底死去了多少？浮肿病到处泛滥，90%的人，都未能幸免。

有这样一个事例：某县城关公社的一位女公社干部，很有一套弄虚作假的本事，口号比谁都叫得响，记得切，说话一出口，就是那一套。当上边来人检查粮食情况，她便领着这些检查的人，在夜间去看仓库，先从前门进去，一看，确实打了不少的粮食，堆集成山，出了门后，她便领着这些检查的人在街上转了几圈之后，便又领着他们从后门进到仓库，再一看，也有那么多的粮食，而实际上，他们所看到的，还是原来的那一堆，而且下面还都是用一些草垫起来的，草上面都用谷子覆盖着，她们就是用这种弄虚作假的手段，来号称千斤省，千斤公社，千斤大队的。

有一个生产队的书记，以亩产玉米1万斤的“辉煌成绩”，来到北京参加劳模大会，社员们说没有那么多的产量呀，这不是实事求是。而这位书记却说：算了，什么实事求是不是求是的，这一次就是这样吧，咱们先说有这么多，下一次再去实事求是吧。于是，他就带着这个亩产万斤玉米的“大成绩”来到了北京，参加了劳模大会，终于取得了“劳动英雄”的光荣称号，衣锦还乡。

还有一个地方，炼钢的什么设备也没有，更不要说炼钢的技术了，然而，就是在那儿，竟然冒出个一天一夜炼130万吨钢的奇事来，而且竟登在《人民日报》上，如此等等，像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举不胜举。

人们的异想天开，奇思狂情从吉林省巴吉堡的一个赛诗会上，也可以略见一斑。赛诗一开始，先有一个人登台朗诵：

今年是个丰收年，  
秋后粮食堆成山。  
不知粮食打多少，  
压得地球乱转转。

这首诗赢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有一人高声地叫道：“这不算啥，听我的！”

社里麦穗插云间，  
麦芒刺破玉皇殿。  
麦根扎到龙王府，  
吓得东海波浪翻。

这人刚刚唱罢，掌声还没有响起，便又有人喊了声“听我的！”

深耕细作产量高，  
一棵玉米穿云霄。  
彩云拴着玉米腰，  
吓得月亮弯弯腰。

那时，在人们的主观世界里，庄稼真的成了精怪了——“稻粒赶黄豆，黄豆像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有次天，花生像

山芋，山芋超冬瓜”；“鱼秧撒下千万条，条条养得扁担样”；“玉米秆儿穿九天，浑身棒子有几千”……

夸张，已远非“燕山雪花大如席”可以媲美了；民歌，已失去了昔日的调侃、娱乐、咏叹的功能，而变成了一台粗陋的鼓风机，为那蔓延全国的热昏火浪，鼓噪呐喊。

要说，一个古老的农业民族，撑破胆子让他胡思乱想，也无非是那庄稼，百姓们的感情还是真挚的，他们以为那就是“共产主义”，可悲的倒是把他们引到这狂热境地里来的那种理论、政策、宣传和口号。

巴金在他的《随想录·豪言壮语》中，有这样一段引人深思的话：

“……我当初的确认为‘歌德’可以鼓舞人们前进，多讲可以振奋人心，却没有想到，好听的话越讲越多，一旦过了头，就会不可收拾；而一旦成了习惯，就会上瘾，以后不说空话，反而日子难过，譬如二十年前我引用过的豪言壮语：‘叫钢铁听话，叫×国落后，’当时的确使我的心十分激动，但是不是有助于‘叫某国落后’呢？实践的结果证明说空话没有用，某国并未落后。倘若真的要‘叫某国落后’，还得另想办法。无论如何，把梦想代替现实，把未来当作现在，好话说尽，好梦做全，睁开眼睛，还不是一场大梦。”

“那只不过是一段现代神话！”——事隔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人们似乎可以对那荒诞付之一笑。

《聊斋·考城隍》中有这样的几句话：“有心为善，虽善不

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人们不禁感叹：“有意作假，当如之何？”

然而，历史是很固执的。它还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说：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不是你出了毛病，就是我出了毛病，这场官司其实到今天也没打清楚。

《战国策·秦策二》中，讲了一个曾参杀人的故事：“昔者曾子处费，费人有与曾子同名族者而杀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参杀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杀人’。织自若。有顷焉，人又曰：‘曾子杀人’。其母惧，投杼逾墙而走。夫以曾参之贤与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则慈母不能信也。”

人类一定的思维方式，总是同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在农业文明中，与个体小农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相适应的，只能是狭隘的经验型思维。我们无法超越生产力水平，就如同我们无法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样。

列宁说过，离开唯物主义是错误的，危险的，甚至是反动的。在那个时期，许多人早把列宁的话给忘了。个别人甚至拿着唯心主义当宝贝。根据杨献珍同志的上述材料说明，1959年，有一位哲学家在河南省的一个县里，住了七八个月，对那里的种种胡夸、弄虚作假、谎报产量的情况，熟视无睹。后来有人议论河南省的领导有主观主义时，这位哲学家听不愤愤不平地说：河南省没有主观主义。谁要说河南省的领导有主观主义，他就要挺身而出，为河南辩护，谁要是讲河南有主观主义，那就是“一次反映论”。这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只许他们弄虚作假，放假卫星，不许小民说一句“有主观主义”。谁说谁就是“一次反映论”。弄虚作假，放假卫星，究竟需要几次反复，几次试验，才能认识那是“真理”呢？

钢铁、粮食都是硬东西，说假话、喊口号、胡吹胡夸，是办不到的。钢是一吨一吨的炼出来的，粮食也是要一颗颗地长出来的。

在《西游记》里，有个孙悟空，他会八九七十二变，需要之时，拔根毫毛一吹，要啥有啥，可是，这种本事只是人们的幻想而已，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这种人，这种变化的本事也没有地方去学，我们要的是真铁、真钢、真粮，不是要假“卫星”。

社会主义不是靠吹牛吹得出来的，而是靠人们一点一点地用劳动建设起来的。像这样一个劲儿的胡吹胡夸，受害的只是老百姓，只是那些无知贫穷的人们。

根据粮食部的多次报告，从1959年起，国家的粮食局势就已很不稳定，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到了6月份，全国大中小城市和工矿区供应的粮食都是随调随销，有许多地区的库存已经挖完，全国粮食周转库存只有340亿斤左右。——这是近五年来，同期粮食库存最低的一年。5月下旬，食油的供应也出现了四面告急的严重情况。食油出口计划落空，许多城镇时有脱销，工业用油和农村用油供应不上，副食和日用工业品，也经常无货，偶尔有货，也排队成龙。

在1958年春，全国农村就普遍发生了春荒，出现饿饭、浮肿、逃荒甚至是非正常死亡的现象。据湖北、河北、广东三省给中央的报告，1959年春季，湖北省闹粮之风此起彼伏，麻城、谷城、孝感、红安等所谓的“红旗”县，一片叫喊之声。河北省有30多个县闹缺粮，其中最为严重的要是乐亭县，每人每天只供应半斤粮。广东省少数地方已饿肿了一万多人，其中有100

多人死亡(这是比较保守的统计数字)。山东省馆陶县由于水灾,加上虚报浮夸和反瞒产的错误作法,造成了停伙、逃荒、死人的凄惨局面,全县7个公社,就有6个公社的食堂停伙和半停伙,社员四出觅食,远者到河北的邯郸、曲周、大名等地投亲靠友。

## 多灾的年月

真是“福无双降,祸不单行”,1959年正在祖国遭受到空前的人为劫难,广大老百姓们面临着严重的饥饿与死亡的威胁之时,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自然灾害,又偏偏降临到这个拥有着960万平方公里、5亿多人口的苦难深重的民族之中。刚刚沉浸在建国之后所取得巨大的成功而喜悦的人们,还没能抒发尽心中饱含的那股激情,便就又走向那令人惶惑的饥饿、痛苦、灾难和死亡之中。

从1959—1961年,这是一个令中华民族感到极为痛苦的时期,也是一段令亿万人民惶惑和不安的年月——

在这一段时间里,全国绝大多数地区都少雨,干旱的范围十分广泛,旱情相当的严重,其严重的程度在建国以来,到1986年为止,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可比拟。在1959年,全国的受灾面积就高达62198万亩,其中成灾面积达20682万亩,到1960年,受灾面积又上涨为80374万亩,其中成灾的面积高达34495万亩,主要为旱灾所致。再到1961年,受灾的面积依然高达80346万亩,成灾面积为40038万亩(见下表2—1,《全国农作物受灾面积》;表2—2,《全国农作物成灾面积》表)。

表 2—1 全国农作物受灾面积

单位：万亩

年 份	受灾面积	其 中			
		水	旱	风 雹	霜 冻
1949	14018	13923	78	—	71
1950	15571	9838	3597	1215	921
1951	21360	6260	11744	839	2517
1952	13553	4191	6354	1587	1421
1953	35463	10780	12924	2360	9399
1954	32126	24197	4482	1220	2227
1955	30081	7870	20149	887	1175
1956	28294	21566	4691	1805	232
1957	43723	12124	25807	2116	3676
1958	46444	6419	33541	2845	3639
1959	62198	7219	50710	2896	1373
1960	80374	15232	57187	5884	2071
1961	80346	13307	56770	6667	3602
1962	52050	14715	31212	3562	2561
1963	48822	21107	25298	1871	546
1964	32764	22400	6238	2393	1643
1965	31206	8381	20446	1637	742
1966	36311	3770	30022	2519	—
1970	14961	4693	8585	1683	—
1971	46576	5983	37574	3019	—
1972	60867	6125	46049	4488	4205
1973	54740	9352	40803	4232	353
1974	58019	9646	38330	5394	4649
1975	53029	10226	37428	4087	1468
1976	63749	6296	41238	10043	6172
1977	78032	13643	44778	7589	12022

年 份	受灾面积	其 中			
		水	旱	风 雹	霜 冻
1978	79667	19807	59860	—	—
1979	59051	10136	36969	7455	4491
1980	66780	13719	39167	10340	3554
1981	59679	12937	38539	6441	1762
1982	49700	12500	31100	4300	1800
1983	52100	18200	24200	8600	1100
1984	67532	19735	22084	19341	1549
1985	66548	21296	34484	9345	11423
1986	70703	13733	46563	7395	3012
1987	63102	13029	37320	3971	3722

表 2—2 全国农作物成灾面积

单位：万亩

年 份	成灾面积	其 中			
		水	旱	风 雹	霜 冻
1949	—	13923	78	—	17
1950	8115	7065	884	166	—
1951	6543	2214	3449	—	880
1952	6198	2321	3848	20	—
1953	10629	4927	2012	—	3690
1954	18819	16958	840	410	611
1955	11783	4600	6036	191	956
1956	19667	16358	3077	—	232
1957	22474	9048	11100	596	1730
1958	11732	2162	7546	685	1339
1959	20682	2726	16760	819	377
1960	34495	7472	24265	1928	840

年 份	成灾面积	其 中			
		水	旱	风 雹	霜 冻
1961	40038	8092	27981	2751	1214
1962	25008	9477	13036	1457	1038
1963	30035	15719	13532	784	—
1964	18952	15057	2134	656	1105
1965	16834	4219	12160	230	225
1966	14636	1425	12159	1052	—
1970	4942	1851	2897	194	—
1971	11163	2222	7978	968	—
1972	25765	1889	20408	1385	2083
1973	11427	3865	5829	1542	128
1974	9789	4106	3444	1149	1090
1975	15059	5201	7977	1536	345
1976	17155	1991	11772	2441	951
1977	22738	7484	10509	2327	2419
1978	37865	11659	26206	—	—
1979	22865	4302	13974	3034	1375
1980	33476	7538	18728	5445	1765
1981	28115	5959	18201	3000	955
1982	24200	6700	15000	1700	800
1983	24300	8600	11400	3800	500
1984	41585	13719	13444	9124	987
1985	34058	13424	15094	5029	511
1986	35484	8402	22147	4079	856
1987	30589	6156	19549	3430	1454

在这几年中，受灾面积之广，其成灾的程度之重以及给老百姓们所带来的危害之深，均为建国后之首，灾难带来了严重后果。

1960年,在前一年就出现的大面积干旱的基础上,又出现了连续性的干旱,有的地方干旱持续的时间竟长达9个月之久,出现了冬、春、夏三季连旱的灾难局面。北方麦区大部分地区,如河北、河南北部、山东西部、山西、陕西关中、辽宁西部等地,冬春雨雪奇缺,从上一年12月份一直到本年的6月份,总降雨量仅有50~120mm,比常年同期的降水量要少3~6成。干旱一直持续到初夏,连续150~180天无透雨降落。在冬小麦拔节、开花、灌浆的4、5月份,根本无雨,比通常要少3至6成,有的地方达7~9成之多。这样造成了绝大多数小麦大量的减产,有许多地方甚至是绝收。有许多小麦在地里还未开花、结穗就变得一遍枯黄,有时用火柴去点,整个地里就能成为一片火海,无一留存,从头烧到根。在农村,绝大部分池塘干裂,水库见底,河流干涸,断流。据有关资料统计,在山东省境内,汶河、淮河等8条主要河流,均发生过断流,就连那祖国的第二大河——黄河,在它下游范县至济南等河段,也曾有过40多天断流的历史。有的地方在地面以下一公尺深的地方,还见不到湿迹,地下水的水位下降,含水层缩小。

在北方平原地带,有许多水井断源,根本打不出水来,地下水源枯竭;一些地方的农民,连自己吃的水都没有,有的甚至要跑到几里以外的地方去挑水吃,在山东省有一大队的居民,每天要跑到距离本队8里路外的相临大队,去挑水吃,真是水贵如油呀!

在山西有个地方,全大队就只有五六口井能打出水来,于是在那几口井旁,日夜人流不断;挑水的人排成了长龙,打一挑水,就要花去半天的时间。

陕西的关中,有一地方因长期干旱无水供饮,而发生了

“抢水风波”，有两个生产队，共用一水库的水饮用和灌溉，两队争着往自己田地里供水，结果因分水不均而发生了纠纷，在多次冲突之后，双方终于大打出手，结果造成了4人死亡，15人重伤。

在整个1960年中，全国绝大部分地区，都在不同的季节出现过不同程度的干旱，其范围之广，造成的灾难之重，是建国前后几十年所不遇的。

由于严重的旱灾，庄稼和其它各种农业作物大幅度的减产，家畜死亡，草木枯萎，土壤沙化，……这些，给广大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困难。尤其是粮食作物的绝收，许多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地干了一年，然而，他们毫无收获，在干旱之中付诸东流，他们只好忍受着饥饿，背上了箩筐，出外逃荒了。

到1961年，在我国北方，再次出现了大面积的干旱。河北、山东西北部、内蒙古的大部分及东北地区西部，总的降雨量仅有50~100mm，比常年同期的降水量要少3到6成。尤其是在3月下旬到4月中旬，正值冬小麦拔节、孕穗，大量需要水的阶段，而这时，大部分地区却降水稀少，在邯郸、德州、济南、菏泽等地，滴雨未落，致使冬小麦的生长发育和春播进度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农民们眼睁睁地看着小麦慢慢地枯死，毫无解救的办法，在河南南部，湖北北部一带，4~8月长期少雨，总雨量要比常年同期少4~7成，再加上这一带从1959年的干旱开始，连续3年受灾，旱情最重。河南的驻马店、信阳一带，小麦几乎是绝收，水稻也大幅度地减产，农民无以生计，尤其是在当地政府实行高征购，反瞒产的运动过程中，本来就因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农业收成锐减，然而还要高额的上交，人们

根本就无法完成那高额的任务，许多人被逼无奈，只好出外逃荒，更多的人则是因找不到吃的，而活活地饿死。

在甘肃省西北部的敦煌、玉门、酒泉和金塔等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伊犁河流域、巴音郭楞州、昌吉州等地，因遭受严重的干旱，粮食绝收，有70%~80%的居民，粮食的消费量每天还不足四分之一公斤，这个消费水平大约是我们常说的“半饥饿”标准的一半。在甘肃省的张掖县，半数农村居民的粮食消费量甚至更低，每天仅有3盎司。大量的人口在饥饿绝粮中，无奈地死去。

农村粮食的极度短缺，反映在农村集市买卖的食品价格上，上涨的幅度惊人，为建国以后任何时期所不可比拟：中共中央于1959年下半年，批准重新开放在1958年人民公社运动开始时关闭的农村集市，最初这些集市仅限于买卖不属于国家统一收购的农产品。但是，在1960年，这一禁令还没有普遍地推行，到1960年的下半年，由于农产品的极度短缺，绝大多数的农村集市，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到国家收购价格的两三倍的水平，而谷物的价格则暴涨到国家固定价格的10倍；到1961年，这个差距拉的还更大。在农村自由集市上，粮食价格每公斤竟高达2~4元，为所有各类征购价格平均每公斤0.13元的16~30倍。集市上的猪肉价格，每公斤也上涨到10元之多，为国家收购价格的14倍还要多。这些食品价格上涨的幅度，大大地高于其他严重饥荒事例中有记录的上涨幅度。广大的农民们，在天灾人祸的影响下，无粮可吃，当然也无粮可卖，更不要说是到街上去买粮了。

## 死亡参数

由于受到了规模空前的自然灾害和各种人为因素的影响，致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走向 20 世纪 60 年代之际，遇到了历史上罕见的严重饥荒。

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不再是一片片的生机，一股股的热情，一阵阵的歌声，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奔走他乡，逃荒要饭。

据有关统计资料的结果表明：在 1956 年到 1957 年间，全国平均千人死亡率是 11.1‰，可是，到了 1959 年便上升到 14.6‰，而 1960 年则高达 25.4‰ 的高峰。这个数字，比建国以来的任何一年都要高出许多（见下面《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表）。尽管在 1961 年的死亡率陡然又降低到 14.2‰，但仍比 1956~1957 年的水平要高出不少。

### 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

单位：‰

年 份	全 国			市			县		
	出生率	死亡率	自 然 增长率	出生率	死亡率	自 然 增长率	出生率	死亡率	自 然 增长率
1949	36.00	20.00	16.00						
1950	37.00	18.00	19.00						
1951	37.80	17.80	20.00						
1952	37.00	17.00	20.00						

年 份	全 国			市			县		
	出生率	死亡率	自 然 增长率	出生率	死亡率	自 然 增长率	出生率	死亡率	自 然 增长率
1953	37.00	14.00	23.00						
1954	37.97	13.18	24.79	42.45	8.07	34.38	37.51	13.71	23.80
1955	32.60	12.28	20.32	40.67	9.30	31.37	31.74	12.60	19.14
1956	31.90	11.40	20.50	37.87	7.43	30.44	31.24	11.84	19.40
1957	34.03	10.80	23.23	44.48	8.47	36.01	32.81	11.07	21.74
1958	29.22	11.98	17.24	33.55	9.22	24.33	28.41	12.50	15.91
1959	24.78	14.59	10.19	29.43	10.92	18.51	23.78	14.61	9.17
1960	20.86	25.43	-4.57	28.03	13.77	14.26	19.35	28.58	-9.23
1961	18.02	14.24	3.78	21.63	11.39	10.24	16.99	14.58	2.41
1962	37.01	10.02	26.99	35.46	8.28	27.18	37.27	10.32	26.95
1963	43.37	10.04	33.33	44.50	7.13	37.37	43.19	10.49	32.70
1964	39.14	11.50	27.64	32.17	7.27	24.90	40.27	12.17	28.10
1965	37.88	9.50	28.38	26.59	5.69	20.90	39.53	10.06	29.47
1966	35.05	8.83	26.22	20.85	5.59	15.26	36.71	9.47	27.24
1967	33.96	8.43	25.53						
1968	35.59	8.21	27.38						
1969	34.11	8.03	26.08						
1970	33.43	7.60	25.83						
1971	30.65	7.32	23.33	21.30	5.35	15.95	31.86	7.57	24.29
1972	29.77	7.61	22.16	19.30	5.29	14.01	31.19	7.93	23.26
1973	27.93	7.04	20.89	17.35	4.96	12.39	29.36	7.33	22.03
1974	24.82	7.34	17.48	14.50	5.24	9.26	26.23	7.63	18.60
1975	23.01	7.32	15.69	14.71	5.39	9.32	24.17	7.59	16.58
1976	19.91	7.25	12.66	13.12	6.60	6.52	20.85	7.35	13.50
1977	18.98	6.87	12.06	13.38	5.51	7.87	19.70	7.06	12.64
1978	18.25	6.25	12.00	13.56	5.12	8.44	18.91	6.42	12.49
1979	17.82	6.21	11.61	13.67	5.07	8.60	18.43	6.38	12.04
1981	20.91	6.36	14.55	16.45	5.14	11.31	21.55	6.53	15.02
1982	21.09	6.60	14.49	18.24	5.28	12.96	21.97	7.00	14.97

和学网  
PDG

据表中反映，在县一级的死亡率高达 28.58%，全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了建国以来，也是唯一的一次负增长，并且在县一级的负增长率，还竟高达—9.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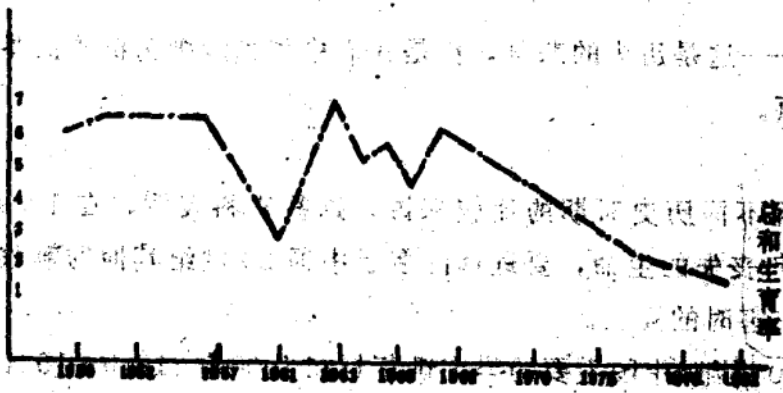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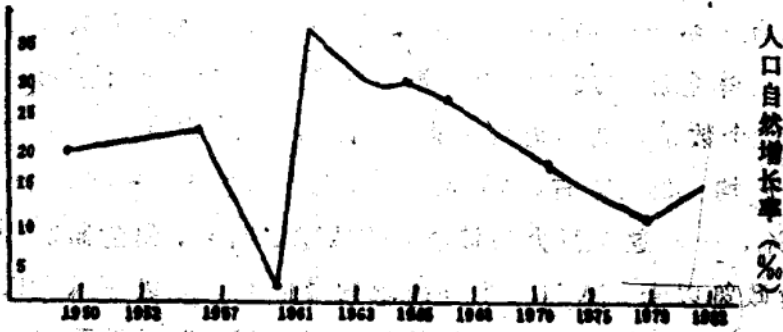
1960 年死亡人数的大量增加，以致在这一年头中，我国的人口减少了 1000 万人之多。累计增加的死亡人数——除开预期的正常死亡数——估计高达 2700 万人。这部分死亡人数主要是婴儿死亡率急剧增加的结果。据有关资料，人口统计的最后结果，比这个数字还有可能要大得多。因为，出生率在 1956~1957 年是平均 33% 左右，而到了 1961 年急剧下降，仅有 18.02%，——这个巨大的波谷，是从建国时起，到全面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人口出生率出现的最低点，从以下《人口自然增长率与总和生育率的变动趋势》图，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来。

——这是历史的悲剧，更是我们中华民族极为沉重而难忘的一页。

就不同历史时期的比较来说，这些资料表明，在 1959~1961 年丧失的生命，要远远的多于中国 20 世纪其他的歉收或自然灾害时的死亡。

20 世纪，中国主要的旱灾饥荒是在 1900 年、1920~1921 年和 1928~1930 年，发生的地点主要在中国的北部和西北部。1920~1921 年的饥荒，就其持续的时间和地域两方面来说，可能是最为严重的，至少使 2000 万贫苦农民受到煎熬，但是，经过政府和人们自己的努力，灾荒得到了缓和，死亡的人数据有关资料说明，也不超过 50 万人（玛丽——克莱尔·贝尔热尔：《1920~1922 年的中国生存危机》）。在 1928 年波及河南、陕西

1950—1982 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与总和生育率的变动趋势



和甘肃的大饥荒中，死亡人数虽然很多，但也超过不了1000万人（玛丽——克莱尔·贝尔热尔：《1920~1922年的中国生存危机》；何炳棣：《1368~1953年中国人口的研究》）。而1926~1927年的饥荒，则更多的死亡一般应归因于蒋介石北伐导致的铁路运输的中断，就其死去的人数来说，相比于1959~1961年，恐怕还要逊色多了。

据有关统计资料表明：在1960年间，全国以山东、河南、山西、安徽和江苏几省的死亡人口为最多。在这些省份中，仅安徽省全年死亡的人口就高达200万人，1960年全省的死亡率猛增到68%，为全国平均数的3.5倍还要多，由于在1960年，安徽省的人口出生率是11%，这说明在这一年中，安徽省的人口下降了将近6%，山东、河南、山西等省，人口下降的幅度，也在4~6%之间，下降的幅度之大，实在惊人。

因饥饿造成的死亡，在历来专门种植非粮食作物的地区，显得更为严重。在正常情况下，这地方的农民在当地农村集市上买粮或靠从政府购粮，大跃进开始时，地方农村交易因集市普遍的关闭而中断，即使在集市重新开放以后，交易的价格也变得为一般的农民家庭所不能接受，集市上可以买到的粮食，价格上涨了许多倍。可是，他们直接卖给政府或在农村集市上出售的烟草、甘蔗等经济作物，其价格相比粮食，却提高得不多，有的甚至是下跌，所以，那些平时靠着政府售粮过日子的人们，情况可能要更糟，死亡的人数会更多。

在大跃进初期就遭到破坏的山东省西北部，历来都是棉花产区，这一地区的农民，通常来到黄河以南，在那里他们用衣服和其他所有物来换取粮食，借以度过在艰难困苦时期的生活。菏泽、德州、聊城和惠民四个地区，生活的境况更惨，在受到

天灾人祸的严重影响之后,到1961年,棉花的产量少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水平的20%,谷物的产量降到了104万吨以下。比起1956~1957年的300万吨的产量,竟然减少了三分之二还要多,即使是在1959年,谷物的产量也达到了225万吨。可见,在1960~1961年时,这些地区的人们,是怎么煎熬过来的。

## 饥饿之中的阴影

在三年的艰难困苦时期,广大的灾区人民,在忍受着饥饿的威胁和浮肿病泛滥的过程中,走过了艰辛的历程——

他们用生命,用自己的鲜血和汗水,谱写了一曲曲令人悲痛欲绝的挽歌,也写下了中国发展史上那刻骨铭心的记忆——

从1959年到1961年,由于连年来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作物的大幅度减产,许多地方的粮食几乎绝收,再加上中央和各地政府部门由于受到了极“左”思想的影响,浮夸风盛行,超报产量,致使在高征购之后几乎没有任何粮食存剩。每年还搬到冬季,就没有了吃的。于是,在那兴修水利的工地上,在千万个农民百姓的家庭里,在那仅有“一干两稀”的供给制下,演奏出一曲曲惨痛的人间悲剧。

工地上的饿死鬼:

由于总是受到自然灾害的袭击,每年不是干旱,就是雨涝,农业生产没有保证,于是中央和各级政府决定大量地兴修水利,搞好农田基本建设,以确保农作物的收成和丰产。每年到了冬季,全国各地便全民上阵,修筑各种渠、塘、坝、堰等大小不

等的水利工程枢纽。

山东某区修筑一中型水库，分期分批地调动了全区的十多万八人，轮流作业，他们用最为原始的操作方法，一锄一锄地挖掘土方，一筐一筐地挑到坝埂，然后再用那四人抬起的巨石砸实；他们以5~10人一组，到工地附近的山上，伐倒那几十年才能长成的大树，然后抬到山下，运往坝堤，再或横或竖地垫在坝下。就这样坝在一寸一寸地增高，然而，过度的劳累，饥寒交迫的人们，也在一个个地倒下，倒下去的不是瘫软，就是再也没有回音，据当时曾参加过修筑水库的老人回忆讲，几乎每天都有人死在工地之上，待水库修建成功，没有人统计过。究竟死去了多少条生命，也没有人统计过，这个水库从修建时起，不知有多少人因饥饿劳累而当场晕倒。

在工地上，粮食一律定量供应，没有一两余地，早晨一千二稀，中午二千一稀，晚上也是二千一稀，干的简直就不叫米饭，用各种东西掺杂着，让现在的人看了就翻胃，然而在那时，这还算是难得的“稀罕”；而稀的呢？全是米汤面汤——“光彩照人”，几乎找不到半点的沉淀，就这样每人每天还没有平均到一斤的口粮，哪里还有精力来保证完成那繁重的劳动任务。工地上的人一个一个身体枯瘦如柴，面无血色，有许多生产队的人员，下班之后，发动大家到附近的山上，挖野菜、挖甜根（一种野草的根，有甜味，故当地人把它称为“甜根”），回来之后洗净放在锅里熬汤喝，在当时，只要是山上有能吃的东西，无不被找尽吃光。

据当时的人讲，有这样的一件事情，某生产队的三个人，晚上饥饿难忍，无法入睡，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都无法弄到吃的东西，肚皮饿的咕咕作响。他们走出工棚时，突然间发现了

一条小狗，那是另一个生产队的人带来用以照看工棚的，于是他们三人便立即商定，将这条小狗杀了，剥皮熬着吃，以解腹饥之苦。他们很快捉住了小狗，还没等狗叫二声，就没气了。于是，在半夜三更里，他们几人便熬起狗汤来，几人围在一起，看着那呼呼燃烧的火苗，心里充满着无限的幻想。可是，还没等狗肉熬熟，就被工棚里的其他人发现了，在惊呼声中一个一个都纷纷地起来，等着那熬着的小狗汤。可事也不巧，人一多，嘴就杂，弄出的声音也就大，最后另一个生产队的人也纷纷醒来，待狗的主人跑过来一看，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可是无奈，等着狗肉熬熟，分得半只狗腿算了事。

还有一个生产队的人，也是忍受不了饥饿的折磨，在到处觅找食物的过程中，发现了工地附近的一个村庄，在集体菜园子里刚收过白菜，菜地上留下了少许的残余菜叶和留在地里的白菜根，于是，他们如获至宝，便将那菜叶拾起，把菜地里的菜根拔出来，一点一点地洗净，拿回来便开始煮起“白菜羹”来，就这样，他们一天一天地维持着生命，修筑着水库。

据当时的人讲，在离工地七八里地远的地方，有一个大山谷，那个山谷后来被人起名叫“死人谷”。当时，只要是死在工地上的人，都一律的让人抬过去，扔到那个山谷里，美其名曰“天葬”。在修建这座水库的过程中，不知道有多少人被这样“天葬”了。

在四川某县，由于连年的自然灾害加上高征购、反瞒产，农民在秋收之后，就粮仓空空了。全县的人口，一年之中，就减少了五分之一，还有五分之三的人挣扎在饥饿的死亡线上。

1961年，春节来临，人们在绝望中叹息着，祈祷来年能够

好运。

在年前二十八，某大队每人得到供应的5斤白面，一户姓张的人家，将白面领回，心里充满着难言的苦水。一家6口人，两老加上4个孩子，怎么将这个年平静地过去？在11月份时，就因饥饿寒冷，死去了57岁的父亲，12月初，再因饥饿，死去了一岁半的儿子，现在4个孩子，两男两女，看起来也实在痛心，孩子经常因饥饿而不停地痛哭，总算到了过年了，孩子们盼望着能有一顿饱饭，但老张心想，仅这点白面，总不能两顿就吃光吧？那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呢？

## 河南的悲剧

河南——这块中州古地，在40年代时，就曾以“水、旱、蝗、汤（汤恩伯）”四灾而闻名，到现在每年还难以逃脱水、旱的肆虐。

虽然在这块土地上，历史开发较早，曾多次以文明而骄傲，开封、洛阳，均有“中国六大古都”之美称，但是，贫穷苦难的人民总是难以过上几年好光景的日子。

在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过程中，河南农民的积极性极为高涨，在全国堪称为首，但是，从1957年夏天开始，省长吴芝圃拿省委书记潘复生开刀，在党内大批以潘复生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为大跃进这个疯狂的年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揭开了河南历史性悲剧的序幕。

由于省长敢斗省委书记，于是在全省的各级领导班子里，便

斗得更凶。以反右倾为中心的干部作风上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行为，便从那时起，就在河南这块土地上，司空见惯了。

正是在这样的高压政策下，河南在大跃进公社化运动的狂飙突起之时，才会显得比别的任何地方都更有精神准备。

还是在1958年春季之时，省长吴芝圃就提出了全国最为激进的惊人口号：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四无省”、绿化、消灭文盲，等等。吹牛浮夸之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全国其它地方所望尘莫及。

——小麦卫星一直放到了西平县的亩产量7320斤。

——钢铁卫星一直放到了新乡地区的日产120万吨，炼铁匠最小的仅为8岁。

这真可谓是“世界之最”了！

1958年，全省的粮食产量实际上只有281亿斤，而河南省委竟然把它吹估为702亿斤，最后导致了全省性的高征购。基层干部为了完成征购任务，而一味地“反瞒产”，因向农民逼粮食而实行捆、绑、吊、打、捕等现象，屡见不鲜。

在1958年11月底，在河南的密县，就已经发生饿死人的现象，而在1959年春天，豫东黄泛区内，浮肿病的泛滥和死人的事态，便更加蔓延……百姓们在饥饿中奄奄一息地哭泣着。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儿女们死去，老伴们被迫离散，牲口被迫宰杀，房屋被迫拆除，渐渐浮肿起来的身体，虚弱无力，不经风霜，临近着死亡的边缘……

然而，唯有吴芝圃还在高兴，他在那种热昏疯狂的状态下，肩上背着河南几千万农民饥饿而怨恨的目光，登上了庐山。

在1959年8月中旬，他从庐山上下来之时，就更加恶狠了。他回到郑州之后便立即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在全省内又一次

掀起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高潮。

河南人民真正的大难开始临头了——

1959年，河南适逢水旱交加，受灾地区遍及全省的每一个角落，几乎无一地幸免，粮食和经济作物大幅度地减产，全年粮食的产量只有210亿斤，但是吴芝圃也不管老天爷算老几，偏偏要把大灾年当成个丰收年。他一手高举着高指标，硬是估产为450亿斤；一手托着“右倾”帽，还把那帽分为八种，即批“三论”（唯条件论、悲观论、神秘论），又批“五派”（促退派、观潮派、伸手派、秋后算帐派、炉前摇头派），大帽子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在党内造成人人自危，在全省造成“恐右病”泛滥。

而这一年秋后，当第二次“共产风”再度刮起之时，还夹带着疯狂的“反瞒产”。这一回可不比1958年，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任务，就是“小彭德怀”，就得像在土改时期斗地主那样挨斗；而哪个农民若是交不够粮食，就会被捆起来，吊打追逼，关押拘留，拆毁房屋……

一时间，全省上下都笼罩在阴霾的恐怖气氛之中——

河南南部一向富庶的信阳专区，在地委书记路宪文积极贯彻中央和省委反右倾精神所掀起的狂潮中，全区打人成风，手段千奇百怪，骇人听闻。许多县的县委扩大会议，成为斗争大会。

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斗争“右倾”的县委书记张福洪，亲自动手毒打，众人拳打脚踢，有的将身上的皮带取下，朝张福洪的头、胸、腿部，一个劲儿的猛抽，直打得遍体鳞伤还不肯住手；有的将张福洪的头发连着头皮一道撕下，活

活地將他整死。

也是在這個縣，另一個县委书记劉文彩，到一個公社去主持“反購產”運動，由於農民無糧上交，他便大打出手，一天竟連續拷打四十多個農民，一個體弱多病，身體骨瘦如柴的農民，被他當場活活地踢死；另有三位農民，儘管身體稍好一點，也竟被當場活活地打死；還有一位年青小伙子，由於火氣旺盛，路見不平，見他們打人過於殘忍，上去勸阻了他們幾句，然而，劉文彩矛頭一轉，怒目面視，當即指揮在場的人員把這位小伙子，五花大綁，眾人齊上，打的打，踢的踢，棍棒、皮帶一齊上，一時間，只見這位小伙子，頭破血流，癱軟在地，苦苦地哀求，當場這位小伙子就一命嗚呼。然而，就是這樣，他們還不算數，還指揮別人將小伙子的屍體抬去扔到河里。

據有關資料說明，整個光山縣的公社一級幹部，親自主持和動手打人的竟占百分之九十三。解山公社（現在解山屬於駐馬店地區）的一個黨委委員、團委书记，親手拷打了當地的農民達92人，其中當場打死4人，打傷後不久再死去的8人。

在廬山會議以後，從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為止，整個信陽地區為追逼糧食，正式由公安機關逮捕的人數就達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獄中；短期拘留的達10720人，死在拘留所的667人。

當地的群眾形容當時的恐怖氣氛時，編了這樣的一段順口溜：

幹部好似閻王爺，  
大隊好像閻王殿，  
只見活人去，

不见活人还。

在后来河南省委向中央的检讨中，也称这个时期的信阳“一时间形成了一种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如此凶狠的反瞒产，把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甚至是喂牲口的饲料，尽数掠劫而去，到1960年春天，整个信阳地区的公共食堂普遍断炊了，最严重的村子达80天没有一粒粮食，浮肿病大面积蔓延，农民也开始大量地外逃或者是饿死。

有一个村庄，原来住着15户人家，共有87人，一年多后，死的死，走的走，逃的逃，到1961年春，只剩下了32人，5岁以下的小孩子仅有4人，50岁以上的老人仅有1人，整个村庄，一片萧条冷落，没有鸡叫，没有狗吠，没有猪跑，耕牛也只剩下了3条。

——一场浩劫，百姓们的灾难！

然而，就在农民大量地饿死或外逃之时，那位地委书记路宪文还在叱喝：“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因为思想问题。”

1959年11月间，当他从潢川县驱车返回地委，沿途亲眼见到倒毙在公路旁边的死人，拦车要粮的群众，被父母遗弃的孩子时，他却视而不见，置若罔闻。不仅如此，他甚至还下令要地区的公安部门，“限期消灭人员的外流”；指示社队的干部民兵，封锁村庄，不准群众外出逃荒；指示城镇机关、工厂、企业单位一律不准收留农村来人；还要求各个县委做到“街头、交通要道没有一个流浪汉”等等。

——可怜的老百姓们，忍耐真是到了极点。

他们大多数被逼得一点粮食都没有，妻离子散还不说，就

是连仅仅为求得生存而去外地逃荒要饭的一点点权利，也被剥夺了。是否只有坐而等死了？无奈，有的群众在白天跑不了，就只好在晚上逃，大路不敢走，就只好走小路，小路也不敢走时，就只有走山路，他们躲社队的干部，就像当年躲日本兵一样，而在逃荒中途，饥饿而死的人，不知道又有多少。

某公社一户姓李的人家，带着生病的妻子和一个5岁的孩子，因受不了当地干部的威逼，一起出外逃荒，可是，他们还没能走出公社，就被民兵发现了。抓住后，先是一顿毒打，然后就是游行示众，直把他们一家三口折磨得死去活来，方才放他们回家。5岁的儿子，因浮肿并且受到严重的疾病感染，没过两天，便就死去，妻子早就身体有病，再加上这一打一气，又失去了儿子，于是，在她儿子死后仅三天，便也含泪离开了人间。剩下他一个人，觉得活着还不如死了好，落个心静，于是，悬梁自尽。

另有一户姓王的人家，兄弟三人，外加年近50的父母，因家中无粮供炊，兄弟三人于是便商定，老大留在家中，供养父母，老二、老三设法外出逃荒，另谋生路。老二逃得还算顺利，没被抓住，自己慢慢地直逃到了江西，事隔8年之后，家人方才知他的下落。而老三却很不顺，在刚刚逃出本公社时，没走多远便被抓住，五花大绑，送了回来，先也是一阵的毒打，后又游行示众。那拿着枪的民兵，把他打得鼻青脸肿，其中一腿被打骨折，然后才通知他的家人，把他领回家里，并保证永远不再外逃。可是，他的一条腿，就这样无辜地失去，直到现在，还依然拄着拐杖过着残疾人的生活。

这位路宪文书记之所以如此有恃无恐，骄横霸道，就因为

他拥有一件最为得意也最具资本的功劳。在他管辖下的遂平县楂岬山卫星公社，在1958年4月，率先由27个小社合并为一个大社，成为人民公社运动的先声，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他也因此曾受到过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赞扬。他有这样的一块金字招牌在手中紧紧握着，他还害怕什么呢？似乎是天爷老大，他老二，谁也不敢来惹他。

大灾难之后，整个信阳地区，人口锐减，田园荒芜，农村城市满目的凄凉。

解山公社的一户人家，在父母、爷爷和2岁的弟弟相继死去之后，仅留下了姐弟2人，姐姐15岁，弟弟12岁，姐弟两人无以为生，只好背着行囊出外乞讨，最后，一直流浪到河北省的邯郸，可在寒冷的冬季，她们衣不暖体，食不饱肚，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姐弟两人竟被冻死。在死时，15岁的姐姐，还紧紧地抱着12岁的弟弟，嘴角半张开着，仿佛欲说什么然而又吐不出，象是在抱怨，又象是在哭泣……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河南这样惨烈的灾难之中，当那些老实忠厚的河南人民，一批一批的倒毙下去之时，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为了实现他梦寐以求的一个理想——让党中央在郑州开一次全国党代表大会，靠着高征购、高积累聚敛起来的民脂民膏，在郑州北郊的黄河岸边，兴建起了一座豪华的园林型的别墅群。别墅群内除了按当时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候补委员会的人数，以每人一个套间盖的一幢大楼外，还别出心裁地按当时党的七位领袖，每人一幢别墅，从总书记到党中央主席，规格面积逐级递增，以主席的别墅最为宽大考究。可是，不料建成之后，“信阳事件”案发，吴芝圃下台，中央再也没来郑州开会，

这样的别墅群，竟长年闲置，无以利用，并渐渐地毁坏，室内墙粉剥落地板打烂。只是那幢主席别墅，永远紧锁着大门，自建成的那时起，就从来没有住过。

（此处原文模糊，推测为描述别墅群现状及主席别墅的情况）

（此处原文模糊，推测为描述别墅群现状及主席别墅的情况）



## 第三章

# 农业大国究竟怎么了

- 根部出现了蛀虫
- 贫瘠土地上的参天大树
- 父母为何只偏爱他
- 赤字·通胀
- “艳若桃花”的伤口

数字  
PDF

## 根部出现了蛀虫

章三策

“我们应该有准备。一方面是力争不出乱子；另一方面也要有准备，万一出乱子也没什么可怕，我们只要把情况跟干部、群众讲清楚，大乱子可以克服。可是办事不能急躁、草率，必须谨慎从事。”

乱子出现了。

1959年~1961年是建国以来，我国农业史上悲惨的一段日子。

在当时，农业危机中，最突出、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粮食问题。粮食产量连年大幅度下降：粮食产量由1957年的3901亿斤，下降到1959年的3400亿斤。1960年又降为2870亿斤，比1957年下降了26.4%，甚至低于1951年的水平。1961年为2950亿斤，比1957年下降了24.8%。

粮食问题其实就是“吃饭”问题，全国人民都必须靠其维持生存。粮食的减产，而同期人口却增加了1600多万人。按每人每年需500斤粮食计，国家一年大约差2400万人口粮食，加上高征购挤农民的口粮，竟达到一年差300万人的粮食。

四川、吉林、黑龙江等商品粮基地，1960年上半年只完成调出任务的一半左右，到了下半年已无力调出。因此，各个地区只好从中央库存中大量地借用粮食，以解决缺口粮的问题。国家库存粮，1959年6月底为343亿斤；1960年6月底又降为127亿斤，连正常情况下铺底粮和运转状态的周转粮数都不够，

一些大城市几乎脱销。情况是很严重的。1961年5月28日，中央向各地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指示》。在当年6月6日，中央又发出《关于为京、津、沪、辽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要求有关省区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抢时间调运粮食。但这工作一直进展不快，京、津、沪和辽的粮食库存越来越少，到了随调随销的地步。

粮荒发生了，农业亮起了红灯，各地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浮肿病、饿死人的情况。据测算，中国人口总数1959年是6.72亿人；1960年6.62亿人，即比1959年减少了1000万人；1961年又比1959年减少了1300万人。

其它食用作物也遭受了灾难性的减产。由于粮食供应紧张，国家挤农民，农民挤牲口，还挤了食用作物。1960年，棉花由1957年的164万吨降到106.3万吨，下降了35.2%；油料作物由377.1万吨降到170.3万吨，下降54.8%；而猪下降43.6%。1961年，差距更为明显，呈直线下滑的趋势。棉花产量减少1680万担，下降了51.2%；三种油料减少4305万担，下降了57.1%；甘蔗则比1957年下降了二倍多。

更为严重的是，农业生产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农业劳动者的人数大量减少，体质也很差。1960年，农业劳动者的人数比1957年减少2291万人，减少了11.8%；用于劳动生产的耕畜的数量，连续三年下降，到1961年只有3818万头，比1957年减少了1550万头，减少28.8%；中小农具的损失、破坏严重。1961年与1957年相比，铁制小农具减少25%左右，木制和竹制农具减少到35%到40%，旧式中型农具减少40%左右；生产资料，如化肥等连年产量不见上升，供应得过少，使得土地没有多大的肥力，无法高产丰收（天灾的影响也是有的）。全国耕

地面积逐年减少。到1961年，全国耕地总面积竟比1957年减少了1278亿亩，全国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减少0.24亩。

总之，从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农业这个生命之源、国民经济之基础，它所受到的灾难是深重的。它所带来的影响，不仅对于其自身，而且对于整个农业大国的方方面面都是沉重的打击，无疑给那些认为“农业已经过关”的人当头一棒。

蛀虫已经从大树的根部蛀起，乱子已经出现。怎样才能跟干部和群众说清楚呢？必须对1959~1961年期间的农村再深刻地认识一遍，然后再更深一步地认识农业当时的损害，以为今后的农业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鉴。

让我们再回到那非常的1959~1961年去，体会一下当时农业所面临的种种损害。

首先是祸从天降。

在这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的日子里，1959年虽说是天灾初降临的头一年，但农业受害的程度已是相当严重。在这年，需要水最多的三伏时期，有8个省区的大部分地区，遭受了严重的干旱。受旱面积近4亿亩，而珠江流域却发生了大洪水，在东江流域相当于百年一遇的洪水，造成北江下游的水位比历史上最大洪水的1915年还高；其他的天灾也陆续而来。农业大国头上出现了不祥的征兆。

1960年、1961年，状况没有什么改变。病魔挥舞着它的旗帜，更为肆虐地把灾祸撒向各方。1960年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及早防旱》中写道：“1959年以来，旱、水、风、虫自然灾害接二连三地来，受灾面积达6.5亿亩，是解放以来灾害最严重的一年，也是历史上少见的。”

自然灾害不可避免地要重重地落在这个有几亿农民的农业大国头上。据统计，1959年人口非正常死亡率高达14.6%。而这其中，农业的劳动者——农民是占了大部分名额的。农业生产开始显露出严重的症状。再加上中国人民不甘落后，不断取得胜利后，滋生了急于求成等情绪，农业局面更越发不可收拾，走向了更加严重的地步。

历史曾经无数次地向我们证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一切带有空想成分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个别论断是不能照板搬豆腐的。想象力越丰富，魄力越大，犯的错误就越大。1959年，毛泽东和党中央就已经从办人民公社的一些混乱中，发现了急于向全国所有制和向共产主义过渡、搞产品调拨、平均分配、剥夺农民的共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等农业问题。感到“党跟农民的关系存在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为了纠正错误，党中央在1959年初，接连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八届七中全会。例如，在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召开的上海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规定：农村公社的全部劳动力，用于农业生产方面的，一般不应少于80%。

经过以上的纠正，1959年初产生的一些农村公社内部所有制方面的毛病得到了初步解决。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庐山会议后，尤其是1959年10月15日，中央批准农业部的报告，决定在农村反击那些所谓的“右倾歪风邪气”之后，农村中“急于过渡”、“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在1959年下半年至1960年下半年更加严重地刮了起来。

如果说1958年是急于由高级社向人民公社过渡的话，这次主要的就是急于由队有制向社有制过渡。

为了在三五年内完成过渡，各地农村人民公社拼命发展社

有经济。于是在1959年10月前后，掀起了大办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大办水利、大办文教的建设热潮。但是，在这些大办的过程中，不但所需劳力从大队、生产队无偿抽调，而且所需的资金、财物也多是向大队、生产队、甚至社员征集。仅就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59年10月14日发出的《关于今冬明春继续开展大规模兴修水利和积肥运动的指示》，就抽调3000万人进行无偿劳动。这实际上是完全否认了等价交换的原则，在某种范围内造成了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严重地损害了生产大队、生产小队和广大社员群众的利益，影响了农业生产。

为了尽快实现向公社所有制过渡，各地农村人民公社还千方百计地缩小穷队和富队之间的差距，甚至干脆将穷队与富队合并，一夜之间便实现了穷富队之间拉平。此外，各省还普遍恢复或新建了农村的公共食堂。据统计，到1959年底，我国农村的公共食堂总数达到391.9万个，就餐人数约4亿。1960年上半年更掀起高潮，全国很快普及了公共食堂，许多省、区参加公共食堂的农村人口占到了人口总数的90%以上。这样就浪费了大量的粮食，在农业的粮食帐上又加上了重重的一笔。

同时，农村中还实行供给制，企图早日实现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即是一种“穷过渡”的方式。看起来似乎是很先进的，有很多的社会主义因素，但是它却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错误地使农民以为共产主义就要来临，可以过上幸福日子。农民的积极、热情，影响了经济领导机关，于是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时犯高指标的错误。例如，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粮食产量为10500亿斤，棉花产量为1亿担。后来虽降了一倍多，但仍然是脱离实际生产力水平，难以实现的。

面对当时的形势，也不乏有清醒的认识。在1959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调查组，就曾反映农民不欢迎公共食堂的情况。但由于当时坚持农村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不肯改正。明珠被沙土淹没，发不出亮光。1959年3月，鉴于当时经济政策的不利造成农村劳动力外流的情况，周恩来总理给邓小平去信，请书记处批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起草的《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批发了，但却没有收到多大的效果。毛泽东在1959年~1961年期间，也多次发现农业上的问题，并指了出来，但由于指导思想上的错误，没能彻底地纠正。

农业上，指导思想的错误、经验的不足对农业及农民的损害是巨大的。正如刘少奇在1962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说的那样，在整个粮食减产总数中，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只占1/3左右，根本的还是工作失误造成的损失。

农业上的估计错误，以及工业的盲目发展，使工农业的比例严重不协调。这是自1959年以后显现出来的。它给农业、农民带来了危害，挖了农业的“墙角”，致使国民经济的基础受到巨大的损失。特别是1960年，国民经济出现了畸形：农业总产值占20.1%，重工业占53.3%，轻工业占26.6%，工业跟农业的比例达到4:1。又有另外一份统计表明：在工农业方面，从1957年到1960年，按不变价格计算，工业总产值由704亿元增加到1650亿元，增长1.3倍；而农业总产值却由537亿元下降到415亿元，下降了22.7%，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比例由5.7:4.3变为8:2。工农业的这种比例关系，大大地超过了当时生产水平所许可的范围，反映了工业生产的过快发展和农业的萎缩。过分地强调了工业的作用，发展过于急，减少了对农业的投资，不能不影响到农业。就拿工农业劳动力的分配来说，

1957年为1:13.8,到1959~1961年期间,比例一下子缩小了不止3倍。农业劳动力大量减少,而工业劳动力(大部分是职工)大量增加,反过来又继续增加了农业的负担。

不仅由于大办工业抽调了大批的农村劳动力,而且另外由于农村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和社会福利事业也抽调了一大批的劳动力,这样就削弱了农业的第一线。1960年在农村第一线的劳动力,由1957年的1.8365亿人减少到1.4625亿人。而且留下来的多是弱劳动力(妇女等)。加上积极性不高,生产的劳动效率大大降低。但是,每个农业劳动力负担的城镇人口却由1957年的0.52人上升到0.77人,远远地超过了当时农业实际所能负担的水平。

上面所提到的,其实是一些瞎指挥的错误,下面我们着重说说农村的经济政策问题。

主要分为三方面。

第一方面,自留地所牵涉的问题。在“左”倾的错误影响下,为了适应办公共食堂的需要,为了尽快地消灭所谓“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农村政策存在着很多问题;自留地问题是其中之一。

1959年4月,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各地的意见,对人民公社有关的十八个问题作出了原则的决定。其中对于自留地采取的具体措施是:社员自留地数量按原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不超过也不少于每人平均占有土地面积的5%。同时还允许社员私养家畜、家禽,利用房前屋后,水边路旁的零星闲散土地种植庄稼、树木,谁种谁收,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中央明确指出,“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必要的”。但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斗争却使得这些正确的措施被认为是“猖

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被彻底否定。

当时，不仅收回和取消了社员的自留地，归社所有，还限制社员家庭副业，完全成为了一个“大集体”，“小自由”被取消了。再加上按劳分配的不公，农民的意见很大，积极性被破坏。情况是严重的：干不干一个样，多干少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甚至干得多的还不如干得少的，大家等着大队分配。农业生产力也遭到严重的破坏，致使农产品的供应紧张：1960年，人均粮食消费量比1957年减少35.3%，猪肉全国人均消费量下降了69.9%，粮和副食品极为缺乏，导致许多人饥饿瘦弱，甚至饿死。

第二方面，征购问题。在三年灾害期间，对于农民最大最主要的负担就是过高的粮食任务。

但是，是什么导致了高征购呢？首先，粮食产量从1959年开始连续三年大幅度下降，而工业和城镇的人口增长过快；再次，浮夸风盛行，估产过高。这两个因素导致了高征购。例：1959年粮食实际产量只有3400亿斤，而国家公布的数字却高估到5401亿斤；1960年，中共中央在上海会议上讨论制定的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更加脱离实际，夸大地估计“大好形势”，规定1960年粮食产量为6000亿斤，比1959年增长11%。

一些数字可说明当时征购的情况：1959年粮食产量比1957年减少501亿斤，而征购量却增加了387亿斤，征购量占粮食总产量的39.7%。其中净收购占粮食总产量的28%；1960年粮食产量比1957年减少1031亿斤，而征购量仍比1957年多60亿斤，征购量占粮食总产量的35.6%，其中净征购占21.5%；1961年粮食征购量为809.4亿斤，占当年粮食产量的比重虽有所下降，仍然达到27.4%。

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造成了农民留粮的严重不足，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加重了某些灾情严重地区的粮荒，有些不致出现粮荒的地区也先后出现了粮荒。

第三方面，支援农业问题。

这又得分两点说。首先，对农业的支援少。因为对粮食的高估，对农业形势的看好，而实际的产量却大幅度下降，不仅拉大了工农业之间的差距，也拉大了农业跟其他行业的差距。造成对农业的支援减少，或者说已无力对农业进行有力的支援。化肥等生产远远跟不上需求。铁制小农具、农药等也严重缺乏，生产力大大受影响。而从总体上来说，是没有把农业作为基础，面向农村，把支援农业放在第一位，建立一个以农业生产服务的完备的工业体系。对农业的支援少，也表现在对粮量征收过高的农业税上。

另一点，不可否认，从1960年起，国家逐渐加强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1960年、1961年用于农业、农业机械的钢材分别为81万吨和70万吨，而1959年只有49万吨。但是还没有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同时，对于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也增加了投资。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基建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效益却不是很大。例1959年~1960年期间，掀起了兴修水利的高潮，修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大中型项目达150多个，比“一五”全部建设项目多1.2倍。但由于不量力而行，半拉子工程很多，经济效益很差，有的工程动工前对水文地质勘测不够，草率上马，遗留的问题很多，某些草原地区还出现了盐碱化。

1959年~1961年，确实是农业史上多灾多难的一段悲惨的日子。

## 贫瘠土地上的参天大树

“基本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

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建设上发生的几次重大挫折反复证明，除了政治上的原因以外，从经济上来说，都是同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盲目扩大基建投资、片面追求高速度分不开的。

1959年~1961年期间，就是基本建设达到建国以来最高记录的一段日子。

陈云同志一直主持经济工作，对于经济有很深刻的认识。早在1957年他就曾经说过：“基本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然而，到1959年，虽然天灾人祸，农业受到巨大的损害，但基本建设的规模仍然愈搞愈大，战线过长、积累过高、效益下降等毛病呈现了出来（在1961年）。

基本建设的规模愈来愈大是跟基建投资增多分不开的。

在基本建设投资方面，中央批准的国家建委1959年10月的报告，就提出要把基建投资增加到311.6亿元，即增加63.6亿元，限额以上的施工项目增加到1000个，即增加230个。实际执行结果，1959年基本建设投资为344.6亿元，比调整之前的原定指标270亿元多74.6亿元，比追加计划也超出了33亿元。

1960年，全国的基本建设投资再度猛增，达到了投资总额384.07亿元，比已经膨胀的1959年投资又多了将近40亿元。1961年虽有所下降，仍达到123.37亿元。

这么庞大的基本建设投资是按照在1958年粮食产量7500亿斤、棉花产量6600万担（即农民已经搞好），计划到1962年要达到钢产量5000万至6000万吨的目标来安排的。但是1959年~1961年的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导致工业、交通等行业全面的下降。而基本建设却居高不下，这样，不仅挤了农业、挤掉了轻工业，重工业自身到了1960年底也站不住脚掉了下来。

首先，让我们看看基本建设的投资增长是如何大大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挤掉消费额，显得规模庞大的。基本建设投资1960年比1957年增长1.8倍，而同期国民收入只增长0.35倍。1960年，基本建设投资占国民收入的31.5%，形成积累跟消费比例的严重失调：新增的积累过多地挤占了新增的国民收入。1959年，新增加的国民收入为157亿元，而用于新增积累却达到179亿元，即还挤掉了上年原有消费的22亿元（占当年新增国民收入的14%）来扩大基本建设。由于1959年、1960年平均每年增加1277万人口，但消费基金基本上没有增加，甚至有所减少，这就在某种程度上严重地影响了人均消费额的下降。1959年，积累率为43.8%，创造了建国以来的最高纪录；1960年，随着国民经济的下降，积累额不得不减少，但积累率仍达到40%。积累额主要的是用于基本建设，但它与消费额的比例却严重失调，基本建设的规模太大了，到了1961年，削减了投资，由1960年的167亿元减为129亿元，大中型项目由900个减少到771个，积累率仅达19.2%，正好与前面形成反差，基本建设几乎没有余力进行必要的扩大再生产，造成的危害一样是十分严重的。

另一方面，基本建设的投资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也愈来愈大。在农业遭受三年自然灾害下，1959年、1960年，基本建设的投

资均占财政支出的 54% 以上。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都被用在基本建设上。特别是 1960 年，为了维持既定的 1962 年为目标的建设规模，当年的财政还出现了 82 亿的赤字。

总的来说，这么大的基本建设规模确实是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人力所许可的。它的资金从哪儿来呢？只能靠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动用企业流动资金，占用银行信贷资金，挤掉农业和工业维持正常生产的费用等办法解决的。在形式上实际是一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就拿劳动力来说吧，这三年全国职工人数大大地超过了国家计划，其中基本建设的职工人数更是以极大的速度增加。而这些职工主要又来自农业生产战线。过量地抽调农村劳动力，不仅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也加重了农业负担。在物力方面，1959 年—1960 年，基本建设所用钢材的供应一年比一年紧张。以钢为例，这期间，钢材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2%，低于基本建设投资年平均增长 6% 的速度。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规模庞大的基本建设投资中，资金过多地集中在生产性的建设上，而忽视了必要的非生产性建设。1960 年 5 月中央强调提出：在基本建设方面必须坚决贯彻大中小结合以中小为主而且以“小洋群”为主的方针。据统计，1960 年，21 个省市区共有职工 1820 万人，其中“小洋群”为 686.6 万人，“小土群”为 318 万人，合计 1004.6 万人，占职工总数 55.2%，可见当时基本建设建的“小洋群”、“小土群”曾经占了很大的比例。再包括其他一些生产性的基本建设，基本建设中生产性建设占了绝大部分。“一五”时期，非生产性建设原已过分压缩，平均只占投资总额 28.3%，而在 1959 年却只到 13.6% 比重减少了一半以上。虽然后来在 1959 年~1960 年期间建了不少高标准的楼、堂、馆、所，但也只是占同期非生产

性建设投资总额的 1/7 左右，这跟投资在生产性基建上的“大办大搞”是形成鲜明对比的，严重地影响了城市建设和人民生活。

基本建设的规模如此庞大，必然导致基本建设的战线拉长，主要指的是同时期上马的项目过多，没有能够集中力量，有效地使用我们的物力、财力和人力。在 1959 年~1961 年期间，全国施工的大中型项目：1959 年为 1361 个；1960 年为 1815 个；1960 年为 1409 个，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实行的大中型企业的总和只有 1384 个。这样就必然使工程的进度拖长，其中不少是半拉子工程，人为地造成了危害。

基本建设的战线过长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地方小型项目无控制地“遍地开花”。这是为了响应当时中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在 5 年或 7 年的时间内使地方工业总产值赶上或超过农业总产值，地方投资急剧增加的后果。计划外建设项目大量增加。1959 年，限额以上施工的建设项目，原确定为 1092 个，但第一季度实施施工的项目（因实际上发展的速度比计划中的快得多），据不完全统计，已达 1263 个。加上那些正在筹建施工的还有 331 个，竟达到了 1600 个左右。由于左倾的错误，基建的投资到 1960 年更是升级。全国施工的计划外的大中型项目有 380 多个，占全国施工的大中型项目的 20% 以上，而同年施工的计划外小型项目也占了全部施工的 34%。甚至计划内的项目又有不少增加的计划外工程，例如，一些“楼、堂、馆、所”，虽然中央曾经多次禁止，但在一段时间内还控制不了。

另一方面，表现较为突出的是，过早过多地设立基建筹备机构。因为计划要建设的基本建设项目很多，必须做好筹备工作，收集设备、材料以及征收人力。据统计，这种机构 1960 年

就有 1500 个左右，筹建人员和生产准备人员达 51.5 万人，浪费了物力、人力。

经济效益是最能体现一件工作是不是作得成功的体现。从 1959 年——1960 年由于基建战线太长，超过实际可能。建设项目的投产率（即全部建成投产项目个数占施工项目个数的比例），由 1957 年的 26.4% 降到 12%、9.8%。例如，1960 年全国水利会议决定蓄水 1 亿立方米以上的水库年内搞 100 个，结果各地共搞了 360 个，其中一些因质量不高，后来被冲垮了不少。炼钢的“小土群”、“小洋群”建设，也因效率低、损耗太大，而后来纷纷下马，被报废。又以大中型项目为例：1960 年投产率只有 9.8%，是 1954 年以来投产率最低的一年。大部分没有来得及建成，甚至建成了没来得及发挥其效用，因为不配套或者资源勘探不清等原因，就下马了。损失以千万为计算单位（每一个项目）。

经济效益的不高，也使得用于基建的流动资金严重缺乏，不利于扩大再生产或筹建其他必需的项目或者支援农业、工业的生产急需。使用率也大大降低。1959 年为 69.2%，1960 年仅为 68.8%，固定资产增产缓慢，直接影响了新增生产能力计划的完成。据统计，1960 年，工业、交通部门 23 种主要新增生产能力计划中，除棉纱、棉外，其余 21 种都没有能完成其计划。其中铁矿开采、铝电解、铜冶炼、电碱等 8 种计划完成不到一半。

其他的一些基建，地区分布不合理、重复建设，或是生产上不是十分急需的，也造成投资后，生产的经济效益不高。这都是经济效益差的具体表现。特别是 1961 年，基本建设的投资数额下降，但上的大中型项目仍然高达 1407 个，超过了 1959 年的水平。投资少而项目多，必然导致建设中资料省力省事，建

得差不多也就行了。像这类基建，后来调整时给关停转了不少。

在1959年到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基建问题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投资方向的不正确。这是由于当时权力下得过多而造成的。

我们知道：基本建设的投资来源于两方面——国家投资（即预算的投资），自筹投资（即预算外投资），1959年~1960年期间，预算内投资增长很快，而在预算外投资比预算内投资增长更快，这部分投资主要是搞小型项目，大部分用于计划外建设，这就不仅拉长了基本建设战线，冲击了国家投资的项目，而且不容易控制，也不容易停下来。1959年，自筹款为77.65亿元；1960年，自筹款为86.94亿元。这样，为以后产生的一些问题提供了机会：乱上项目，说增加产量，就上项目，不认真规划材料、设备等需要纳入综合基建计划，势必冲击国家计划，影响计划项目的建设。

### 父母为何只偏爱他

“如果片面地‘突击’某一部门，从而使各部门之间必要的比例关系遭到破坏，不但这个部门将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并且有可能会损害其他部门。”

实践证明，在我们这个农业大国，工业跟农业之间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是发展国民经济的主导。要把国民经济搞好，必须协调好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发挥工业的

主导作用。

1959年~1961年，由于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陷入了僵局，同时也由于工业的“异军突出”，使得国民经济的比例更加失调，呈现出严重的局面。

1959年~1961年，工业究竟发生了什么？

工业重点论（重工业重点论）无疑是当时的一个热点。

工业是发展国家经济的主导，特别是重工业更是体现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是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物质基础。而在旧中国，重工业的产值在全部工业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很低：在1949年只占全部工业产值的26.6%，这是中国生产力水平落后的标志。因此，我们党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改革，要求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保证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工业（重工业）的生产。这也是正确的。

在当时，执行苏联模式的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工业为重点，压迫农业的弊端已初步显示。庐山会议准备和开始开会之前，毛泽东同一些领导干部谈话，提出：要把过去安排经济计划的次序重轻农，按农轻重再安排。重工业重点论的苗头已经出现。

历史往往捉弄人。由于庐山会议后期的“反右倾运动和经济经验”的不足，继承1958年“全民大炼钢”的衣钵，在1959年下半年开始，实行以工业为重点（尤其是重工业）的方针。强调“以钢为纲”，盲目追求钢产量的高指标的“重工业重点论”方法去发展国民经济。

“重工业重点论”具体地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钢产量的高指标。第二，一切以钢为中心。

钢产量的高指标。1959年，庐山会议原确定了1959年国民

经济计划的各项指标中，钢的指标为1800万吨。1959年上半年，工业开足马力，钢铁生产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到6月底仅产了530万吨，距半年900万吨的产量计划差距很大。7月份庐山会议只好把原确定的钢指标减为1200万吨，但仍然是不符合当时生产力的指标的。最后中央决定把实现这个目标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拼资源地蛮干，到年底终于完成1381万吨（包括土钢），“1959年重工业比1958年更冒进”。1960年，在二届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高指标的“第一本帐”（钢产量为1840万吨）的同时，又编制了以钢产量2040万吨为中心的第二本帐，甚至第三本帐（钢产量为2200万吨），并要求各部门，各地区一律以此为准安排和检查工作。这就使得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中的指标大大加码。但1960年第一季度日产量仅为4.98万吨，第二季度更是大幅度下降，眼看完不成指标，仍然靠大拼资源，24小时的连续运转。到年底，不顾一切地把钢产量保住了，为1866万吨。

高指标所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它使资源在1959~1960年期间，大量地被耗废，也给人带来了劳累等病，工人的体质明显下降。

以钢为中心，即是“以钢为纲”，它造成的后果也是严重的。虽然它也带来工业的发展：从1959年到1961年工业总产值分别是1484亿元、1650亿元、1019亿元，比1957年分别增加了780亿元、946亿元、315亿元。但是重工业总产值从1959年到1961年分别是：874亿元、1100亿元、588亿元，而1957年只有330亿元。重工业畸形发展，使得工业内部结构畸形，挤了其他行业，“把整个国民经济都冲乱了”。

在工业内部，1959~1961年，钢铁产量成倍增长，迫使煤

炭、电力也跟着大上，因而铺开了一个庞大的重工业建设摊子。反过来，又要求钢铁、水泥及机械工业等生产资料生产迅速增长，这样使得整个工业形成了以钢为中心，以生产资料工业自我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畸形经济结构。

重工业也挤了其他行业：农业、交通等等。使农业、交通远远跟不上重工业发展的速度，重工业异军突起更为明显。

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建设，已经超过了农业提供粮食和经济作物的可能，并且为了大办钢铁、大办工业，农村大批的青壮年成为城镇人口。之后，又动员了几千万人上山去找铁矿，采掘矿，修建铁路公路，为钢铁生产运送矿石。建起了不少的“小土群”，但是却因大量地砍伐树木，严重地破坏了森林资源，占用了几千万亩耕地。农业肩上的负担，一下子又增加了不少，进一步受到了摧残。由于大办工业，大办钢铁，必然导致了农业经济遭受严重的破坏，也是1959~1961年期间粮食大幅度减产和副产品急剧减少的重要原因。前面已经提到，在此不再多说。

大办工业也必须要使交通也跟上步骤。但是在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畸形发展，“突飞猛进”时，交通运输行业却远不能跟上步骤。于是在1959年~1961年期间，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出现了比例的严重失调。

在“一五”时期，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68%，其中农业产值增长了25%，工业增长了128%，而全国的货运量增长了155%，可以看出交通运输事业是发展较快的；适应时势的。

1959年，货运量增长也是较快的。据统计，从1958~1960年，全国的货运量增加了1.1倍。但是在同一时期，生铁产量从1958年至1960年增长了3.6倍，占货运量最大比重的煤炭

产量增长2倍，铁矿石产量增加了4.8倍。1959年，货运已经明显地赶不上需要，差距正在扩大。1960年，全国各地普遍掀起大造铁路，特别是土铁路和轻轨铁路的高潮，但尽管如此，交通运输的“跃进”计划（比1959年，铁路货运量增加33%，汽车货运量增加57%）没能完成。而且许多是不能使用的土铁路。而同时钢产量的增长速度为34.4%，在1960年时，全国货运量（包括民间运输在内）25.5亿吨，但正常运输能力只有21亿吨，因此，全国的交通处于被动的状态。为了给重工业让路和解决粮食问题，力求保住工业用煤及粮食等的货物运输，在挤掉其他货物运输后，仍有30%的铁矿石和大量的煤炭积压，在矿区运不出来。据统计：在1960年的运量中，靠正常运输能力承担的占82%，其余的18%是靠超载多拉，使用农村劳动力短途接运等办法突上去的。汽车开三班，日夜赶运，农村参加运输的劳力最高达1000万人。1961年情况稍为好转。

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工业发展，是远远超过实际生产力所能承担的。据另一份表统计：3年中，为了完成运输任务，铁路交通部门所属线路与车船，因过度使用而损坏严重。1961年，全国汽车完好率仅60%，整个运输能力大幅度下降。这是工业规模太大所造成的。

在工业内部，重工业和轻工业“两兄弟”也引起了纷争。导致的后果是：轻工业出现了从未有过的下降情况。1960年，轻工业总产值为550亿元，比1959年减少了9%，棉纱产量下降28.6%，棉布下降了28%，食糖等某些产品下降了60%，人民很需要的轻工日用品供应日益减少，呈现出奇缺现象。而重工业，1960年重工业产值为1100亿元，比1959年增长25.9%，比1957年增长了几乎2.3倍。其中钢的产量比1959年增长了

34.5%；原煤增长7.5%，水泥增长27.5%，钢材增长23.8%，呈高速增长之势。

为了保钢，轻工业被迫“停车让路”。在劳动力方面，轻工业企业的职工，特别是集体所有制的生产合作社（工厂）的职工被抽调去大炼钢铁，有的则是由为生产日用品服务转向为重工业生产服务。另外一方面，交通运输部门也是优先给重工业安排运输任务，这样又使得轻工业的原材料、燃料等供应不足，甚至连产品都运不出去。当时造成了大量的轻工业物质积压在码头、车站，大量的轻工产品堆在临时仓库里。分配给轻工业的钢材指标大大减少。如：缝纫机生产，因为缺乏生铁，1959年上半年比1958年同期产量下降将近40%，但是重工业以及基本建设需要的钢材压不下来，也无法控制。而另外一些工业品为原料的产品，如电池、灯泡、民用锁、火柴、日用陶瓷，铁锅甚至发卡等小商品，也因重工业的过分挤占或者安排不够而供不应求，影响了城乡人民的生活。

我们知道1959年~1960年正是继续跃进的时期，而重工业又要轻工业为其“让路”，轻工业怎样才能既“跃进”又“让路”呢？当时出现的一种情况是：抛弃技术，转而采取限期实行机械化、自动化的办法，建立轻工业生产厂。一时犹如点点星星撒遍人间大地。但是真正能够坚持生产的企业可以说是寥寥无几。例如，湖北省府城县流行着一首打油诗：“大办工厂闹哄哄，三天过后又稀松，牌子挂出几百个，十个倒有九个空。”而且由于技术不过关，也缺乏真正的技术人才，生产出来的轻工产品质量不可靠，损耗巨大，不能为市场提供正常的供应。

除了重工业的排挤外，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农业的全面减产，棉花、烟叶等原料来源受到了很大影响，轻工业生产能

同农业可能提供的原料之间也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例如：1960年跟1957年比，棉纱和食油的生产能力分别增长了31%和4%，而棉花和油料的生产却分别下降了36%和54%。1961年，棉纺工业的开工率仅为52.5%，制糖、卷烟、罐头等工业开工率只达20%和35%，农业和轻工产品的大幅度下降，很快造成市场上的严重困难，使供需之间的矛盾变得更为尖锐起来。

煤炭是工业的主要“粮食”，是支撑整个工业的重要基础，关系着工业全局，但它一直发展不好不快。1959年10月25日至11月26日第八次全国计划会议讨论安排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时，就把采掘工业（主要产煤）与动力工业、交通运输业一起列为必须加强的薄弱部门。到了以重工业为中心搞工业时，更显得远远落后于冶炼、加工工业的需要。当然，当时的重工业是孤军突出也是显得采掘工业不强的原因。

在1959年到1961年，工业总产值连续三年超过1000亿元，分别为1484亿元、1650亿元、1019亿元，而煤的产量只有3.69亿吨、3.97亿吨、2.78亿吨，据估算，对工业的发展远远不够。而在采掘工业，有不少是新增的矿井，又属于简易投产，尚未形成综合生产能力，只好催促老矿井拼命增产，这样资源不断被强化开采、滥用。设备因超负荷，“带病运转”，矿井本身的生产能力受到很大的破坏，而且煤炭中的矸石以及灰分大量存在，质量品位下降，因此又需要更多的煤炭产量，形成的恶果不仅对于当时，甚至对于以后的恢复都是极其困难的。据调查：在1960年，在煤炭部直属的508处矿井中，生产能力破坏严重和简易投产的有179处，占部属煤矿设计能力的42%，采掘关系不正常（开采和掘进的比例）的矿井占77%。到了1961年底，中央直属煤矿23种主要设备的平均寿命率仍有

12.6%。中央直属煤矿设计能力共 1.76 亿吨，其中生产力破坏严重和简易投产的 7484 万吨，占 42%。

竭泽而渔所造成的损失，不仅是对工业本身的，也是对其他行业的损害。全国重点煤矿的产量从 1960 年 7 月起直线下降，人民生活用的燃料动力仍超过产量的 3.5%（1960 年）停产。例如：到 1960 年 11 月，山东省轻纺、化工等部门共 744 个企业，因缺煤停工、半停工的占 3/4 以上，不少地区甚至发生了抢煤事件。

从上可以看出：在 1959 年至 1961 年期间，重工业重点论不是像所说的那样，使国民经济“全速前进”，而倒像是把其他行业以及工业自身给搞垮了。例：1961 年，钢产量下降为 870 万吨，工业总产值比 1960 年下降了 631 亿元。

工业企业管理极端混乱也是使当时工业所面临的不良状况的原因之一。普遍的表现是许多产品的质量下降；人身和设备事故不断增加，浪费的现象十分严重。而具体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方面，任意废除合理的规章制度。把规章制度看成是阻碍前进的拦路石，是属于“教条主义”的东西，会束缚企业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坚决地“砸烂”。结果自然是使许多工作无章可循，有章不循的纷乱局面，为任意推行一些不切实际、违反科学的技术措施提供了“方便之门”。而且不讲究实际可行性，容易随着“风”吹而“草”动。

第二方面就是生产秩序混乱。工业企业的建设摊子铺得太大，建设了不少的大中型企业外，还有许多“遍地开花”的中小型企业（也有不少的“季节性”企业），造成生产秩序异常混乱，缺少什么就生产什么。而又由于缺乏技术人才，生产出来

的产品质量很差。

第三方面, 设备遭到严重的破坏。有些企业是实行党委的统一领导、大权独揽, 以致于削弱甚至取消了厂长的职权。他们忽视技术的作用, 无视设备的运耗, 以为一架设备机器, 可以生产出无限的产品出来。另外也由于受指标的压力, 设备也不得不 24 小时连续运转, 使设备的损耗严重。而设备是生产所必需的, 进而就必然导致产量的减少以及质量的降低。

第四方面, 经营亏损严重。缺少技术管理, 没有实行经济核算, 无限度地增加职工人数都是导致经营亏损的原因。这点尤为突出, 国营企业 1961 年亏了 105 亿元, 相当于当年国民财政收入 29% 左右。而其中, 工业部门的亏损达到 46 亿元。

第五方面, 劳动生产率低下。有些企业不考虑现代化企业管理的需要, 不适当地推行“无人管理”和“工人自我管理”, 出现磨洋工的状况, 国营工业的劳动生产率, 同 1957 年相比, 1961 年下降了 52.3%, 特别是钢铁工业, 劳动生产率下降了 75%。

## 赤字·通胀

“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 涨了物价, 动用了很大一部分黄金和白银和外汇的储备, 在对外贸易上还欠了债, 并且动了几十亿元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 这些都是通货膨胀的表现。”

在我国 30 年的历史进程中, 国民经济进行过两次大的调整。其中之一就是以 1961 年为始的为期 5 年的调整。

这说明当时的国民经济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危机：速度太高，积累太多，基本建设战线拉得太长、规模太大，重工业比重升得太快等所引起的比例的严重失调；而危险的信号又都是从财贸发出来的。征象是：财政收支不平衡，货币流通量大大超过商品可供量，通货膨胀，市场商品供应全面紧张。

1959年~1960年财贸方面究竟出了什么事？那就让我们回顾一下，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这个有着几亿农民的农业大国财贸方面的情况吧。

首先，财政金融出现了赤字。

为何会出现赤字呢？

财政金融出现赤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先必须要注意到当时财政收入的两面性。一方面，1959年~1960年期间财政收入是年年增加的。1959年为578亿元，1960年为634.9亿元，分别比1957年的财政收入增长了84%和76.5%。并且1959年、1960年的财政收入分别占国民收入比重达47%、52%。银行对工业的贷款，由1957年的33.4亿元增至1959年的258.3亿元，1960年更增至399.6亿元；银行对商业的贷款也从1957年的216.4亿元，分别增至1959年的495.5亿元，1960年的506.3亿元。然而这种财政、信贷规模的扩大，带有虚伪性。

而另一方面，财政的统收过多，而财政资金又主要用于基建。再在当时“左”的错误影响下，财政收入确实有不少虚假。银行也存在着虚假存款。事实上，财政支出方面，基建投资相当一部分是挪用企业的流动资金和设备维修费，占用银行信贷资金和企业维持正常生产的费用，以及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得来的。例如，1959年的基本建设支出增长1.4倍。1960年增长了1.9倍，全国性的几个“大办”（大炼钢铁、大搞水利、大搞农

田基本建设等)，使得基本建设失去了控制，资金渠道又多，五小工业“遍地开花”，耗资巨大，浪费也大。同时支援农业资金增长也很快，1960年比1957年增长达2.7倍。另外，在财政支出中，流动资金占用过多，物资盘亏损失很大。据估计盘亏、报废、损失部分约占流动资金的15%左右。实际上，自1959年以来，在财政上收入很少。在农业生产下降，企业产品成本提高，工业、商品、外贸等亏损增加，实际上收入不多。

可以看出，财政收入实际上锐减，而支出在不断增加，存在着赤字是在所难免的了。经过后来核实，1959年、1960年、1961年，财政赤字分别为65.8亿元、81.8亿元、50亿元。

财政赤字像巨兽一般，吞噬着人民的生活。

为了弥补信贷的严重不平衡，弥补财政赤字，在当时不得不发行大量的货币。从1959年到1961年期间，1959年的货币流通量为82亿元，1960年货币流通量为98亿元，比1957年增加了81.7%，1961年发行量又比1957年增加1倍多。是第二个五年计划中货币流通量最多的一年。但是同期的工农业总产值只增加14.7%，市场货币流通量显然大大超过了商品流通的正常需要。特别是1961年，货币发行量增加的幅度是这样的大，是1950年统一财经以来所未有过的。

大量发行货币是出于无奈的。因为在当时信贷工作中，重的轻的，无条件地支持生产，认为放就是支持生产，收就是打击生产。提出“需要多少，就贷多少”，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贷给。同时对于银行下放的权力过多，信贷脱离计划性，而其他部门、企业又在计划外强令银行增加贷款，把银行信贷资金和财政资金的界限搞混，银行贷款用作财政性支出（如基本

建设开支，弥补企业亏损，发放工资，缴纳利润，增加福利和“四项费用”开支等），结果把银行的资金和存款大量垫付给了企业流动资金。而在财政管理方面，没有坚持量入为出的基本原则，做到收入按政策，支出按政策。1959年~1961年期间，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大大增加了货币的发行量。

实行增加货币流通量的办法就是银行实行现今收支，而投放的货币量年年大于回笼数目。

当时的情况，正如陈云同志所说的那样：“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涨了物价，动用了很大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的储备，在对外贸易上还欠了债，并且多发了几十亿元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这些都是通货膨胀的表现。”

“一方面支出钞票多，而另一方面，农业、轻工业减产，国家掌握的商品少”，两方面不能平衡。而支出的钞票中有很大的部分被地方和企业所挤占了。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当时财政过于分散，财政纪律松弛等。有些地区和单位乱拉乱挤国家资金，化大公为小公，任意地占用财政收入；税收中欠税、漏税，应交而不交，流动资金不足就向国家要钱，把事业费、行政管理费等打入成本，乱挤了应交国家的利润，多发了工资，这必然造成了社会购买力的膨胀。

社会购买力的膨胀，在一定的程度上使通货膨胀的危害更为严重。社会购买力1959年为675.1亿元，1960年为716.7亿元，比1957年增加了46.8%。国家和集体所有制职工工资由1957年的217.6亿元增加到1960年的324.1亿元，增加了48.9%。城镇集团购买力从1957年到1960年平均每年增长10.8亿元。而另外一方面，市场上的各种商品严重缺乏，特别

是吃、穿、用商品缺口很大，外汇收入、侨汇减少，外汇结存急剧下降，无力增加进口市场消费。1960年在动用很大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的储存，挖了大量商品库存的情况下，商品货源仍比社会购买力少14.8亿元，差额占当年社会购买力的10.4%，1960年8月5日，中共中央虽然发出《关于大力紧缩社会购买力的指示》的应急措施。例如，要求全国一切机关、团体和部队、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在今后的5个月内，把公用经费中的商业性支出部分压缩20%左右，全国共压缩5亿元。但这对于膨胀的社会购买力来说，是小菜一碟。

通货膨胀是严重的。1960年每天货币所有的内贸消费品库存，由1957年的5.2元减为4.1元，下降了21.1%，市场供需关系严重，物价上涨得飞快。例如，蔬菜等副食品和许多种类副产品，因供不应求或受集市贸易价格的影响上涨较多；地方工业和手工业生产的许多种小商品质量下降，变相涨价情况相当普遍。虽然国家也保障了一些商品的定量供应部分的价格，但由于许多商品定量较少，物价稳定不了。

在贸易方面，也出现了不少的问题。

首先，在对外贸易问题上，以1960年为例，1960年外贸收购和出口，1至7月份“计划完成得很差”，“国家的外汇收支出现了很大的逆差”。到7月下旬，全国出口商品，收购的计划只完成43.3%，出口计划只完成38%。“估计到今年年底，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欠帐可能达到17亿元到20亿元。特别是1961年进口粮食，花了将近4个亿外汇”。

再次，就是国内的贸易问题。

刘少奇曾经说过：国家商店、供销合作社、农贸市场是三个主要的流通环节。但在1959年~1961年期间，国营商业独家

包揽了商品供销，而市场贸易是被禁止或只作为权宜之计的。一平二调、供给制等更取消了商品交换，窒息了市场机制，并且对集市贸易严加限制（例如中共中央对一类产品棉粮油等继续坚持征购统销的政策，二类产品猪牛羊等通过合同进行派购，完成任务后才可上市自由销售），并且急于替代，供销合作社没有充分发挥其经济作用，合作商店、合作小组没得到应有的发展。这些因素，使得三者之间的流通产生了堵塞，形成了当时生产、流通既乱又死的严重局面，使得产销间的传统联系被割断，服务质量减低，商品短缺现象甚为严重，从吃的、穿的到日用品都是呈现求过于供，例如，1959年由于食油供应四处告急，为了满足城镇需要采取基本上停止农村供应4个月的非常措施。1960年情况更进一步发展。然而奇怪的是：商业部门的商品库存总额竟增加了35%（跟1957年比），但这多是些质次价高，不适销，不对路的冷背残次品。

农村严重缺粮的情况在农村集市上反映出来（1959年到1961年）。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粮食短缺很严重，在国家大量增加粮食征购的情况下，仍然不够城镇销售的需要，市场供求矛盾十分尖锐。1960年缺粮124亿斤，1961年缺粮119亿斤。

对于农村集市问题，中共中央于1959年下半年批准重新开放在1958年公社运动开始时关闭的农村集市。最初这些集市只允许买卖不属于国家统一收购的农产品，但是在1960年，这一禁令实际上被废除了。

农村地区粮食的短缺可以从农村集市上可以买到食品的惊人的上涨速度中反映出来。1960年下半年，由于实际的短缺以致哄抬物价、投机等现象，绝大部分农产品的农村集市价格涨

到国家价格 2 倍的水平，可是谷物的价格却暴涨到国家固定价格的 10 倍。到了 1961 年，这个差距就更大了。农村自由集市粮食的价格是每斤 1~2 元，为所有谷类征购价格平均每斤 0.065 元的 15 至 16 倍。猪肉价格涨到每斤 5 元，为国家收购价的 14 倍，其他的食品都有较大幅度的上涨。据统计，1961 年全国集市贸易的价格比 1957 年上涨了 25.4%。

当时，由于农民出售高价的农产品得到了很多钞票，得益非浅，致使这个时期，竟出现一部分农民的生活比城市职工好的奇特现象，不少城镇人口回到农村。

## “艳若桃花”的伤口

在表面上看，1959 年~1961 年，国内的形势是相当好的。人民跟自然作斗争，大搞生产，意气风发，呈现出一派勃勃的生机。然而透过这虚假的繁荣景象背后，却看到严重的隐患。

这个隐患，就是一直贯穿在 1959~1960 年期间的“左”的指导思想。

“左”的倾向由来已久。特别是建国以后，中国这个农业大国在经济上一直处于“赶超型”。由于同发达国家存在着很大差距，新生的人民国家恨不得马上赶上乃至超过发达国家。而我国发展的起点又是较低的，要赶超西方发达国家，急于改变贫困落后面貌，客观上就存在产生“左”的偏差的土壤，“左”的倾向必然产生。

在经济上，“左”的指导思想过分地夸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离开生产力的现状，空谈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

性，认为只要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可以创造任何的、高水平的生产力；忽视了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试图创造人间的奇迹。它在经济上造成的危害，在前面已经讲过很多，后果是致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走了一段弯路。

因为“左”的指导思想是存在于头脑中的，所以1959年～1960年期间，经济上的一些实际问题得不到彻底的解决。不免有人会问：那么在政治、思想文化上呢？

表现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左”的指导思想更有所发展。即是不断地反对右倾保守，并把党内的不同意见分歧等同于阶级斗争，动不动给你上纲上线，是政治问题，有正确意见的同志不敢把真话说出来。

这期间，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关键的一“点”。在庐山会议上，本来可以纠“左”的却到了反右的转折，酿成党内“左”倾错误越积越深。在政治上，党的政治生活原则被破坏，党的政治路线越来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与实践越来越发展，严重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组织上，违背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的破坏，助长了毛泽东个人专断作风和个人崇拜思想的发展。这是建国后我们党在政治生活中的一次重大失误。

首先，党内存在着个人崇拜、个人专断之风，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央和毛泽东曾遵循反对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坚持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集中制原则，例如：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把党的纪律概括为四条：（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但是，党

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时，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却日益严重，他听不进不同的意见，甚至利用权力压制正确意见，对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自己尚能作一些自我批评和检讨，承认自己犯的错误，但是却不愿意被别人批评，因为相信自己观点的正确。

再次，全国上下普遍受“左”倾错误的影响。群众和干部在思想上逐渐形成了“左”比右好的概念。从1959年~1961年期间，就曾经两次反右。彭德怀等一大批坚持原则、执行正确路线的干部被批判。事实教育人民“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保险，右危险，宁“左”勿右的错误观点几乎是从上到下的一种通病。

毛泽东多次提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这本是正确的命题，但这个口号的提出是为“大跃进”服务的，在只许反右，不许反“左”的情况下，势必是谁的调子最高，谁的“豪言壮语”最多，谁表现得最“左”，谁的思想就是最解放的。把脱离实际的空想当作解放思想，因而，破除迷信，实际上成了破除科学的同义词，解放思想实际上成了说大、空、假话的代名词。

宁“左”勿右，在政治思想领域中表现为“急于求纯”的思想。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上半年，大搞过渡高潮，期望早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不断开展“拔白旗”、反右倾、“民主革命补课”等政治运动，误伤了一大批党内的干部和群众，造成党内及党与民主党派、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都很紧张。以教育文化、文艺界为例，当时全国教育片面强调知识分子要接受劳动改造，忽视了学校教育，教育质量下降；而在文艺界，文艺创作的题材日益狭窄，而且要求思想性强，忽视艺术性，写工农兵生活，搞“三突出”。同时，艺术问题被当作政治问题，

别人话一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这是流行文艺界的“五子登科”。导致文艺作品纯之又纯，出来的多是“闪光的语言”、“豪言壮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同时，走“左”倾的错误路线，也使人们认识国情不从我国的实际出发，而从“纯洁”、“完美”的抽象概念出发，幻想消灭社会分工，消灭商品制度的办法改造社会，企图开辟一条社会主义新道路，实际上追求的是一种空想的社会模式给人民的思想造成错觉。

历史事实证明：错误倾向的代表人物总是违反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因此，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时候，往往就是“左”倾或者右倾错误的时候。

从1959年~1961年期间，党发生了严重的“左”倾错误，把反右倾斗争扩大化。据1962年甄别平反的统计数字看，在这三年期间，被作为重点批判对象或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干部有365万人，群众有300多万人。政治生活出现了问题，民主集中制原则被严重地破坏。

政治生活的主题是要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扩大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人民内部实行最大限度的民主。而对于那些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敌对分子，必须实行专政。但是党内党外却有别。例如：贪污腐败问题。中央监委的监察工作情况反映第215号《贵州省遵义和毕节地区群众生活和干部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中，对不少人铺张浪费严重，贪污腐化，破坏党章，违纪乱法，而且不顾人民死活的情况，进行揭发。这种情况不少。但为什么对其处理那么轻呢？因为在当时反腐败的斗争中存在着重大缺陷：在

理论上把官僚主义腐败现象仅仅归结为思想道德问题，因而在实践上也就仅仅希望通过思想教育、道德教育，使其改邪归正。而对一般的群众，盗窃、贪污都被重重处罚。同时，在给予人民的最大限度的民主上，以党代政，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手里，什么事都让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人民的民主就很难实行。

## 第四章

# 苦果早已种下

- 吹牛皮的后果不妙
- 人民公社的风起和整顿
- 人祸难补
- 彭德怀“请为人民鼓咙胡”
- 周恩来万没料到的
- 新“大跃进”出台
- 沉重的钢铁
- 让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
- 农业赔惨了
- 19亿元赤字的背后



## 吹牛皮的后果不妙

据统计资料证明, 1958年的粮食产量确实是历史上最高的年份, 仅粮食产量就达到了4000亿斤。这还不包括部分地区因大炼钢铁抽走了劳动力, 丰产不丰收的数字。农业状况是喜人的。然而, 人们的浮夸是吓人的。

1958年初, 报纸上开始报道了一批亩产2300斤的纪录。到了夏收期间, 农业方面开始不断“发射”高产“卫星”上天。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公社放了第一个小麦亩产“卫星”: 亩产2105斤。以后纪录便被不断刷新: 2394斤, 3664斤, 4353斤……到4412斤, 报纸宣布为冬小麦亩产“最高记录”。但几天后, 又接连放出亩产4535斤、4689斤、5103斤的“卫星”。早稻亩产达到了15000斤, 并且是地委第一书记和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的专家们亲临验收的。8月3日, 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大跃进宣传报道中注意事项的通知》, 要求控制宣传高产数字。但不久, 又报出早稻单产36956斤、43075斤9两的“高产卫星”。最后, 在9月份的《人民日报》上报道了: 广西省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的“中稻高产卫星”, 亩产量高达130434斤14两4钱的记录!

当时新编了一首描绘农业生产的民歌这样唱道:“稻粒赶黄豆, 黄豆像地瓜, 芝麻赛玉米, 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 山芋赶冬瓜, 一幅丰收图, 跃进农民画。”

在浮夸风的影响下, 全国上下甚至产生了粮食多了该怎么办的忧虑。例如当毛泽东在1958年8月4日视察河北省徐水县

时，县委书记张国忠告诉主席说，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 12 亿斤粮食汇报，平均每亩要产 2 千斤。张国忠又说，主要是山药高产，全县共种了春夏山药 35 万亩。

毛主席听过后，不觉睁大了眼睛，笑嘻嘻地看了看其他的人，说道：“要收那么多粮食呀！”毛主席伸出又厚又大的坚强的巴掌，算帐一般地说：“你们夏收才拿到 9 千多万斤粮食呢！秋季要收 11 亿斤呀！你们全县 31 万多人口，这么多粮食哪能吃得完呢？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大家一时都被毛主席问住了。后来，张国忠答道：“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主席就：“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

李江生说：“我们拿山药造酒精。”

毛主席说：“那就是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那么多酒精啊！”

毛主席呵呵笑着，左右环视大家，大家不觉都跟着笑了起来。张国忠也笑道：“我们只是光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

毛主席说：“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

很多人都在私下里互相议论着：“毛主席看问题看得多远，看得多周到啊！”

“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毛主席又笑道：“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后来，安徽、河南等省争相宣布自己已是人均粮食千斤省。农业部发布的生产公报，1958 年油菜、春小麦、早稻总产量分别比上年增长 56.5%、63%、126% 这样高的数字。农业部根据各省的报告汇总的全年粮食估计总产量，竟然高达 10000 亿斤

(1957年是3900亿斤)。这样高的数字，就连毛泽东也不相信，以至于对外宣布估产时降到了6千~7千亿斤。

对农业估产过高，又必然引起高征购。粮食产量最后估计是8200亿斤，于是，1958年粮食征购量达1175亿斤，粮食征购量占实际产量的比重，由1957年的24.6%增加到1958年的29.4%。

农村粮食本已快要吃空，又要尽先外调。加上当时为筹集资金，大办工业，还对银行放给农村的贷款，不问是否到期，一律强制收回。

这样“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农民很大恐慌。几亿农民和基层干部联合起来，搞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起来反抗，保卫他们自己的产品。所有这些，都使这一年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收购不上来，大量蔬菜留在队里吃不了宁可烂了，不卖给国家，不足100斤的猪，不待长肥，也宰了吃了。从这一年冬开始，全国市场上已部分出现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供应不足的紧张状况，其严重程度大大超过了建国历史上比较糟糕的1953年和1956年。

1958年这个丰产年没料到是如此结果，但是，好年运和坏年运总是相伴而来的。在紧接的1959年，1960年，1961年三年期间，自然灾害频频降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成了肥皂泡，破灭了。1959年生产出粮食3400亿斤，1960年粮食仅生产出2870亿斤，1961年也只生产粮食2950亿斤。谁也没料到是三年的自然灾害，接连的三年！当1958年、1959年把存粮吃空以后，天灾带来的无疑就是饥饿。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一受灾，一切都难办了。

## 人民公社的风起和整顿

农村人民公社组织，是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小并大的过程中经毛泽东所倡导起来的。在1958年8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因为在北戴河召开，也简称为北戴河会议）时，全国许多地方已经在建立了。北戴河会议上，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北戴河会议正式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会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以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合一为主要特点的人民公社。

于是，一个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就在全国各地农村掀起来。当时要求先把人民公社的架子搭起来。在短短的30天里，就不断地有省、区宣布实现了农村公社化。到了9月末，全国农村除了西藏自治区外已基本实现了公社化。建立起人民公社26425个，参加公社的农户达12194万户，占农户总数目的98%。

人民公社的特点，就是“一大二公”。所谓大，一是规模比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初级社一般只是90户，高级社是一二百户，而人民公社实际上许多都在4000户以上。二是经营范围比农业生产合作社要广大。农村初级社、高级社一般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而人民公社则不仅包括农业生产，还要求是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这样的人民公社一建立，就必然要把原来经济条件、贫富水平不同的社队合而为一，实行统一核算，又大搞平均主义做法，实际上就是富队让穷队共了产。

“公”，一是人民公社要与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合而为一，国

家把农村中原属全民所有制的银行、商店和其它企业下放公社管理，使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中增加了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二是把社员的自留地、家禽家畜、家庭副业收归人民公社所有，消除所谓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三是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大搞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幸福院等公共事业，实行工资制和粮食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

当时不顾条件地大力推广吃饭不要钱，试行把全部或大部人民生活包下来的供给制。到1958年为止，全国农村共建立了公共食堂340万个，各种托儿组织340多万个，幸福院15万所。有的地方还对社员生活实行“七包”“十包。”“七包”就是要包吃、包穿、包住、包生养、包教、包婚丧、包看病等生活需要。而所谓“十包”除了上述“七包”外，还包烤火费、包理发、包看戏看电影等。

人民公社在分配上企图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实行按需分配，不但超越了当时经济负担的可能，难以继续维持，而且由于社员干好干坏都一个样，不利于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

另外，这个时期的“大办”工作，在农村也都交由人民公社来执行，这又进一步助长了“共产风”的泛滥。当时有全民大炼钢铁，大办工业、大办交通运输、大办水利、大办文教事业等许多的群众活动，一个接一个。每一个活动，都是凭借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依靠大规模地、甚至是无偿地调用农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实现的。

1958年秋，毛泽东视察了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农村，发现在人民公社问题上存在许多混乱思想和混乱现象。例如：有的人把人民公社看成是全民所有制，与国营企业等同起来，对

劳力、产品可以无偿调拨；有的人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混同在一起，提出一二年内要实现共产主义；有的人主张废除商品生产，甚至把消灭家庭、废除个人生活资料所有权等误认为就是共产主义。

在1958年11月初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在充分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前提下，针对所发觉的、普遍存在的混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情况，明确地提出必须划清这两种界限，肯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还要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

毛泽东在会议上批评了陈伯达等人提出的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毛泽东专门指出，在社会主义现阶段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一个国家，商品生产不是消灭的问题，而是还需要大大发展。他特别强调，为了团结几亿农民，必须发展商品交换。废除商业，对农产品实行调拨，实质上就是剥夺了农民。

在这次会议上，规定了要实行劳逸结合，既抓生产又抓生活的方针。会议期间，毛泽东还给县以上的各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建议大家认真阅读一下斯大林所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指出道：“现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问题，读这两本书就可能给以澄清。”

这次会议并没有摆脱对我国经济发展形势的不切实际的估计，又继续提出了一些高指标，对人民公社的建立、公社化的错误没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对于当时的客观形势，这些是可以理解的，而且第一次郑州会议毕竟是纠正错误的开端。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一次郑州会议结束以后，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除了继续批评“共产风”外，还提出要在1958年12月到1959年期间对人民公社进行整顿。随后，又在武昌召开了八届六中全会，在这次全会上，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八届六中全会后，各地根据全会决议的精神，普遍开展了整社工作。但是，农村的“共产风”并没有完全被制止，加上当时对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缺乏认识，在整个过程中又不适当地开展反对本位主义和瞒产私分的斗争，造成农民的严重不满，使国家同农民之间的关系变得很紧张。

第二年，中共中央在2月末到3月初的时间在郑州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第二次郑州会议）。内容仍然是解决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和纠正“共产风”的问题。这次会议比八届六中全会又有所进步，比较系统地检查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多方面情况，对“左”倾错误进行了纠正。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重要的发言。毛泽东指出，八届六中全会决议，没有写明白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是需要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的生产队或是生产大队的所有制，就要危及农民的利益，而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

毛泽东的眼光很敏锐！

## 人 祸 难 补

当时的“大跃进”运动，对跃进的标准和划分是不同的。

“跃进”，就是高速度，既以高速度发展农业、工业等整个国民经济，同时也要求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一齐“跃进”。在工业上，增产20%，只能算“跃进”；增产25%为“大跃进”；倘若增产30%以上，则为“特大跃进”。在农业方面，增产20%以上，就算是“特大跃进”。

“中国人民自古多奇志！”在1958年，粮食产量是历史上最高的年份；在工业上，仅用4个月的时间，一阵“大炼钢铁”运动，就实现了仅用一年时间就使钢铁产量翻番的奇迹。这些成绩，对于刚刚解放十年，从墟堆里站起来的中国老百姓们，无疑是在像火一样热的头脑中加上一桶汽油。殊不知，国民经济这艘巨轮已经偏离了航向，驶向浅滩；更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加剧了巨轮的偏航角度。盛行一时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已经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后果，留下不少隐患。

首先是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失调。

由于不断扩大基本建设规模，1958年的积累率一下子从上年的24.9%提高到33.9%，施工的大中型项目由原计划的1135个增加到了1587个。国家职工由于工业与基本建设的急剧扩展，在一年内增加了2000万人，国家职工总数达4532万人。这种状况，超过了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负担的可能。

在全民大炼钢铁中，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被白白地浪费了。

不少设备因超负荷运转招致严重损伤，产品的质量下降，品种减少，更是普遍现象。例如生产钢铁，1958年生产的1108万吨钢中，合格的钢产量只有800万吨。在1369万吨生铁产量中，土铁达416万吨。而这些土钢、土铁，质量很差，含硫量过高，以致很难予以使用。而且用小高炉和土高炉炼铁、炼钢，成本

费用也高得惊人。比如炼出一吨生铁，大高炉用1000元的成本，小高炉则为345元，而国家调拨价只有150元。用小高炉炼一吨铁就得赔进去195元。据国家统计局估算，没有炼成的土铁和烧结铁740万吨，约亏损31亿元，而全年大炼钢铁运动，总计约亏损了50亿元。为了生产土铁、土钢，还过量开采了煤炭和矿石，滥砍滥伐了大量树木，其实这些也是一笔巨大的损失。

工业内部因为执行“以钢为纲”而矛盾重重。轻重工业比例失调，不少的轻工业工厂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因“停车让路”，原材料或燃料动力的供应不能解决，生产很不正常。加上大批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在这一年内“转厂过渡”，剩下的生产合作社只占13.3%，使一些轻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的供应十分紧张。在重工业中，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燃料动力工业与其他工业之间的比例发生失调状况。在1958年8、9月份，东北三省因为电力缺乏，在“以钢为纲”的前提下，轻工企业只占有原水平电力负荷的三分之一，减产纸张10万吨左右。北京有名的王麻子刀剪厂因有300多人被抽去炼钢铁，只留下20多人生产刀剪，产量立即由原来每月的3.5万把骤降至3千把，而且剪子的品种也由200多种减为11种，刀子由360多种减为7种。由于轻工业产品产量锐减，品种变少，其结果是造成了第二年人民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紧张。

职工队伍的庞大，急剧增加了社会商品购买力。在社会商品生产非但没有较快增长，而是下降的情况下，必然加剧了社会商品的供需矛盾，在很大程度上要影响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导致了日后的通货膨胀。工人因为取消了计件工资和奖金，收入有所减少；农民因为实行了人民公社化后，自留地、家庭副业基本取消了，而集体分配又少，造成收入显著下降。“大跃

进”运动的任务，迫使着城乡劳动力加班加点，到处转战，十分地疲劳，生活又受影响等诸多因素，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工业与交通运输业之间也发生了不协调。

在交通运输方面，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等部门都已出现异常的紧张局面。在全国铁路网上，因为积压物资达数百万吨，使许多的车站，专用线发生严重堵塞。为适应“大跃进”的需要，全国大办交通运输，各地动员了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和各行各业的男女老幼，同交通运输部门的专业队伍一起参加运输。这样的运输大军，既有火车、汽车、轮船、飞机等现代化运输工具，还有木帆船、骡马大车、手推车等比较落后的工具。有些地方还组织拖拉机、自行车参加运输。

工业交通运输业之间，交通运输是工业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之一。然而在1958年，煤炭产量增长了107.7%，生铁产量增长了130.5%，而同期的交通运输货运量作了很大努力才增长40%。全年的货运量中，正常的运输还只占80%，有20%完全是靠全民搞运输，特别是发动农民搞运输才完成的。

由于大炼钢铁，大办工业和大办其他事业，占用了过多的农村劳力，留在农村的劳力比上年减少了3818万人，而且所减少的大部分是青壮年劳力。农业与工业劳动者的比例由1957年的13.8:1下降为3.5:1。在许多地区，还因为大量的运输工具和牲畜也被用去炼钢铁，结果是大批的粮食和棉花因无人收割而烂在地里，很可惜。据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保守看法：“1958年农产物估计有10%左右未收回。”这样，导致了1959年春粮食供应紧张局面的出现。

## 彭德怀“请为人民鼓咙胡”

因为在“大跃进”运动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动员9千万人上山炼钢铁，严重占用了劳动力，其结果使农业受到很大损失。而农业生产在全国也搞“大跃进”，大放“卫星”，普遍刮起了一阵浮夸风。在办人民公社这件事上，又走得过急，搞了“共产风”。大量问题的出现，使经济发展受到阻碍，促使毛泽东开始意识到“大跃进”的失误。中共中央为总结1958年以来经济建设经验教训，进一步纠正“左”的错误，于1959年7月2日在江西省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毛泽东本来是想上庐山诚心诚意地检讨失误，谁知道……

在上庐山之前，毛泽东对“大跃进”以来的形势作了估计：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告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是夹在两者之间的。总的说来，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但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我们搞合作化、公社化，农业总是增产的，苏联则不是。他们搞集体农庄，农业大幅度减产。没有将军不打败仗的，三仗一败两胜，即有威信。对去年一些缺点错误要承认。从一个局部来讲，从一个问题来讲，成绩与错误可能是十个指头与两个指头、三个指头、七个指头、九个指头的问题；但从全局来讲，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从总的形势来讲，就是这样，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和主要缺点，就在于没有搞好综合平衡。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有群众路线。以后

一定要搞好工、农业之间以及工业内部、农业内部的平衡。

“今年的任务，钢铁产量可定 1300 万吨。”毛泽东在会议召开的第一天发言。“粮食产量情况如何？去年增产有无三成？我看今后每年可争取增产一千亿斤，1964 年可搞到一万亿斤。钢产量，明后年大概只能增加 400 万吨。”

粮食每年增加一千亿斤，钢两年增加 400 万吨；显然是过于乐观的估计。不过，这已经是经过几次压缩后的指标了。

“过去陈云同志提出来，应当先安排市场，再安排基建。有人不赞成。现在看，陈云是对的。”毛泽东称赞陈云。

陈云由于 1956 年的“反冒进”，他和周恩来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此后，陈云便不再领导计划工作了，但他仍然经常向毛泽东提出自己的建议。在两个月前，陈云写信给毛泽东，建议将已压缩到 1650 万吨的 1959 年钢产量指标再压到 1300 万吨。毛泽东接受了这一建议。

第二天，各地高级干部们分东北、西北、西南、中南、华北、华东六个大组，围绕《毛主席的书面发言》中所谈到的 19 个问题，座谈讨论。

彭德怀在西北组讨论。

从 1958 年以来，他多次外出，跑了八九个省，了解了许多真实情况、真实问题。

在粮食方面，高指标压出“高”产量、“高”产量带来高征购，农民的粮食被强制性地征购走了。到年底，严重缺粮的省份不断出现。甘肃省，在 4 月份召开的上海会议上，还说是余粮省；到了 6 月，就变成了严重缺粮省，以致不得不动用军队将已十分紧张的运输力量来为甘肃调运粮食。

还是在半个月前，彭德怀出访回国到达北京后第二天，就

不顾旅途劳累，来到国防部大楼办公室。黄克诚总参谋长向他汇报了国内情况，谈了甘肃缺粮问题，中央要向那里运粮食，但运输很困难。

“军队可以抽出一点运输力量吗？”彭德怀问。

“凡能抽出的全部抽出来了，海军舰船抽了一部分到重庆运粮，空军也抽了一部分。如再抽，要影响战备。还有，现在油的储备也有问题。”黄克诚说明了难处。“西藏平叛虽已经结束，但运输车辆还不能减少。”他又补充说道。

军队的困难，彭德怀也是很清楚的，但他还是指示黄克诚尽可能多抽一点运输力量来帮助地方运粮。

“粮食要多少有多少！”真是荒唐哀哉！

彭德怀1958年到平江，同当地农民交谈，一位红军老战士递给他一首写在纸条上的打油诗：“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呼）！”

彭德怀把这张纸条，仔细地夹在了自己的笔记本中。他希望这次在庐山会议上能把问题摆明白，说透。彭德怀耿直言是众所周知的。

在1959年4月，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讲话，毛泽东对1958年以来工作中出现了那么多问题，而又没有及时有效地纠正，很不满意，他说：

“我讲话不起作用。这一次我要亲自挂帅来……”

“你不是早就挂帅了吗？”彭德怀说。

是不是彭德怀对毛泽东在党内至高无上的发言权和决定权有看法？为什么会脱口说出了这么一句话呢？

毛泽东极为生气，严厉地批评了彭德怀，彭德怀也常常怪自己脾气不好，有话冲口便出，对毛泽东有时不够尊重。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7月13日晚，彭德怀写了一封3000余字的信。第二天早上又让人把信抄工整，送给毛泽东。由于抄者疏忽，把其中的“有得有失”抄成“有失有得”。仅仅是“得”与“失”的位置写颠倒了，不知后来造成多大影响。

毛泽东读完信，考虑了三天，决定先将这封信在会议上公开。于是在信头上批语“印发各同志参考”。17日上午，每个与会者被告知，讨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

毛泽东还在政治局常委同志中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

会议形势急转直下。到了7月23日，毛泽东经过了9天的反反复复思考，作出了出人意料的决定，发动了对彭德怀的严厉的批评。

错误又得以延续！

## 周恩来万没料到的

在1959年7月下半月讨论和批判彭德怀的意见书后，接着还在庐山，从8月2日到16日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议程有两个，一是修改1959年经济计划指标；二是“路线问题”。

毛泽东首先发言：“武汉六中全会决定今年的指标后，上海七中全会有人主张改指标，多数人不同意，看来当时改也改不彻底，现在还有5个月，改了好。”

“高指标是自己立一个菩萨自己拜，现在还得打破。”

“上庐山后，有部分人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说不敢讲话、

有压力。当时摸不着头脑，不知所说的不民主是为了什么。前半个月是‘神仙会’，没有紧张局势。后头才了解，有些人觉得没有自由，就是认为松松垮垮不过瘾，不得要领。他们要求一种紧张局势，要攻击总路线！想破坏总路线！”“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我说过，危险无非是：一、世界大战；二、党的分裂。当时还没有显著的迹象，现在有这种迹象了。”

事情如果从“党分裂的危险”这个高度出发，是任何办法也挽救不了的。

毛泽东又指出，我们反了9个月“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党，向党的领导机关疯狂进攻，向人民事业，向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

8月3日开始，全会分成三个大组，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张闻天与周小舟在一个组，彭德怀、黄克诚各在一个组。因为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三人，也是明确发言反对“大跃进”，支持彭德怀信中观点的。

张闻天评论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缺点及其后果。一是高指标，急于求成，导致基建战线太长，新增工人太多，许多企业产品不成套，原材料也缺乏，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下降，给国家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二是一平二调和“共产风”造成粮食浪费，其它生活用品供应紧张、财政结余用完、物资后备减少和外贸计划难以完成等后果。三是虚报浮夸，强迫命令，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在人民群众中以至在国外的信誉。四是在放权方面，“下放太多，体制紊乱，造成半有计划、半无政府状态，导致发展了某些地方的本位主义、地方主义，破坏了

各地区之间的协作关系。”

周小舟认为：关于炼钢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问题，其实1070万吨不如800万吨。办人民公社一股风，越包越多；基本建设搞得太多了；公共食堂并不利于节粮、养猪、造林、积肥，而是浪费劳力，吃得不愉快。针对彭德怀信中提到的得与失，周小舟强调，从具体问题来讲，得多于失，得失相等，失多于得几种情况，都是有的，要加以区别。比如湖南搞了5万个土炉，有2万个根本没点过火。还比如有些地方搞什么晚稻并秧，结果造成很大减产。

黄克诚指责了一些“大跃进”的缺点。“大跃进”造成了粮食、基建原材料和市场供应的紧张，党与群众的关系受到了影响，党在国际上的威信也受到影响。对于人民公社，黄克诚认为搞早了，“如果我们去年不搞，可能更主动些。”

这些都是实事求是的发言和思想认识，代表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认真态度和朴实的作风，反映着他们忧国忧民的思想。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更主要是因为毛泽东一时意气的影响下，没有能把纠“左”进行下去，反而又开始左倾冒进。

中共八届八中全会讨论决定，由周恩来在1959年8月26日的二届人大常委会议上报告说：工业方面，钢产量由原定计划的1800万吨调整为1200万吨（不包括土钢，土钢由各地方自产自销）；原煤产量由原定计划的3.8亿吨调整为3.35亿吨；其它工业品的产量指标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工业总产值由1650亿元调整为1470亿元。农业方面，粮食产量由10500亿斤调整为5500亿斤；棉花产量由1亿担调整为4620万担；其它农产品和畜产品的产量指标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农业总产值由1220亿元调整为738亿元。基本建设方面，投资总额由270亿元降

为 248 亿元；施工的限额以上项目由 1092 个调整为 788 个。这次调整与 4 月间通过的计划相比较，削减幅度很大，钢产量几乎减少 1/3（因为排除了土钢），原煤削减了 11.8%，粮食削减了 47.6%，棉花削减了 53.8%；工业总产值削减了 10.9%，农业总产值削减了 39.5%，基建投资削减了 8.1%，限额以上施工项目削减了 27.8%。但是，这个指标与上年实际情况相比，钢产量要增长 50%，原煤增长 24.1%，粮食增长 37.5%，棉花增长 17.4%，仍然是不实际的高指标。

但周恩来实在是难处。

周恩来在整个“大跃进”中，始终处在一种批“反冒进”的压力之下，处在不得已而为之的困难境地。毛泽东对国务院的工作是不满的：“几十个部，不知道都干了些什么。”周恩来只有加倍谨慎。

在“八大”二次会议前，周恩来准备大会发言稿，主要是检讨“反冒进的错误”。他说一句，书记记一句，有时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很显然，他的内心是矛盾的。秘书建议自己暂时离开，让总理安静地构思。周恩来同意了。秘书走后，周恩来独自在办公室坐到凌晨两点多钟。后来，还是在邓颖超的劝说下，由周恩来口述内容，秘书回去整理成文字材料。在秘书的稿中，有这样一句：“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周恩来严肃地对秘书说道，在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上，在整风以后，还可以引用这句成语，在延安整风以前，不能引用！“这说明你对党史知道的太少！”周恩来在说这些话时，几乎流下了眼泪。秘书发现，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十几天内，周恩来两鬓的白发又增多了。

在庐山会议期间，周恩来三次找国务院各部领导开会，谈

形势，摆问题，算细帐，研究克服已经出现的严重困难的措施。

“陈云同志强调财政、物资、资金三个平衡，要略有节余。去年全给冲乱了。”

“单生铁一项补贴了 15 个亿。”

“综合平衡没有做好，不能这样子过日子，特别是‘三材’太不平衡。”

“冶金部全年预算 24 个亿，上半年就已经用了 19 个亿。”

“……”

周恩来向部长们把面临的问题一个个摆出来，并提出：“指标到底放在那个杠杠？”“基建到底铺多大摊子？”

周恩来原来设想，继续召集部长们好好议一下，定出一个符合实际的方案。但是，没有想到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

## 新“大跃进”出台

政治斗争是严酷的。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

1959 年的庐山会议以后，政治斗争所形成无形的压力使得各层干部都出现宁“左”勿“右”，宁可冒进一些的思想行为。即使结果不妙，也要比被“戴上”保守的“右倾”帽子好得多。再加上不切实际地估计了形势，否认国民经济的发展比例失调，对 1958 年“大跃进”持肯定态度，在国民经济的一片“看涨”声中，中央错误地认为，在 1958 年、1959 年两年“大跃进”的基础上，1960 年应该继续“跃进”。

毛泽东提出，在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的 300 年是一个

“大跃进”。既然资产阶级能够实现“大跃进”，那么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实现“大跃进”？国家经委和《人民日报》在1960年元旦社论上重又提出了“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的号召。

这些议论，对1月份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有很大影响。会议简单地估计认为1960年搞一个“大跃进”，可能比1959年的“大跃进”更好。于是，会议制定的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又一次提出了钢产量为1840万吨的高指标，产煤量为4.25亿吨，粮食5940亿斤，棉花5300万担，基本建设投资345.14亿元，工农业总产值3060亿元。

会后，1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家计委提出的以上指标，并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照此安排工作。这样，在1958、1959连续两年“大跃进”之后，中央又发动了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意味着又出现“高指标”。

1960年3月在向第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报告1960年计划时提出：工业总产值要在1959年增长39.3%的基础上再增长29%，农业总产值要在上年增长16.7%的基础上再增长12%，钢的产量（不包括土钢）从1335万吨增加到1840万吨，增产38%，煤的产量比上年的3.47亿吨增长22%，粮食产量比上年5401亿斤增产10%达到5940亿斤，棉花产量从4820万担增加到5300万担，增产10%，生猪从1.8亿头增加到2.4亿头，增加33%，汽车货运量从3.4亿吨要增加到5.4亿吨，增加57%，基本建设投资（预算部分）由267亿元增加到325亿元，扩大了21.7%。

实际上由于1959年的估产就偏高，如果和核实后的1959年数字比较，1960年计划指标的增长速度，特别是农业方面，更

要超过计划内增长幅度。例如：工业的总产值应该增长 41.6%，农业的总产值应该增长 77%，而其中农业的粮食要增长 74.7%，棉花要增长 55%，生猪要增长两倍多。这种高指标，神仙也做不到。所以，加上天灾的影响，实际 1960 年工业总产值只完成计划 77.9%，农业总产值完成 51.9%，粮食产量完成 48.3%，棉花产量完成 40.1%，生猪只完成计划的 30%，汽车货运量完成计划规定的 31.1%。

更加糟糕的是，公布的高指标，还不是 1960 年的最终目标，只是所谓的“第一本帐”。还有“第二本帐”，“第三本帐”。每本帐都比前一本帐的数字更高。

4 月 14 日，二届人大二次会议刚刚结束，中共中央就批准了冶金部提出的 1960 年钢产量的三本帐计划。冶金部提出，第二本帐把钢产量搞到 2040 万吨，第三本帐再争取把钢产量搞到 2200 万吨，分别比二届人大二次会议确定的钢产量指标提高 200 万吨和 360 万吨。生铁产量也相应提高到 3300 万吨，比原计划增加 550 万吨。煤炭部也提出，为了配合完成钢产量的第三本帐，全年煤炭产量争取要达到 4.62~4.7 亿吨，比原计划增加 3700~4500 万吨。铁道部也提出，铁路货运量争取达到 7.8~8 亿吨，也比原计划增加了 6000~8000 万吨。

5 月 10 日，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建委三个部门又向中央提出了《关于 1960 年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基本建设第二本帐的安排》的报告，提出第二本帐的主要指标是：钢产量为 2040 万吨，煤产量为 4.62 亿吨，铁路货运量为 7.6 亿吨。而且，基本建设投资从 325 亿元增加到 382 亿元，限额以上基建项目则增加 83 个，总数达到了 980 多个，而且中间有 426 个被确定加快建设速度。

5月3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上述安排，决定把第二本帐作为党内必须确保完成和超额完成的第一本帐，要求各地区和各部门立即抓紧时间，组织执行，并以此为标准来安排和检查工作。这就把1960年计划中原列的高指标继续大大加码，在4月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提出“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2040万吨钢为纲的工业生产计划而奋斗”的号召。

在1960年4、5月间草拟“二五”后三年补充计划草案时，提出1962年钢产量按3600万吨安排，争取达到3800至4000万吨，即平均每年要增加800万吨，粮食按6800亿至7200亿斤安排，即平均每年要增加500多亿斤，规定三年的基本建设投资1400亿元，占国家全部财政收入的50%，平均每年投资近500亿元。这对于1960年继续铺大经济规模有很大影响。

明摆着，要完成如此的高指标是很困难和不可能的。为了强制推行这些高指标，当时继续推行反右倾的斗争。在1960年4月还提出过去是“一季争（争投资）、二季叫（叫困难）、三季反（反右倾）、四季超（超计划）”，现在把8月（反右倾）提到4月，以后就不必反了。这种提法现在看来是多么的荒唐可笑。实际上这种采用提前预防，早点“反”的方法，来压制客观困难的反映，强制贯彻“左”的错误。当时已开始察觉到4月下旬和5月上旬的生产情况“不很好”，但仍认为可以扭转过来，只要及时掌握，抓得紧、不麻痹，还是大跃进的局面。

有关经济主管部门后来曾回顾说：在1959年第四季度突出高产，已经出现了严重不协调的现象。可是又提出了1960年的第一季度生产水平要不低于或是稍高于第四季度，实现“开门红”的口号。后来勉强实现了“开门红”以后，生产已出现了下降的苗头，但是当时还认为是“在5、6月份内，一个以煤、

铁、矿、运为中心的生产高潮将会出现，提出了‘上半年要完成全部的指标一半左右’的要求”。实际执行的结果，高潮并没有出现，而要求的指标也没有能够完成，这时还没有接受教训，不去落实情况，接着又要求在第三季度内“掀起一个更新更大的增产节约运动的高潮”。实际上呢？在7、8月份以后，煤炭等主要产品又逐日地大幅度减产。到了10月，由于又集中力量保钢，钢铁的产量是促上来了，但是又严重地挤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其它部门，是得不偿失的事情。

尽管在1960年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人民勤奋苦干，但方法不对头，仍然不能产生实际的效果。

## 沉重的钢铁

众所周知，煤、铁、矿、运是炼钢的基础要素。全国1957年只能生产535万吨钢，到了1960年至少要生产1840万吨钢，时隔三年，产量却是三倍还多。这种事情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但是在1958年第四季度和1959年第四季度的“大跃进”高产成绩冲击下，认为只要运用“小洋群”“小土群”的炼钢方法，动员上千万的劳动力，那么工业的增长，钢的指标就有了完成的保证。

所谓“小土群”，就是动员群众大办小型的土法炼铁、炼钢。在原有大中型钢铁企业发动群众突出炼铁、炼钢，则称为“大洋群”。那么搞小型或中小型的突出炼钢铁的企业，就称为“小洋群”。由于这次要求是不要土钢，所以重点就是放在建成快，能出不是土钢的“小洋群”上。

1960年5月强调：在基本建设方面必须坚决贯彻大中小相结合以中小为主而且以“小洋群”为主的方针，明确树立发展“小洋群”是我国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长期的战略方针。据冶金部统计，1959年底全国已有正常生产的钢铁“小洋群”1300多个，矿山“小洋群”约1000个，炼焦“小洋群”400多个，“小洋群”和“小土群”所生产的生铁占50%，铁矿石占45%，焦炭占70%。所生产的生铁的质量合格率已由1959年的50%（1月份）增加到同期1960年的80%，每吨平均成本同期由400元降到280元。当时以为，在全国2000个左右的县、市中，有煤炭资源和铁矿资源的约占3/4，其中建立了钢铁基地的只占2/3。因此，根据1960年内全国所有有煤铁资源的县、市至少要搞起一个以煤铁为中心的“小土群”、“小洋群”基地，有条件的人民公社也要尽可能举办好“小土群”的采煤、采矿、炼铁企业。当时还提出要使小煤窑、小铁矿、小高炉、小转炉、小铁路“五小成群”，在有条件的地方要搞小有色金属矿、小化工、小水泥、小水电等等。据统计，21个省市自治区职工共1820万人，其中“小洋群”686.6万人，“小土群”318万人，合计1004.6万人，占职工总数的55.2%。可见当时“小”字运动占了很大份量。

然而，尽管作了广泛发动，采取种种措施，钢铁生产的形势仍然不好，原计划指标难以完成。据统计，在1960年的1~8月份，全国只完成钢的产量1137万吨，离2040万吨钢的指标还差900多万吨，而时间只剩下4个月。再有一个困难，是钢的重要生产基地东北又遭受水灾，严重影响到钢的产量。眼看着计划就要落空。9月18日，中共中央只好批转了《国家经济委员会党组关于以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的紧急措施的报告》。

把钢的产量指标由 2040 万吨降为 1900~1950 万吨，发出了“工业交通战线上的全体同志们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为在今年完成 1900 万吨到 1950 万吨钢而奋斗”的号召，采取了全国保钢的各种措施。然而，钢的日产量仍在不断下降。

12 月 3 日，鉴于钢铁生产实际情况，中共中央不得已发出了《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强调能不能完成 1960 万吨钢的生产任务，是国内外注目的大事情，是一个政治性问题。各地区、各部门必须抓紧时机，克服困难，集中力量抓好煤、铁、钢、运。把钢的产量再次突击上去。最后到 1960 年结束时，钢产量达到 1866 万吨，勉强完成了二届人大二次会议所确定并公布的指标。

然而，钢铁的生产又挤了农业生产。农业和轻工业都受到重大的影响。当年，重工业产值比上年增长 25.9%，主要产品产量增长 24%~40%。而轻工业总产值则比上年减少 9%，棉纱、布料、食糖等主要产品的产量下降了 28%~60%。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重工业又升为 52.1%。轻工业降到 26.1%，农业降为 21.8%。农轻重三者比例又发生严重失调。

这一年可谓注意了交通运输的地位。早在 1959 年 10 月下旬至 11 月下旬第八次全国计划会议讨论安排 1960 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时，交通运输业就被列入了钢铁工业所必须加强的部门，同样的部门还有动力工业和采掘工业。按照二届人大二次会议确定的经济计划，把铁路货运量定为 7.2 亿吨，汽车货运量定为 5.4 亿吨，铁路货运量增长幅度为 33%，汽车货运量要增长 57%，分别接近和超过了钢产量的增长速度。1960 年 4 月中央批准的铁道部的报告，同意在 1960 年内修筑 12000 公里土铁路和轻轨铁路的庞大计划。

为完成此项任务，从1959年冬到1960年底，全国各地普遍掀起了大造铁路，特别是土铁路和轻轨铁路的高潮。尽管如此，交通运输的“跃进”计划仍未能完成。大造了不能使用的土铁路，还浪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资财，损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

1960年1月，中央还号召立即掀起一个以大搞半机械化和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央要求各部门，各地区运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拿出大炼钢铁那样的决心和气势，来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使用“大跃进”的高速度而不是一般速度，去实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向自动化、半自动化发展。全国各部门各地区于是很快地掀起了一个全民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高潮，成为1960年“大跃进”的又一个特点。

发展科技，也是发展生产力。但如果是盲目地发展，也未必好。

在“动脑筋、想办法、闹革新的浪潮”中，又因为急于求成，出现了不少浮夸虚假和浪费现象。例如，当时宣传某地市仅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就使全市笨重体力劳动和手工操作普遍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其他地市则表示要在1960年内使全市的机械化、半机械化程度提高到80%~90%。这些目标犹如农业放“卫星”一样，不能相信。又例如，当时不顾客观条件盲目采用和推广超声波、红外线等新技术，说“超声波是神通广大、妙用无穷”，“一切部门、一切地区都应大力推广，人人试验，到处试验”，事实上到后来是劳民伤财，成效甚微。有关经济主管部门后来也承认，在指导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中，曾经提出过脱离实际的要求，比如在1960年曾要求将工业交通部门“四化”的程度提高到60%、70%或者更高一些。1960年4

月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提出推广的 203 项重大技术革新项目中，将近的 1/4 的项目是条件不成熟的，甚至有些项目完全不适应当时的情况，根本不应该推广。

我国是一个经济落后、文盲较多的国家，群众中大多数人缺少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据 1960 年全国统计数据表明，当时平均每万人中间，仅有自然科学技术人员 29.7%；平均每万名职工中，自然科学技术人员仅 390 人。直到 1964 年 7 月 1 日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权威资料上，全国有 69122 万人，其中大学文化程度的人仅 288 万人，仅占 0.4%；高中文化程度的人 912 万人，仅占 1.3%；初中文化程度的 3235 万人，占 4.7%；文盲和半文盲（12 周岁以上）的人 26340 万人，占 38%。在这种人口文化构成与技术构成条件下，发动“千军万马齐上阵”式的群众运动，不可能达到科学技术水平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革命目标，不可能迅速从手工劳动占主要形式的情况一“跃”而成实现机械化、半机械化劳动占主要形式的事情。

在文化与技术程度偏低的国度里，并非不能进行技术革命。只要合乎科学发展的规律，仍然能实现技术革命的目标。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在原子弹、氢弹、火箭、导弹、人造卫星的研制上，能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就是尊重了科学发展的规律，由群众与技术人员、科学家合作攻关。不定高指标，不搞“左”派“右”派斗争，在“大跃进”热潮下不浮夸，不急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积极性，于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发动缺乏科学文化知识的文盲、半文盲来搞技术革新，即使热情再高，也改变不了愚昧的现实，带来的是破坏性的后果。全国、全民努力创造的“大跃进”始终不能如“愿”以偿。这是一条主要原因。

## 让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在当时发热的头脑中似乎不再是遥远而不可及的。

早在1958年，原属于山东省范县（现属于河南省）就在一次万人大会上宣布“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甚至描绘了他们共产主义的美好图画：“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从那时起，全国出现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热景象。人民公社的建立，部分地区混淆了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界限，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把集体所有制宣布为全民所有制，而且把个体所有制、甚至社员的房屋、家具等也并为全民所有。然后就认为共产主义一宣布就实现了。部分地区纷纷制订实现共产主义的计划。中共中央还确定河北省徐水县为共产主义试点单位，而徐水县也宣布，1963年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毛泽东似乎也相信形势大好，在范县的“共产主义规划”上指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3年时间。也不要紧，3年完不成，顺延也可以。

在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表示，要让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即使我们已经具备了进入共产主义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也应当由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你上半年开始过，我就下半年过，你过我也过，最多比他迟3年。可是一定要苏联先过，否则苏联脸上无光，全世界无产阶级脸

上无光，对我们也不利。如果我们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怎么办？还是挂上社会主义的招牌，可以行共产主义的实际。

毛泽东的话是有余地的。

到了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相隔不几日，党中央开始多次召开会议，初步纠正急于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

但从1959年下半年庐山会议以后，中央又改变态度。1959年10月，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农业书记会议提出了由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的问题。12月中央召开的浙、皖、苏、沪四省市座谈会，又对过渡问题进行了具体讨论。座谈会议纪要指出：一、需要社有经济的充分发展，二、穷队赶上富队，三、社员人均年收入在200元以上等条件。认为根据不同的经济条件，仅分别需要3至5年和5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了。1960年1月在上海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还提出8年完成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制到基本社有制的过渡想法。

3月份，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采取积极态度，放手发动群众，试验组织各种形式的城市人民公社。城市人民公社可以大型国营厂矿为中心，或者以机关、学校为中心，或者以街道居民、城区加上部分农村为主体，等等。要求全国城市在上半年普遍试点，下半年全面推广，除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五大城市外，其它一切城市都应挂出人民公社牌子，以大造声势。到了7月底，全国190个大中城市已经建立1064个人民公社，参加人民公社的人口为5500多万人。占上述城市人口总数的77%。

这是继1958年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后的又一次“共产风”。

当时大办城市街道工业和各种生活组织，包括公共食堂、托幼组织，几乎都是白手起家的。依靠平调，侵犯了不少个人的

住宅、财产。城市人民公社对人民的生活包得更多，统的更死。商业渠道更加公有化、单一化了。从上到下，只有国营商业，再不准有供销社、小商小贩、货郎担子。而这些小商小贩们，在1959年时有206万人，在城市人民公社化期间，过渡到国营商业的有10多万人，转入农业，交通部门的有50多万人，转入城市人民公社的有10多万人，退职20多万人。到1960年底留在合作商店、合作小组的大约只有90多万人，而其中大部分已按国营办法进行管理或实行与国营企业统一核算。

全国农村人民公社把发展社有经济的工作放在重要地位。大办社有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文教事业以及大搞农田水利建设。这些活动，不但所需劳力从大队和生产队无偿抽调，就连所需资金、财物也多是从大队、生产队甚至社员个人征集的。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人民公社在办工业过程中，没有厂房，让社员腾出住宅500多间，没有资金，让社员凑了40000多元，缺乏机器、设备，也让社员捐献。仅办服装厂一项，就让社员交了50多台缝纫机。用这种方法，公社办起了462个大小工厂，工人人数达到7125人，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0%。然而，因追求数量，盲目办厂，加上不善管理经营，许多的社办工业没能取得应有的效益，一些工厂不久就被迫解散。

即使一个公社内，生产大队之间的贫富状况也不相同。因此，要提高全社的人均收入，尽快向基本社有制过渡，就必须扶持、帮助穷队，使穷队能很快赶上富队。当时，扶持帮助穷队一般采取的方式有：一是把穷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由国家、公社分别在基本建设、生产资金、生产资料、计划安排等方面，对穷队给予大力支持。二是把部分穷队转为公社直属队，不但有农业贷款、抽取公积金等方面照顾穷队，甚至无偿地抽调了

富队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帮助穷队生产。这种无视按劳分配原则，拉平穷富队社员的收入，严重损害了富队社员的利益，挫伤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1959年上半年，因粮食供应紧张，被当作生活集体化重要内容的农村公共食堂，解散了不少。庐山会议以后，解散公共食堂等做法被认为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而受到批判，于是各地又开始恢复和推广公共食堂。

1960年3月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认为食堂“是我们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是当前农村中阶级斗争尖锐所在”，要求“各级党委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必须办好公共食堂。于是上半年又掀起了大办公共食堂热潮，很快遍及全国。许多省、区参加食堂的农村人口已占90%以上。当时推广“统一用粮、指标到户、实物到食堂”的办法，非经批准是不许领取粮食回家做饭。吃饭食堂化脱离了农民的现实生活水平，违反了自愿的原则，造成了生活上的许多不方便。更由于侵占、克扣了农民的口粮，引起农民很大的不满。

1960年春季以后，粮食调运很不好办，5月份各省所调出的粮食仅完成计划的一半左右，京、津、沪和辽宁的大工业城市调入的粮食不够销售，库存几乎挖空，有的城市大米已经没有库存，天天告急。粮食供应紧张最早发出了危险的信号。当时对于困难的原因和性质还缺少认识，但饥饿的形势已经迫使人们不能不开始正视现实了。

毛泽东在6月份中央召开的上海会议上，写出《十年总结》，回顾了過去寻找建设道路和在“大跃进”中的一些错误，提出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

是的原则，强调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也来自实事求是；还指出目前仍然存在一个相当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有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折扣，当事人还不懂。但毛泽东仍然坚持执行过高的计划指标，使国民经济越发陷入极大的困境。

## 农业赔惨了

农业是一种自然经济，受自然因素影响很大，在1958年这一个好年头以后，1959年及以后三年都是灾年，无疑引起农业生产的大倒退现象。

当时，自然灾害确实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年份。据统计，1959年成灾2亿亩，粮食减产200至300亿斤；1960年成灾面积达3.7亿亩，粮食减产300至400亿斤；1961年成灾更达4.3亿亩，粮食减产400亿斤以上。这对农业当然有严重影响，但在整个粮食减产总数只占到1/3左右。1960年的农业总产值只完成415亿元，粮、棉的产量降到了1951年的水平，油料产量甚至比1949年还低。其他主要农副产品的产量也大幅度下降。

在这三年受灾时期，曾经多次强调了发展工业必须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从1957年至1960年，国家用于农业投资的金额由12.7亿元增加到28亿元、36.2亿元、49.9亿元，在经济建设投资中所占比例分别由9.2%增加到10.5%、10.5%、13%，制造拖拉机、化肥等支农工业也有很大发展。但是，工业、建设发展过急，严重地挤了农业。

粮食的极度缺乏，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据

部分省、区和共青团中央反映的情况，有相当一部分职工、学生和居民患了浮肿病。例如，1960年10月至11月间，重庆市9所大学患浮肿病的人数占师生总数的10%以上；太原市14所大学患浮肿病师生比例占到13.5%；山东省财政厅竟占到35%以上的高比例。另外，患肝炎和妇女病等疾病的人数也不断增加。更为严重的是，全国的部分农村开始出现大量的非正常死亡现象。当时河南省信阳地委向中央报告，仅1959年冬到1960年春，正阳县就死亡8万多人，新蔡县死亡约10万人。另有遂平县嵒岬山人民公社一个社就死亡近4000人，比例占总人口的10%，有的队竟高达30%。

在1960年，全国人口净减1000万人。

为了大办工业、大办水利等活动，曾调用了农村中大量的青壮劳力。1958年秋收，因硬要完成钢铁翻番任务，约有9000万人上山采矿，不少庄稼无人收割，丰产未能丰收。1959年后曾经引起注意，承认过去8000万人搞水利占用劳力太多了，1960年实际使用在农业第一线的劳力，仍比1957年少了约4000万人，而且参加农业劳动的大多数属于妇女、老弱等半劳动力。工农业劳动者的比例，如以工业劳动者为1，则1957年为1:13.8，“二五”的前三年却分别下降为1:3.5，1:5.6，1:5.7。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更是盛行，除了人民公社内部急于实行大队、公社核算制外，还无偿平调生产队和社员的人力、财产。不但全民大炼钢铁、大修水利，就连交通、邮电、教育、食堂、敬老院、托儿所、文工团等等，几乎无一不是通过无偿调用来办理。房屋没有，用具没有，都通过向生产队和社员无偿平调而得来。全国有90%以上地区都出现了这种情况，这种实质上“对农民的剥夺”，严重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

从1957年到1960年，因为提倡厂矿、公社办学，甚至各县办大学，全国高等学校由229所增至1289所，在校学生也从44.1万人猛增到96.2万人；中等专业学校由1320所猛增到6228所，在校学生从77.8万人增至221.6万人；普通中学由11096所增至21805所，在校学生由628.1万人增到1026万人。还有大量大城市人口的过快增长，必然要对粮食带来高征购。从1957年到1960年，在粮食产量实际下降的情况下，粮食征购从860.8亿斤增加到1175.2亿斤，1348.2亿斤，1021亿斤。粮食征购占产量的比例也由24.6%增加到29.4%、39.7%、35.6%。农村中粮食留量减少，更增加了农村生产生活的困难。

为了解决城市缺粮问题，中央于5月28日和6月6日多次指示紧急调运粮食。但是，粮食的调运工作一直进展不快。11月，中央确定调运粮食24亿斤，有关省、区却只完成12.5亿斤。同月，北京、天津、上海共销售粮食5.7亿斤，而调入的粮食却只有3.7亿斤。不过当时实在是没有更多的粮食可供调运。据统计表示，1960年7月1日至8月25日，征购粮食入库139亿斤，比上年同期减少近51亿斤；而粮食销售152亿斤，却比上年同期增加13亿斤。再加上6月底以前的库存减少数，使这个时期的粮食库存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00亿斤。到了11月底，约减少300亿斤。于是只能降低城镇居民口粮的供应标准。

由于受到交通运输能力制约，使调运更加不畅。在交通方面，由于生铁产量猛增，钢铁任务紧迫，大大占用了交通工具，增加了交通的负荷量。在第一个五年建设时期，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68%，其中农业产值增长25%，工业产值增长了128%，而全国货运量增长了156%，体现了交通先行的

作用。而1960年与1957年相比较，工业总产值增长1.3倍，特别是生铁产量增加3.6倍，铁矿石开采量增加4.8倍，煤产量增加2.03倍，全国货运量只增加1.1倍，远远落后于煤、铁增长的需要。1960年全国货运量是25.5亿吨，但正常的运输能力只达到21亿吨，多余的4.5亿吨，主要是靠超载多拉、使用农村劳力突击短途运输。尽管这样，全年仍有大约30%的铁矿石和2000万吨的煤炭积压在矿区运不出来。由于突击运输，农村劳力最高时曾动员了1000万人参加短途运输。运输完毕，车船受损严重，三年中木帆船减少了18%，畜力车减少了25%，驮力减少了70%，造成运输能力下降。

运输能力的破坏和滞后，又使其它方面也受到影响。当灾情发生后，许多地区急需救命的粮食。中央调拨了粮食，却苦于涝灾缺船，旱灾缺车，粮食运到较少或无法送到，使灾区的灾情救护工作难以展开，无疑是加重了灾情发展。

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产量的下降，更加突出了工业、基建规模的比例不平衡的经济畸形结构，迅速导致整个国民经济全局性的危机。

## 19亿元赤字的背后

“大跃进”的最大特点就是“以钢为纲”。第一是因为政治上考虑要“超英赶美”；第二是因为钢产量是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工业水平的标准。所以，被压抑很久的民族激情，促使中国人民急于想“露一手”给全世界看看。发热的头脑中留下这样一个片面的理解：“只要钢铁元帅一升帐，一切就都上来了。”

为了让“钢帅升帐”，不顾一切大上，就不断催逼着要更多的铁、有色金属、煤、运输和劳力等等。

在1960年，由于新建大钢铁厂来不及，就只能催逼着老企业拼命增产，大办消耗料大、质量差的小企业。这样，资源不断被强化开采，设备因超负荷，“带病运转”被大量损坏，产品质量日益下降；而且煤炭、铁及铁矿石等原料的品位，质量下降，又需要更多的开采量，使采掘工业远远落后于冶炼、加工工业的需要量。

到了10月份，钢产量比上年同期增长40.5%，而生铁产量仅增长37.9%，炼焦煤产量仅增长21.1%。要炼1吨铁，平均需要3.5吨铁矿石和1.5吨焦炭。但从1958年开始，每新增1吨的炼铁能力，只新增加2.2吨铁矿开采能力和0.8吨炼焦能力。因而至1960年，机械化半机械化的炼钢能力已达1700万吨，而机械化半机械化的采矿能力只能满足冶炼1200万吨钢的需要，在重点矿山中又因为强化开采、设备损坏，大约又有30%~40%的生产能力不能发挥作用。有色金属矿也是这样，当时铜、铝的综合生产能力大体只能适应冶炼600万吨钢的要求；1960年铜的电解能力约19万吨，选矿能力约10万吨，开采能力只有7万吨。各个环节处于倒立状态，冶金工业内部比例也发生失调。

在能源供应上，煤炭已经到了竭泽而渔的地步。为了适应大炼钢铁，从1957年到1960年期间，原煤产量由1.3亿吨增加到3.97亿吨，三年中增产了两倍，但仍是不能满足钢铁的需要。而煤炭企业三年中新增的机械化半机械采煤能力只有1.1亿吨，只占三年新增产量的41.2%。其余约60%的产量是靠老企业开采和小型简易采矿方式来突击增产。按规定，煤矿

掘进进度应至少不低于开采，这样才能有效益。但1960年时的煤矿开采和掘进的比例是1:0.833吨，掘进速度落后于开采，使开采受到极大限制。而生产设备也损坏严重。

竭泽而渔所造成的损失和浪费，使全国重点煤矿的产量从7月开始直线下降，燃料动力与国民经济比例失衡。在此期间，钢铁冶炼，煤所占比重11%增为28.1%，交通运输用煤由7.5%降为5.9%，人民生活用煤从43.4%下降到18.1%，例如1960年11月，山东省轻纺、化工等部门的744个企业中，因缺煤停工、半停工的占3/4以上。不少地方还砍伐树木，拆烧旧屋甚至抢煤事件都有发生。可见，“钢帅升帐”不是带动全局，而是拖垮一切。

一方面是农业全面减产，另一方面是为保钢而挤占了燃料、运输，1960年轻工业总产值只占到工业总产值的33.4%，而重工业总产值却占到66.6%，首次出现1:2的轻重工业产值比例，而这是不合理的，不科学的经济比例。由于棉、油料作物减产，1961年全国棉纺织工业的开工率为52.5%，制糖、卷烟、罐头等工业的开工率仅为20%到35%。轻工业产品大幅度下降，势必造成市场供应紧张。

从1957年到1960年，基建战线铺得太开，超过了实际可能，建设项目的投产率由26.4%降为10.7%，12%，9.8%。1960年全国水利会议决定蓄水1亿立方米以上的水库年内搞100个，结果各地搞了360个，然而重视数量忽视了质量，后来被冲垮了数十个。煤、铁的“小洋群”“小土群”建设，因效率低、损耗大，后来也大多下马甚至报废了。三年来，基建投资逐年增加，然而每百元的积累效益逐年下降，从1958年到1960年，每百元积累所新创国民收入，分别为55元，19元，-0.4元，

出现了负积累，充分说明经济循环正在恶化。

而基本建设投资中，有相当大部分是靠挪用企业的流动资金和设备维修费，占用银行借贷资金和企业维持正常生产的费用，还有是降低人民生活水平等所谓“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来进行建设的。后来为了归还亏欠，在处理1961年以前有帐可查，必须解决的财政遗留问题时，国家财政拨付了大量资金，用于抵补国营企业（主要是商业部门）物资亏损、归还工交企业定额流动资金、补拨国营商业自有流动资金、归还供销社等集体企业资金、归还银行贷款损失和商业部门赊销、预付呆帐损失。所以，“大跃进”这几年财政虚收实支，虚盈实亏，帐面上收支平衡，实际上赤字并不只限于1961年决算中的19亿无。

银行为了缩小信贷的不平衡，被迫大量发行货币，从1958年到1960年三年中，货币流通量增加了81.7%，而商品零售总额在1960年只增长9.2%，全国集市贸易的价格上涨了25.4%。人民最必需的吃饭、穿衣、日用品都成了问题。在1960年的大部份时间里，除某些特殊供应外，市场上几乎没有禽、蛋等食品的供应，就连锅、盆、碗、筷之类日常用品也很难买到。

在1960年初，中央还认为国民经济发展比例正常、市场繁荣稳定。作出了1960年还应该继续“跃进”的决定，到了下半年和年底时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大跃进”运动的错误在天灾的催化下迅速显示了出来：“只算政治帐，不能算经济帐，”盲目追求不切实际的战略目标，片面强调高速度，只求多快，忽视好省等等，干扰了甚至阻碍了经济正常发展，最终搞得没钱、没粮、没锅、没衣服穿……

“大跃进”从一开始就为中国人民摘下了一个苦果子。

1961年1月，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 第五章

# 左右倾的庐山

- 神仙会
- 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 军事俱乐部
- 扩散的庐山冲击波
- 大跃进：1960



## 神仙会

古时的神仙，多选一处风水宝地作为洞府，野鹤闲云，谈经论道。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最后一个年头，在秀丽的庐山，避开大跃进的滔滔热浪，中国的领导人在庐山开了一次使历史急转弯的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庐山会议”。庐山会议的前半期，却颇为安静宁和，称得上是纵情山水的“神仙会”。

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前后，就全国的经济来说，恐怕是除了井冈山和长征之外，从未遇到过的巨大困难。也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后，从未有过的紧张：四处告急，八方求援，到处是饥饿的脸孔，到处是水旱肆虐过的庄稼。1959年，中国的脚步迈不动了。

1959年6月下旬，从上海开过来的东海舰队“大别山”号军舰悄悄停在九江港。那甲板上一溜儿排开的46辆高级轿车乌黑锃亮，在夏日里闪着华贵和威严。

九江汽车站接到通知，停止出售去庐山的客运票。山上各单位也接到通知，凡历史不清白者和现实表现不积极者，一律以支援农村大跃进的名义，请下山去。登山公路上一片寂静，不见往日游人如织的情景。莲花洞、赛阳、观音桥等处山道上，布满威严的岗哨，路旁莽莽苍苍的树林里，巡逻队时隐时现。

1958年6月29日破晓时分，一列车队顺山势逶迤而上。车队的中央，一辆苏制“吉姆”车像旗舰似的被簇拥着。

领导人登山了。

庐山会议的安排除了继续纠“左”外，还准备让大家开怀畅谈，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安排好今后的工作，以便继续鼓劲干下去。庐山曾经是国民党政府的“夏都”，夏天到庐山开会，可以避暑，远离尘嚣，精神肉体都放松一下，过几天较闲适的生活，做一做“神仙”。

当年的水电部副部长李锐参加了庐山会议。从他7月4日寄出的家信中可以看出一点“神仙会”的安闲：

“1日下午7点半开船。甲板上啖荔枝，谈形势，早稻丰收在望，人们心情倒还舒畅，江风甚凉，留连甲板，12点后始入睡。2日天亮之后，庐山在望。九江曾是口岸，立过租界，岸上仓库颇密，昔日繁华当远胜长沙。一路车队爬上牯岭，共24公里……北京部长们多住在原来一所疗养院，其他散居山崖诸楼台，不辨方向。案头有《注意事项》，加衣盖被之类，并云：此间空气清新，使呼吸加深，胸阔肌肉加强，血液循环增进，红血球增多，氧同化作用良好，食欲增加，发汗咳嗽减少，等等……午饭前，看完两本《庐山指南》。午饭吃两碗半，午睡一个小时，晚饭依旧，当是‘空气清新’奏效。整理带来文件，阅当地报纸，预报有雨，不敢外游，夜观赣剧《思凡》、《惊梦》、《悟空借扇》，皆主席所点也。”

以下是3日所记：“晚上跳舞，舞场为一小教堂。上帝有知，都进不了天堂的。一切都极安静。有戏、有舞，却消没在山风松涛之中，跟北戴河另一番味道，那儿总是让你挂念着海，想到海中飘游整日才好；这是‘深山养道之心’，尘嚣世欲之感皆被融化。”

初登庐山，这些难得有闲纵情山水的中央大员、封疆大吏们游兴极高，看至酣处，往往或口占、或挥毫，一展诗怀。

毛泽东的两首诗《七律·登庐山》和《七律·到韶山》便是这时传开来的。

### 七律 登庐山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 七律 到韶山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谢觉哉老人也欣然命笔：

### 在庐山（二首）

#### 游海会秀峰等处

又是中华第一山，从庐山外看庐山。  
一泉飞跑至天下，五老从容席地谈。

#### 访云中人民公社

住行衣食无忧虑，体脑勤劳有定程。  
我为人人人为我，本来生活在“云中”。

林伯渠手拄拐杖，轻抚寿眉，终成三首：

庐山（三首）

诗家情绪喜庐山，山在重峦叠嶂间。  
不要认错真面目，个中动静一线牵。

背靠五老向鄱湖，古诗海会仍旧装。  
门额记镌真面目，只应历史述沧桑。

匆匆卅二年前事，为举义旗聚九江。  
正是骄阳炼大地，却将时雨润洪荒。

诗中虽寄情山水，但细读之下，似乎隐约也有一丝沉重。

李锐与同事们登含鄱口（壑谷正对鄱阳湖，似口含湖水也），归来后沉思良久，炼成四句：

含鄱口上鄱阳含，水色天光变幻间。  
高处为云低处雾，笑谈不觉失群山。

此刻，董必武也和中南组诸君盘桓含鄱口，谈笑声喧，诗作联翩。其中董必武的一首《七律·初游庐山》，引得诸老步韵唱和。那诗道：

庐山面目真难识，迭嶂重峦竞胜奇。  
乍雨乍晴云出没，时高时下路平陂。

盘桓最好宜花径，伫立俄延读御碑。

如许周颠遗迹在，访仙何处至今疑……

## 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从7月2日到15日，这一阶段，会议基本上按照预定计划，较为正确地指出了当时存在的问题，初步总结了“大跃进”运动的经验教训，继续做出了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参加者，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以及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他们在庐山的40多天里，或唱红脸，或唱黑脸，或唱白脸，演出了一场令历史震颤的人间大戏。

6月29日和7月2日，毛泽东先后在协作区主任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两次讲话，提出了读书、形势、任务、宣传、综合平衡、群众路线、工业管理、体制、协作关系、公共食堂、核算单位等19个问题，让与会者讨论。

政治局扩大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他首先发言。这次毛泽东没有站起身来，敞开衣扣，挥动巨大的手掌，气吞山河地发表演讲，而是静静地坐着讲。

难道毛泽东觉察了自己搞“大跃进”的失误，因而感到内疚？

不！关于形势问题，毛泽东对大跃进以来的形势归纳为12个字：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指出，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告老爷，大势不好”的程度，是在两者之间。总的说来，有伟大的成绩，有

不少的问题，但前途是光明的。缺点是1、2、3个指头的问题。这里，毛泽东定下了会议的基调。

关于综合平衡问题，毛泽东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和主要缺点，就在于没有搞好综合平衡。过去强调要两条腿走路，几个方针并举，但实际上仍然没有兼顾。在这里，毛泽东强调说，在经济工作中，平衡是个根本性的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有群众路线。以后我们一定要搞好工、农业之间以及工业内部、农业内部的平衡。

关于安排国民经济的次序问题，毛泽东指出，过去的次序是重、轻、农，照现在看来，应该改为农、轻、重。应该在安排好农业和轻工业之后，再安排重工业和一些基建项目。毛泽东还肯定了陈云提出的先安排好市场，后安排基建的方针。指出要把衣食住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关系到6.5亿人安不稳定的问题。现在实际挂帅的是农，其次是轻。农业问题，一曰机械，二曰化肥，三曰饲料。农、轻、重，把重放到第三位，放他4年（准备犯4年错误）。不提口号，不作宣传。工业要支援农业，明年的化肥，农用钢材，这次会议都要做出决定。

关于经济管理体制问题，毛泽东指出，过去4权（人权、财权、工权、商权）下放过多过快，造成了混乱，有点无政府主义，现在要强调一下统一领导、集权问题，要把下放的权力适当收归中央、省市两级。管得过死不好，过活也不是没有问题。现在看来，不可过活。

关于人民公社问题，毛泽东指出，要恢复农村初级市场，要恢复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要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以把生产、生活和核算统一起来。

为了使广大干部弄清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规律，毛泽

东还再次强调了读书问题。他要求中央、省市、地委一级的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认真研究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3版。县社干部，也要抽出一段时间，学习各省编的好人好事、坏人坏事和文件汇编等3本书。

刘少奇在西南组的讨论中说，1958年出了一些乱子，得到了有益的教训，碰到了钉子知道转弯，不犯长期性、全局性的错误，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正确领导。

朱德在中南组发言说，去年成绩是伟大的。但对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这一点估计不够，共产搞早了一点，食堂要坚持自愿参加的原则。

站在今天这个高度上客观地讲，庐山会议这一段基本上是按照原来计划进行的，在“纠左”方面比郑州会议更为深入。但是，庐山会议潜伏着严重的危机（这一阶段），作为会议组织者的毛泽东，虽然较前为多地承认了“大跃进”的问题，但是，他决不允许别人对他亲自树立的“三面红旗”的错误作出超过“一个指头”的估计。“问题不少”，究竟全国发生了多少严重的问题，是否需要再认真摆一摆？毛泽东没说，粮食短缺，老百姓正在饿肚子，有些地方还饿死了人，国家库存被挖空，经济濒于崩溃，下一步再怎么跃进？毛泽东没说；大炼钢铁白白丢掉50个亿，工业内部平衡一片混乱，下一步的工业化道路怎么个走法，他没说；农民对过早进入高级社、人民公社究竟是什么态度，1958年党和人民在如此英明能手指引下干了如此狂热的一场闹剧，是不是应当从指导思想，党风等方面进行一番深刻的反省？他也没说。值得思索的是，毛泽东强调了读书问题，似乎是读一本政治经济学教材，两本大跃进中的好事坏事的书就能解决问题，就能扭转左倾冒险错误。

毛泽东千里迢迢把各路诸侯召到庐山来，或许就是要在这一避暑胜地的清静凉爽之中，愉快地宣布曲折已经度过，问题已经解决，众人只需统一这个认识，下山以后继续跃进。

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或许真的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或许为了保持红太阳的权威而不肯承认错误。总之，毛泽东的这种态度，为以后的风波埋下伏笔。

##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吼虎岭，处在上个世纪末的英租界与俄租界的交接处。庐山的峰峰岭岭、沟沟谷谷，以“虎”字取地名的不少。猜想起来，恐怕是在古代庐山猛虎藏身出没之地甚多之故吧。牯岭附近，自殖民者开发之后，虽然虎豹踪迹减少，但一直到50年代，那浞阳峰，三叠泉等远山深壑还是时闻虎声的。

西北组的讨论会场就设在吼虎岭北面的一幢西式平房里，7月3日，开始小组讨论。

彭德怀沙哑、厚重的湖南口音，不啻是吼虎岭下一声久未闻听的虎啸。

“1957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信提高了，得意忘形，冲昏头脑喽！”

彭大将军坐在小组会场中央的一张沙发上，冷着脸，锁着浓眉，微抬起那张线条四楞四方的下颌，一股不肯通融，不甘罢休的犟相。上庐山以来，他还一直没有露过面，只闷在别墅里看会议发下的文件、群众来信以及国防部转送的电报等等。7月1日多数与会者的游山，他也没有去。今天的第一次露面，他

便来势凶猛。

彭德怀本不准备参加这次中央扩大会议的，他请总参谋长也是书记处书记的黄克诚来，但黄总长权衡再三，认为还是彭总去的好。

彭德怀假如不上庐山，或许1959年的这段中国历史就不是今天这种样子，而他个人的遭遇大约更是另一种情形了。但是，这个颇令今人惋惜的偶然细节，其实丝毫不能改变中国的必然命运。即使彭德怀此次不来庐山，甚而1959年在庐山没有发生这场大风波，中国人日后的灾难也是注定了的。这绝不是宿命的观点。因为在20世纪中叶的中国历史舞台上，由于一个人的伟大和全民族的渺小，使得任何领袖以外的政治人物的作用都将变得微乎其微。

然而彭大将军毕竟来了。

从历史的某个局部来看，领袖人物的作用便显得举足轻重。尽管彭德怀上山以前对自己将要扮演的政治角色毫无刻意准备，甚至他或许决无向毛泽东挑战的深思熟虑。但是，在那时党内高层人物圈里，一股尚处于微澜状态的对毛泽东的批评情绪，已在小范围内悄悄涌动，这种情绪的直接动因，便是全国经济的大混乱和人民的极大苦难。于是，命运之神似乎在寻找一个人了，这个人是一个代言人，但更有可能是一个殉道者。

命运之神选中了彭德怀。

井冈山、长征、华北抗战、保卫延安等等不必细说，单表1950年10月中南海研究出兵援朝一事。当时国内百废待兴，众将均对志愿军司令员一职沉默不语。彭德怀一夜未眠，次日上颐年堂向主席慷慨请令，三年鏖战终于将克拉克上将打到谈判桌上来签订战书，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阵营里第一

个击败美军的东方将领。这个历史的殊荣，使赫鲁晓夫曾在苏共二十一大期间盛赞彭德怀是“真正的英雄”、“伟大的统帅。”1959年4月到6月间，彭德怀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东欧八国，所到之处，无数鲜花交织着倾盆大雨般的褒扬扑面而来，令中国军人扬眉吐气。彭德怀本是淡于名利也厌于吹捧的血性汉子。一生血战的骁将往往都只怀念沙场，因而卓著战功带来的极大声望或许在他看来只是过眼烟云。然而，有一件事却不容忽视，中国几千年封建政治延续下来的某种特有规律此刻彭德怀却浑然不觉。“功高震主”的千古忌讳和“功成身退”的历史明鉴此刻要对他发生作用了。

历史在1959年终于选中了他。彭德怀腔子里的血永远是滚烫的。

用但丁的一句话来说，就叫作：“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彭德怀第一次发言就涉及毛泽东。

“把那些个经验好生总结一下，不要丢掉了！也不要埋怨。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没有那么多嘛。我去了解实际只增产百分之十三，我去问了周小舟，他说那公社增产只有百分之十四，国家还给了不少贷款和帮助。主席去过这个公社，我曾经问过他，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个事。我看他是谈过的！”

这个“他”很明显是指毛泽东。

第二次发言依然涉及毛泽东，甚至直呼其名了。

“去年忽视了工作方法六十条中的一切经过试验。吃饭不要钱那么大的事，没有经过试验。总之，大胜利后容易热，就是熟悉的经验也容易忘记。我犯过四次错误：打赣州，百团大战，至今还没有定论，西府战役打宝鸡，在朝鲜的第五次战役。

“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容易犯官僚主义，防止官僚主义的办法有两条：一是工作人员经过选举，群众有随时罢免之权；二是工资等于最高的技术工人的工资。

“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也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在内！”

彭德怀手里挥舞着一支红蓝铅笔，情绪激动。61岁的人了，还是肝火旺盛，嘴不饶人。

诚然，彭德怀讲不出多少高深的理论，他所谈“无产阶级专政后容易犯官僚主义”，也只是在引用马克思的话。但关于“吃饭不要钱那么大的事，没有经过试验”这句批评，则是他根据自己的耳闻目睹真切感受到的。照说一个国防部长对全国经济大势的了解，怎能有管理国家行政、经济的负责人或省委的书记们清楚？彭德怀只不过回了趟湖南老家，从家乡父老们那一张张蜡黄的脸上，那床上的草席垫子，那只有米星星的大锅青菜里，那饿得哇哇直哭的娃娃们的泪眼中，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那时并不懂得多少政治经济学。他只凭着朴素的直观，那是任何恢宏深邃的理论所没法欺骗的。

在平江幸福院，一个当年的老红军把一首诗写在纸条上交给他，这是一首近乎民谣的诗。正是这首后来广泛传开的诗使身经百战的彭大将军泪湿青衫。

谷撒地，薯叶枯，  
青壮炼铁去，收获童与姑，  
来年日子怎么过，  
请为人民鼓咙胡。



好辛酸呵。“咙胡”者，喉咙也，意思是请你彭老总赶紧为老百姓讲讲话吧。

彭德怀，这条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硬汉子落泪了，他腔子里的血的温度急剧升高。

吼虎岭下那个执拗、深厚的湘音已有些愤怒了。

“农村4个月不供油，办得到吗？完全是主观主义……那次我回湖南，在株洲碰到薄一波，我对他说，粮食实际产量恐怕没有估计的那样多，今年如果按1200亿斤征购，恐怕要征过头，会影响农民的情绪，还是降到900亿斤比较妥当。一波同志说，你给中央打个电报吧。我说，请你写，用我彭德怀的名字发。我不隐瞒自己的怀疑……毛主席与党中央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所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也是不行的。去年乱传毛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国家那样穷，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搞什么名堂……解放以来，一连串的胜利，造成群众性的头脑发热，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只讲可能和有利的因素。在大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进反面的东西……”

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仿佛憋了许多怀疑和焦虑，而今不吐不快：

“大炼钢铁，全民上阵，土高炉、小转炉，炼出来一堆废物，劳民伤财呵！北戴河会议硬要1958年比1957年翻番，弄出‘1070’的高指标，不是头脑发热是什么？……公社化运动一股风，轻率地改革所有制关系，好像一夜之间就能跨进共产主义，这是指导思想上的重大偏差，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蠢事……”

毛泽东沉默了一个星期后，终于有反应了。7月10日下午，

毛泽东把各小组组长召来。对前一段的讨论，他和颜悦色地讲了几点看法，弦外之音即是有人“出界了，”他出示了“黄牌”。他说：

“党内有些同志不了解整个形势，要向他们说明，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全国大炼钢铁赔了二十多个亿，算是付了学费嘛，去年北戴河会议的时候，人心高涨，但埋伏了一些被动。1958年的错误，主要是钢铁加番，粮食加倍，基建过多，办社刮共产风，就这回事嘛，搞得我们被动。对大跃进和公社化的问题，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已经解决或正在解决，我们开了许多会议，总是想把问题加以分析，加以解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有人说总路线根本不对，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根本不会错的呀。把问题摆开嘛，总可以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在总路线下面，我估计得高不高？路线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要有时间，要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至少还要10年。对形势的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现在首先要思想问题搞清楚。会议初步安排到15、16日结束，从今天起用5、6天时间，起草、讨论、修改一个《会议纪要》，乔木牵头，作为向中央的报告，加按语转发全党。”

一切都将不了了之！

这一段史实在《彭德怀自述》中记载得很详细。

7月10日毛泽东讲话后，彭德怀眼见会议就要结束，但未采取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的根本措施，“心中十分忧虑。”他认为：“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不上去，势必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于是他想：“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议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

到纠正。正如在 1953 年秋，人民公社刚成立不久，曾有一些人对于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和按劳分配原则问题在认识上有些模糊，但是经过主席的开导，那个问题很快得到了纠正。”因此，彭德怀决心见一见毛泽东。

1959 年 7 月 13 日拂晓，彭德怀踩着露水向毛泽东的别墅走来。

彭德怀整整苦熬了一夜。身经百战的彭大将军，金戈铁马，叱咤风云，何曾优柔至此？多少年来，他不知痛骂过部下多少回：战场上最忌犹豫不决。今天，当他面对着统帅他的人，竟也踌躇不前。想来想去，他终于压下心底的火气，劝自己不要赌这口闲气，还是去找毛泽东当面谈谈。见了面让他先谈几句丑话，你且忍住，再说他几句丑话，看法也就交换了嘛！

谁知，他一走到毛泽东的别墅门口，警卫员就告诉他：主席昨晚一夜没睡，刚刚躺下。

如果说，毛泽东在和江青结婚以后曾经多次萌动过同贺子珍破镜重圆的念头的話，庐山这一次恐怕是最后一次了。在庐山会议刚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就把闲居南昌的贺子珍秘密接上山，只谈了一个多小时，江青就打来电话说也要来庐山，迫于无奈，贺子珍又被匆匆送下山。彭总来时毛泽东在痛苦的回忆中刚刚睡去。

有人说，假如彭德怀不顾一切推开警卫员闯进去，那么庐山会议和中国后来发生的一切，会不会就是另外一种情形了呢？命运永远是无法猜度的。

但是对于彭德怀和毛泽东来说，今天早晨无疑是失去了一次彻底决裂前的缓和或通融的机遇。撇开历史的必然性不谈，单就这两个人的关系和秉性而言，这次交谈（假如能谈的话）的

意义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彭德怀的发难，从一开始一直就是为党为国为民的一片拳拳之心，如若摈除某种误解和猜疑，以毛泽东的胸怀和气度，肯定能在很大程度上理解和宽容彭大将军此情此意的。

无奈彭毛二人在今日清晨失之交臂。

7月13日夜，彭德怀的别墅灯火彻夜不熄，彭德怀伏案沉思，一挥而就。第二天清晨，他让工作人员将信誊清后，派人送到毛泽东处。

这封在庐山引起风暴的信共3000余字，分为两个部分：一是“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二是“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信的实际内容有如下几点：

(一) 指出了当时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法。

在信中，彭德怀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较多地指出了当时存在的各种问题。认为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所有制问题上的混乱，大炼钢铁浪费了人力和资源，另外1958年基建规模过大，1959年又没有及时地进行很好调整。彭德怀指出：“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鉴于当前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状况，彭德怀建议：“在安排明年度（1960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于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那些实在无法完成的基本建设项目，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

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则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4年赶英和超美的跃进速度。

(二) 总结了1958年以来工作失误的经验教训。

彭德怀认为，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产生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上的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还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可供借鉴。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的原则体会不深，对于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外，我国目前状况还是一穷二白，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以及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

彭德怀还指出，在过去的一个时期里。我们在主观上，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了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1. 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高，造成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中国温饱问题不再是世界的话柄，因此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也有着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反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同样也是犯了不实事求是的毛病，恐怕这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

2. 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

想一步跨入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与具体措施，长远性的大政方针与当前步骤，全体和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因而，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

彭德怀认为，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因此，想要彻底克服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等方面的问题，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最后，彭德怀写道：“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则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

彭德怀派人把信送交毛主席后，疲惫而又畅快地睡着了，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中国的航船笔直地破浪前进。舵手毛泽东，二副彭德怀正寄情海天……

客观地讲，彭德怀的这封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然未能完全摆脱“左”的思想的影响，仍然基本上肯定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成绩。”但较之其他与会者在此之前的发言，毕竟更多地点出了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更深地分析了产生这些错误的主观客观原因，并正确地提出了当务之急的任务是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问题。彭德怀在信中表达的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与毛泽东的看法有着明显的不同：毛泽东认为调整指标的任务已基本完成，下一步是继续跃进，彭德怀却认为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仍然严重失调；毛泽东认为全民大炼钢铁的得失比例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彭德怀则认为大炼钢铁是劳民伤财；毛泽东认为犯错误

的主要原因是客观上缺乏经验，受到的损失权当交了学费，而彭德怀则认为主观上还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原因。

彭德怀把在那个时代里能说的都说了，该说的也都说了，只不过稍为委婉一些。虽然有些观点并不十分深入、系统，但是，我们还能对彭德怀苛求些什么呢？

此时，在庐山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因身体不适，几天前已经下山。

7月16日上午，毛泽东把在山上的三位常委请到别墅。说昨天收到彭德怀14日写给他的一封信。他已经给这封信加上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并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

“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毛泽东带着漫不经心的笑意，夹着香烟的大手，在空中缓慢地划了个弧形，“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同志也上山来，参加会议。如果林彪同志身体还可以，也请他来。”

这封信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标题印发给了与会诸人并展开讨论。

如一阵天外来风，搅乱了庐山云雾。轻轻松松的神仙会已经过去，两种意见的对立逐渐尖锐、激烈起来。有些人在彭德怀并非字斟句酌的行间字里寻找，捕捉亵渎最高权威的“险恶用心”，另一些人则在回忆他在发言、散步、游山时说的类似的言辞。甚至连在离京南下的专列上，几个人都谈起了浮夸风、急过渡所造成今年粮食恐慌，彭德怀曾接着别人的话脱口冲出一句：“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早就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苏联军队来喽！”这种极经不起分析的戏言，也被人一一“钩沉”出来了。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的那种氛围，非常自然地重现于

1959年夏天的庐山……当然，同样也有一部分基本赞同彭德怀看法的人，极力地从正面来理解、解释这封信的积极意义。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甚至叹道：

“彭总伟大，只有他敢于写这样的信。”

呵，彭大将军！

真理也许掌握在你的手里，但真理有时像一个谦卑的婢女，她要依附权威才行。你不拥有这样的权威，反而你向权威挑战，力量是何等悬殊！你的命运是否已经注定？太多的人并不崇拜真理而只崇拜权威，你知不知道？假如真理由你来宣布，立即会招来非难和指责，你将陷于重围，但倘若换了权威来宣布真理，人们便会心悦诚服。“名不正，则言不顺”。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一个人的伟大和全民族的渺小这种奇怪现象的存在。

西南一位“封疆大吏”首先发难，他认为彭德怀信的矛头是针对毛主席的，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是等于说前一段我们的路走错了，从中共历史上来看，路线错误那就要更换领导了。如此可怕的推理，在这时还是极个别的现象，大约又因为这位“急先锋”所管辖的那个大省的许多人民正在饿肚子，情况大是不妙，所以他的发难并未引起更多的响应。具有悲剧和喜剧色彩的是，在文革中，他恰恰与彭德怀一同囚禁在京郊那座著名的“政治”监狱里。

在延安就以整人著名的康生，见时机已到，在下面开始造舆论：“彭德怀的信是反毛主席的。彭德怀是魏延反骨，搞分裂，组织‘章罗同盟’。再不反击，人都被彭德怀拉走了。”

但当康生在小组会上发言时，一方面把彭德怀信的性质说成是敌对的，对他实行“宗教裁判”，但高明之处在于凡称其名必携带同志，整人经验极为丰富的他知道眼下越是这样不厌其

烦地携带，越是他的厉害之处。

“彭德怀同志的信中有很多刺，都是影射毛主席的。这封信是反对毛泽东同志和整个中央领导的，写这样的信的目的就是要公布他的政治纲领，要拉队伍夺毛主席的权。”——柯庆施有了康生的鼓励，那眼泡里溢出了旺盛的精力。

实际上被康生、柯庆施煽动起来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

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的人还在两种对立意见的争论中，保持着中立。他们对彭德怀的信基本肯定，认为信中反映了当前存在的实际问题，只是有些提法不恰当，说得过重了一些，但不应上纲上线到反党性质这个高度上来。

一机部部长赵尔陆认为，过去一个短时期经济生活上的脱节现象，不能不说已使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威信受到些微的影响，造成一定的被动。作为党的高级干部，由于缺乏经验，头脑发热，向中央反映了一些不确切的情况和资料，应该感到沉重。从这种心情出发，他对彭总的信感到同情，彭总的精神值得学习。建议书中值得斟酌的是有个别问题的提法。分析得不够深，不够全面，容易引起误会。大跃进期间，部门之间工作矛盾最严重的是一机部同冶金部。赵尔陆上山时，曾带来多种不合格的生铁样品，由于会议形势的发展，后来没有拿出来。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笏较直率，他认为我们目前需要彭总这样的精神，信中的某些词句容易引起误会，可以不必争论，主要应看精神。过去的一个时期经济生活上的比例失调，引起各方面的关系紧张，是相当严重的，现在虽然已经大体上得到纠正，但完全解决还要做许多工作，缺点的性质问题，从理论上讲，如果有缺点错误，必然非“右”即“左”；大跃进中主要的倾向，肯定不能说是右，当然就是“左”。彭总并未说党的路

线“左”了，只说缺点的性质属于“左”的范畴。这是对的。问题是怎样处理，目前可以不公开提出反“左”，以免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但在将来的一定时间，把执行总路线中右的和左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还是很有必要的。

贺龙认为，我们的缺点还不到一个指头。这么大个国家，这么多人，工作有一点缺点、错误，有什么奇怪的？而且缺点、错误很快纠正。这是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而我们去年的工作出现的一些左的偏差，也只是在克服了右倾保守错误，执行总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工作方法上有些缺点所产生的，既然是这样，就谈不上什么小资产阶级的疯狂性和什么难于克服的错误。因此我对彭总给主席的信，觉得在总的估计上是不恰当的，是把问题说得过于严重。

庐山上已经沸沸扬扬。祭坛正在架设。彭德怀的命运如何？中国的命运又如何？

## 军事俱乐部

50年代的中国老百姓和普通党员，已经很少有人知道“洛甫”这个名字了。而这个名字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经显赫一时。中共党史上的灿烂夺目的遵义会议决议，便是出自张闻天的手笔。

与那位行伍出身的彭大将军不一样，“洋博士”张闻天一生迷恋理论，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似乎还在毛泽东之上，眼界之宽在当时中共高层人物中也属寥若晨星者之一。作为常务副外长经常巡察驻外使馆，使他得以纵览国际风云，天下大局了然

于胸中。这个不可多得的参照系，使他对于当时相对处于闭关锁国之中的国内诸种情势，自然会从对比中，较国内的同事看得更深，更清楚些。而多年驻苏大使的经历，又使他亲眼目睹了斯大林晚年沉痛教训和苏共反对个人崇拜的现实做法，不能不对毛泽东日益明显的独断专行深感忧虑；再加上他早年就已形成的对经济问题的浓烈兴趣，对大跃进及人民公社的弊端也有独具慧眼的理论上的窥破。这样，出于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责任感和正义感，张闻天是决然按捺不住的。

这将是洛甫一生中最为光辉夺目的一次闪耀。不幸的是，这又是最后一次。

胡乔木、田家英等同志都知道张闻天的脾气，纷纷来电话劝他不要太过激进，大势不是他张闻天一人所能扭转的。

可是，谁都不肯说出真话，中国怎么办？彭德怀怎么办？马克思主义怎么办？人民怎么办？彭老总，我洛甫不会让你跳光杆舞的！

洛甫在中国的舞台上又一次出场了。

1959年7月21日下午。华东组。天气晴转多云，天边隐隐孕育着惊雷。

“我是搞外交的，对经济是外行，情况知道很少，发言权不那么多，讲些外行话吧！这次庐山会议，是总结经验嘛！”

张闻天很平静，他一直在照着稿子念。发言中一共谈到13个问题：大跃进的成绩；缺点；缺点的后果；对缺点的估计；产生缺点的原因；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政治和经济；三种所有制的关系；民主和集中；缺点讲透很有必要；光明前途问题；关于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成绩和缺点之间的关系。发言通篇立论恢宏，高屋建瓴，绵针细密，逻辑严谨，明快尖锐，对当时

中国的各种政治、经济上的危机和党内最高权威存在的问题，直刺要害，入木三分，不啻是那个热昏、迷狂、愚昧年代里一篇理性与科学的宣言，透过历史的尘埃，在今天仍然闪烁着灿烂的光芒。

张闻天的发言全文 8000 多字。

《发言》指出，缺点的原因可以讲得具体一些：比例失调是由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共产风”主要是所有制和按劳分配两个问题；虚报浮夸、强迫命令是不允许讲话，不允许怀疑所致，否则就扣“怀疑派”、“观潮派”等帽子。讲缺点还应讲具体后果，这样才能取得经验，针对后果提出纠正办法，比如钢铁指标过高，其他指标也被迫跟着上，造成了全面紧张和比例失调；基建战线拉得太长，“三边”（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做法，浪费太大，工程质量也差；新增工人太多，招 2000 多万，人浮于事；企业产品不成套，任务朝令夕改，不能实现其价值；原材料缺乏，经常停工待料；产品质量下降，技术水平下降，不注意设备维修，等等。从而造成大量资金和物质的浪费、积压，市场供应紧张，物质储备减少，财政结余用光，外贸出口不能完成，等等恶果。大炼钢铁不单赔了 50 个亿，最大问题还在 9000 万人盲目上山，使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的损失，丰产也不能丰收。去年什么事都提倡全民，甚至要求“全民写诗”，搞得老百姓不胜其烦。

从毛泽东起，当时大多数人还是要保食堂，认为这是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一个标志。报纸上曾大批“资产阶级法权”，批按劳取酬。

“要坚决贯彻按劳分配。我个人建议，取消“吃饭不要钱”，改为实行社会主义保险。对于少数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实行

“吃饭不要钱”是必要的。但对于多数人这样做，就不对了。我们不能搞平均主义。

现在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怕取消供给制就不够进步，退出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其实，这完全不是一回事，这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社会主义并不一定就要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做法。

对于穷和富的观念，要慢慢改变。按照多劳多得的原则，劳动好，对国家贡献大，所取得的报酬就相对多些，生活就富裕，富是由于劳动好，反之则穷一些。”

《发言》还精辟地谈到当时流行的共产主义风格的宣传问题，共产主义风格为集体牺牲个人的思想，这些是可以宣传的，可以用来要求少数人、先锋队、先进分子，但不能当作制定现行政策的根据。如果社会主义不能满足个人的物质，文化需要，就没有奋斗目标，社会主义也就建设不起来。

关于产生缺点的原因，《发言》认为主要是由于缺乏经验。但绝不能到此为止。而应该从思想观点、方法和作风上去找原因，这样才有利于总结经验教训，避免今后重犯错误。这也是张闻天发言的主旨所在。关于主观主义和片面性，《发言》专门作为一个问题提了出来：强调主观能动作用是对的，但强调过了头就不好了，以至于不顾实际可能性，这就成了主观主义。好大喜功也是有的，但要合乎实际，否则就会弄巧成拙，欲速不达，好事变成了坏事。张闻天从主观主义进而谈到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领导经济光政治挂帅不行，还要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有的人根本看不起经济规律，认为只要政治挂帅就一切都解决了；有的人公然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说是不用算经济帐，只要算政治帐，这是不行的。总结经验，还应从经济规律上进行

探讨。

有的人以“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这一哲学范畴的法则，为大跃进中出现的严重失调辩护，甚至认为就是要冲破平衡，不平衡才是好事。张闻天在发言中明确地讲，经济建设就是要找出相对平衡，按照相对平衡办事，利用相对平衡制定经济计划，要使之大体上是个平衡的计划。遇到某一个方面被突破，便要及时调整，这就是所谓积极平衡。《发言》认为我们国家还是一穷二白，资金有限，必须根据节约原则，严格控制资金使用，最合理地使用每一块钱。因此，毛泽东同志要大家学习政治经济学。领导经济建设，不懂或不熟悉经济规律是不行的。中国的经济建设自有其特殊性，但是有关的普通规律仍然起作用，问题在于怎样使两者相结合。

大跃进期间，不按科学办的事情太多，报纸上放肆地报道，随便吹牛、放卫星、超外国，引起了很大的混乱，给国外造成的影响也不好。庐山会议前，在外交部召开的务虚会上，张闻天就曾经讲过不要吹，说有些东西我们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但究竟正确与否，还有待实践继续证明。搞经济工作，要学点科学技术知识。在这方面我们缺乏常识。许多已有的技术措施、操作规程等，要研究其科学根据。要改革，也要在人家已有科学成就的基础上改革，不能随便把原来的东西推翻。更不能乱吹，使人家看了觉得我们很外行。鞍钢把工业生产质量定额制度一把火就烧掉了，好像打土豪时烧地契一样。现在到处也找不到，弄得一个时期生产秩序很乱，生产技术没有科学依据，光用土办法蛮干怎么行呢？蛮干是要死人的。“一切经过试验”。这条原则我们要遵守。试验确实成功了，再推广也不迟。实验室里成功了，还不等于在工业生产中也成功了。工业中少量生产

和大批量生产也不一样。上海的“英雄100型”钢笔被我们吹成超过了“派克”。据说美国人开始很害怕，后来试验了，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很多关键没有摸到。”后来“英雄”并不超“派克”。上海造的表，也吹了一阵，其实走得并不怎么样……

《发言》的针对性极强，如此明快而尖锐，几乎是毫无顾忌。最后说到根本关键还在于健全党内民主生活时，尤为如此。

“讲一下党内民主作风问题。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毫不怀疑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可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在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

“这个问题对于执政的政党特别重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英明、伟大、讲我们的成绩，因为这些是客观的现实。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出不同意见。决不能因为人家讲了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了种种帽子。不要造成一种提错了意见就是观潮派、机会主义、右派的局面。一个人是否真有问题，要经过一定时间观察。对一个人，经过长期观察其言论、行动，认准其是右派无疑，再扣帽子也不迟。这样，对团结干部有利。”

“总之，民主风气很重要。要造成一种生动活泼、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斗力。过去的一个时期就不是这样，几句话讲错了，就要被扣上帽子。反而有些虚夸的被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会是这种样子呢？为什么不能听听反面的意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们手里，怕什么呢？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人，一定会听反面意见的，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

实事求是的讲话, 我认为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要培养起这种风气的确不容易。

“光讲成绩, 不讲缺点, 是否会保持积极性呢? 我看也不会。因为人家不服。我们对农民检讨几句, 他就高兴, 积极性就提高。马克思主义者鼓励积极性靠真理, 现在我们觉得有些虚, 就是因为真理不够。要防止骄傲自满、麻痹大意的情绪。要更多地看到存在着问题的一面, 有些地方发生浮肿病, 死了一部分人, 数字虽不大, 但是问题是存在的。我们胜利一个接一个, 胜利本身有消极面, 因为它容易使人的头脑发热、骄傲自满起来, 问题这时就容易随时发生。这一点必须严加警惕。谦虚一点还是有好处的, 头脑冷静一点, 倾听一下不同意见, 苦苦想一想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把热锅上的蚂蚁变成冷锅上的蚂蚁, 否则, 满足于成绩, 虽然心宽体胖, 却研究不了问题, 接受不了教训……”

《发言》的最后, 张闻天才回到彭总的信上来:

张闻天认为, 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 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 本意是很好的。但是从各方面的反应看, 不少同志似乎对彭德怀同志这个出发点研究不多, 只注意了他这封信的一些具体说法。其实, 他的信是肯定了成绩的, 彭总说成绩是最基本的。这同大家的看法一样, 至于个别的说法, 说得多一点或少一点, 关系就没有多大。

例如, 他说: “基本上还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这话是对的, 毛主席说过, 总路线正确与否要看十年。彭德怀同志说, 一年就基本上证实了总路线是正确的。这估计本身就很高, 没有什么不足。

关于彭总对得和失的提法, 是就局部问题而言的; 在炼钢

铁问题上，有得有失，而且分析来看，他强调的是成绩一面，在这一方面有得有失，考虑一下也是可以的。

至于各方面的紧张具有政治性的说法，我认为是要看你怎样讲。在刮“共产风”时，各方面的关系的确紧张。现在已基本好转，但是除了反革命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攻击我们外，人民内部也还有矛盾，还有些问题没有妥善解决，我们还不能麻痹大意。所以，彭德怀同志提出的这个问题，是值得考虑的。

彭德怀讲浮夸风，是从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估产过高谈起。说浮夸风吹遍了各地区、各部门。他这样说，说的是普遍性。当然，各地区，各部门的情况不平衡，对某些地区，某些部门来讲，彭德怀的话可能相对严重了一些，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浮夸风确实是严重的，是很大的问题，现在也并不是已经完全解决。

彭德怀同志说：“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这个问题不说可能好一点，说了也没什么，究竟怎样，我们可以考虑。但是，刮“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吧。

至于说“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张闻天认为，如果讲的是一个时期的事，这样讲问题并不大。

关于纠“左”的偏向是否比纠正“右”的偏向更加困难的问题，有人说容易，有人说困难。“左”的毛病谁都犯过。现在是局部问题，纠正错误肯定比过去容易。但是，是否一定那么容易，容易到什么程度，还要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样。做得好，抓得紧，就容易；做得不好，抓得不紧，就不那么容易。

.....

洋洋洒洒 8000 余字的发言，张闻天讲了 3 个小时，他有一种倾吐后的畅快。同时，张闻天清楚地知道，那个巨大权威的阴影已经向他靠近。

有人做过统计，张闻天的发言中讲成绩的只有 270 余字，用了 39 个“但”字，13 个“比例失调”，12 个“生产紧张”，108 个“很大损失”，以及“太高”、“太急”、“太快”、“太多”等一大批“太”字。

张闻天，你是条好汉！

黄克诚是 7 月 17 日上山的，19 日在第五组发了言。黄总长认为：检查缺点使我们进步，不会使我们后退。毛主席教育我们要天天扫地洗脸，检讨了缺点，我们就会更加健康，就会干劲更足、更踏实。他讲了以下几条缺点：

1. 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
2. 比例失调；
3. 1959 年计划指标过大。

头一条是起了主要作用的，后两条与之有联系。北戴河会议通过公社决议时，黄克诚就对陶铸、周小舟等交谈过：公社挂个牌子算了。黄克诚是一个遇事尤其重大之事惯于多想困难的人，这是大革命失败后他自己的艰辛经历，包括要饭千里才回到苏区，以及多年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在党内斗争特别是打 AB 团等肃反政策的教训中，使他养成的一种思考习惯。在谈到公社问题时，黄克诚发言了：“我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对不对请大家研究，去年搞好还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从长远说，搞了好；从短时期说，不搞更主动些。”谈到

作风问题，黄克诚补充一点，即只能讲成绩，不能讲缺点，讲好的高兴，讲缺点不愉快。黄总长认为有缺点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缺点不讲。在发言中黄克诚还指出去年兴了铺张浪费之风。中央出来开的几次会，也很铺张，他虽然也吃了也玩了，但很不舒服。另外出外开会带戏班子的办法也不好。对群众讲勤俭持家，几个月不吃肉。干部们却吃得那样好，这样不行。最后黄克诚还谈到了缺点造成的影响：

1. 粮食紧张状况是解放以来没有过的。建筑材料、市场副食也紧张。

2. 党与群众的关系受到影响。

3. 党在国际上的威信也受到影响。

最后黄克诚又立场明确地对彭德怀的意见书表示了态：“大家都在议论彭老总这封信，我也谈点看法。我看，这封信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出发点是诚恳的，指出的问题也是大致准确的，至于某些提法，用词，是可以仔细斟酌的。有些看法，他谈得直露一些，但也未必没有道理。”

7月13号晚饭后，黄克诚邀请彭德怀出去散步。他们俩就像同时放线的两只风筝，悠悠地并肩，向山林小径荡去。

“我是支持你的意见的。”黄克诚平静地说道。

那位清瘦，戴着眼镜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呢？他此刻正在中南组里激扬文字呢。

“彭总的信，总的精神是好的，至于某些提法、分寸、词句可以斟酌……彭总说全民炼钢是有失有得。这个得失问题，从具体来讲，得多于失，得失相等，失多于得，都是有的，要加以区别。比如湖南搞了5万个土炉，有两万个根本没有点过火；

有些地方晚稻并秧，大大减产，这就是只有失而无得嘛。缺点少讲，或讲而不透，是难以正确总结经验教训的。正确地检查缺点，不仅不会泄劲，反而能鼓舞正确的干劲。

“各省由于工作方面不同，因而看法也不同，有些同志自己去年有失误，怕人家讲，一讲就要给人家扣帽子，这样不好嘛！还是认真听听人家讲得有点道理没有嘛，大家一起讨论，从各方面把问题提出来，经过分析，就可以达到一致的。”

7月23日。

历史永远记住了这一天，主席终于愤怒了！

据当年在毛泽东别墅一位烧锅炉的值班工人回忆说：

“7月22夜，我在锅炉房值班，忽然发现后院竹林有个亮点，晃来晃去，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再仔细看了一会，呵，是烟头的火光。谁在那林子里抽烟，这么晚了？好一阵子，那人才从竹林里走出来，我一看，妈呀，竟然是毛主席！天亮后我去那里转了转，见林子里扔了一地的烟屁股……”

可以想象出毛泽东那一夜内心斗争的激烈程度，几个开国元勋的命运捏在他的手里呢。

7月23日上午9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

毛泽东发言了，一贯高亢的嗓音里有些嘶哑声。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点，可以不可以？讲点这样的意见，我看了同志们的记录、发言、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我感觉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人家讲坏话。

“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

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就是要垮台了。这是右派讲的。党内一部分意见还没有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映，各地都有……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的同志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前一个时期蔬菜太少，头发卡子太少，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市场紧张，以致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紧张嘛，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

“说我们脱离群众，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春节前后，我看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并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是公社运动。

“……我们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我看这次会议有些问题不能解决，有些人不会放弃他们的观点……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到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坏话、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两个星期，再反击，劝同志们要听。你们赞成不赞成是你们的事，不赞成，如我错，我作自我批评。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摇摆的……”

“有些同志在关键时刻就是动摇的。在历史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后来又有了高饶路线，现在又是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国民党说我们是扭秧歌王朝。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

“……一个生产队一条错误，70 几万个生产队，70 几万条错误都登出来，一年登到头，登得完登不完？还有文章长短，我看至少要一年，这样结果如何？我们的国家就垮台了……那我

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基本正确，部分不妥。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我看不是右派，但距右派只有30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他们的论调，这种同志相当危险，不相信，将来看。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食堂是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我看如果在全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许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不是说党不管党吗？去年8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面，对建设根本外行，对工业计划一点不懂。去西楼时曾经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管都没管，还说什么英明？但是，同志们，1958年，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过去责任在别人，现在应该说我，实在有一大堆事没管。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被炸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大办钢铁的发明权是柯庆施还是我？我说是我，我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说600万吨。以后我找大家谈，也觉得可行。我6月讲1070万吨，从此闯下了大祸，所谓始作俑者，应该断子绝孙……”

毛泽东谈到这里竟然哽咽了，那个硕大的，富于想象力的大脑袋在微微颤抖着。

“我有两条罪状，一条叫1070万吨钢，大炼钢铁，你们赞成，也可以给我分一点，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主要责任在我，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还有总路线，是虚的。实的，你们分一点。见之行动是工业、农业。至于其他一

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天天想着欧洲革命要来了，又没来，反反复复，一直到死了，还没有来。到列宁时才来，那不是性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马克思刚开始也反对巴黎公社，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后来被杀了。马克思是否也该杀呀？巴黎公社起来了，他又赞成，估计会失败，看到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3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这划不来。我们也有广州公社，大革命失败了，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否也会像1927年那样失败？像二万五千里长征，大部分根据地丧失，苏区缩小到十分之一？不能这样讲。失败没有？到会的同志都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不是，是一部分失败，多付了代价，刮了一阵子共产风，全国人民受了教育。如果讲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自己负责。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毛泽东历史性的讲话戛然而止。

全场几乎还在意外的屏息凝神之中。在这个海拔千米以上的，决定未来中国命运的特定时空里，寂静，一如暴风雨前。

毛泽东这次没有高深恢宏的理论，而是用强烈的感情和巨大的权威再一次慑服了大家。

参加庐山会议的中共要员中，不乏有一些冷静的人，他们在开会前热切盼望毛泽东能清醒起来。他们知道，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蓝图一往情深，他只要陶醉于其中就很难苏醒过来。话又说回来，一旦毛泽东清醒过来，他的超群之才和宏大气魄，力挽狂澜于即倒是弹指一挥间的事。可是，7月27日，毛泽东将重新陷入迷狂。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引发了一场仅次于文革的浩劫。一种毛泽东不能自觉的心理缺陷在东方领袖那种尤为严重

的被崇拜被神化的巨大孤独之中，已经压倒了他那曾经异常清醒的理智。

从延安走到北京，毛泽东一直是充满自信的。但他发动的一场大跃进出现挫折以后，他的自信心开始受到折损。

1959年的夏季，正是毛泽东的低潮，国事、家事没有一样使他顺心。

到这时，“神仙会”上只有一个人还敢于继续讲他想讲的话，他的名字叫朱德。

“去年农业是好收成，粮食为什么还紧？主要是吃大锅饭吃掉了。好的吃了，坏的烂了，农民对私有制习惯了，分散消费可能会节省一些。关于手工业问题，去年很多合作社升级变为国营。一升级，它就不计盈亏了，什么都要国家包起来，这怎么行？看来集体所有制自负盈亏还是个好东西。商业去年也下放了不少，不搞经济核算，结果亏欠了很多，我看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体经济都要承认，不承认个体经济不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各自生活。要把这些问题都摆清楚，认真总结一下经验教训。”

7月23日傍晚，李锐从照江岩归来，遇到周小舟，周说要去找黄克诚谈谈。李锐有虑：这个时候去会引起嫌疑。周小舟嚷道：

“横竖不过如此，去，怕个什么？”

“不是我不欢迎你们，还是慎之为佳吧。”黄克诚说：“都不是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啊。”

来的三人火气都不小。推开挡在门口的黄克诚。

周小舟谈斯大林晚年专断，压制不同意见。

“袁世凯要称帝，有人就特为他办了一种报纸，专讲劝进的

话。袁世凯就最喜欢听。”

“这不是钓鱼吗？”

“不能一手遮天！”

黄克诚扶了扶眼镜，冷静地说：“可以找主席谈谈。”

正在这时，彭德怀进来了，加入讨论。

又过了一会，一位当时极受毛泽东信任的主要人物来找黄克诚，偶然碰见彭德怀和这群“低调俱乐部”的成员正在一起情绪激昂地议论。他们一见此人，顷刻各自散去。此人立即向毛泽东禀报：彭黄等人还有组织活动！

毛泽东的愤怒在加剧。

彭德怀开始扭曲自己了。

信本身并不重要。于是，写信的初衷，酝酿信的那些思考、信里提出的观点、支撑那些观点的千真万确的事实——家乡父老的泪眼、大锅里的菜饭、娃娃们的饿态、“鼓咙胡”的请求等等，都是可以随之而跨越过去。否则，彭德怀的良知本身不肯批准。

然而良知还在挣扎，又必须寻求一个更崇高、更神圣的“理性”来镇服它！

“从全局利益出发”，彭德怀突然觉得有些柳暗花明了。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国防部长、副总理。他看问题的立场必须首先考虑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的特殊位置。毛泽东曾再三提醒全党，杜勒斯的美国和赫鲁晓夫的苏联，都在对中国采取敌视态度。中国已经肩负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支持世界民主，民族解放运动的中流砥柱的重任。而能够领导中国共产党担负起这个征途的领袖，只有毛泽东一人。这

是一个不能挑剔违拗的权威，一个不能加以思索的对象。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就是最大的全局。为了毛泽东的光辉和正确，你彭德怀必须放弃一切——你以为的真理，你眼中的人民；你的痛苦和欢乐还有你自己！

彭大将军缴械了。

7月26日，彭德怀违心地做了检讨。承认了思想方法上有片面性。信中对如何肯定大跃进的成绩，以及研究经验教训的看法，是有错误的，关于写信的原因，彭德怀说：

“我写这封信时，是希望在这次会议上能够深刻地研究和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使我们的建设工作搞得更好一些，这是出发点 and 动机，因而就过多地强调了困难和缺点方面，对于全国情况缺乏具体分析，提出了一些错误的看法。这种错误的看法，可能引起在经济建设中快和慢的摇摆……我的思想落后于实际，对全国情况了解甚少。当时呢只感到截至13日的小组会中，对经验教训探讨得还很不够。从会议的《简报》上看不到反面的意见。空气有些沉闷，思想上有点急躁情绪。担心有一些缺点可能要被重复，不利于今后的继续跃进。为了提醒主席注意这一情况，就在13日写了一封供主席参考的信。那时又听说小组会在15日就要结束，使人心情更加急切。我感谢主席的严正批评，纠正了我的错误。”他坚持说：“这封信，当时考虑只是主席参考用的，信中不合逻辑，字句不妥之处甚多，提出了一些问题，也没有交代清楚。如信中的‘有失有得’、‘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的各方面紧张，是具有政治性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提法，都是不妥的或错误的。”他最后苦着脸说：“这次会议的意义十分重大，对我教育很大，现在会议快要结束了，建议会后收回我7月14日给毛主席的信。存入中央档案，作为我

今后思想检查的资料。”

彭德怀在后来的笔记中追叙这一日检讨的心情是“万箭穿心”。他也许还没有预料到，日后他要做的检讨，会十倍地“万箭穿心”。

也是7月26日，经过两天时间的反复思考，黄克诚也在小组会上作了检讨。他讲了自己19日发言的缺点，认为自己的嗅觉不灵，听了主席的讲话，受到了极大的、深刻的启发和教育。去年工作中的那些缺点，应该由全党来负责，绝不应该把责任都推到主席的头上。黄克诚认为他也是中央书记处的一员，应该有他该负的责任。他又谈到自己对彭德怀信中所述意见的错误性质认识则不十分明确，没有认识到其思想具有当前开始露头的右倾代表性，总的精神是错误的。黄克诚最后谈到他曾经反复考虑过建设速度的快和慢的问题，认为在没有掌握建设经验的时候，虽然慢点但可以少出乱子。但根据主客观形势和条件，宁可承担些乱子，把速度放快点比慢腾腾的好。自己在思想方法上有一个极大的毛病，一个问题或一事物摆到我们面前的时候，常常把困难和不利方面想的多、对有利方面想的不够，因而表现在实际行动中，常常是谨慎有余；进取不足。这也是对党内发生某些“左”的现象比较敏感，对“右倾”偏向嗅觉不灵的重要原因。

张闻天也在7月26日的小组会上作了检讨。他违心地说从来没有怀疑过党的总路线的正确、大跃进的伟大成绩，以及缺点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参加庐山会议以后，逐渐地产生些不满，是因为感觉到有些同志只喜欢讲成绩，而不讲缺点，因

此就在小组会上，在肯定了大跃进和总路线以后就大讲了一通缺点，还批评了一些不愿意讲缺点的论点，张闻天认为这样做是出于责任感，目的是为了帮助同志，没有想到自己的立场有什么问题。对彭总的信，当时也以为基本上好，对大跃进和总路线的正确是肯定的。只是对于缺点的有些提法还可考虑，但也关系不大，只要能把问题提出来就好。也不认为有立场问题，即便是主席23日讲话以后，开始时对主席所说的立场问题、动摇问题体会也不是那么深刻。现在，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和反复考虑，才认为主席提出的这个问题很深刻，很重要！

我们不难看出，张闻天的思想转弯承受着外部的巨大压力和内心的痛苦反省，但他这时还没有“上纲上线”地责备自己。只是检讨地说：“对某些同志们怕讲缺点、怕自我批评的疑心，是不合实际的，是不对的。”“有些缺点和问题，是有那么一些事情的，但是我片面地强调了或夸大了这些缺点，使人得到的印象是问题很多，成绩不大。事实上，我所提的许多问题和缺点，许多已经解决，许多正在解决，有的就要去解决。”张闻天违心地承认：“主席说到立场问题，动摇问题，我是有这个问题的，看到了我的问题，就联想到彭总的信，也是有这个问题的，我认为主席在这方面的批评是正确的。”张闻天还提到错误产生的原因：首先是因为没有直接参加大跃进运动，对群众的思想感情体会不深，对国内当前的主要政治动向认识不清；其次是由于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教条主义、夸夸其谈的老毛病还没有克服掉。在结束检讨发言时，张闻天表示：愿意撤回在上次小组会上带有错误性的发言。

周小舟“觉悟”较慢，直到27日，他才作了长篇发言，他

仍较多地回顾去年湖南的具体情况。其他人追问周小舟对彭德怀意见书的想法。小舟则讲他对总路线从未动摇，也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他自问没有把三句话割裂开来，主席在 23 号的讲话，自己毫无思想准备。对彭总的信，原来说总的精神是好的，同意的，某些提法、词句可以斟酌。听了主席讲话，才认识到这是方向问题、立场问题，才感到这封信是不对的。最后周小舟承认上次发言是错误的。

7 月 26 日是庐山会议的一个关键日，反党定性，批斗升级。27 日上午，刘少奇主持协作区主任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对这次庐山会议的重要指示：继续批判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彭德怀同志反对毛主席，长期以来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还要联系彭德怀同志历史上的错误来批判。毛泽东强调说：

“划清界限，不仅对事，而且对人。”

与此同时，中央警卫局的首长和江西省接待委员会负责警卫工作的领导人，召集各位首长的警卫负责人会议，宣布：

一、这几个人（即彭、黄、张、周及其追随者），不能擅自进入毛主席、刘主席的驻地。

二、这几个人的汽车不能下山。没有毛主席、刘主席的批准，九江机场的飞机不能起飞。

三、这四个人不能互相接触。

这种非常措施就等于正式宣布，党内出了“反党集团”。消息不胫而走。

7 月 26 日晚，政治局常委会找彭德怀谈话，彭德怀和毛泽东顶撞起来。他骂了一句著名的粗话：

“在延安你操了我 40 天娘，我操你 20 天的娘不行？”

彭德怀的这句著名的粗话，作为他“记仇”的一个证据，永

远刻在毛泽东的记忆中。可他哪里知道，毛泽东则比他“记”得更牢。

事隔仅仅3年，1962年9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的娘不行？’这一操，会议就被扰乱了，工作受到影响。20天还不够，我们把工作丢了。”

事隔5年，1964年3月，毛泽东在一次讲话又来重提此事：

“七大前，开了斗争彭德怀的会，他在庐山会议上不是说，你们骂了我40天，我也骂你们20天。”

28日，刘少奇主持协作区主任会议，听取各组批判彭德怀的情况汇报，并传达毛泽东的指示。

为了更有力地批判“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及其追随者，根据毛泽东的意思，将原来的六个小组，合并为三个小组，实行“任务包干。”

第一组，批彭德怀，组长李井泉。

第二组，批黄克诚，组长张德生。

第三组，批张闻天、周小舟，组长为柯庆施。

“党内右派在猖狂进攻。”毛泽东一声令下，“要划清界限！”于是不论过去有没有表过态，或讲得重讲得轻的，都起而踊跃发言，大家直接对着彭德怀、张闻天等开火。

——开始联系历史上的几次错误路线：立三路线、一次王明路线、二次王明路线、高饶事件，认为凡紧要关头彭德怀都是动摇的，总是站在错误路线一方，这次反对总路线，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思想上是个人英雄主义。说彭德怀自以为“有骨气、不信邪”。以犯上为荣。百团大战是无组织无纪律。还有的人提到会理会议，反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问题。

——重提延安华北座谈会总结的彭德怀的四大错误：抗战战略方针上反对毛主席，打百团大战；执行王明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对群众运动泼冷水；闹独立性。

——彭德怀、张闻天等的共同特点，都是说党内不能讲话。

——彭德怀说，他批评的具体对象是冶金部、农村工作部和宣传部，这三个部恰恰是主席抓得最多的。张闻天说的“好大喜功”指谁？还不是指毛主席。

——猖狂进攻已经到来，不仅是立场问题，动机不是为了党的利益，而是别有用心，是想在党内掀起一场斗争，反对总路线，攻击毛主席。彭、张等看到气候已经合适，认为自己抓住了辫子，要向毛主席和中央算帐。

——而且还有个组织问题：此次彭德怀是元帅，张闻天是副帅。一封信，一个发言，都带有反党纲领性质。锋芒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向党下的挑战书。

——毛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海会议上都讲过，要防止党的分裂问题，是有所指的，指的就是彭德怀。

——“第一书记说的算，别人说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不行的，是不正常的现象。”彭德怀这些话是讲毛主席的。他向毛主席进攻着，并且很厉害。他在小组会上还讲过“脱裤子”，“要脱大家脱”。

7月29日下午，毛泽东终于又露面，亲自主持了全体会议。他宣布了中央常委会的紧急决定：8月2日在庐山召开中

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

在座的彭张等人心中雪亮：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党集团”问题，即将升格为一次重大路线错误，交给全党“审判”。

7月31日，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再次发表重要讲话。这是毛泽东为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做的总结性发言。

毛泽东认为：彭德怀同志错误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思想，或者是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混合物。“30年来，彭德怀和我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一、二、三次反围剿，反张国焘路线是合作的，但都有他的不同意见；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完全是另搞一套；抗美援朝时期，有的问题也是不合作的。

毛泽东强调，现在的问题是泄气、右倾和右派们的联合进攻，要鼓足干劲，反对右派危险。前途光明，就是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人民公社，黄克诚同志说迟一年搞为好，我说迟10年、50年都可以，苏联到现在还没有嘛。这是群众搞起来的。物质基础，我们确实没有，但事情不决定于它。美国物质基础最强，但他们搞不起来。中国穷，贫农、下中农有百分之七十，他们要协作，如果等物质基础，就可能出资本主义。穷要革命，穷就是基础。

最后，毛泽东指出揭发批判彭黄张周及其追随者，是一场阶级斗争，事关全局，为了解决路线问题，中央决定在庐山紧急召开八届八中全会。

八届八中全会参加的人数几乎是刚闭幕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者的两倍，会场于是便改在庐山人民剧院。

30年代庐山的三大建筑之一的大礼堂，20世纪50年代末，被中国命运看中了，作为一个祭坛。

8月2日的中央全会上，毛泽东在开场没多久就点了彭德怀、张闻天的大名：

“1957年不是有人要求大民主，大鸣、大放、大辩论吗？”这显然在暗指彭德怀。

毛泽东点张闻天的名，重提他在延安时期跟着王明所犯的路线错误，他说：“洛甫开始时不承认路线错误，七大经过斗争，洛甫承认了路线错误。那场斗争，王明没有改；洛甫也没改，又旧病复发，他还在发疟疾，一有机会就出来了。”

张闻天，你旧病复发，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撕开他心中早已愈合的创伤。

小组批判会上，“军事俱乐部”问题，还没有迫逼出个名堂。……彭德怀、张闻天等矢口否认。

毛泽东却笑着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即军事俱乐部的同志们（彭德怀、黄克诚不都是带兵的么）。”推论如此简单！

“我怀疑这些人是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彭德怀同志，原来就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

这还是毛泽东么？

庐山这个悲剧舞台在扩展、延伸。

毛泽东在《安徽省委书记张凯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的报告》上批道：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凯帆……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体的主要成员，原是高饶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

是明显证据之一。

“他们原来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不舒服了，早就参加高岗反党集团，而这个集团是用阴谋手段达成其反动目的的。这个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

第一小组的会场，忽然骚动起来。

“野心家！……伪君子……！……一贯反对毛主席！……”林彪的粗眉间挤出深深的沟壑。因为双眉的挤动，双眼呈显三角形。他盯紧彭德怀不放：“1935年，你提出取消三军团，也是阴谋，只顾你的小算盘，全不顾党的大局！”

康生的批判自有他文人的特色。他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说：“你彭德怀，早年起名叫彭得华，野心好大呵，要得中华还起个号叫石穿，水滴石穿，搞阴谋嘛！”康生扶了下眼镜继续说：

“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右倾机会主义集团，把毛主席的思想、路线说成是‘左倾机会主义’，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污蔑他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这是公开的反对毛泽东同志思想的，公开反党反人民的言论！所以他组织了‘军事俱乐部’！”

前排的一个大个子站了起来，指着彭德怀的鼻子，“你站起来，交待罪行！”

“站起来！”“坦白！”前排又有几个人站在了彭德怀的对面。口号声冲出窗子。连庐山人民剧院的停车场上，睡在外车里等候首长的司机们都被惊醒。

第二小组批斗“旧病复发”的“副帅”张闻天的烈焰也渐渐猛烈起来。

“张闻天！你们反党集团的目标是反对毛主席，逼毛主席检讨，进而推翻毛主席！”

“你今年3月两广之行，勤劳艰苦之行，就是要找反对、推翻毛主席的材料！”

“你一直在反对毛主席，毛主席已经说过你的材料都是假的！”

“你敢否认毛主席的指示？”

张闻天忽然明白了，自己读了一辈子书，其实连“强词夺理”这四个字都没有真正弄清楚。

张闻天在8月9日老老实实在地向毛泽东投降了。“我的右倾机会主义是有来源的，从全民大炼钢铁、武汉会议、上海会议，就开始有右倾思想，其主要问题是：搞小高炉、土高炉、那么多人上山、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人民日报关于资产阶级法权、主观能动性的一些文章总的感觉是太‘左’了……我觉得中央似乎不准讲反面意见，我有抵触情绪……”

黄克诚受到的压力也不轻，慢慢地，他在态度上，也采取了彭德怀所说的“要什么就给什么”，在检讨内容上，大体类似张闻天，认了帐啦。

周小舟经过十多天的“帮助”，终于承认了“我陷入了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成为这个集团的成员之一。”要周小舟承认这一点，真是痛苦不堪的事。8月13日他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推论结果，我必然是反党，反中央，反主席的俱乐部成员之一，同时我有许多右倾思想和观点，推论结果，又必然得出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结论……我想假如戴上了这两顶帽子，我对主席、中央、全党、湖南党员和人民，甚至对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都必须说我犯了反党、反中央、反主席、反

总路线、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两条错误，然后再说下去，势必泪洒满下，不尽欲言。”这一封信并没有感动毛泽东。

批判在深入。彭、黄、张、周面对巨大的压力，终于屈服了。

张闻天承认“军事俱乐部”是有目的、有组织、有准备、有活动的。成立俱乐部的目的是为推翻毛主席的领导，按照他个人的面目来改造党。与会人说他有五毒：狭、高、空、怯、私。张闻天表示完全接受。最后张闻天表示他认识到了，根本不存、在什么个人崇拜，毛泽东同志的威信不是他个人的威信，而是全党的威信。

彭德怀硬不下去了，承认“军事俱乐部”就是发动这次进攻的司令部。他表态说要坚决与以往的他决裂，永远做党的驯服工具。鉴于当时的形势，彭德怀还请求处分，他认为人民解放军是党的有力工具，由他这样的人来指挥军队，是非常危险的，诚恳地请求上级撤消他的国防部长和军委委员职务。

黄克诚检讨完自己后，也开始违心地评价彭德怀了，他说：“彭德怀同志是伪君子，表面上装作正直无私的样子，实际上是野心勃勃；表面上装得艰苦朴素，实际是骗取群众的拥护，言行不一。他口头上常对我说，对毛泽东同志服了，实际上他内心很不服，遇事反抗。直到现在为止，还有严重的抵触情绪，并没有低头认罪……”

1959年8月16日。

庐山人民剧院里，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全票通过了三个决议：

《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

《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

《八届八中全会公报》

同时通过的还有人民日报社论稿：《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

毛泽东作了后来冠之为《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可以作为庐山会议的结束语，也为后来的空前浩劫拉开了大幕。

“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要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消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熄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了。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就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就现在说，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得需要时间的，并且需要很长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也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还不明白。一旦出了问题，例如1953年的高、饶问题，现在的彭黄张周问题，就有许多人感觉惊奇，这种惊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社会矛盾是由隐到显的。这是一个规律，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理解，是要通过自己的斗争和实践才会逐步深入的。特别是有一些党内的斗争，例如高饶彭黄这一类斗争，具有复杂、曲折的性质。

“昨天还是功臣，今天就变成了祸首。怎么搞的，是不是弄错了？人们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变化，不知道他们历史上的复杂和曲折，这不是很自然的吗？应当逐步地、正确地向同志们讲清楚这种复杂和曲折的性质。否则，处理这类的事件，不可以用简单的方法，不可以把它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而必须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评从严、处理从宽’，‘一曰看，二曰帮’的政策。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内，个别同志还应该留在中央政治局里……”

毛泽东眉毛在动。他内心十分清楚，造成彭张等人从功臣到祸首的巨大反差，是由于他的无上权威在起作用。这对一贯喜欢以理服人的毛泽东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尴尬。

“为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就要仍然把他们当作同志看待，当作兄弟一样看待，给以热情的帮助，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的时间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是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我认为这些话是极为重要的。”

值得书写一笔的是：《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是这次庐山会议最重要的“成果”。这个决议当时没有发表，甚至在会议公报中也不曾提到有此一个决议。整整过了8年，即1967年8月16日，这个决议才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这个《决议》一开始就定了性：“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在庐山发动了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

进攻，而来自党内的特别是党中央内部的进攻，显然比来自党外的进攻更危险。”因此，“坚决粉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不但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于保卫党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完全必要的。”

《决议》认为，彭德怀的信和发言“是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纲领”，特别指出他是“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使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受到某种程度的威胁。《决议》用概括的语言叙述了彭德怀“进攻”的内容。如“反对群众大办钢铁运动、反对人民公社运动”等等，但是有两处引用了彭德怀的原话，那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早就要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苏联军队来”。看来这是最触犯忌讳的两点了。

《决议》宣称：“八届八中全会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包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所承认和他们的同谋者、追随者所揭发的事实，证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而且，“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

为了揭露，《决议》清算了彭德怀的历史老帐：“立三路线时期，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高饶反党联盟事件时期，他都曾经站在错误路线方面而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他们本质上是在民主革命中参加我们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代表。”

他们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地发难，猖狂进攻呢？《决议》分析后认为：“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胜利，虽然注

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最后灭亡，在这样的条件下，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高岗集团残余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迫不及待地兴风作浪，出来反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

多么巧妙的结论！不是由于决策上的失误导致的严重后果引起彭德怀等人的意见，而是总路线等等的胜利使面临灭亡威胁的剥削者蠢动的。

最后《决议》宣布了对这几个人的处理：“把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调离国防部、外交部、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仍然可以保留，以观后效。”

庐山会议结束了。

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摸索中，将又一次走上弯路。

8月20日，毛泽东到达南京。

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来到玄武湖边的“五号别墅”拜望毛泽东。

……

“庐山会议的精神，你们省委准备怎么贯彻呀？”毛泽东微笑着说，“彭的信可以发到县团级的干部手中。”

江渭清稍微沉吟了一下，说：

“主席，我想如果先把彭德怀的信发到县团级，再批判，这次会议的决议就无法贯彻。彭的信会先把我们干部的感想搞乱了，所以我们打算先正面传达，后发彭的信。”

“好嘛，你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吧。”

“我们省委考虑不‘钓鱼’。”

“嗯？”

“就是不要到处抓‘小彭德怀’。我们省委考虑了一下，是不是应该掌握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的原则？”

“这样比较科学，实事求是嘛！”

……

站在20世纪90年代这个高度上，俯瞰30余年前的那场庐山会议，无论从原因及后果上，都会有一个较清醒、全面、客观的认识。

从原因上讲。

第一，毛泽东对“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根本错误缺乏深刻的认识。虽然，毛泽东对错误有所觉察，并且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就为纠正这些错误作出了努力。但是，他对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的错误始终缺乏深刻的认识。他一直到逝世都认为大跃进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好方法，人民公社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优形式。错误与成绩相比，也只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而且，这些缺点和错误已在实际工作中基本得到了纠正。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当然不会接受彭德怀、张闻天等人提出的应从指导思想纠正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错误的意见。对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缺乏深层次的认识，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错误发动反“右”斗争的最根本原因。

第二，人们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毛泽东的个人专断。由于长期不断的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建国以后，特别是1957

年以后，毛泽东逐渐骄傲、自满起来。与此同时，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他的个人崇拜也有了迅速的滋长。党的八大虽然明确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这一问题，但没有在制度上做出应有的规定。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错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的混乱，又使毛泽东等领导人得出了要有一定程度个人崇拜的结论。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反冒进的错误批判，可以说是他滥用人们敬给他的个人崇拜和实行个人专断的开始。1957年的八届三中全会和1958年的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以及八大二次会议，又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于是，毛泽东与全党以及党的其他领导人之间便逐渐形成了领导和服从、指示和执行的不正常的关系。在一言堂的情况下，也只有他才可以提出纠正他所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缺点和错误，并确定纠正到何种程度。彭德怀等人的纠左建议之所以遭到了毛泽东的批判，就在于他们的建议超越了毛泽东所能容许的范围。

第三，无端地猜疑彭德怀“里通外国”。1958年大跃进，在国外遭到了许多人的怀疑和反对。其中，有善意的批评，也有恶意的攻击和嘲讽。这些都被毛泽东看作是帝、修、反向中国的联合进攻。1959年4月到6月彭德怀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过苏东八个国家，曾与赫鲁晓夫有过接触，因而他在庐山会议上发表不同意见，便被猜测、怀疑为有国际背景是配合赫鲁晓夫反华的特务。关于这个问题，刘少奇在1962年的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曾经这样说过：“仅仅从彭德怀同志那封信的表面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个又一个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党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问

题不在这里。”刘少奇认为，彭德怀的问题，一是参加了高、饶反党活动；二是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我们读者可以从这里明显看出，无端地猜测，怀疑彭德怀“里通外国”也是庐山会议转向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康生、林彪等人在会上会下挑拨离间、搬弄是非和一些人出于历史上的个人恩怨对彭德怀落井下石，也与庐山会议的转向有关系。他们的所做所为，助长和增强了毛泽东的怀疑、猜测，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毛泽东作出了批判彭德怀等人的错误决策。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后期错误发动的对彭、黄、张、周等人的批判，是党在前进道路上的一次重大曲折。它在政治、经济、理论等各方面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第一，政治上，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民主生活和民主作风。从延安整风到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党的民主生活一直是比较正常的。1957年以后，毛泽东虽然开始凌驾于党的集体领导之上，实行党内一言堂，但还不至于使人完全不敢发表不同意见。而毛泽东在庐山会议的后期错误发动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则是建国后党在历史上开了对提不同意见者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先例。在庐山会议上，实事求是，正义直言者，遭到了打击；阿谀奉承者，受到了赏识。这样，在党内逐渐形成了真话不说，谎言盛行的极不正常局面。个人专断和家长制作风也逐渐取代了集体领导和民主生活。

第二，在经济上，中断了纠正大跃进错误的历史进程。本来，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党就一直做着纠正大跃进以来左倾错误的努力。过高的生产建设指标已经被几次压低，国民经

济比例的严重失调也已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但是，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人对经济形势作出的正确分析和为纠正大跃进错误提出的很好建议，却被定论为向党的猖狂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因而遭到了批判。这样，庐山会议不仅中断了纠正大跃进错误的历史进程，而且，还发展了过去的“左”倾错误，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混乱。为了继续进行大跃进，提前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1959年下半年猛攻钢铁，结果钢产量终于达到了1387万吨，积累率高达43.6%，比1958年还高4.5%，农业、轻工业、手工业生产大受损失，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严重失调，直接导致了长达三年国民经济严重困难。

第三，在理论上，为在党内进行阶级斗争提供了依据。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是建国以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和实践的开端，它严重混淆了不同性质的两类矛盾，把阶级斗争扩大到了人民内部。而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不仅把彭德怀等人错误地当成“资产阶级的代表”进行了残酷打击，而且，还把这种斗争看成“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从而把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到党内。“文化大革命”这一次所谓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政治大革命”就是在党内进行阶级斗争的一次最为典型的实践。而文革中大批革命老干部成为斗争的对象，也与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提出的“党的同路人”，“同盟者”的论断有关。

## 扩散的庐山冲击波

在庐山这个祭坛上，彭、黄、张、周及其同道者被摆在了供品的位置上，然而，一切才刚刚开始。

庐山会议后期，特别是庐山会议以后，在错误地批判彭德怀等人的同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发动了一场全国规模的反“右倾”运动，这一运动历时半年；错误地打击了大批干部和群众，恢复和发展了在庐山会议前得到初步纠正的“大跃进”错误。

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反“右倾”运动的部署和发动，在八届八中全会尚在进行之时即已开始。8月7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指出：“现在右倾思想，已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危险。”它“动摇军心，瓦解士气，妨碍人民公社的巩固和顺利发展，妨碍建设事业的跃进，妨碍总路线的贯彻执行。”中央要求“立即在干部中，在各级党的组织中，对右倾思想和右倾情绪，加以检查和克服”。

在执行上述指示方面，行动最快的要算中共辽宁省委和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8月初，在庐山上开中央全会的辽宁省委和二机部党组的负责人，就向辽宁省委和二机部传达了7月下旬毛泽东对鞍山市委报告的批示以及对李云仲信的评论，布置检查本地区、本部门工作中是否有“右倾问题”。8月8日，在接到中央指示后，辽宁省委和二机部党组马上就召开会议，制定了“反右倾”的方法和措施。辽宁省委决定采取以下三项措施：（一）立即向各级党委发出通知，要求组织学习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以及《人民日报》的有关社论，严格检查和克服党组

织中存在的消极思想和“右倾”情绪；（二）召开重点企业领导人以及市委书记参加的紧急会议，传达和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三）召开全省各条战线职工参加的广播大会，广泛动员群众参加到“反右倾”运动的行列中来。由于采取了以上措施，在中央指示发出后不到一周的时间内，辽宁省就轰轰烈烈地掀起了反“右倾”运动的高潮。

一手缔造了这一“胜利”的毛泽东，对辽宁省委的反右倾工作非常满意。8月12日，毛泽东在辽宁省委关于执行中央反“右倾”的报告上用潇洒的毛体字作了批示，认为辽宁做得很快，步骤也好，成绩显著，取得了斗争主动权，迫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处于被动。毛泽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学习辽宁的经验，迅速部署反“右倾”工作，坚决把“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和“右倾活动”打下去。8月14日，中央转发了辽宁省委的报告以及毛泽东在报告上的批示。

随着庐山会议精神的传达和贯彻，全国各地区、各部门普遍开始了对反“右倾”运动的发动。8月18日至9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和外事工作会议，专门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等人所谓“组织军事俱乐部”和“里通外国”的问题，并提出消除他们在军队里和外事系统的“流毒”和影响。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以及各大军区、各军兵种也先后召开了扩大会议或干部会议，传达了庐山会议的精神，部署和安排了各部门的反“右倾”工作。

195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在工厂、矿山、企业、公社中深入讨论提前和超额完成今年生产计划问题和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通知》，要求“各个人民公社、工厂、矿山、

交通、贸易等企业、国家机关都应举行群众大会，反‘右倾’，鼓干劲，讨论如何提前和超额完成本单位生产计划的问题”。9月8日，中央决定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两个文件向全党传达，一周以后，中央又提出将上述两个文件向党外传达。

与此同时，党中央还加强了反“右倾”的舆论宣传。《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陆续发表了《克服右倾情绪，厉行增产节约》、《克服右倾思想，掀起增产节约群众运动新高潮》、《反右倾，鼓干劲，为在今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斗争》、《人民公社万岁》、《‘得不偿失’论可以休矣》以及《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等等大量社论文章，宣传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伟大成绩”。批判了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各种“错误”言论。这样，在庐山会议结束后的不长时间里，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运动，就在全国内发动起来了。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和党中央为什么要把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扩大为全国性的反“右倾”运动？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对当时的形势作出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于1958年以来的大跃进运动，毛泽东一直是充分肯定的。在庐山会议上，虽然他也能承认大跃进是“问题不少”，但是，在他看来，这仅仅是一个指头，顶多在局部是两三个指头的问题。而且现在也已基本上得到了纠正，今后的任务应该是继续跃进。基于这样一种错误估计，毛泽东不仅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李云仲以及江西省委中级党校的一部分学员提出的正确的意见和看法认为是“右”的东西，反映了一种“右倾思想”和

“右倾情绪”。而且认为这种情绪在全国普遍地存在着、增长着。因此，毛泽东错误地认定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所以必须像1957年发动反右派斗争那样，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反“右倾”运动加以反击。

第二，对来自党内的不同意见作了完全错误的定性。1959年的上半年，随着“大跃进”恶果的逐渐出现，国内外、党内外对大跃进问题的议论也日益增多起来。本来，党员对党内的重大问题提出个人意见，发表自己的看法，是完全符合组织手续的。即使意见错误，也应允许人家提出，再对其进行教育帮助。但是，毛泽东等不仅不接受这些意见和看法，反而把党内存在的不同意见，看成是对党的猖狂进攻，对“三面红旗”的极力否定，对国际上帝、修、反进攻的密切配合。而且把提出不同意见的党员干部看成是抱着“八股”思想入党的党的“同路人”、“同盟者”、“资产阶级民主派”，甚至于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分子。他们提出意见的目的，就是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取消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破坏无产阶级专政。这种毫无根据的错误定性，自然会导致一场政治运动的错误发动。

第三，对“马鞍形”出现的原因作了颠倒是非的分析。1959年度的工业生产、特别是重工业生产，有一个上升、下降、再上升的过程。1月至5月份，稳步上升；6、7两月有所下降；8月以后，再度上升。6、7月份的生产，特别是钢铁和煤炭的生产，之所以下降，最主要因素是八届七中全会后毛泽东和党中央根据陈云同志的意见压低了钢铁等生产的指标。这种下降，是十分正确的，是为调整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所必须的。遗憾的是，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却把这种上升、下降、再上

升的情况，称之为新的“马鞍形”，并把这种情形的出现，不正确不公正地归咎于所谓“右倾思想、右倾活动、特别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作怪”，认为如果不反掉“右倾思想”、“右倾情绪”，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无法继续实现工农业生产的跃进，这种错误的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反“右倾”运动的发动。

反“右倾”运动在其初期，主要在党政军的中高级机关中进行，重点是解决中高级干部的问题。对于基层单位里的一般干部和群众，则着重进行正面教育。8、9两月份，全国各地普遍召开了党的中高级干部会议，认真学习和讨论了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文件和毛泽东的有关指示，自我和互相检查了对“彭德怀右倾反党集团”的认识以及对“三面红旗”的态度，查出了一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且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思想批判和组织处理。

1959年10月，中共中央陆续推广、介绍湖南、广东、上海、北京、二机部以及解放军总政治部等地区 and 部门开展反“右倾”运动的经验。认为“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仅在党的中高级干部中有，机关、农村、工厂、学校和部队等单位的一般党员干部里也有。要求全国所有部门和单位都必须深入地开展反“右倾”运动，检查和清除“右倾思想”和“右倾活动”，批判和处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就这样，从10月份开始，机关、农村、工厂、学校和部队等单位，全都掀起了反“右倾”运动的浪潮。

机关里的反右倾运动，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党的领导干部，运动的主要方式是自我检查和群众性揭发批判。根据中央宣传推

广的第二机械工业部的做法，机关里的反“右倾”运动，一般都采取了以下三个步骤：（一）学习文件，明确认识，提高参加反“右倾”运动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二）向党交心、自我检查，在此基础上确定重点批判对象，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斗争。（三）组织专题辩论，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觉悟。根据中央反“右倾”的要求，主要辩论“大跃进”是否正确，人民公社是否有优越性，大炼钢铁是否得不偿失，国民经济是否比例严重失调，市场供应是否全面紧张以及如何理解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关系，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等等问题。

农村的反“右倾”运动方式，主要是整党整社，斗争的重点对象是富裕中农，对农村反“右”倾运动搞得较早的是湖南省委，他们把富裕中农对“共产风”等“左倾”错误的正确批评，看作是富裕中农向社会主义制度的猖狂进攻，代表了农村的资本主义势力。要求立即开展一个比1957年的农村整风更为深刻、更为广泛的社会主义再教育运动，放手发动群众，开展鸣放辩论，批倒斗臭富裕中农。广东省从9月下旬到11月的月上旬，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先是召开县的三级干部大会，批判基层干部们的“右倾思想”，接着发动社员群众鸣放、暴露群众的糊涂认识和上中农们的“反动言论”，每个大队都要选定几位错误严重、影响较大的上中农代表人物为重点批判对象，对他们的所谓“资本主义思想和行为”进行彻底的批判。

在工厂里，反“右倾”运动的斗争对象，主要是领导干部，对广大的职工群众，则主要是进行正面教育。当时，许多工厂的干部鉴于大跃进中片面强调政治挂帅、不切合实际地大搞群众运动、造成经济损失的经验教训，主张把由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改为真正的厂长负责制，依靠工程技术人员来管理生

产。遗憾的是，这些今天看来是正确的主张当时却被当成了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政治挂帅的“右倾言论”。提出和支持这些主张的工厂领导干部也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而受到思想批判和组织处理。

在学校，反“右倾”运动的矛头主要是指向所谓“浸透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党员专家”。一向平静的学校也风起潮涌。斗争党员专家们的理由是他们有党员的称号，受到党内外的信任。“比那些党外的资产阶级专家更能迷惑人，危害性也更大。”中国第一学府北京大学参加运动的128个党员骨干教师，有27人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一时间，许多年老资深的教授、讲师们不得不低头认错；清华大学参加运动的174名党员骨干教师，有17人被公认为“有严重资产阶级思想，以专家自居，不服从甚至反对党的领导”。许多平时深受学生们爱戴的老师不得不放下书本，走下讲台，加入被批判的行列。

在部队里，同样也深入开展了反“右倾”运动。各大军区和各省军区在召开团以上四级干部会议查出一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之后，又普遍召开排以上干部会议，学习中央关于反“右倾”运动的文件，在军队中到处抓“小彭德怀”。一旦谁被确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一定会被批倒批臭。

彭德怀，那位为民请命的彭大将军呢？他是否对这一切感到痛苦呢？答案是肯定的，不过彭老总此刻也正在深刻地自我“检查”，接受军委、国防部的批判。

在反“右倾”运动的初期和中期，中共中央虽然多次强调要坚决清查和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但没有也不能制定出一个判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具体量化标准。因而，在运动中，各地区各部门自行其是，普遍发生了打击面过宽的倾向。

硬性的名额分配搞得人人自危。后来，中央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分别下发了《关于整社运动中掌握重点批判对象的问题的意见》、《关于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和处理方法》以及《关于在反右整风运动和农村整党运动中对于犯错误的党员干部的处分的通知》等文件，文件规定：凡是党员干部，“公开散布系统性的右倾言论，从多方面来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积极支持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纲领，公开为反党集团辩护，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历史上多次犯错误、屡教不改，对党心怀不满，这次又借批评大跃进中的缺点为名，猖狂向党进行攻击的”，“执行党的路线、政策一贯严重右倾，1958年大跃进以来又有严重的右倾言论和行动；而且在学习了八届八中全会文件以后仍然执迷不悟，不主动深刻检讨的，情节又比较严重的”，才可以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人，应该限制在由国家供给的、脱离生产的党员干部的范围之内，不脱离生产的党员干部一律不戴帽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数、农村重点批判的人数，应该限制在党员干部总人数和农村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以下。这些规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反“右倾”运动的打击面，但百分之一的比例仍然太高，使得大批干部和群众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严重伤害了干部和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全国各地区、各部门的反“右倾”运动，从1959年8月份开始，经历了半年左右的时间，这一运动持续时间虽然不很长，但是却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留下的创伤是难以愈合的。

第一、错误打击了大批干部和群众。据第二机械工业部后来统计，仅到1959年10月12日，二机部在北京的单位就已确定了重点批判对象472人，占干部总人数的7.6%；处级干部42

人，占处级干部总数26%；科级以下干部425人，占科以下干部总数的6.8%。浙江省确定的重点批判对象，在省级机关处长以上干部中占的比例是4.6%，在县委委员中的比例是4.5%，在公社党委书记中的比例是5.2%。四川省在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时，就揭发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和“坏分子”61人，占到会总人数的3.87%。福建、青海两省，竟然还分别挖出了以省长江一真、省委书记张国声为首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受到错误打击的群众人数比干部更多，仅在广东省的汕头地区，就有3867个上中农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的干部们，绝大多数受到了撤销职务、留党察看和开除党籍等各种党纪、政纪处分。被定为重点批判对象的群众也受到了围攻批判和其他形式的打击。

第二、导致了“大跃进”错误的继续发展。在反“右倾”运动中，喊得最响的口号是“反右倾，鼓干劲，继续国民经济的大跃进”。在这一口号的笼罩下，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被认为是协调、正常的；得不偿失的全民大炼钢铁，被认为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市场供应的全面紧张，被认为是供给状况良好；供给制等平均主义的做法，被当成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体现。总之，当时否认了尖锐存在的问题，肯定了应该纠正的错误。

不仅如此，反“右倾”运动还批判了1959年上半年的部分纠“左”的努力，否认了纠“左”过程中所采取的一些正确措施。在工业方面，加强企业管理、健全规章制度、消除混乱的状态，被认为是反对政治挂帅、打击群众运动；在农业方面，部分地区实行生产小队基本所有制、包产到户到取消供给制、公

共食堂等行动，被看成是右的歪风邪气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就连因为调整指标而造成的6、7月份工业生产正常下降，也被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作怪”导致的结果。

由于以上不切实际地估计形势，否认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肯定了大跃进的错误做法，批判纠左的正确措施，再加上严酷的政治斗争所造成的压力使人宁左勿右，唯左是从，1959年下半年的全国规模的反“右倾”运动，导致了大跃进错误的继续和发展，直接造成了1960年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

## 大跃进：1960

庐山会议后，在广泛发动起来的反“右倾”运动中，为了反击国内外舆论对大跃进运动的微词，表明反“右倾”对革命干劲的鼓舞和经济建设的保证和促进，各地区、各部门又对生产建设的各项指标不断地加码。

在基本建设方面，1959年9月2日，国家计委和国家建委决定新上200个限额以上基本建设项目。8月22日，又确定追加13.6亿元基建投资。这样，再加上1958年结转投资20亿元，国家基本建设达到了281亿元，超过了8月底压低前的270亿元。基建项目的数量也基本恢复到了1959年4月的水平。这无疑给本就捉襟见肘的中国财政雪上加霜。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层层加码，到年底，全国基本建设的实际总投资竟达到了349.7亿元，比基建规模急剧膨胀的1959年还多出80.9亿元，增长了30%以上。

农业方面，10月15日，中共中央提出，要“力争在原定的

农副业总产值比 1958 年增加 10% 左右的计划之外，现增长 33.5% 亿元的产值，使 1959 年的农业副业总产值比 1958 年增加 15%，使农业在特大旱涝虫害的侵袭之下，仍能实现大的跃进”。为了完成农业方面的高指标，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超产运动。如江苏省实行的“三超五比”（实产超包产、项项超指标，人人超定额；比田间管理、比秋收、比秋种、比征购、比分配），河北省则实行了“五赶竞赛”（山地赶平原，涝地赶好地，弱苗赶壮苗，晚田赶早田，三类苗赶主粮，总产赶去年，产量加番，措施加番）；山西省实行了“五补”（旱地丢了水地补，早秋丢了晚秋补，粮食丢了蔬菜补，伏桃丢了秋桃补，农业丢了副业补），四川省不甘示弱，实行“五种”（增种、补种、改种、套种、间种），各省都有一套决心书式的汇报材料。但是，实际上，1959 年的农业生产不但没能超产，没能跃进，反而大幅度地减产，没有完成 8 月份所确定的计划指标，比 1958 年大大地退了一步。1959 年粮食的实际产量共有 3400 亿斤，仅完成计划的 62%，比上年减少 600 亿斤，下降了 15%；棉花的实际产量只有 3418 万担，仅仅完成计划的 74%，比上年减少 520 万担，下降了 13.2%；农业总产值下降 13.6%，这样大的下降幅度，在建国后的农业生产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工交生产方面，10 月份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业生产会议又制定了 1959 年第四季度工业生产的大跃进计划，计划中要求：第四季度的工业总产值要完成 486 亿元，保证全年完成 1600 亿元，比上年增长 37%；钢产量完成 470 万吨，保证全年产量超过原计划产量 50 万吨；生铁要完成 730 万吨，保证全年产量超过原计划产量的 1500 万吨，经过第四季度的拼命干，基本上完成计划指标。但是，重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大

幅度上升，农业和轻工业所占比重则急剧地下降，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又进一步失调。

对于1959年下半年的大跃进错误所加剧的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状况，本来，党中央应该及时作正确调整的。但是，1960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却不切实际地估计了形势，全面地肯定了大跃进运动，并且错误地认为，在1958年，1959年两年大跃进的基础上，1960年应该继续跃进。毛泽东在会上甚至提出，在人类的历史上，资产阶级统治的300年可以说是一个大跃进，资产阶级能够实现大跃进，无产阶级的国家为什么不能实现大跃进？会议确定的196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是：钢1840万吨，煤4.25亿吨，粮食6000亿斤，棉花5500万担，基本建设投资345.14亿元，工农业总产值要达到3060亿元，这个指标，在当时的中国是很难实现的。

更为严重的是，上述那些严重脱离实际的指标，特别是钢、铁等重工业指标，还不是1960年的最终目标，还只是所谓的“第一本帐”，还有更高的第二本帐”，甚至“第三本帐”。中共中央决定把第二本帐作为党内必须确保完成和超额完成的第一本帐。中央强调指出，要集中力量大力抓好煤、铁、矿、运，以此为中心，大力保钢，争取到1960年钢产量达到2100到2200万吨。这就样，在196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正式确定之后不久，中共中央又较大幅度地提高了钢等一些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指标，增加了基本建设和投资项目，进一步扩大了资金和物质等方面的缺口。

为了实现以迅速提高钢等重工业产品的产量为中心的1960年经济建设的继续跃进，当时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全力保钢。从1958年以来，党中央就一直错误地把“以钢为纲”当成发展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方针，一直把钢的产量当作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1960年的继续跃进，也是以完成钢产量的高指标为中心的。在跃进中，党中央始终如一地强调着完成钢产量指标的重要意义，即使在国民经济困难重重、无法跃进之时，也采取了削减其他而全力保钢的措施。

早在1960年4月确定钢产量第二本帐2040万吨指标的同时，中共中央就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工业书记会议，要求各地大抓煤、铁、矿、运，全力发展钢的生产，力争上半年达到950～1000万吨的产量，以确保全年2040万吨任务的完成。为了扭转第二季度工业生产下降，钢等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任务完成得不好的情况，中共中央还专门发出了《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着重强调了完成原定钢产量指标的重大意义，部署了发动群众、压缩基建、充实人员、加强管理等等一系列集中力量、全力保钢的措施。

但是，尽管作了种种努力，钢铁的生产形势仍然不好，原定指标仍然难以完成，据国家经委在9月初的统计：1960年1～8月份，全国只生产出了1137万吨钢，为了完成2040万吨的任务，在今后的4个月内必须产钢900多万吨才行。按当时生产水平，4个月内只能生产600多万吨，而且钢的重要生产基地东北又遭水灾。为此，9月18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家经济委员会党组关于以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的紧急措施的报告》，鉴于形势不得不把2040万吨的钢产量指标减为1900～1950万吨，发出了“工业交通战线上的全体同志们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为在今年完成1900万吨钢而奋斗”的号召，并且规定

了一切生产钢、铁、煤炭的企业和交通运输等部门为尽全力保钢所必须采取的紧急措施。12月3日，鉴于钢的日产量不断下降的情况，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把对全年钢产量要求降到第一本帐的水平，强调能不能完成当年的生产任务，是国内外注目的大事情，不仅有经济意义，而且更有其政治上的意义。各地区各部门必须抓紧时机，克服困难，集中力量抓好煤、铁、钢、运，把钢的产量突击上去。

由于采取了压缩其他，全力保钢的一系列措施，在1960年结束时，钢的产量虽然勉强达到了1866万吨，但是，农业和轻工业的生产却受到了极大的影响。1960年，重工业产值比上年增长25.9%，主要产品产量增长24~40%，而轻工业总产值则比上年减少9%，棉纱、布、食糖等主要产品的产量下降28~60%，农、轻、重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

第二，大搞“小洋群”。1960年的小洋群，是由1958年的“小土群”发展而来的。当时认为，“小洋群”在钢铁工业的发展上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一）增加钢铁产量；（二）加快钢铁工业的合理布局；（三）推动钢铁部门的技术革命；（四）促进地方工业的发展和农业机械化的进程。基于以上认识，发展“小洋群”被当成了实现1960年钢铁工业生产继续跃进的一项重要措施来抓。1960年4月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工业书记会议，甚至提出了要使小煤窑、小铁矿、小高炉、小转炉、小铁路“五小成群”的要求。据统计，1960年21个省、市、自治区的1820多万职工中从事小洋群的职工就多达666.6万人，可见其在钢铁等重工业部门中占据着很大的比例。1960年的“小洋群”，虽然在技术方面比1958年的“小土群”有所进步，但同样也造成了资金、资源和人力等的相当程度的浪费。

第三，大办交通运输。1958年的全民大炼钢铁，曾经受到了交通运输情况极度紧张的相当程度的限制。因此，为实现更大跃进，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被放到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从1959年冬开始，全国各地普遍掀起了大造铁路，特别是土铁路和轻轨铁路的高潮。但是尽管如此，交通运输方面的跃进计划也没能完成，1960年的铁路货运量仅仅比1954年增长了23%，而且，大造不能使用的土铁路，还浪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资财，极大地损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

第四，大搞技术革命。这是不同于大跃进的一个新的特色。1960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掀起一个以大搞半机械化和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指示》，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运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拿出大炼钢铁那样的决心和气魄来搞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用高速度来实现机械化或者半机械化的目标，进而向自动化、半自动化发展。

根据上述要求，全国各地区、各部门都迅速掀起了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浪潮。根据24个省、市、区从1960年1月到3月上旬的不完全统计，仅仅是工业交通部门的职工，就提出革新建议2530多万件，已经实现和正在实现的达965万件。但是，在取得一点成绩的同时，在那个时代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浮夸现象。举例来说，当时宣传沙市仅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就使全市笨重体力劳动和手工操作普遍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天津市的交通运输部门只用26天的时间，就使市内运输装卸机械化半机械化程度由原来的9%提高到了90%。在今天看来，无异于天方夜谭。



## 重病之下的中国

进入1960年，尽管人们满腔热情地希望“开门红、满堂红、月月红、红到底”，但是在自然灾害比前一年更为厉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

台风使华南地区和辽宁省遭受了空前的水灾；

干旱祸及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黄河流量减少了2/3）。

害虫又在农村广大地区肆虐；

……

全国60%以上的耕地面积遭受水灾或旱灾，农作物大幅度减产。

1960年。

农田成灾面积达到3.7亿亩，粮食减产300~400亿斤。

粮食产量由1959年的3400亿斤下降到2870亿斤，仅略高于1951年的2701亿斤，比1957年低1031亿斤。

棉花产量下降到2100万担，跌到1952年2600万担的水平以下，比1957年低1180万担。

油料产量下降到3405万担，比1957年减少4135万担。

耕畜比1957年减少1400万头。

生猪存栏数比1957年减少7253万头。

……

1960年，在农村第一线的劳动力，由1957年的1.8365亿人减少到1.4626亿人，而且留下的大多是弱劳动力。由于粮食产量减少，又加上全国人口增加1600万人，致使粮食供应紧张。

当饥荒威胁着整个国家的时候,由于经济作物遭灾减产,运输系统也陷入混乱。劳动力被调往政府指定的灾区,最后,由于食物短缺情况日益严重,工人精疲力竭,身体虚弱,以致工业生产遭到进一步的破坏。

据有关材料统计,1958年至1960年的基建投资合计996亿元,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合计还多81%。可1960年的国民收入却减少了2亿元,而且基建投资还增加了39亿元。结果,国家的财力、物力捉襟见肘,过大的基建规模也维持不下去了。

由于工业战线过长,内部比例失调,管理混乱,许多企业无法继续生存。

仅以煤炭工业为例。为了保钢、保电,只好依靠拼设备,只采不掘,结果不仅设备遭到严重破坏(1960年设备完好率只有30.8%),而且采掘比例失调,无煤可采。煤产量从4、5月开始逐月下降,许多工业企业因无煤供应而被迫停产。仅山东一地,轻纺、化工、机械工业停工或半停工的企业达75%。

由于高积累,财政收支极不平衡,财政有赤字,就多发票子,出现了通货膨胀;

由于市场供应紧张,商品短缺,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

由于许多粮食被挖空,为克服粮食严重缺乏的困难,中共中央号召采取多种办法,包括大搞瓜菜、大搞代食品和代用品,并区别不同的地区减少民用布的平均定量,压低城市的粮食标准和食油定量。

1960年,按人均的粮食消费量比1957年减了35.3%,猪肉全国人均消费量下降69.9%。

在粮食和副食品极为缺乏的情况下,全国人民响应党中央

的号召，大规模地动员起来，以玉米和小麦秆粉、橡子面、叶蛋白，以致树皮、杂草补充粮食的不足，以渡过灾荒。

由于经济状况仍极度恶化，粮食大幅度减产，许多人饥饿瘦弱，不能正常出勤，疾病流行，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剧增。据统计，1956年至1957年死亡率为11.1%，1959年上升到14.6%，到1960年达到了25.4%，1960年，全国人口净减少了1000万。

此外，在“左”倾思想指导下，为了支持“大跃进”，出现了滥伐森林、破坏草地、围湖造田、乱建水库等等，严重破坏了自然环境与生态平衡，使当时处于严重困难下的中国又受到了大自然的报复与惩罚，留下了惨痛的教训。

在“左”倾思想指导下，片面强调粮食生产，为了多打粮食，不少山区、牧区、林区，盲目毁林造田，开荒种粮，毁掉了大片森林、草地。

森林的滥砍滥伐，使土壤的有机质大大减少，造成土地贫瘠，水土大量流失，尘沙飞扬，气候失去调节，水涝旱灾频繁。

在乱砍森林的同时，对草地的破坏也极严重。不少地方，毁草种粮，畜牧业减少。又产生土壤的沙化、碱化。从60年代起，全国每年沙化面积达2000万亩，森林草被的减少，又带来了严重的风沙，每年因风沙毁坏的农田达240万亩，有些地方因沙害只能耕种40%的耕地。

三年大跃进期间，全国农村大搞水利建设，增加了灌溉面积，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但是有些水库建造时，缺乏科学分析，造成上游拦坝蓄水，下游缺水成灾。例如，流经新疆全境的塔里木河，由于上游不合理的乱造水库，截流蓄水，使水流量减少，使中下游经常缺水断水，影响了两岸的农牧林业，使

沙漠面积不断扩大。

不合理的灌溉,使一部分土壤盐碱化。如黄河、淮河、海河流域的冀鲁豫三省,1958年至1960年三年大跃进后,盐碱地高达6170万亩。这些都为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此时的中国,在自然灾害和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下,完全像一个得了重症的病人,最需要的是好好的调养,然后,万万没想到的是,背后又受一重击……

## 又一次闪电行动

正当我国面临着严重的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出现困难的时候,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不同中国政府协商,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专家。7月25日,苏联方面没等中国方面答复,又迫不急待地通知中国政府,自7月28日至9月1日期间,将撤回其在华的全部专家。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苏联援助中国的建设项目共有304项,到1960年上半年,建成了103项,还有201项正在建设之中。苏联政府不顾世界的舆论,背信弃义,在短短的一个月内撤回了全部在华帮助工作的专家1390人,终止派专家900名,撕毁了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

这些苏联专家分布在我国经济、国防、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等部门的250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在技术设计、工程施工、设备安装、产品试制和科学研究等方面担负着重要任务。这

些苏联专家聘期未满，合同没有到期，苏联方面不顾中国方面的挽留，说撤就撤，始终坚持。

苏联在专家撤走时，带走了全部的设计图纸、计划和有关资料，并且停止供应给中国建设必需的重要设备，还大量地减少了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这就使我国一些重大设计项目和科研项目被迫中断，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被迫中断，使一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入生产，使中国大批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和半停顿的状态。加重了中国由于三年“大跃进”和自然灾害而造成的经济困难，给我国的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而在对外贸易中，苏联对中国实行限制和歧视政策：不供给中国钴、镍等矿产品和一些急需的钢材品种，停止供应新技术。于是，两国的贸易额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同时，中国与东欧五国的经济贸易关系也大受影响。

苏联这一突然袭击式的行动，不能不说是苏联“老大哥”对不听话的中国“小弟弟”的一种报复行为。

赫鲁晓夫叫嚷：昏庸的中国人（一个少见的民族）侮辱了苏联恩人。

毛泽东则咆哮着说：“还不如法国的资产阶级，他们还有一点商业道德观念。”

对此，后来到1964年，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信中，曾气愤地说：“在中国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时候，他们乘人之危，采取这种严重的步骤，完全违背了共产主义道德。”

赫鲁晓夫的这一行动使苏联的在华专家和中国人一样感到意外和震惊。

苏联化学家（斯大林奖章获得者）米哈伊尔·克罗奇科曾

经两次作为苏联科学家代表团的成员来过中国，用他的话说：

“作为 1960 年突然令人吃惊地被召回国的人员之一，我可以证明，对这一行动感到愤怒的不仅仅是中国人，我在中国认识的科学家同事和其他苏联专家们毫无例外，都对于在我们的合同期满前就被召回国这件事感到十分不安。当苏联驻北京的代表告诉我们说，调我们的重要原因是我们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令人感到不满意时，其他人也一定和我一样，难于掩饰自己的惊愕。事实上，我们当中很少有人在自己的一生中曾经生活得比在中国时更舒服。我们的中国主人更是迷惑不解，他们再三追问我们为什么要离开，是否有什么办法能留住我们。”

“事实是突然发生的，这说明这一决定是无法改变的。1960 年 7 月中旬，我们收到带来这个消息的第一批电报。到 8 月下旬，在中国各地工作的数百名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已经携家眷离境。9 月初，除了外交官和几个商务官员外，留在中国的苏联公民一个也没有了。”

苏共领导人的这一做法，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是史无前例的，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是十分罕见的。这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建设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和损失，也极大地伤害了中国共产党广大党员和中国人民的心。关于这一点，正如 28 年后现苏联《真理报》总编阿法纳西耶夫在一篇文章中所认定的那样：

“苏中关系急剧恶化的原因是复杂的，是多种情况造成的。”  
“双方都有过错……但是，毫无疑问，赫鲁晓夫在其中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中国人认为他批准了从中国紧急撤走苏联专家。召回苏联专家伤了中国人民的心和感情，使中国在经济上处于严重的境地。”

然后，当苏联专家奉命全部撤离中国的前夕，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为全体专家送行。他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全体援华专家所做出的贡献，代表中国人民表示惜别之情，讲到最后，他说：“我的感情已经不允许我再讲下去了……”

60年代，不论中苏两党有多么大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事情的发展何等曲折，赫鲁晓夫一声令下撤退全部在华工作的专家，这确实是伤害了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

1960年8月份，苏联从中国撤走最后一批学生、专家、学者，中国也采取了对等行动。中国的多数专家安全回国，但在苏联各原子能研究中心的中国核专家，却因为苏方拒绝中方提出的建议——用中国军用飞机接他们回国，结果在苏联飞机送他们回国途中，飞机不知因何原因爆炸，中国的核专家无一生还。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历史在与中国开玩笑？

毋庸置疑，在中国连续两年遭受自然灾害、歉收以及组织普遍混乱之后，苏联人突然中止技术援助，是对中国经济的又一沉重打击，中国的“兄弟般的社会主义盟国”就是这样对中国1960年“困难时期”作出“贡献”的。

中苏同盟的破裂，使中国在国内遭到经济危机的同时，又面临一个日益险恶的外部环境。中国这时既处于敌对的美国军事基地（从朝鲜、日本、冲绳岛和台湾沿伸到东南亚）的弧形包围之中，又面临来自北方的苏联的新威胁，中国已处在了内外交困的紧张时期。

## 甩手丢下个乱摊子

苏联因为中国人不俯首贴耳而试图对中国人加以惩罚，苏联化学家（斯大林奖章获得者）米哈伊尔·克罗奇科生动地概述了这一行动所造成的直接经济影响：

“突然撤回专家，意味着许多新工厂建筑地面上的工作停顿下来，而在许多已经开工的工厂里，工作陷于混乱。按苏联设计建成的工厂，再也找不到备用部件，苏联援助的矿山和发电站也关闭了。因为俄国人同时取消了提供设计和设备的合同，中国放弃了设计新建项目的工作。在经常决堤泛滥的黄河上建设发电站和灌溉工程，就是不得不放弃的项目之一。”

1960年至1961年，由于缺少足够的原材料和其他物质，数以千计的小工厂和经济效益差的工厂不得不关闭，许多工厂开工率都不足。到1962年，工业生产和1958年至1959年间的水平相比，下降了大约40%，而大企业在“大跃进”期间雇用的绝大多数工人和被解雇。新的招工又被冻结，总的来说，整个工业劳动力被削减了一半。城市里充满了大量的失业者和未充分的就业者，从更加萧条的农村地区涌来的几百万农民又进一步扩大了失业者的队伍。于是，城市多余的人口和工厂被裁减下来的人员在1962年的春节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回乡运动”。

苏联政府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使中国经济的发展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害。

首先严重扰乱中国正在进行的建设工作。当时，苏联援助的项目有201项正在建设之中；而苏联专家撤离时，带走了全

部的图纸和技术资料。苏联方面还停止供应关键性的技术设备，致使大多数项目只得停工下马，为这些项目进行的国内配套生产，也因此中途废止，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

当年，在学习苏联经验和对待苏联专家工作方面，在各个部门的工作实践中，存在着两种思想倾向。

一是机械照搬，乃至全盘苏化，有时过分依赖专家。其实，毛泽东最担心的一个问题是过分依赖于苏联的技术。1956年，他就曾警告说，对于外国的东西，“必须有分析有批判的学，不能盲目的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这里说的外国无疑是指苏联。

这个思想在1958年初表达得更为清楚，毛泽东当时说：“学习应与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他接着全面抨击了模仿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他抱怨说：“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统计工作几乎是抄苏联的；教育方面也相当厉害，……甚至不考虑解放区的教育经验；卫生工作也是，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鸡蛋和鸡汤，因苏联有一篇文章说不能吃鸡蛋和鸡汤……我们对整个经济情况不了解，对苏联和中国的经济情况的不同更不了解，只好盲目服从。”因此，当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又连同技术资料一并带回时，这种过分依赖的弊病也就显而易见了。

二是有些部门把专家请来了，没有很好地使用，使得他们一时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由于没有很好地向苏联专家学习，而是凭主观去工作，严重地影响到了产品的质量，出现了大量次品和废品。

1959年9月28日，苏联专家兹高尼克在给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长汪道涵的信中指出：“看到了苏州和抚顺绝缘器材厂

的产品后，发现悬挂式绝缘器没有按固定的全苏规格的规定进行试验，也没有进行渗透试验。同时按照苏联技术标准，特别是关于孔隙度的技术标准，上述工厂生产的全部绝缘器是不合格的，不能用在高压输电线上。这些工厂的工作人员给我看的绝缘器绝没有一个不带明显的砂眼。在苏州某工厂里，人们曾试图使我相信，这并没有多大关系。

“我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似乎微不足道的问题来打扰您，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我看来，这种对技术条件不甚了解以致忽视的作法，可能导致相当严重的后果和事故，使高压线路提前报废，一些城市甚至整个地区供电中断。”

针对上述这两种情况，周总理先后有过多次数重要讲话，回忆其内容，基本精神大致有三条。一是学习苏联经济不能机械照搬，要结合中国实际消化运用。二是在专业技术问题上，要认真听取专家们的建议，不能置之不理。在原则问题上要自行决策，不能依赖专家。三是在工作上，生活上要尽量提供方便条件，对全体苏联专家都要热情相待，不能让他们坐冷板凳。周总理的这些指示精神，都在不同的年份分别体现在有关专家工作的规章和条例之中。而苏联于1960年夏天撤走专家，却在过了几年之后才发表官方解释，指责中国人一直在虐待苏联专家，可是苏联专家自己却说：“我们当中很少有人在自己的一生中曾经生活得比在中国时更舒服。”

由于苏联专家的撤离，中国政府不得不决定把正在苏联技术援助下建设的工业企业（不管工程进度如何，也不管已经提供了多少设备）一律停两年。

其次，在中国以往的出口贸易中，苏联和东欧五国占的比重达70%左右。中国出口商品的生产，包括包装、花色、品种，

都是按这些国家的要求进行的，它们突然中止合同，减少对中国产品的进口，使中国出口商品的外销陷入极为被动的局面。

第三，1960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苏联政府在此时一方面逼中国还债，另一方面又大量减少对中国轻纺工业品的订货。1961年，苏联逼迫抗美援朝时的军用物资折款为14.06亿新卢布，中国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偿还苏联欠款，不得不咬紧牙关，将国内市场紧缺的猪肉、水果及其它农副产品挤出相当部分对苏出口，使供应本已紧张的市场更加紧张，大大加重了中国的经济困难。

赫鲁晓夫召回在中国大约250个企业中工作的1390名苏联科学家和工业专家，其真正的原因是中苏关系的迅速恶化。在此之前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1958年，从长波电台与共同舰队的争端为开始，以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的针锋相对为标志，中苏的敌对公开化了，但苏联召回专家这个行动也许是促使两国关系最后破裂的最大原因。

## 风云弥漫的1958

1957年11月彭德怀率军事代表团赴莫斯科，主要目的是与苏方把1955年以来同赫鲁晓夫商谈的中苏军事合作的某些主要问题落实下来，以加速国防现代化。其中主要包括建立中国原子能工业、生产原子武器、原子武器运载工具即导弹，建立军事航空工业及舰艇建造等。

赫鲁晓夫与彭德怀谈话，基本同意了彭德怀的要求，并商定，由双方有关军事部门协商解决，原则上决定苏联在远东的

海、空军将同中国合作。

但是，赫鲁晓夫却将中国希望合作的愿望当作插足中国的机会。

1958年4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在中国建立用于潜艇舰队海上通讯联络的长波电台，苏联出费用7000万卢布，中国出3000万卢布，建成后归苏联控制。

6月，中共中央复电苏方，表示建台可以，一切费用由中国负担，可以共同使用，但所有权为中国。

此后，苏方又致函中国，提出全部费用由苏方负担，所有权归苏联。因涉及中国主权问题，中共中央坚持不让。

一事未了，一事又起。

7月，苏驻华大使尤金在答复中国希望苏联提供原子潜艇问题时，又提出了要搞中苏共同舰队的意见，同刘少奇谈了又同毛泽东谈。他说，他受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委托，由于苏联的自然条件不能发挥舰队的作用，黑海会被敌人封锁，波罗的海更不用提了，北面也不宽阔，东面的海面不能算安全，而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因而要建立一支共同舰队。

毛泽东当场拒绝了这种无理要求，他生气地说：打起仗来，苏联军队可以过来，中国的军队也可以到苏联去，我们是同盟国，可是搞共同舰队，就是要控制，要租借权。提出所有权各半，是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半个指头也不行。你们可以说我们是民族主义，又出现了第二个铁托。如果你们这样讲，我也可以讲，你们要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中国的海岸。毛泽东要尤金大使把他的话如实地向赫鲁晓夫汇报，不要粉饰。

赫鲁晓夫收到尤金的报告后，急忙于7月31日来到中国，

同毛泽东会谈。

毛泽东尖锐地对赫鲁晓夫说：我（先后）跟你们谈了三次，我得出一个结论：你们不信任中国。搞舰队要搞“合作社”，这是政治问题，这叫政治条件。这样，我提出几个方案：

“第一，你们帮助我们搞，给我们技术资料，派专家帮助我们搞。

“第二，搞共同舰队，不搞。你们要坚持第二方案，我们不干，不干没有原子潜艇，没有关系。

“第三个方案，撤回我们的请求，不搞了，你们又不同意。

“第四个方案，所有的海岸线都给你们，我们不要海岸，我们打游击。

“第五个方案……”

赫鲁晓夫碰了毛泽东的硬钉子，知道无法谈下去，便当场抵赖说：我们脑子里从来没有共同舰队的想法的影子，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不会有这个想法，这是尤金不懂军事，给传达错了，我们原来是说共同研究舰队的发展方向问题。

这是中苏关系由顶点到闹翻的开始。后来毛泽东回顾说：事实上同苏联闹翻是1958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赫鲁晓夫对这件事一直讳莫如深。

赫鲁晓夫在处理中苏经济和科技合作上，是以其自身的利益和需要为转移的。

在1956年8月，中国通过李富春向苏方提出导弹方面技术援助的要求，9月得到令人失望的答复，只限于给培养50名留学生。这意味着至少要七八年甚至更长时间以后，才能在中国进行导弹的研究工作。

1956年10月起，西方国家掀起第二次反苏反共浪潮，国际

形势紧张。赫鲁晓夫在对中国新技术援助方面出现松动的迹象。

1957年6月，赫鲁晓夫同莫洛托夫等人的斗争尖锐化，赫鲁晓夫很需要中国的支持，便主动由驻华大使向周恩来提出，设想由苏援华在北京建立原子能科学研究中心。又经过8、9月的双方谈判，10月15日签定了国防新技术协定。

而1958年苏联要在中国建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在中国搞海军基地的要求被毛泽东拒绝后，赫鲁晓夫便下决心单方面撕毁了国防新技术协定。

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直言不讳地承认问题的实质所在。他说：在关系破裂以前，“我们的核专家同他们的正忙于制造第一颗原子弹的工程设计人员进行了合作。”后来，“我们的专家建议我们给中国人一枚原子弹样品。他们把样品组装起来并装了箱，随时可以送往中国。这时，我们负责核武器的部长向我作了汇报。他知道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不可挽回的地步。”他请示：“现在已经准备好可以运走了，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等待您的指示。”“我们专门开了一次会，决定该怎么办。……我们不希望他们获得这样的印象，好像我们是他们驯服的奴隶，他们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而不管他们如何侮辱我们。最后，我们决定推迟给他送去样品的时间。”

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以当时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在日内瓦谈判关于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协议，怕西方国家知悉苏联正在新技术方面援助中国，“有可能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为“理由”，对中国施加压力，片面撕毁1957年中苏政府代表团签定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中断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有关技术资料等。赫鲁晓夫认为，中国离开苏联

的支援，造不出原子弹。

但是历史恰恰有力地嘲弄了他，仅仅相隔五年时间，中国自己试制的原子弹在1964年10月16日爆炸成功，为上一天赫鲁晓夫下台放了一个响亮的礼炮。毛泽东在经济上主张自力更生与政治上维护国家主权已融为一体。

## 中印边界冲突背后

在1951年前后，印度方面趁中国和平解放西藏之际，向历届中国政府均不承认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边境东段推进，侵占了中国9万平方公里领土，后来又在中段侵占了2000平方公里，并且还要侵占西段3.3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

1959年中国发生西藏武装叛乱事件后，达赖喇嘛逃往印度。中国边防军平叛作战进驻山南边境要地。印军于8月越过麦克马洪线的实际控制线，向北面中国西藏境内推进，和中国边防部队发生了武装冲突。

苏联为了其自身南亚战略的需要，不顾事实真相与是非，由塔斯社于9月9日发表关于中印边境事件的声明，对中印冲突表示遗憾，从而把中苏分歧公开于世。

接着，赫鲁晓夫赴美国同艾森豪威尔先是在华盛顿，后在戴维营会谈。随后带着美苏交易的需要和要中国共产党服从其战略的要求，于9月30日赶来北京，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10周年招待会，并同中国领导人会谈。

在9月30日的国庆宴会上，赫鲁晓夫即席讲话达40分钟，宣传美苏会谈的“戴维营精神”，努力表现出愿意改变对西方的

战略方针, 缓和东西关系的姿态。并用教训人的口吻, 要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这在中国方面看来, 实际是要搞苏美合作来决定和主宰世界。

10月2日, 赫鲁晓夫及苏斯洛夫、葛罗米柯、波诺马廖夫、安德罗波夫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毅会谈。赫鲁晓夫更表现出一种直接介入中印边界问题, 在中国内政外交问题上要中国服从于苏美合作战略的态度。

赫鲁晓夫替美国讲情, 带来了艾森豪威尔的口信, 要求中国释放被击落的美国间谍侦察飞行员唐奈与费克吐。毛泽东说, 将来可以放, 现在不能放。给回绝了。

赫鲁晓夫谈台湾问题, 要求中国同苏联制定共同路线, 创造一切条件, 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即要求中国党和政府放弃作为内政问题采取对台方针政策。

他举出苏联内战1920年4月到1922年11月远东共和国的例子, 说列宁那时做过让步和牺牲。他把列宁当时在苏维埃俄国处于外国干涉的紧急情况下, 为了避免同日本作战所提出的策略方法, 要中国照着办, 这实际上是要中国同意美国提出的方案, 承担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

中国领导人说, 宣布对台湾不使用武力, 是国际问题。这是美国的办法, 实际上是要我们承认两个中国, 我们不能接受。

赫鲁晓夫说, 1958年对金门打炮你们没拿下来。中国领导人说, 就是不拿下来, 目的是维持同台湾国民党的内战关系, 不让美国插手。

赫鲁晓夫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偏袒印度, 说谁先开枪我不知道, 反正是印度人被打死了。

周恩来说: 印度人先入境, 打了12个小时, 怎么能说我们

错了呢？

赫鲁晓夫说：我打过仗，不管谁先开枪，反正印度死了人。他并说：你们为之战斗的土地只是一块人口稀少、荒凉的高地，边界也是几十年前确定的。

陈毅副总理回答说：西藏印度边界是英国在1914年用所谓麦克马洪线确定的，这块土地是属于中国的，是英国人把它从我国手里夺走的。又说，我们对民族主义者的政策是既团结又斗争，而不是迁就主义的态度。陈毅并提出质问：苏联为何发表这样一个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声明？

赫鲁晓夫为印度当局的亲西藏叛乱分子立场解释，说当时印度没有直接介入。同时又说，西藏正好与印度毗邻，印度认为有一个独立的邻居是至为重要的，西藏本身不能对印度构成任何威胁，而一个属于中国的西藏就会对印度构成威胁。难道中国不理解这一点吗？这等于公然承认印度方面实际支持西藏叛乱分子搞所谓“西藏独立”有理。

在中印边界问题之争上，周恩来举例回答赫鲁晓夫说，如果苏联与芬兰发生了边界事件，苏方将采取什么对策？

赫鲁晓夫理屈词穷，无法回答。

赫鲁晓夫还发泄了旧日的怨恨。他说，去年毛泽东同志在尤金面前严厉地批评了我们党，我们认为是不公平的，我们忍受了。1956年中共八大，米高扬讲话，毛泽东中途退了场（米高扬说中国的许多创造都是列宁的意见，并批评中国对经济的领导，毛泽东听不下去，退了席），这是不恭敬。1957年初，周恩来同志到莫斯科给我们上大课，我们也忍受了，等等。

赫鲁晓夫还抱怨说：你们说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但我方提出的意见，你们并不接受。

国庆十周年上这次双方都很不愉快的会谈，不但未能解决任何分歧，反而加深了矛盾。

关于这次会谈，1963年毛泽东回顾说，1959年赫鲁晓夫在印度问题上对我们施加压力，他们单独发表了一个声明，名义是中立，实际上是偏袒印度，谴责中国。他从戴维营回来就来教训我们；那一次也是谈得不欢而散。

## 日益加深的毛、赫分歧

赫鲁晓夫在实际处理同美国关系的战略方针上，以1959年与艾森豪威尔总统“戴维营会谈”为标志，是发生了明显变化的。

在此以前，由于战后两大阵营“冷战”相持的原因，在1957年莫斯科宣言上写着：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人民群众的最凶恶的敌人；帝国主义如果发动世界战争就注定灭亡；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等。

在实际行动上，苏联支持中国和各民族独立与进行民族解放运动的国家同美帝国主义斗争。以此削弱和打击美国的力量，使之不能强有力地同苏联抗衡。因而苏联具有为首地同美帝国主义斗争并以斗争来争取世界和平的形象。

在当时的东方，苏联建议中国加强在福建地区的空军，以对台湾海峡的美蒋海军起到威慑作用，表示愿派苏联歼击机队驻扎福建地区，帮助中国应付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苏还公开发表声明，说谁进攻中国就是进攻苏联，就是进攻整个社会主义阵营。

但当时在台湾海峡斗争上，毛泽东和中国政府根据中国同美国大使级会谈的状况和台湾海峡形势，有自己的判断和方针。

1955年3月开始的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国方面要求美国从台湾地区撤出全部美军，中美建交，可以发展双边贸易文化关系。美国则要求中国在台湾地区放弃使用武力。双方立场截然对立，会谈于1957年12月陷入僵局。美方想降低会谈代表资格，中国拒绝，此后会谈中断。

1958年3月，中方递交信件，指出美方提出较低级谈判是想破坏会谈，美方不予回复。6月30日，中国发表了带最后通牒式的声明，提出：“中国政府要求美国政府从今天起的15日以内派出大使级代表，恢复会谈。否则，中国政府就不能不认为美国政府已经决心破裂中美大使级会谈。”7月1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表示要恢复大使级会谈，谈判地点改在华沙。

中国政府决定以外谈判以外的手段，在福建沿海展开针对美蒋的军事行动，封锁了金门岛和马祖岛，宣布将解放这些岛屿。美国认为这是要解放台湾的前奏。8月23日，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进一步炮击和轰炸了金门、马祖岛屿。9月4日，中国政府宣布金、马周围设立12海里禁区。而美国则增派一艘航空母舰护送美蒋运输补给品船只，直接进到3海里领海线，侵犯中国规定的禁区。

9月下旬，斗争达到顶点。

10月6日和25日，毛泽东撰写并发表了两篇国防部长文告，10月6日的文告说：“从10月6日起，暂以7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指出中美争端在于美国侵占台湾海峡，应在华沙会谈中解决；中国问题则应在我方与台湾

蒋介石之间谈判解决。10月25日公告又提出：逢单日打，逢双日不打，使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屿的军民同胞得到充分的供应，以利你们长期固守，但仍以不引进美国人护航为条件。此后，福建前线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持续多年，这打破了美国要把台湾问题变成国际问题的企图。

毛泽东和中国政府的这一特殊斗争方针，不合赫鲁晓夫之意，并且长时间不理解。

1974年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还说：“我们以为他们打算采取决定性行动来消灭蒋介石，因此他们提出要的那些东西，我们都给了他们，”“然而，当我们提出在他们的领土上驻扎我们的歼击机队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却是极端奇怪的。他们明确表示我们的建议冒犯了他们。”“中国对蒋介石发动的军事行动采取了炮击两个沿海小岛这样一种形式。”“可是，正当中国人能够跨越海峡去占领那些岛屿的时候，他们突然停止了攻势。结果整个仗等于白打了。”

当后来毛泽东向他解释说“我们只是想显示一下我们的潜力。我们不希望蒋介石离我们太远了。我们想让他呆在我们够得着的地方”时，赫鲁晓夫认为：“这真是个奇怪的逻辑。”

尽管赫鲁晓夫的方针与毛泽东的方针不同，但他声明支持中国在台湾海峡同美国和蒋介石进行斗争，是真实的。

但是，到1959年10月中苏两党领导人会谈时，赫鲁晓夫却帮助美国说话，并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压中国，在台湾问题上要中国承担不以武力解放的义务，以适应苏美搞缓和交易的需要。这不但同中国的利益相矛盾，也同在此以前赫鲁晓夫在台湾海峡上的态度有变化。这一重要变化的分界点即是美苏戴维营会谈。西方外交界认为，正是从戴维营会谈起，苏联同中国

分道扬镳了。

1959年10月中苏领导人不愉快的会谈后，赫鲁晓夫在海参崴说中国像“公鸡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回到莫斯科后，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说中国在台湾海峡问题上“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他还说美国总统“也像我们一样在为保障和平而操心”，戴维营会谈“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没有战争的时代开始了”，1960年要成为“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的一年。说“世界已经进入了谈判解决主要的国际争端以建立持久和平的阶段”，要求他国服从于苏联同美国搞裁军和禁止核武器试验协议的谈判。

在1960年2月初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的宣言，说裁军是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苏联在联合国14届大会上提出的全面彻底裁军的建议，“反映了华沙缔约国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中国代表康生在会上发了言，2月6日，中国发表了康生的发言。这个发言声明：由于美国在国际关系中一直对我国采取排斥的态度，因此，“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参加和它的代表的签字，有关裁军的军事协议和其他一切国际协议，当然都不能对中国具有任何约束力。”对这一声明的发表，赫鲁晓夫恼火，西方震惊。

所有这些问题的发生，在中国领导的心目中，赫鲁晓夫是违背1957年莫斯科宣言，散布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松懈世界人民革命斗争，想以两个大国决定世界命运，背离马列主义原理与原则的行为。于是，便有1960年4月纪念列宁诞辰时3篇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文章的发表。

1960年4月《红旗》杂志第8期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的文章；4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

进》的文章；同日，陆定一在纪念列宁诞辰大会上作了《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报告。3篇文章合出了一本题为《列宁主义万岁》的小册子。

这些文章，引证列宁的论断和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论点为根据，以帝国主义本性是否改变、马列主义学说是否过时、现在究竟是什么时代、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等问题为内容，批判所谓“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同时也批评“并不是修正主义者”，但“面对着某些历史的新现象，感到迷惑”的“好心善意的人”，说：“在我们彻底驳斥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谬论的同时，也应该帮助这些好心的人改正自己的不正确的想法。”

当时苏联也对中国进行了批评，甚至早在1958年底赫鲁晓夫同美国参议员汉弗莱的谈话中，在1959年初的苏共二十一大上，对中国的批评便已开始。

中苏双方互相批评对方违背1957年莫斯科宣言，各自引证宣言的论点批评对方。但比较而言，中共对苏共领导人的批评，更较为切合列宁的一些论断和宣言的论点。

问题是，宣言是多年共产主义运动经验与理论和“冷战”时代的产物，不能不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同时它又是诸多共产党之间，又首先是中苏两党，在一定条件下求同存异，作某些妥协的产物。在实践当中，必然出现某些不同的理解和各自强调一定的侧重点。因而一旦争论起来，是个相当难以扯得清楚并说服对方的事情。正是在这种分歧发展的过程中，毛泽东在1960年1月至3月便得出苏联主要领导人已是“半修正主义”的看法。

发表3篇文章的基本想法是：怎样把社会主义阵营团结起来，发展马克思主义，揭露修正主义并克服半修正主义的动摇，

使社会主义阵营的分歧得到最高原则的解决。但是，纪念列宁诞辰 90 周年时的相互批评与争论，并没有解决理论上、战略指导方针上的分歧，矛盾反而更尖锐了。

## 1958~1959 中苏有约在前

虽然从 1958 年开始，苏联和中国的矛盾冲突日益加深，但苏中在经济方面的合作却并没有停止。苏联继续援助中国发展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

1958 年 1 月，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率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圆满地结束了对苏联为期 3 个多月的访问。代表团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苏联科学院、苏联部长会议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苏联高等教育部和苏联的一些主要科研机关，讨论了发展科学技术和进一步扩大苏中两国科学技术合作的大问题。苏联方面有 600 多知名学者和专家参加了讨论。

在谈判过程中，中国代表团希望苏联帮助中国解决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直至 1967 年）所拟定的极其重要的科技问题。此项援助包括：向中国派遣苏联学者和专家，中国科学工作者和工程技术人员在苏联学习和进修，提供必要的设备、仪器、器材等。

经过谈判，1958 年 1 月 18 日在莫斯科签订了苏中两国政府关于共同进行最重要的科学技术研究以及苏联在研究中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协定。

协定规定，1958 年至 1962 年共同研究对中国具有重大意

义的 122 个最重要的科技问题, 进一步加强两国科研机构的接联系。

同时还签定了苏中两国高等教育部及两国农业科学院关在科学技术方面进行合作的协定。

1958 年 4 月, 苏联和中国签订了通商和航海条约。根据约, 缔约双方保证本着友好合作、互相帮助的精神, 在平等利的基础上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发展和巩固两国的通商关系

贸易和航海条约附有《苏联驻华商务代表处和中国驻苏商务代表处的法律地位的规定》, 其中指出, 苏联和中国商代女执行下列职能:

- 一、促进两国间贸易经济关系的发展;
- 二、在驻在国代表本国有关对外贸易的一切利益;
- 三、代表本国调整同驻在国的贸易业务;
- 四、进行苏中两国间的贸易。

1958 年 6 月至 7 月间, 苏中经济合作委员会顺利地举行一次例会。会上详细讨论了进一步加强两国合作的措施, 并了相应的决议, 其中包括扩大苏中两国对口的科学研究所和计院直接联系的决议。

1958 年 8 月 8 日, 苏中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签定了关于建和扩建 47 个工业企业和电站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的协定。协定规定, 苏联有关机构将负责完成一些车间和设备的设计图纸, 以便仿照使用, 并保证从苏联提供工艺设备、仪器缆以及就地生产配套设备所必需的某些特殊材料。苏联有机构派遣必需的专家, 帮助一些企业安装、调试设备和投产。助这些企业培养本国干部。

协定还规定, 苏联方面将把产品生产专利以及这些企

织生产所必需的图纸和其他技术资料无偿地交给中国方面（中国方面只应支付为编制和转让技术资料所需的实际开支）。

苏联有关机构按协定提供的技术援助所需费用，应由中国方面根据现行的苏中贸易协定以向苏联提供商品的方式进行支付。

1959年2月7日在莫斯科签定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冶金、化学、煤炭、石油、机器制造、电器、无线电、建筑材料等工业部门的78个大型企业和电站的新协定。

协定规定，苏联有关机构将根据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完成勘测和设计工作。提供设备、仪器和某些材料，派遣大批苏联专家对一些企业的建设、设备的安装、调试和投产提供技术援助；接受大批中国专家和工人来苏联有关企业进行生产技术培训。

同以往的协定一样，该协定规定，苏联方面将无偿地向中国方面转让这些企业产品生产的专利，并无偿转让组织有关生产所必需的技术资料以及在中国为这些企业制造成套设备所必需的技术资料。

苏联设备、设计图纸和其他种类的技术援助总值约50亿卢布（旧币）。中国根据现行苏中贸易协定的规定向苏联提供货物以此支付苏联提供设备和各种技术援助的费用。

报道签订协定的消息说：“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这次签订的协定是进一步加强和扩大两个社会主义国家间有效的、互利的经济合作和兄弟般互助的新的重要环节。”

1958年底，中苏两国政府代表团就两国完成1958年相互供货计划和进一步发展贸易的问题在莫斯科进行了贸易谈判。双方商定，苏联在1958年第四季度补充提供货物；结果，两国

1958年度换货总额超过1958年4月23日议定书初步规定当年换货额达6亿卢布，其中苏联超额提供了汽车、农业机械、石油、石油产品、动力设备及其他产品；中国则超额提供了米、生丝、毛料、丝绸、成衣、针织品及其他货物。

苏中1959年度贸易谈判也顺利地结束了。为了共同的目的和任务相协调，双方商定大幅度地扩大苏中两国的贸易额。

苏联根据原有协定提供的成套设备大量增加的同时，向中国提供的电力设备，特别是涡轮发电机、柴油发电机、电液压器、锅炉机发电站及农村用小型水电站的设备也大大增加。与1958年相比，苏联还增加向中国提供大型钻探设备、运输具、轴承和许多我国国民经济所必需的其他货物。

1958年同往年一样，中国预定向苏联提供锡、钨、钼、丝、毛、茶、柑橘和其他商品。

然而，随着中苏矛盾的日益加深，到1960年7月16日苏联最后翻脸，这些经济上的合作，一切的一切都已经结束。苏联的背信弃义、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停止提供必要的设和材料，给在自然灾害威胁下的中国重重一击，是雪上加霜。

## 冲突在布加勒斯特

随着1960年2月初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上的矛盾，4月中国纪念列宁3篇文章的发表，中苏两党分歧扩大，随着生了苏共领导人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共搞突然袭击的件。

6月20日至25日，罗马尼亚工人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

会前，苏共中央于6月2日致函中共中央，建议利用罗马尼亚共产党三大的机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中共中央复函建议扩大成员，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但要求延期召开，以作充分的准备。6月7日，苏共中央复函同意，并建议在布加勒斯特一般地交换一下意见。

以彭真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在赴罗途中，6月17日在莫斯科同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进行了会谈。科兹洛夫对各国党代表会议召开的时间避而不谈，只说到布加勒斯特后再商讨。

6月19日中共代表团抵达布加勒斯特，直至22日上午，赫鲁晓夫等都不提会议之事。22日下午，东道主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乔治乌·德治口头通知，24日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会议，但不告以会议内容、开法及发表公报之事。22日晚，赫鲁晓夫对中共代表团说，会议怎么开，他不知道。

6月23日下午，苏方交给中共代表团一份6月21日的《苏共致中共通知书》，中文译本长达84页。显然是在莫斯科就准备好了的。很可能也早发给了其他党代表团。下午19时，又送来了由苏联起草的会议公报草案。

在24日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赫鲁晓夫发动了大多数党向中共的围攻，并都准备了发言稿，对照着苏共意见书，进行宣读发言。这显然是经过准备、预先策划好的一个突然袭击。

苏共中央的领导人和通知书攻击说，在时代问题上重复列宁的论述是“教条主义”；说中共“拒绝和平共处”、“希望战争”、“观火”、“制造紧张局势”，是“左倾冒险主义”；说中共进行“托洛茨基式的分裂活动”，在国际群众组织中采取“宗派

主义立场”；说中共领导人同阿尔巴尼亚党负责人列希谈反苏同盟；说康生在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是“向帝国主义送情报”，中共散发纪念列宁的3篇文章斯拉夫式的分裂活动”，等等。

中共代表团认为，这是赫鲁晓夫蒙蔽事实真象，散布中共的材料，滥用自列宁以来苏共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开威信，造成声势，强迫许多兄弟党的代表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反对中共的发言。因而对兄弟党代表采取讲明真象，是非，坚持团结，尽量避免争吵的方针。

对待赫鲁晓夫，代表团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团结原则，留有余地，后发制人”的指示，仍采取“团结一评——团结”的方针，用劝说的态度，摆事实，讲道理，余地，必要时据理反驳。

有3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阿、朝、越）不参加对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代表卡博说：“如果情况确实共代表团所说的那样的话，那么中国同志的立场就是对的。鲁晓夫随之对阿代表团施加压力。与其愿望相反，阿党代而鲜明地支持了中共。

6月25日和26日，举行51党代表会议。中共代表团会议执行主席乔治乌·德治，向各代表团分发了中共代表声明。这个声明是由中共中央在国内根据会议发展情况写稿给中共代表团，代表团立即翻成多种文字，提交会议分

《声明》公开指出：“中共中央认为：苏共中央代表团晓夫同志在这次会谈中完全破坏了历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兄弟党协商解决共同的问题的原则，完全破坏了在会谈以前这次会谈只限于交换意见，不作任何协定的协议，突然袭

提出了会谈公报草案，对这个公报的内容没有预先征求兄弟党的意见，而且在会谈中不允许进行充分的正常的讨论。这是滥用苏联共产党从列宁以来长期形成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信，极粗暴地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这种态度同列宁的作风毫无共同之处，这种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同志的这种态度和这种做法将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声明》说：“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同上同赫鲁晓夫同志是有分歧的。”对于这些分歧的问题，“应当采取严肃的态度，进行认真的思考和同志式的讨论，”“但是赫鲁晓夫同志所采取的却是家长式的、武断的、专横的态度，他在实际上把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同我们党的关系不看成兄弟党的关系，而是看成父子党的关系，”“企图使用压力使我们的党向他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我们在此严正地声明，我们党只信服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而决不会向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念屈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取决于各国人民的要求和斗争，取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而绝不是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指挥棒。”

《声明》还表示：“我们同赫鲁晓夫同志之间的分歧意见，从我们两党的整个关系来说，仍属部分性质。”希望能找到机会，“进行平心静气的同志式的交谈，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意见，使中苏两党的关系更加团结和巩固起来。”

26日会议的最后3小时，赫鲁晓夫作总结性的发言。他对中共又作了全面、系统的攻击，说中国共产党是“疯子”，“要发动战争”，“把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旗帜拿起来”、“纯粹的民族主义”，“托洛茨基方式”等等。

中共代表团“针锋相对地当众对他进行了使他无法招反击，初步揭穿了他的阴谋，打击了他的老子威风”。彭真尖锐而激烈的即席发言，指出赫鲁晓夫的作法是为所欲为不得别人的意见，谁不听他的就组织对谁的进攻，还不准为自己辩护，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种完全破坏了国际准则。

中共中央在《声明》中指出过：“我们很高兴地看到这谈中提出的《会议公报草案》声明确认莫斯科宣言的正确性是这个草案对于莫斯科宣言中的各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论点明是不确切的、片面的。……因此我们不能接受这个草案。提出了需修改草案。后来，中共代表团“为了顾全大局，在会谈公报上签了字，以便缓和一下已经出现的严重分歧立”。

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赫鲁晓夫没能压服中共，反而：中共的严厉批评，这使中苏的敌对状态公开化了——或者说少在共产党的国际听众面前公开了。

出于恼怒和报复，苏共领导人把思想上的分歧扩大到关系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几个星期后，赫鲁晓夫一回莫斯科就命令俄国专家回国，并且显然是命令他们把图纸也带回。……

## 瘫痪的经济大动脉

赫鲁晓夫对中国使的这一着儿，仿佛是一场拳击赛，本来有些力不从心的一方又受到了另一方强有力的重重一击。

时，中国的经济大动脉跳动得不再有力，濒于瘫痪了。

首先最突出的是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农、轻、重三者之间的比例关系很不协调。

从1957年到1960年，按不变价格计算，工农业总产值由704亿元增加到1650亿元，即增长1.3倍。而其中农业总产值却由537亿元降到415亿元，下降22.7%；工业与农业的比例由5.7比4.3，变为8比2。重工业与农业的比例更为失调。1960年重工业比1957年增长一倍，而农业却减少一倍。在这期间，重工业平均以49.4%的高速度孤立发展，而农业却以平均9.7%的减速连年下降。轻工业也从1960年开始连续三年下降。重工业的单向片面发展，超过了农业负担能力，也超过了燃料动力供应和交通运输的负担能力，不仅影响了农业，而且也挤掉了轻工业，“一五”期间，轻重工业产值比例平均是59.2比40.8，而1957年到1960年比例变为33.4比66.6，轻工业远远落后了。1961年，主要轻工业产品产地的上海、天津，产量只及1960年同期1/3，沈阳则低于1/5。这就造成了市场轻工业供应的极度紧张。

其次是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战线过长。

基建战线急剧膨胀是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积累率过高的主要原因。由于战线过长，各地区、各部门不得不停建缓建大批正在施工的建设工程。1962年，全国施工的基建项目由1960年的82000多个成为25000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由1960年的1815个减为1003个，同时，基本建设总投资也从1960年的384亿元急剧下降为67.6亿元。虽然1960年比1957年基建投资增长了1.8倍，而同期国民收入却只增长了0.35倍，基建所需的钢材、木材等都大大超过实际提供的可能性。另外基建

项目多，摊子铺得大，战线过长，经济效益也很低。

### 第三，工业企业管理混乱和严重亏损。

由于生产管理混乱，经济效益很低，产品质量下降。合格率由1957年的99.4%下降到1960年的74.9%。全国企业劳动生产率，1960年与1957年相比下降12%。工业的物资消耗增加，成本提高。工业总产值每亿元平均耗电1957年的2501万度增加到1960年的3443万度，耗油量1万吨增加到21万吨，增长了一倍。报费亏损也极其严重。年以前基本建设未完工而下马报废的达150亿元。1960年工业不能利用的固定资产报废达50亿元。

### 第四，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也极不平衡。

为了满足建设资金的需要，国家通过多方集资增加财政收入。从1957年到1960年四年财政收入分别为310亿元、444亿元、578亿元、635亿元，各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1.1%、39.6%、47.3%、52%。这个规模和增长速度是前所未有的。银行对工业的贷款从1957年的33.4亿元，到1960年分别增加为94.4亿元、258亿元和339.5亿元。四年增长了11倍。同期内对商业的贷款分别为216.4亿元、342.4亿元、495.3亿元、506.3亿元。四年增长1.3倍。这样大的支出，使1958年到1960年三年中国家财政赤字分别达到21.8亿元、65.8亿元、818.4亿元，占当年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分别为5.3%、11.9%、12.5%。由于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极不平衡，迫使银行大量发行货币，从1958年连续三年货币投放量大于回笼数，年末货币流通量增加了81.7%。

由于工农生产的下降，国家财政收入的大量减少，直接影响了城乡人民的生活。

全国城乡人民粮油肉布消费品年人均绝对消费量，以1960年与1957年相比较：粮食减少了79斤，油减少了1.1斤，猪肉减少了7.1斤，棉布减少了20尺。而其他日用品，像食盐、火柴、锅、盆、碗等类的小商品供应也都严重不足。根据当时一些典型调查，职工实际生活水平大体下降了30%左右。

面对这种极其困难的境地，中国人真的会被人家看笑话，看热闹吗？

## “逼上梁山”

苏联的撤退专家，撕毁合同，的确给灾难下的中国釜底抽薪、雪上加霜。但是其作用的另一方面，又促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更加坚定自信地走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苏共领导人加力压迫中国之后，中共党内有些领导干部已经在考虑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该怎么办。副总理兼国家科委和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于1960年7月3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苏联在重要技术关键上卡我们，令人气愤，但气愤并没有用，一定要争口气，事情有可能这么一逼，反而会成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动力，会使我们更加坚决地在科学技术上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不是指望外援”。“在新的形势面前，我们继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是可能的”。对此，周恩来在阅读“建议”时作旁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

二是“今后科技往来采取新的做法。凡协议上有的项目，我们到时候就要询问，仍然要。但对方不给，绝不再催。挂上一

笔帐。协议以外的新要求就不提了”。“对苏联专家，要中央所指示的方针，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多做工作”。

三是“独立自主，立足国内，绝不意味着自己封锁”。对此，周恩来阅时作旁批：“关于科学技术，一要，十分仍然要提，他们不给，不强求。二学，留学生、实习生、生，已经去的必须学好，不给学就不学。来我国的专家，派人向他们认真学习，不教就不学。三买，凡可以购买的技术资料，应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千方百计地买到。四管管要到、学到、买到与否，或者多少，主要还要靠自己钻己不钻，不仅没有独特的创造发明，而且也不能把要到、买到的用于实际和有所发展。”

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以坚韧的毅力，战胜了暂时的经济困难，也使科学技术尤其是国防尖端科学技术自力更生、团结奋斗的基础上，获得了显著的发展。

后来，毛泽东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1吨重的勋章”。这固然是一种讽刺的话语，但苏方撤退专家一事，的客观上起了促进中国人民奋发精神自力更生的作用。

而赫鲁晓夫和苏联，从撤退专家、撕毁合同的行动中，有得到什么好处，反而丢失的东西太多、太多。这一点，苏联的许多人都是意识到了的。

1963年11月29日，苏共中央曾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出重新派专家的问题。

中共中央于1964年2月29日的复信中说：你们（1961）行为，充分说明了你们“把派遣专家当作对兄弟国家施加压力，干涉它们的内政，限制和破坏它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具”，“现在，你们又提出向中国派遣专家的问题。坦白地说

国人民信不过你们”，“往事记忆犹新。在苏共领导采取反华政策的情况下，我们不愿意上当了”。

中国对苏共领导人的这种不信任感的产生，也是苏联 1960 年撤退专家、撕毁合同的严重后果之一。



## 第七章

# 走出乌托邦

- “上帝”没有预言
- 告别“红烧肉”
- 勇于自贵的领导人
- 玉米面糊糊里的营养
- 法官的眼睛最亮
- 正宗的“四川泡菜”
- 耕种南亩，心系人民
- 苦瓜能明目
- 患难见真情
- “耕地不用牛”的时代还很遥远



-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 “沧海桑田”并非传说
- “老大哥”的气魄
- 地球发抖了
- 而今迈步从头越
- 两副重担一肩挑
- 没有硝烟的战场
- 钢铁长城
- 超越自我
- 黄土地永远是根



## “上帝”没有预言

《圣经·旧约全书》上记有“挪亚方舟”的故事：上帝要灭世界，便降下预言给有正义感的挪亚，让挪亚造一只方舟躲避灾难并拯救有限的生灵。就在挪亚造好方舟后的第七日，帝降下了倾盆大雨，大雨接连下了40昼夜。江河湖海一齐暴怒，雨水冲决了堤坝，滚滚的洪流席卷了沟壑、洼地、平原、丘和山岭。人群、牛羊与庄稼，以及一切的獐狍野鹿全部陷入没顶之灾，就连峰巅上的树木都没入了洪水之中，只有那孤零零的“挪亚方舟”安然无恙地漂泊在万顷波涛之上。

时光推移到公元1959年，东方这片古老土地上不相信“上帝”的人们，正以空前的政治热情，大跨步地迈向理想中“共产主义”社会。但这种简单的热情却触怒了万能的“上帝”——客观规律。于是，“上帝”悄悄地降下了灾难。在此的三年里，旱、涝、虫、雹交替地践踏着这片刚刚获得解放土地。“天灾人祸”肆虐地蹂躏着这些深受百年之苦刚刚翻身人们。这次的灾难，没有了“挪亚方舟”，这次的灾难再也找不到安然无恙的停泊之地。

但是，这些确实不信上帝的精灵，这些宁折不弯的脊梁，有在灾难面前低头，他们与天斗，与地斗，同甘苦，共命运，亿人民心连心，谱写了一曲难忘的时代之歌。

“乌托邦”理想国的餐桌上没有了肉，新中国出现了一代吃素食的领导人，他们吃“素”不是为了敬

“佛”，只因为他们心中装着亿万受灾的群众。

## 告别“红烧肉”

毛泽东，这位从韶山冲走出来的农民的儿子；这位当年站在高高的天安门城楼上挥帽呼喊“人民万岁”的时代巨子；这位正在走向神坛的巨人；这位见到“红烧肉”就像过大年一样高兴的“凡夫俗子”，当他看到他的亿万衣食父母正忍受着饥饿之苦的时候，他再也没有心情去动一筷“红烧肉”，他毅然决然地戒掉吃肉，他要同人民一道渡过这艰难的岁月。于是，一小碟豆腐、一小碟萝卜就成了他再造乾坤的物质基础。

人民的灾难就是他自己的灾难，毛泽东始终注视着灾情的变化情况。1959年6月，广东东江流域暴雨成灾，几个县的县城和绝大部分村庄、农田被淹，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受到很大的损失。毛泽东及时地写信给《人民日报》的编辑，要求报社一点也不要隐瞒地公开报道，对全国的灾情，也要照样如实公开报道，以唤起人民的全力抗争，毛泽东还要求报社大力报道提倡人民生产自救和政府救济。因为他深信，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人民一定能够战胜这场灾难。

面前的灾难，也给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和豪迈的诗人一个冷静思考的机会。他从中看出了“浮夸风”的危害和造成的损失。于是，毛泽东又搬出当年取得革命胜利的法宝：走群众路线，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1月，毛泽东派自己的秘书田家英、胡乔木和陈伯达分别组成调查组去浙江、湖南和广东的农村去搞调查。要求他们用10天至15天的时间，深入农村最基层调查

搞得最好的生产队和搞得最坏的生产队存在的问题，以取得型的材料。1961年5月下旬，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主要是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向群众寻求真理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农业六十条》，从而走出了农业“乌托邦”的泥潭。

## 勇于自责的领导人

刘少奇，这位特殊年代少有的冷静型的领袖，似乎早就感到这场灾难的来临，只是极“左”的思潮太迅猛，使他无回天，但他又不是“挪亚”。何况，他也不想仅用一只方舟来救有限的生灵，他更愿默默无闻地工作，同人民一起去抗争奋斗。

刘少奇同志性情淡泊，不讲究吃穿。在这段困难的日子，他的生活更加俭朴，每餐只是两菜一汤，平平淡淡，无论是上还是灶上都没有什么油水，甚至连卫士都淡得出口水。有天中午，餐桌上突然出现了一盘红烧鸡块，卫士看到后喜不自禁。吃饭时，王光美同志一点也舍不得吃，只是照顾着给刘奇同志夹菜，两个人你谦我让，一顿饭下来，那“红烧鸡块”还剩下半盘多。少奇同志先回办公室工作去了，光美同志没有动那半盘鸡块，只是将另一盘素菜打扫干净，接着就把半盘鸡块用纱罩罩上了。光美同志走后，卫士就把半盘鸡块吃了。晚饭时，光美同志端了一盅酒来，她没有见到鸡块，问炊事员，炊事员说他没有见到那盘剩鸡块。这时，新到不的卫士感到很惊讶：难道这位全党全国的领袖人物还吃剩鸡？卫士说他把剩鸡块吃了之后，光美同志叹了口气说：“哎，手

来是留给少奇同志晚上吃的。”她没有再说下去，转身把那盅酒又端了回去。

1961年6月的一天，晴空万里，骄阳似火。刘少奇到十八所审核文章，中午就在所里吃了便餐。饭后，出来在院子里散步，当他看到工作人员利用院子里的空地种的老玉米被骄阳烤得卷了叶时，他来到玉米地边立住脚，望了望老玉米，又抬头看看天上的烈日，说：“早成这样了，浇浇水。”

他对自然灾害的痛心，并没有代替自我责备，他没有推卸自己在这场灾难中所应负有的责任。

1960年，是三年困难时期中最困难的一年。这年11月5日，刘少奇率我国党政代表团飞抵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3周年庆祝典礼，并出席80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替会议。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谈到苏联的经济情况时说，苏联的形势很好，只是农业收成不太好，但那是由于天气原因造成的，赫鲁晓夫在讲完苏联农业生产遇到的困难之后，意味深长地瞄了一眼刘少奇。刘少奇平静地但是坚定地说：“我们也是严重歉收，困难不少。我们也有天气原因，但主要是政策，我们正调整政策，解决这些问题。”刘少奇勇于自责，不怨天尤人的精神正好与赫鲁晓夫把困难推给“天灾”上的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更何况这坚定有力的话里还透出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1961年4月1日至5月15日，刘少奇带领调查组到湖南长沙宁乡县进行了44天的调查，其中有32天他住在农村，详细调查了关于人民公社食堂、商业、集贸市场、农村自留地、家庭副业、房屋、粮食及山林等方面的问题。这些详细的资料引起了这位政治家就农业前途问题的更深刻的思考。

刘少奇同志的自责精神并不向最基层的农民隐瞒，他与湖南炭子冲农民谈话的时候，坦率地自我批评说：“将近手没有回家乡了，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的生良苦，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恐怕早有影响，下见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工作中犯了错误。”这感人肺腑的话语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光明坦荡的胸襟。

## 玉米面糊糊里的营养

国家处在困难时期，身为政府总理的周恩来同志担子重了。他时而在石油工人的钻塔前，时而站在茶乡的田塍上而接见外宾参加外事活动，时而出席或主持重要的会议，像一只永远也不知疲倦的蜜蜂，把爱和幸福无私地奉献给人。而又有谁能够想象得到，供养这个伟大灵魂的物质养料竟自这不稠不稀的玉米面糊糊呢？周恩来总理很喜欢喝玉米糊。无论是开会、批阅文件、谈话还是乘车，拿起杯子就喝，什么也不耽误。碰到紧急的外出活动，一杯玉米面糊一个面包就是他的应急餐。玉米面糊糊成了周总理解渴的和解饿的食品。

周总理从来没有把吃饭看成是单纯的吃饭，而是把吃饭成一种工作，看成是他联系人民群众的途径。在大庆，他一人一道吃高粱米，和工人一道啃窝窝头。平常开会，只要招待活动，他总是喜欢挤到服务人员之中，和大家一起吃份把自己溶入普通群众之中。

1961年4月28日至5月8日，周恩来总理带国务院

组到邯郸的农村蹲点调查，经过周密细致的调查后，他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指出：大家都愿意回家做饭；社员不赞成实行供给制；社员希望实行记工分的办法，以产定分。同时向毛主席汇报了一下邯郸的灾情，麦子产量很低，有的甚至绝了产，棉秋作物有希望能丰收。最后他向主席汇报了急需解决的问题：恢复社员体力和恢复畜力等问题。

周恩来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锐利的观察力洞察了农村“乌托邦”中存在的问题，并把自己调查的着眼点放在了“恢复社员体力”问题上，体现了“人民总理爱人民”的优良品质。

## 法官的眼睛最亮

法官的责任要求自己能够公正无私地剖析事实真相。谢觉哉，这位共和国的最高法官，不仅具有敏锐的观察力，更具有当面戳穿谎言的勇气。1959年是“浮夸风”最盛行的年代，谢觉哉去流沙河考察渔业发展的情况，公社的一位负责人说公社办公所在地的一口渔塘内每年可产一万斤鱼。而生于斯地的法官更了解当地的情况，于是，当面指出了这位同志的谎言。

1961年，湖南宁乡县委、县政府几次上报都说宁乡县1961年全县的生猪产量可达200万头，谢觉哉知道后，就写信给宁乡县委，批评了县委、县政府的工作作风。他语重心长地指出：上面爱听假话，下面就讲假话，即使领导不说假话，而是不假考察地听信了假话，那也是假话。因此，他建议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同志亲自到基层去看看，并且他要求这些领导“会”看，不要被“摆样”的形式所迷惑，更不可只听汇报要数字。只有

这样,才能得出结论:“那里的生活已有改善,生产方式已更正、人民情绪正在高涨……”

这位法官的目光深邃而远大,把对孩子的思想教育当成自己的责任。他时常地叮嘱孩子要有战胜困难的勇气,要求我们在这种生活艰苦的岁月里锻炼自己,他叮嘱孩子们要爱惜书籍、爱惜衣服,破旧的衣服要补好了再穿,因为“添买新衣服,不仅要花钱,而且要增加市场上的负担”。他还谆谆教导孩子们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只有专深,才能红透。”做一个又红又专的建设者。

## 正宗的“四川泡菜”

三年困难时期,朱德同志一再主动降低自己的伙食水平,带头节衣缩食,他反复叮嘱炊事员一定不能超过国家供应的标准,他还亲自指导炊事员把米和菜放在一起,做成菜糊糊,和大家一起吃。

1960年,朱德去四川视察,他也是只吃杂粮和四川泡菜。南充视察时,他吃清明菜和米粉做成的馍馍。在成都,他吃红薯时,连皮都舍不得剥掉,服务人员担心他消化不了,要他剥掉皮后再吃,这位当年挑着扁担走山岗,南瓜汤当主料的司令员和蔼地说:“不要紧,我消化得了。”

1962年春节,朱德把孩子们召集到家里,给孩子们讲家告诫孩子们革命不是为了做官,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不去追逐个人的名和利。在国家遇到困难时,大家的的生活应当苦一些,朴素一些,要多想想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困难。有一

警卫人员在给朱德同志放洗脸水时，一下子放多了，朱德便说：“洗脸水不要多放，天旱缺雨，天津市人民吃的水都得由北京密云水库拨给，我们可要注意节约用水啊！”为了教育孩子们，朱德和康克清还亲自到园子里挖野菜做了给孩子们吃。有一天晚饭时，桌子上摆着马齿菜、苦苦菜和野苋菜，康克清说：“现在国家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人民生活很苦。”朱德接着说：“毛主席领导人民渡难关，带头不吃肉，我们都要听毛主席的话，同人民共艰苦，你们以后就到学校去，同学们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可不能特殊啊！”星期天一有空，朱德就带领孩子们到园子里学习劳动本领，手把手地教他们刨地、施肥、浇水、点种，孩子们在他指导下种下的南瓜、西红柿都长得很好，康克清则教孩子们洗衣服、培养他们生活自理的能力。

## 耕种南亩 心系人民

庐山会议后，彭德怀搬进了吴家花园，此时，他已不再担任任何职务了。正值国家处在困难时期，城市里蔬菜供应紧张，彭德怀对他的勤务员说以后不要进城给他买菜了，也不要当地同群众争菜吃。他看到院子里有许多野菜，就拔些野菜，把野菜洗净后交给炊事员，让炊事员给他做着吃。随后，他就在院子里清除杂草，翻整土地，整出一片菜园子，种上了各种蔬菜和水果，他对勤务员说：“我不能给人民办事了，但我可以劳动。我们吃自己种的菜，这不仅减轻了人民的一点负担，而且还减轻了你们的负担，往后你们就不用进城采购了。”为了让作物有更充分的养料来生长，他又在院子里积了许多肥。他的侄

女来看望他，嫌他把院子里搞得臭烘烘的，就建议他去买些肥代替，彭德怀说：“人民生活很困难啊！叫我买化肥，买什化肥呀，国家这么困难，我们要为国分忧啊！”

在吴家花园，彭德怀还特地选择了水塘旁边土质最好的分地，他准备种小麦做个试验。他把这块地进行了深翻，细的土疙瘩都被他用手捏过。他说：“人家说深翻，我就深翻；家说多施肥，我就多施肥；说密植，说水浇，我都照着做。把力气都用在这块田里，看一亩地到底能产多少斤。”这位驰骋、决胜千里的将军就像当年冲锋陷阵一样卖力地守护着块田地，指望不让麻雀啄去一粒麦粒，收获时，一过秤，900斤。彭德怀说：“一亩地，八九百斤，算我功夫不够，加一亩产两千斤，顶天了。我们共产党人最讲实事求是，最提倡讲真话，这一点是我们的长处，假若你叫我去讲假话，昧着心，不顾事实地瞎说一气，我不干，就是杀了老子的头，我也不干。”

困难时期，鸡蛋很难买。一天，彭德怀对跟随多年的勤务员说：“如今鸡蛋不好买，你喂几只鸡，可以给孩子们吃鸡蛋。”勤务员说吴家花园较荒凉，即使喂了鸡，等星期天他回家时会因无人看管而被黄鼠狼叼走的。彭德怀说：“没关系，你走我管，我给你喂鸡。”以后，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彭德怀就负责喂鸡。天黑后，就把鸡关进窝里。有时临睡时，他还要到窝边走走，生怕黄鼠狼来咬鸡。或许是黄鼠狼早已被这位勇立马的大将军的气势所震慑住了，居然从未来捣乱过。等下蛋了，勤务员想把鸡蛋留给彭总司令吃，彭德怀却怎么也不他说：“我那是义务劳动，有义务帮助你喂鸡，没有权利吃鸡蛋该吃鸡蛋的是孩子们，他们正需要营养。我这个老头子锻炼”

来了，不吃鸡蛋，身体也照样结实。”这位功勋卓越的将军总是想到孩子和关心孩子。

1961年11月，彭德怀返回故里。在故乡，他无微不至地关心着人民群众的冷暖和疾苦。在考察幸福院时，他拿出200元钱，给每个老人添一床毯子；在考察幼儿园时，他又拿出钱给每个幼儿添置一个围兜肚。看到光秃秃的山头，彭德怀建议大队在这些山上种些板栗、核桃。回京后，他给家乡寄来了一箱板栗、核桃种子，要求每户种几株。他还带着侄儿全家开荒造田。回家后，他对夫人浦安修说：“我们自己节省一点吧，乌石的学校设备太差了，留点钱帮助他们。”不久，他给乌石小学寄去了几百本小人书。

在故乡的40多天里，彭德怀做了40多天的调查研究。他把自己调查到的情况，整理成厚厚的一大本材料，准备汇报给中央，他的侄儿担心会出问题，他说：“我吃人民的饭，就要为人民做事，替人民说话，把情况反映上去，参考参考也好嘛！古人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古代仁人志士能够做到的，共产党人还不能做到吗？”他做到了，他的正道直行，他的大公无私都体现出来了。

## 苦瓜能明目

1941年，罗荣桓同志患了严重的肾脏病，但他仍然坚持战斗。革命胜利后，罗荣桓同志在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处理繁重的工作的同时，还得同恶疾做顽强的斗争。“有一分精力，就要为党多做贡献”是他的座右铭。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人民的生活受到影响。担任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的罗荣桓同志，经常地深入学员班、食堂、宿舍解情况。他经常到学员和工作人员之中，问思想、问学习、生活、问工作，要他们坚定信心，鼓舞斗志。有一次，罗院自己正发病，他还是拄着拐杖，艰难地走到学员宿舍，看望位得浮肿病的学员。当时正值秋末冬初时节，天气已经很冷，学员看到他的头上直冒汗，还以为是他走路走热的，哪里知道罗院长是忍着剧烈的病痛来到他床前的。

而在自己的生活上，罗荣桓很俭朴，他时常嘱咐身边的作人员，不要到什么“特供点”之类的地方去买东西。罗荣说：“越是在国家困难的时候，就越要注意同群众同甘共苦。”时，罗荣桓和大家吃一样的饭菜，唯一的差别，就是在他的桌上多一小碟“炒苦瓜”，他开玩笑说：“苦瓜是个好东西，苦后甜，吃了能明目清神，不会迷失方向。”

是的，这位战功卓著的元帅由于爱吃炒苦瓜而找到了国发展的方向。那时由于受“左”的思潮的影响，出现了只强“红”而忽视“专”的倾向，许多人对红与专的关系认识比较乱，有的人甚至直接将“红”与“专”对立起来。而这位有略眼光的军事家对“红”与“专”的认识则是清晰而明确的。19年，罗荣桓同志担任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他在全军政治作会议上，明确地提出：军队也要“又红又专”，并指出“红落实到‘专’上，只讲‘红’，不落实到‘专’上，‘红’也空的”。他并且把这种思想也传授给自己的孩子。他在同儿子东进及罗东进的几个同志谈话时说：“你们这些人的责任是很的，如果将来发生战争，就得要你们这些人拿出东西来。你这些人的政治任务就是要‘专’，要使自己成为社会主义的专家”

为我国的国防工业做出些贡献。我们现在非常缺少专家。我们有许多现代化的企业没有搞好，或者搞坏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缺少专家，缺少科学知识。”

正是由于炒苦瓜的特殊功效，无法让这位身缠重病的元帅安静地呆在机关里看材料听汇报，他更想亲自到基层看一看部队的实际情况：国家处在困难时期，部队的思想状况如何？干部战士最关心的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这位元帅踏上了征程。

60年代最初的日子是寒冷而严峻的。春天虽然临近了，但严冬还在施展着它的余威。车窗外是尚未解冻的大地，车厢内却洋溢着春天的暖流。罗荣桓和贺龙两位元帅在热烈地谈论国际国内的形势。

列车到达浦口站后，两位元帅接见了南京军区的司令员许世友同志，许世友汇报了南京军区各部队的情况，他说：“部队干部每人每月只能吃到31斤粮食，没有肉吃，油水很少。特别是团级以下干部，他们年纪较轻，每天都带着部队搞训练，爬山过水，晚上搞夜战演习，睡不好觉，体力普遍下降……但干部们情绪很好，没有怨言。”罗帅说：“我们的干部是很好的，他们懂得体谅国家的困难。越是这样，我们做领导的越要关心他们。党要把部队的生产和生活，当作一件大事来抓，一下子解决有困难，机关干部宁肯少吃一点，也要把粮食省出来，让下面的干部们吃饱。”说完话，罗荣桓用铅笔在纸上写下了“31斤”几个字，然后又在“31斤”下面划了两条粗重的黑道，使人感到那不是画在纸上，而是刻在这位元帅的心上。

1963年，罗荣桓病情加重住进了医院；他仍然十分关心全军政治的发展，关心解放军政治学院的教学和各项工作，他躺在病床上解答教员关于中国革命史方面存在的疑难问题。1963

年10月，罗荣桓的病情恶化了，但他仍然在病中会见许多人。每当大家离去时，他总是乐观地说“明年再见！”。但是，这伟大的战略家这次却没有看到吞噬他生命的疾病是个顽敌，没有能够看到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完全从三年自然灾害的阴霾走出来，就匆匆地与世长辞了，但他的乐观与自信以及他对人民的赤诚的爱激励着全国人民去努力地恢复生产、走向富裕。

## 患难见真情

中国的各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关系是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漫长过程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种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共和国处在国民经济发展的三年困难时期，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爱国人士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与合作，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59年，“国庆节”前夕，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著名无党派民主人士和著名的文化教育界人士举行会议，就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实行特赦的问题进行了座谈。1959年12月1日，首次赦免了33名战犯。第一批战犯的获释，在国际国内引起了较大的震动。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改造政策是伟大的和正确的。被特赦的战犯也都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感激备至，表示要跟着共产党走，继续改造思想，改变立场，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力量。他们的家属也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共

党和人民政府，并勉励他们继续改造思想、报效国家。

1961年6月30日，在中国共产党建党40周年前夕，各民主党派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而发表了献词。献词说，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们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统一战线，在革命的每一个重要关头，中国共产党都及时给我们指出前进的方向和正确的道路，真诚地团结我们，恳切地教育我们，耐心地帮助我们。在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革命阶段中，我们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尽到一份力量，应该感谢共产党的领导。献词还表示，今后一定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逐步改造世界观，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

1960年2月19日至21日，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预备会议上，代表们就工商界一年多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变化情况；服务和改造的关系；工商界今后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要求及措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会议号召会员加强自我改造，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三年困难时期，著名的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宋庆龄女士住在北京西河沿一所普通的房子里，房子潮湿阴冷，引发了她的荨麻疹病，她的关节炎也因房屋空气的潮湿而加剧。国家主席刘少奇很关心她的健康，想给她再建一所房子。她写信给王光美同志，信中说：现在国家正在建设时期，需要款，如另外建造房子，又需费一笔款。为了我个人的住所增加国家的开支，这样，将使我感到不安。故我不打算再迁新址了。这位社会活

动家首先考虑的是国家的难处，而没有提及自己的难处。

## “耕地不用牛”的时代还很遥远

1958年8月掀起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提出了“钢铁帅升帐”的军事化的比喻口号。而同时也犯了“兵家大忌”，记了另一条军事行动的原则：“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足物质保障的军事行动注定是要失败的。

“大炼钢铁运动”，动员了几千万人上阵，抽走了大量的村青壮劳动，1958年秋收时，农村形成了“青壮炼铁去，收童与姑”的局面，致使许多地方丰产不丰收，大量农产品丢在田野里，损失掉大量的农产品。

在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城乡差别，没有工差别。全民炼钢就是工农结合的最好“典范”，城市各单位可任意招收和录用农民当工人。1958年以前，工农的比例为1:13，而1958年为1:7.8，光是1958年，城市人口就增加了10万左右，于是，粮食问题就出现了。

1958年7月至12月，全国共征购粮食902亿斤，占全国食总产量的17.8%。而同一时期，全国粮食销售的数量就达444亿斤，比去年同期多销售98亿斤，其中，用于城市销售占40亿斤，农村销售的为58亿斤。城市主要是因为增加了千万的人口，口粮和食品用粮也有所增加，从1958年10月起，全国城市人口每人每月平均增加了7斤左右。农业用粮加的原因是，由农民组成的钢铁大军、水利大军和筑路大军已不带粮食，到哪里劳动就吃那里的公粮。自然灾害尚未降

粮食储备方面存在的问题就已暴露无遗了，而紧接下来的接连3年的农业歉收无异于雪上加霜，其灾难就更大了。

同粮食问题结伴而来的是食用油的危机。1959年4月，全国的食用油是四处告急。(1)1至9月份，国家计划出口食用油3.48亿斤，而到4月底只出口了6000万斤。(2)城镇居民食用油供应是每月7000万斤，但是不少的城镇已经时有脱销现象发生。(3)工业用油和行业用油平均是月销4000万斤左右，如果不能保持这个水平，就会影响工业生产，尤其是影响肥皂的生产。(4)农村食用油的供应每月是9000万斤左右，但脱销现象更严重。中央认为，四处脱销不如一处脱销，多头紧不如一头紧。于是，党中央当机立断，决定从6月份起，在6月至9月的4个月内，基本上停止对农村的食用油供应。也就是说，除了生产油菜籽的地区还可以适当供应；除病号、孕妇等特殊需要；除了大车用油，农机用油和侨汇地区可以适当供应以外，其他所有农村一律停止供应食用油4个月。把缩减下来的食油用来完成出口的需要，并适当保证城镇和工业的必不可少的供应。在国家出现困难的时候，这些推着小车把革命推向胜利的质朴的农民，又一次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这种“拆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也没有使国家走出困境。1959年夏秋作物受灾严重，受灾面积约2亿亩，占全国耕地总量的八分之一。1959年的实际粮食总产量为3400亿斤，农副业总产值实际比去年下降13.6%。农民全年口粮标准由1957年的消费量409斤，降到312斤，灾区农民口粮标准降到300斤以下。城镇人口，除了高温、高空、地下作业及重体力劳动的职工口粮标准不动外，其他每人每月降2斤左右。猪肉的供应量由1957年的每户年均10.15斤降到每年3.06斤；棉布供应

量由1957年的人均19.48尺降到8.06尺；食油、蔬菜等也缺乏，农村的供应更差，不少地区搞“瓜菜代”。

“屋漏偏逢连夜雨”。紧接下来的1960年，又是一个荒春旱严重，受旱面积6亿亩，有的从1959年入冬以来就一直旱，入秋后，部分地区的旱情仍未解除，有的地方又发生了旱。另一部分地区又发生了洪涝灾害，受水灾的面积达1.2亿亩。再加上虫灾、风灾和雹灾，全国受灾面积有9亿亩，其减产三成以上的就有3亿亩。1961年的受灾减产的面积竟达4.3亿亩。丰年的粮食储备不足和接连的饥荒年，给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粮食不足菜里找，各地农村都大搞春菜、秋菜和冬菜的产，实行“瓜菜代”，粮菜混着吃。各地还推广了做饭增量，把白薯秧粉碎冲洗干净，然后把细磨细作的少量粮食掺入拌熟蒸熟了吃。各地还制造了大量的“代食品”，就是取当地最穷的各种树叶、草叶和野生动植物资源，进行简单的加工处理，制成了玉米根淀粉、小麦根淀粉、玉米杆面粉、橡子面粉、蛋白、人造肉精、小球藻等多种多样的代食品。在有些地方，饿的人们甚至直接吃榆树叶、槐树花等植物的花与叶，食物中毒时有发生。由于营养不良，许多人都得了浮肿病，有的地甚至出现饿死人的现象。1960年人口的死亡率高达25.4%，现了人口自然增长率负增长4.5%的局面。

耕牛、骡、马、驴等大牲畜也因饲料的短缺，存栏数量剧下降，1960年存栏量比1959年减少575.3万头，减7.3%；1961年的存栏量又比1960年减少387.2万头，减少率5.3%，至此，那种关于农村共产主义“点灯不用油，耕地用牛”的美好时代在灾难中变得越来越遥远了。

##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灾难，对胆小鬼来说是灭顶之灾，而对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来说，它只是一种考验。中国人民没有被灾难吓倒，而是同灾难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并在同灾难的抗争中进行了艰难的探索。

1960年，安徽省宿县，一位古稀之年的普通农民，为了照顾患了肺病的儿子，不能参加队的集体劳动。他在征得公社的允许以后，带着儿子去山区养病与生产自救。这位农民，凭着一把锄头和一支四齿钩，开垦荒地16亩。到年底收获时，这位老农不仅收足了口粮，还上缴给公社1800斤粮食和饲养猪鸡得到的60元钱。这与当年安徽全省农业歉收，饥荒遍布城乡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也给当地的干部群众一个很大的启发。大家都认为这种“田包到劳”的方式生产效率很高。于是，宿县的一些农民提出把田包给社员种而后统一分配的要求。安徽省全椒县农民也要求“定产到田，责任到人”。从1961年3月份开始，安徽省委以探索求新的精神，在省内部分地区实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经营管理方法，不到一个月，全省有39.2%的生产队实行了这一办法。到1961年底，全省生产队总数的85.4%都实行了“定产到户，责任到人”的方法。

1961年5月，党中央在普遍进行了调查研究之后，制定了《农业六十条》，调整了农业政策，放宽了农业经营管理的范围，农业生产出现了新的气象。

1961年10月，河北省南宫县仅用两天的时间，召开了小队

长以上的四级干部会议，决定在农业生产中贯彻“大包干”的政策。实行大包干以后，出现了促进粮食征购和多种小麦的新气象。大包干政策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社员们都是早出晚归播种小麦，促进了小麦播种工作的完成。同时，大包干也使小队的小麦产量报实了，这给完成征购任务奠定了物质基础。

同年，在广西、广东、河南、湖南等省（自治区），凡属灾情严重，生产破坏严重及缺粮饿饭的地方，都采用了包工、包产到户或借地的办法，促进了生产自救工作的开展。

1959年11月1日，我国第一拖拉机厂在河南省洛阳市举行了落成典礼。该厂有年产15万台54马力“东方红”牌柴油履带拖拉机的生产能力。它的建成和投产，标志着我国农业机械工业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期，我国还在沈阳等地建立了农业机械生产基地。到1960年我国农业机械已拥有大中型拖拉机45536台，到1961年拥有52239台。农业机械的发展，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同时，国家在各地建立了许多大中小型的化肥生产厂，生产出了大量的化肥。1960年，我国拥有化肥量为332.1万吨，其中国产化肥为207万吨，形成了年产化肥折纯量40.5万吨的生产能力。化肥的生产与施用，改变了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增强了土壤供肥能力，为抵御自然灾害注入了新的活力。

人民群众的生产自救道路的探索及农业机械化能力的增强，还有化肥的大量生产与施用，使我国农业逐步走出灾难的深渊，前途越来越光明。

## “沧海桑田”并非传说

自然界的风风雨雨，留下了沧海桑田的美妙传说。但在 20 世纪中叶，这个美丽传说的主人公不再是变幻莫测的自然界，而是大自然的主人——人，勤劳勇敢的共和国人民，在“人定胜天”信念的指引下，与天斗、与地斗，重新改写了“沧海桑田”的神话传说。

水利是农业的根本保证。早在 1958 年，国家就决定建立 10 座大型的水库，并修建一些水利枢纽工程。1958 年 9 月，以根治和开发汉水为主要内容的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提前动工兴建，到 1959 年 12 月 26 日，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第一期工程完成并胜利截流。拦河大坝高 110 米、水库总容量为 283 亿立方米，灌溉面积为 1520 万亩。

1960 年 1 月 1 日，黄河上的刘家峡水利枢纽工程胜利截流。大坝截流后，形成了一个面积达 100 多平方公里的水库，蓄水 49 亿立方米，可以灌溉农田 1500 多万亩。同年 2 月 24 日，黄河青铜峡水利工程枢纽拦河坝胜利截流，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是一个集发电、灌溉和调节黄河水量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综合利用型的水利枢纽工程，大坝合拢后，可以控制宁夏、内蒙古两个自治区的黄河凌汛，并使宁夏地区形成一个面积为 1000 万亩的黄河平原灌溉网和山区扬水灌溉网。全部竣工后还可以发电 26 万千瓦，这两处水利枢纽工程连同 1958 年 11 月竣工的黄河三门峡截流工程的完成，使黄河这条万古不驯的大河，第一次听从了人类的指挥。

当然, 大规模集团作战式的大修水利工程取得了重大的成绩。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主要是过多地消耗了劳动者的体力影响了农业生产。党中央觉察出来以后, 决定实行“休养休息”政策。1960年6月, 党中央做出决定, 水利建设只搞续建及配套工程, 不再搞新的水利建设工程, 党中央还建议各省、市、自治区都不要再搞运动式的水利建设活动, 而要建立一支常年的施工队伍专门从事水利建设, 这个队伍的人数只能占农村总劳动力的1%~2%, 全国总计不能超过250万人。中央决定每年冬春用于水利建设和农村基本建设的劳动力必须遵守中央的“三三制”或“四一制”, 即在冬天的100天中, 用于水利和农村基本建设的劳动, 只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 用于田间劳动的劳动力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 用于副业生产的劳动力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若新建大中型水库, 必须在开工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如地质勘探、水文数据计算、设计施工图表, 以及施工工具、施工人员的膳食设备、卫生设备、粮食储备等。

三年的自然灾害, 虽然使粮食生产遭到损失, 但农田水利建设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有效灌溉面积在三年中增加了3亿多亩, 排灌设备增加了8倍多, 并在我国农村出现了一批新的电力灌溉区。著名的产稻灌溉区有珠江三角洲、江苏南部和北部地区、浙江省的杭州、嘉兴、湖州等地区。著名的粮棉灌溉区有: 河北省的唐山、保定、张家口地区, 天津市区, 陕西省的关中地区, 河南省的豫北和郑州、洛阳、三门峡地区, 安徽省的史(河)淝(河)杭埠河地区以及山西省的南部、中部地区。

## “老大哥”的气魄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传统农业国家里，都管工人叫起了“老大哥”，既然能称得起是“工人老大哥”，自然有“老大哥”的气派和风度，而不会像“苏联老大哥”那样专干蛮横无理、背信弃义、背后捅刀子的事。

“全民大炼钢铁”的时代，工人的地位自然不必多说。三年自然灾害中，由于农业生产受到影响，粮食产量上不去，工人的生活也受到很大影响。从1959年9月份起，除高温、高空、地下作业及重体力劳动的职工口粮标准不动以外，城镇人口的口粮每人每月降低了2斤左右。食用油的供应也时常脱销，猪肉、蔬菜也很缺乏。即使是在上海市繁华的南京路，敞开着门的百货商店里，许多货架都是空的，有的只摆着一些“样品”，但这些并没有影响工人的工作热情。

运输业是工业的大动脉，矿石、煤炭等原料的运进，工业制成品的运出都离不开交通运输业。1959年，太原汽车站首先开展了“一条龙运输大协作”的运动。他们发扬“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的共产主义精神，从便利物资运输出发，采取“四破四立”的制度，即：破除审批运单受理制，设立流动上门受理制；破8小时受理制，立流水理货制；破过磅制，立守信用之风；破双货笺制，立单货笺制。保证月度计划及时准确，保证急运物资及时通知车站备战，保证包装坚实符合运输要求，保证货物重量准确，保证车辆提货不受时间气候限制，保证车辆随到随卸，不让车等货。太原汽车站的这种做

法如一石激起千重浪，各地运输部门纷纷效尤，于是出现了新路矿一条龙运输大协作，本溪路厂“一条龙”运输大协作及秦皇岛路港“一条龙”运输大协作。

铁道部也于1960年1月份开展了两次全路性的“一条龙”技术表演赛，组织了500条“一条龙列车”参加活动，其中跨两个路局以上的有90多条“长龙”，铁道部还亲自掌握了“一条龙”参加活动。这次活动的开展，保证了鞍山、石景山、汉及上海等主要钢铁厂对矿石和煤炭的供应，促进了钢铁工的发展。这次活动的开展，初步形成了从陆地到江海，从北到南，从矿山到工厂，从城市到农村运输协作“群龙飞舞”的局面。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了345个家合同书及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同，并片面决定从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的1390名专家，并终止派遣900名专家。当时这些专家分布在经济科等部门250个企事业单位，在技术设计、工程施工、设备安装、产品试制和科学研究方面担任重要的角色。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了全部的设计图纸、设计计划和资料。苏联还停止供应给我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苏联政府的这种做法使我国一些重大设计项目和科研项目被迫中断，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被迫停工，一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入生产，严重地打乱了国民经济计划的实现。在我国处于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刻，苏联政府的这种背信弃义的举措，无异于在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自己的痛苦只有自己心里清楚，中国人轻轻地包扎了伤口，开始了自己艰苦的奋斗历程。1960年8月14日，党中央发出

《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全国工业战线的广大职工，都以实际行动响应党的号召，从8月下旬起，钢铁生产有了起色，8月上旬钢铁的日产量平均为3.64万吨，到9月上旬，钢铁日产量平均为4.81万吨，从而扭转了自4月份以来钢铁生产下降的趋势。

另外，全国各行业都开展了技术革新运动，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60年苏联撕毁协议，给鞍山钢铁厂造成了一系列的困难。但是鞍钢的工人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迎着困难前进。没有设备，钢轧板厂的青年工人在“三结合”中，以铸铁代替锻钢，用双炉、双车、双罐、双浇口的办法解决了设备负荷不够的问题，几年来试制成功了直径为1.40的大轧辊等20多个不同规格的轧辊。没有资料，轧钢厂平均只有26岁的“1700轧钢机组”的142名工人，苦练技术本领，经过半年多的时间，战胜困难，开始生产。苏联停止了铬矿的供应，没有高级耐火材料，耐火材料厂女工程师、团支部书记张慧芳和工人一起，经过几十次的试制，终于造出具有世界水平的镁铬砖，保证了工厂的正常运转和生产。

1961年，国家调整了农业政策，农村的生活情况稍有好转。而此刻正是工业处于艰难的时候，于是部分工矿企业中发生了工人情绪极不稳定和大批工人自动离厂的现象。据龙烟钢铁公司和京西煤矿等工矿企业统计的资料说，龙烟钢铁公司在1960年内私自离厂了2800个工人，1961年1至4月份又私自离厂了1700个工人，而且还有逐月增加的趋势。自动离厂的工人大多是采掘工人。其中有不少人是工业生产上的骨干、熟练的打眼工和支柱工。工人离厂的主要原因有七方面：（1）有些农村基层单位采取不正当的手段，瓦解工人队伍，动员熟练工人回

家劳动。(2) 工人工资低，生活待遇差，工人在井下一个月的工资收入不如卖几条鱼，卖几十斤萝卜或卖几十个鸡蛋换来的钱多，正如当时流行的顺口溜：“七级工，八级工，不如老汉一垄葱。”(3) 一些必要的劳动条件得不到保证，例如，庞家堡的一些采掘工人的工作服和鞋已经很破烂，得不到补充。(4) 工人工资奖励上存在着问题，许多临时工长期没有转成正式工，有少数工人调整了等级，而绝大多数人一直未动级。(5) 工人生活安排不尽合理，吃饭的碗筷问题及蔬菜供应问题都未解决好。(6) 放松了对新工人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一些矿的区、厂支部书记异口同声地说现在对工人进行形势教育非常难，工人动辄顶嘴，不少干部也腰杆子不硬，有点理亏。(7) 劳动纪律松弛。针对这些情况，国家制定了种种政策，采取了一些措施安定了民心，恢复了生产。

几乎是与解决工人私自离厂问题同时，国家又制定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的政策。为了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力量，减轻城市粮食等生活用品供应紧张的状况，1960年11月，国家规定：一部分新吸收的职工不再由国家开支工资，应回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压缩县级以上的企事业的一部分职工到县办、社办企业顶替出一部分不熟练的劳动力回农村参加生产。一部分老职工要回国营农场参加生产，但要切实注意不得与民争利，一部分老职工按照干部下放的办法，保留原工资，组织起来去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到1961年底，全国共精减城市人口1345万人，其中回农村参加劳动的有1200万人，其余有的转为小商小贩，有的退休回家，有的从全民所有制企业转到集体所有制的单位。

春去春又回，就这样，许多人从农村来到城市，又从城市

回到农村，来来去去都带着一颗赤诚的心。

## 地球发抖了

据外国地质专家论断，中国是个贫油的国家。于是，中国的石油全依靠进口。当时，中国人都称汽油、煤油为“洋油”，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我国进口石油的数量明显减少，能源供应十分紧张。当时在我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公共汽车烧的不是汽油，而是煤气。汽车上驮着一个鼓囊囊的大气包，有的和汽车体积差不多。

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却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石油地质理论，认为在沉积岩盆地完全有石油生成的可能。于是，我国石油勘探队开进了东北的松辽平原。1959年9月25日，石油勘探工人在松辽盆地陆相沉积中找到了工业性油流，三号井提前喷油。1960年2月，石油工业部党组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提出应在黑龙江松嫩平原中部的大庆地区“集中石油系统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用打歼灭战的办法，来一个声势浩大的大会战”。党中央决定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当年的退伍军人中动员3万人参加开发大庆油田，并陆续从玉门、新疆、青海、四川等石油管理局和30个石油厂矿、院校，抽调了几十个优秀的钻井队和几千名科技人才参加会战。农垦、机械、冶金、电力、建工、铁道、林业及商业等部门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与合作。会战之初，有500多家工厂为大庆生产机电产品和设备，200多个科研、设计单位和企业在技术上给予支持。于是，4万多职工，集50多部钻机，在北部的高产地带打了一场规模宏大、条件十分艰苦

的石油大会战，当年打井 339 口，当年生产原油 97 万吨。经三年的艰苦努力，探明了油田地质储量并正式投入开发生产，1963 年原油的年产量达到 648 万吨。中央还决定利用国内的术和设备，在大庆建一座大型的炼油厂。炼油厂于 1962 年 4 破土动工，经过建筑工人一年半紧张的施工，1963 年 10 月工。投入试运行后，当年年底就正式生产出了汽油、柴油、油等 5 个品种。1963 年 12 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庄严宣布：我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已经以基本自给了，中国人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了。

1960 年年初开始的大庆石油大会战，是中国独立自主开和建设大油田，加快石油工业发展的转折点。大庆油田的勘和开发，不仅粉碎了“中国贫油论”，而且独创了我国自己的油地质理论，为发展我国石油地质勘探和石油工业展示了光的前景。

## 而今迈步从头越

1959 年 6 月，苏联政府片面撕毁了中苏在 1957 年 10 月 1 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我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给我国的核工业建设带来了许多困难。但我国的核工业建设并没有因此而停顿，苏联的背信弃义行为反而更加激发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爱国主义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新中国第一代科技人员以他们扎实的工作基础，用坚持学习外国技术和独立创新相结合的科学态度，推进着核工业研究和核

工业工程建设的进程。

1960年2月，我国在河北省怀来县建成了原子弹爆炸试验场。1960年4月21日，在原子弹爆炸试验场，第一次成功地进行原子弹爆炸试验。这次试验，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数据。

1959年9月1日，在计算技术研究所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大型通用计算机，这台被命名为“104计算机”的快速通用电子计算机每秒钟能够运算1万次。这台计算机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与核爆炸问题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出现极端的困难，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国防会议，讨论关于导弹、原子弹是“上马”还是“下马”的问题，会议的最后结论还是把国防尖端技术放在了优先发展的地位。认为我国的国防尖端技术，只要坚持攻关，加上政策措施得当，争取三五年或更长一些的时间，得到突破是完全可能的。会议确定了一条“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的方针，于是党中央决定自力更生，突破原子能技术，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

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困难时期，党中央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在巩固国防和发展经济中的作用。从1961年起，在国民经济计划体制中，把科技划作一个单独的“口子”。由国家科委负责全面规划，统一安排，然后由国家计委纳入国家计划报中央审批。党中央号召积极发展尖端科技，在工农业生产中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并开展理论研究工作。

1961年1月5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宴请了首都科技工作者，4000多名科技工作者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的盛大宴会。周恩来总理在致词中号召科技工作者，为了祖国的富

强,为了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为了世界的和平,树雄心立大志,埋头苦干,发奋图强,自力更生,奋勇前进。

三年困难时期,物资供应非常紧张。许多科技人员因缺营养,体质明显下降,有的甚至因身体浮肿不能继续坚持工作。但党、国家和人民的期望激励着他们去顽强地奋斗。经过几年的精心研究,1964年10月16日,北京时间15时,在中国的西部上空,升起了一团明亮的“蘑菇云”。中国成功地实行了第一次核试验。这颗装载着六亿人民心愿的“蘑菇云”,在天空庄严地向世界宣告中国国防科技新纪元的到来。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实现了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夙愿。但这方热爱和平的人民并没有把原子弹当成威胁别国安全的工具。在核试验成功后,中国政府发表了声明,说这是中国人民在加强国防力量,反对美国核讹诈和核威胁政策的斗争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并声明,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 两副重担一肩挑

国家对机关和学校的供应因三年自然灾害的到来而出现紧张。机关和学校在抓紧工作与教学的同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生产自救运动。

一般机关都建立了自己的农场,干部及家属定期下农场劳动,种菜养猪,养鸡兔,进行生产自救。1958年3、5月间,江西省5万多名干部奔赴山区、农村,垦荒种田,办起了国营农林垦殖场,并创办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几年来,他们不要国家一分钱,实行半工半读、勤工俭学。既节约了国家开支,又

锻炼了自己的意志。1961年7月30日，毛泽东同志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写了一封信，赞扬了这一事物。

为了帮助国家走出困境，中央国家机关进行了认真的机构精简。从1960年9月到1961年6月，中央各部门在京单位的24万人精简了8万人，占33%。中央各部门的司局机构撤销合并89个，精简率为15%。事业机构合并111个，精简率为26%。精简机构改善了工作作风，提高了工作效率。例如，建工部北京设计院，人员精简了40%，但完成的设计任务比精简前还要多，中央机构实行精简也充实了基层，加强了生产第一线的力量，38000余名干部下放到农村基层和中央各部门直属的厂矿企业单位。直接下放到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干部有8700多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担任了公社和生产队的领导职务。

国家有困难，学生也责无旁贷地分担了困难。1960年，青少年掀起了大搞油料生产的运动。他们利用可以利用的河边、湖边、堤岸边、沟坡边、场院边、房前屋后等空闲地，因地制宜地种植了大量的蓖麻、向日葵、核桃等油料作物。据不完全统计，全国青少年共播种蓖麻、向日葵过400亿株。经过查苗、补种、间苗和移栽后，数量更多。

但是不少城市的大中学校师生，由于劳逸结合不好，营养较差，生活安排不好，有些人发生了水肿肝炎等疾病。这种情况的发生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立即责成有关部门抓紧治疗学生和教师的疾病，并要求办好学校的伙食工作，进一步适当减少师生工作、学习和劳动的份量，增加睡眠和休息的时间，并指出近期不搞运动量大的体育活动，不再安排学生参加校外的义务劳动，严格控制校内重体力劳动，调整教学科研要求，不搞突击竞赛活动，不搞献礼活动。这些措施充分体现了党和国

家关心教育事业，关心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1961年，数十万大学生面临毕业分配，几百万中学生、高小毕业生不能继续升学。这些都直接关系到青年学生的切身利益，但是，广大的学生识大局顾大体，发扬了“国家有困难，大家来承担”的精神，服从了国家的安排。

## 没有硝烟的战场

穿着军装扛着枪，他们守卫着祖国的边疆。脱下军装放下枪，他们并没有退出战场。一场由退伍转业军人打响的“垦荒战”就在祖国的北国南疆，塞外边陲拉开了帷幕。

1956年5月2日，农垦部成立。王震同志担任部长，这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就率三五九旅进军南泥湾，创造了“南泥湾精神”的将军，又领导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农垦事业。农垦部成立后，分别在东北、内蒙古、海南岛、新疆等地区建立了大型的国营农场。

1958年，10万名退伍转业官兵开进了“北大荒”。“北大荒”在解放前是一片一望无垠的大荒漠，气候严寒，交通不便，人烟稀少。农垦大军来到这里时，条件十分艰苦，北大荒冬天的早晚和中午的温差变化大，许多人都生了病。但是农垦大军没有被困难吓倒。经过几年艰苦的创业，他们把这片荒漠变成了生产粮食和大豆的基地。在实践中，他们还逐步摸索和掌握了机械化农业生产的技能和经营管理经验，大大加快了黑龙江垦区的建设和发展速度。

1959年12月，4万名复员退伍战士又开进海南岛和湛江地

区，参加橡胶农场的建设。新疆建设兵团开办的农场也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

到1960年底，农垦系统的国营农场已有20490多处，共有职工280万人，耕地面积达7000万亩，有拖拉机2.8万标准台，一共生产粮食50亿斤。

农垦事业的这种“寓兵于农”的做法，对巩固国防，加强安定团结和稳定边疆局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有利于更好地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开发边疆的水利建设和矿产资源，促进了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加强了各民族的团结，减少了军费开支，同时又有了可靠的物质保证。

## 钢铁长城

1950年西藏和平解放。1959年3月10日，原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分裂分子和上层反动集团公然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全区性武装叛乱，叛乱分子煽动不明真相的僧侣示威游行，袭击执勤的解放军，并向拉萨运输站发起进攻。之后又攻击驻拉萨的解放军和中央代表机关。叛乱分子肆意破坏公共设施，到处烧抢，无恶不作。1959年3月18日，国务院发布命令坚决制止叛乱。3月20日，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奉命开始平息叛乱，在西藏广大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解放军迅速击退了叛乱分子的进攻。到1961年底，叛乱武装大部分被歼灭。平息叛乱的胜利，有力地显示了广大藏胞维护国家统一，渴望民族团结。

与平息西藏少数人叛乱斗争同时进行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祖国西部边疆的自卫战争。

1947年才刚刚独立的印度，羽毛未丰却企图将中国的西藏划入自己的范围之内。在1950年，印度阻挠西藏和平解放的阴谋破产以后，印度政府就派兵向中国边境推进。1959年3月，印度又支持和鼓动中国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举行武装叛乱，阴谋破产之后，印度政府公然向中国政府提出大片领土的要求。当这一无理的要求被中国政府拒绝以后，从1959年8月开始，印度挑起了边界武装冲突。

1959年8月25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段的麦克马洪线以北袭击中国的边防部队。被我国军队击退。10月21日，印军又在边界西段的空喀山口挑起了流血冲突事件。

为了避免事态的扩大，周恩来总理写信给印度总理尼赫鲁，建议双方军队从东段麦克马洪线及西段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维持边界现状，然后举行总理会谈，讨论边界问题。在信中，周总理重申中国政府一贯忠于和平共处原则，不会侵占别国一寸土地，并指出两国都迫切需要专心致志于和平建设，不需要在两国之间，或对任何其他国家制造紧张关系。1960年4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探讨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途径。6月至12月，中印两国官员又进行了多次会晤。但由于印度政府毫无诚意，谈判未果。

1961年5月，印度军队不断地侵入中国边界，修建据点，制造流血事件，并于1962年7月至10月间三次拒绝中国政府提出无条件谈判的建议。1962年10月17日，印度军队在东、西两段同时炮击中国。20日，印度调集10个旅的陆军兵力，在空军的配合下，大举侵入我国境内。中国边防军在遭受重大伤亡的情况下，奋起自卫反击。英勇无比的中国边防军只用了短短的10几天就打退了印度的进攻，清除了侵略军修建的据点，收

复了部分领土。10月25日，印军再次进攻中国，我边防军再次将印军击退，并乘胜追击溃逃的印军，俘获印军多人。在中国完全控制住形势和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中国宣布，自1962年11月22日零时起实行全面停火。中印边界中国自卫还击战的胜利，保卫了领土的完整和中国边界的安全。

## 超越自我

新中国的体育事业没有因为国家出现经济困难而停滞。相反，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我国的体育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国成功地举行了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和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兴建了一批体育比赛和训练的设施。我国运动员在国内及国际的重大体育比赛中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为祖国争得了荣誉，给人民增添了光彩。

1959年9月13日至10月3日，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举行。全国的体育健儿汇集在一起，群情激昂，气氛热烈，比赛成绩十分喜人。

1961年4月4日至4月14日，在北京举办了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有3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选手参加了比赛。我国是东道主，中央一再强调要坚持“一视同仁”的方针。在比赛中，我国运动员发扬了平等、团结、友爱的精神。赛出了风格，也赛出了水平。庄则栋获得男子单打世界冠军，邱钟惠获得女子单打世界冠军。另外，我国男子乒乓球队还获得了男子团体世界冠军。我国的报纸新闻在报道这一消息的时候，还把获得女子团体世界冠军的日本女队一同作为新闻的主题同

时报道,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平等待人、热情待人的优良品质。

1961年2月27日,在北京建立的北京工人体育馆是当时我国最大的体育馆,它能容纳1.5万名观众。它的建成,标志着我国的体育事业有了新的发展。

在体育比赛和体育活动方面。1960年5月25日,北京时间4时20分,中国登山队3名运动员王富洲、贡布(藏族)和屈银华集体安全地登上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这座高耸入云的雄伟大山又一次被英雄的登山队员踩在了脚下,这次攀登的成功,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从珠穆朗玛峰北路攀上顶峰的创举。

1961年3月16日,在北京郊区良乡举行的中国人民航空俱乐部女子1500米个人综合跳伞表演赛中,女子跳伞运动员赵月英创造了距靶心0.365米的世界纪录。

1959年8月30日,穆祥雄在北京举行的游泳比赛中打破了他自己在去年12月20日创造的男子100米蛙泳1'11"4的世界纪录,他的新纪录是1'11"3。

1960年10月28日,我国航空模型选手郁心祯、沈卜洲,在北京举行的一次无线电操纵航空模型创纪录的测验中,他们操纵的无线电操纵牵引模型滑翔机,以1443.92米的飞行高度,打破了苏联运动员德罗于1959年6月创造的飞行高度603米的世界纪录。

1961年2月23日,在奥斯陆国际男子速度滑冰赛中,我国运动员王金玉以196.375分的成绩荣获个人全能冠军。

仅1961年上半年,我国体育运动健儿就打破了62项全国纪录,打破了8项世界纪录。我国运动员就是这样在一次次的超越中,把中华民族拼搏向上的精神传播给世界人民。

## 黄土地永远是根

1959年5月，印度尼西亚掀起了严重危害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与印尼友好关系的反华排华活动。大批华侨无端受到迫害，他们流离失所，无以为生。当时，中国正处在自然灾害的危难中，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受到挫折，但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没有忘记那些侨居在国外的同胞。中国政府不能容忍自己的同胞在外国受到迫害，于是，中国政府就保护华侨的合法权益同印度尼西亚政府进行了严正的交涉。

1959年12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陈毅部长写信给印度尼西亚外长苏班德里约，严正抗议印尼政府制造的大规模的反华排华活动。在信中，陈毅外长还提出了全部解决华侨问题的三点建议。第一，两国政府立即交换关于双重国籍问题条约的批准书，同时讨论和规定实施这个条约的办法。第二，切实保护自愿保留中国国籍或选择印尼国籍而未批准的华侨的正当权益。第三，对于流离失所或不愿意继续留在印尼的华侨，中国政府准备安排他们回国参加建设。希望印度尼西亚政府分期分批地遣送他们回国，并保证他们归国途中的安全。

1959年12月24日，陈毅外长又写信给印尼外长苏班德里约，建议双方立即会谈，全面解决华侨问题。陈毅外长指出，保护华侨的权利是中国政府的责任，只有使愿意留下的华侨得到保障，使愿意离开的华侨得到充分的照顾，华侨问题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

1960年2月2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接待和安置归国华侨

的指示。指示说：近来在东南亚某些国家中出现了反华排华的活动，大批华侨无端遭受迫害。鉴于这种情况，我国政府决定对于那些流离失所，无法谋生或者不愿意继续在海外居留的华侨，将根据他们的意愿，安置他们在国内生活和参加建设。指示还说：我们不仅热烈欢迎受到迫害的华侨回国，而且也热烈欢迎所有愿意回国的华侨回来，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为了做好接待和安置归国华侨的工作，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待和安置归国华侨委员会”。在回国华侨入境的港口，设立接待机构，指示并责成广东、福建、广西、云南省（区）的人民委员会负责做好归侨的安置工作，同时对归侨的安置原则做了具体规定。

归侨安置的原则是，归国华侨学生和具有学习条件的职业青年，依据其学龄和文化程度，安排就业。经济上有困难的，国家给予助学金。归侨中有愿意回原籍同亲属团聚的，由有关人民政府委员会及人民公社妥善安置。归国华侨的生活，各地应给予适当的照顾。归侨带回的财物，一律免收关税，且永远归个人所有。

1960年7月3日，印度尼西亚西爪哇军事当局派遣武装军警数十人，到西爪哇省勃安州芝马圩，强迫当地的华侨迁移。在迫迁过程中，印度尼西亚军警竟用手提枪向手无寸铁的华侨妇孺开枪射击，制造了死亡2人，伤2人的流血惨案。对于印尼西爪哇军事当局的这种杀害无辜华侨的暴行，中国于7月11日向印度尼西亚政府提出了强硬的抗议，并严正要求印尼政府必须保障华侨的正当权益。

中国政府在决定立即解决双重国籍问题，全面解决华侨问题的同时，还直接派出船只协助在印尼缺乏生计而愿意归国的

华侨回国。1960年2月6日至9日，中国政府派出了第一批4艘轮船，接运印尼华侨归国。3月29日上午，第一艘承载2100多名归侨的轮船抵达广州港。国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接待和安置归国华侨委员会主任廖承志以及各方面负责人还有4000多名各界群众一起，热烈地欢迎和亲切地慰问从海外归来的亲人。以后，中国政府又派轮船前往印度尼西亚接运归国华侨前后达51航次。

华侨回国后，国家和各级政府都给予了充分的帮助。为帮助华侨青年提高文化水平，实现华侨受教育的权利。1960年，国家在福建省泉州市创办了“华侨大学”。华侨大学是一所以工科为主，理工结合的综合性大学，这所大学专门招收华侨和港澳学生。

华侨在风雨飘摇中回到故土，在这片黄土地上找到了自己的根。回国后，华侨就投入了祖国的经济建设之中，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 第八章

# 春去春又回

- 走出误区
- “跃进战车”被迫停驶
- 勒住病魔的咽喉
- 再补一枪
- 云压得很低
- 梨酸不酸，一尝便知
- “食”不我待
- 注入强心剂
- 喝点减肥茶
- 锅、碗、瓢、盆



- 红灯停，绿灯行
- 算好当家这笔帐
- 各路诸侯会京师
- 不平静的中南海
- 伤筋动骨的再调整
- “航空母舰”与“护航舰”
- “洗澡”
- 一个好汉三个帮
- 媳妇有身孕，丈夫倍体贴
- 发现误诊
- 拨云见日
- 两个“三七开”
- 走出沼泽地
- 三十年以后才知道



## 走出误区

从1959年到1961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粮食、副食品和日用品供应十分紧张，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在国际上，我们党同苏共之间的分歧和斗争日益尖锐，大论战日趋激烈和公开；美帝国主义和印度政府也一再掀起反华合唱。面对国内外的严重形势，我们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同甘共苦，为克服暂时困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在国际上坚决顶住苏联领导集团的压力，打退了美帝和印度政府的进攻。

为了克服暂时困难，党中央从1960年下半年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同时强调发扬人民民主，加强调查研究，认真总结经验，切实贯彻政策，克服和纠正实际工作中“左”的错误。在中央的领导下，各方面的工作都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许多具体工作条例，如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手工业九十五条，教育六十条，科技十四条等。中央统战部也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起草改善党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关系的文件。1962年1月，中央召开了有7000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加强集中统一。会议前后，又为在“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

数同志进行甄别平反，还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由于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的贯彻执行，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到1962年，国内经济形势开始好转。

## “跃进战车”被迫停驶

由于1960年上半年的高指标、“共产风”等错误比1958年的错误还要严重，影响范围也更为广泛，并且发生在1958年的错误造成的国民经济困难尚未得到基本缓解、全国许多地区又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之时，因而造成了严峻的国民经济困难。

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膨胀，重工业生产指标太高，加上“共产风”和自然灾害的影响，1960年的农业、轻工业产品大幅度下降，农业总产值只完成了415亿元，下降了12.6%，轻工业总产值只完成了550亿元，比1959年下降了9%。粮食、棉花、油料及其他主要农副产品和棉纱、布、食糖等主要轻工业产品的产量都大幅度下降，这是建国10年来从未有过的现象。

粮食的极度缺乏，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据部分省、区和共青团中央反映，有相当一部分职工、学生和居民患了浮肿病。例如10月和11月间，太原市14所大学占13.5%，山东省财政厅竟占到了35%以上。另外，患肝炎和妇女病等疾病的人数也不断增加。更为严重的是，全国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还出现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现象，1960年，全国人口净减了1000万人。由于“大跃进”的错误，出现了市场供应极度紧张，全国居民的消费水平严重下降，日常生活受到极大

影响, 还导致了国家财政的危机, 赤字严重。

面对 1960 年出现的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 党中央就不得不再度采取措施纠正“大跃进”的错误, 并开始从根本上考虑“大跃进”战略是否正确的问题。

为了纠正“大跃进”的错误, 并缓解这一错误所造成的严重困难。1960 年内党中央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 降低供应标准, 对于粮、棉、油及其他食品和日用生活用品, 都压低了供应标准, 实行了严格的凭票限量供应, 1960 年实行凭票供应的商品高达 50 种之多, 其零售额占到了社会商品总零售额的 40.7%; 2. 采集、制造代用食品。粮食、副食品的极度缺乏, 迫使人们寻找其他东西替代, 为了领导代食品的采集和制造运动, 中央和各地区、各部门还专门成立了各种领导机构。这一运动的开展, 对于渡过困难和灾荒, 起到了重要作用; 3. 精减职工人数。中央通过了《关于当前劳动力安排和职工工资问题的报告》, 决定停止从农村招工, 精减各类企业的非生产人员以及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的工作人员; 4. 压缩社会购买力。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力紧缩社会集团购买力的指示》, 要求全国一切机关、团体、部队、学校、企业、事业单位, 在今后 5 个月内, 要把公费中的商品性支出部分压缩 20% 左右, 全国共压缩 5 亿元, 凡是资金不合乎国家规定的, 应一律交回中央或地方财政。这样, 就大大压缩了社会购买力, 减轻了市场的压力; 5. 缩短基建战线。由于基建投资过多, 严重影响了工农业生产, 也妨碍了钢铁“跃进”指标的实现, 于是决定凡是没有开工的限额以上项目, 一般不再开工; 已经开工的项目, 除确保一批增产原料、材料和支农的重点项目外, 其余的项目应停建的停建、应推迟的推迟, 压缩计划的实行, 毕竟有效地控制了基建规模急

剧膨胀的势头；6. 加强财经管理；7. 纠正“共产风”错误。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规定了有关政策，对于稳定农村政策，煞住“共产”歪风起到了重要作用；8. 发展农业生产，党中央充分认识到发展农业生产的极端重要，作出了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的规定，成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良好开端。

在纠正“大跃进”错误，缓解“大跃进”所造成的国民经济困难的过程中，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大跃进”错误的认识也逐渐深化起来。

196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举行扩大会议，讨论196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几年来的经济建设工作。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计划指标还要加以调整，真正的“大跃进”是留有余地的，只有留有余地才能把劲鼓起来。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的《十年总结》一文，回顾了建国以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经济建设工作，指出了近几年存在的思想方法不对头、违反实事求是原则和指标没有留有余地等问题。提出，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在我们面前，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调查研究，从而找出它固有的规律。这里，毛泽东承认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还不很了解，毛泽东的讲话对重新纠正党在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起到积极的作用。

共产党史话  
PDG

## 勒住病魔的咽喉

为了扭转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摆脱“大跃进”造成的困境，在农村工作方面重新纠“左”的同时，在工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布局方面，积极寻找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根本途径。严重的经济困难教育了党，使我们认识到经济建设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否则就要受到严重惩罚。

1960年7月15日至8月10日，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研究了国际问题和国内经济调整问题。会议批准了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副主任薄一波提出的《1960年第三季度工业交通生产中的主要措施》，会议制定了《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指出“农业是国家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粮食问题的解决，不仅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而且直接影响到工业的发展”。中央要求全党全国人民一致努力，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并提出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加强秋田管理，争取秋季粮食丰收，搞好粮食管理、调运，安排好人民生活等具体措施。

8月下旬，李富春主持的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汇报1961年经济计划时，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提高的问题，周恩来表示赞同，并且加了“充实”二字，变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9月30日，中央批准了经周恩来审定的国家计委提出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首次在正式文件中提出“八字”方针，要求在1961年把农业放在首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

固、充实、提高”。

由于八字方针是在讨论安排 1961 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的过程中提出的，因而，国家计委提出，为中共中央所基本同意的《关于 1961 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初步意见》，便明显体现了对国家经济进行调整的特点：加强对农业的支援；放慢工业的增长速度；减少基本建设投资；精减职工人数；压缩社会购买力；控制文教卫生事业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还改变了实行时间长达 3 年的生产计划三本帐的做法，提出 1961 年的计划只搞一本账，各地区、各部门在执行时不得层层加码。这对防止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等错误，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1960 年 11 月 15 日至 12 月 23 日，第九次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进一步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讨论了准备提交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审议的 1961 年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和计划安排要点。李富春在会上的报告中总结了“大跃进”的主要经验教训：（一）发展国民经济必须真正以农业为基础；（二）人民公社必须坚持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三）计划指标必须留有余地；（四）必须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五）必须充分注意产品的质量 and 品种；（六）必须把权力适当集中于省、市和中央。李富春总结的这些经验教训，基本上抓住了“大跃进”的主要问题，表明党对“大跃进”错误的认识大大前进了一大步。

## 再 补 一 枪

在 1960 年下半年采取了一些纠正“大跃进”错误的措施，

并对“大跃进”的经验教训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总结的基础上，1961年1月举行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大幅度压低了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最后终于停止了长达3年的“大跃进”运动。

八届九中全会，是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的。参加全会的有中央委员83人，候补委员87人。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23人列席了会议。在全会之前，从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举行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的召开作了准备。

李富春在八届九中全会上作了《关于安排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意见》的报告。会上讨论并通过了这个报告，正式决定从1961年起，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他在报告中指出：我国国民经济经过了3年的连续大跃进，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当前的困难，连续大跃进产生了新的不平衡，特别是工农业之间不平衡。鉴于上述情况，报告指出：“这就需要我们z从1961年起，在两三年内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即调整各个部门之间已经变化了的相互关系，巩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发展和变革中获得的硕大成果，充实新发展起来的一些事业的内容，提高那些需要进一步改善的新事物的质量，”实行“八字方针”的中心环节是“调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目的，是搞好综合平衡，就是“照顾全局、分别缓急，掌握各个方面的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内在联系，使需要和可能结合起来。”

根据上述方针，报告强调了1961年国民经济的安排，必须

更好地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的方针，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来安排经济生活。要求各级部门都应毫无例外地加强对农业的支援。报告指出1961年要努力加强农业战线，适当缩短工业战线；要注重品种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适当放慢数量的增长。具体规定1961年基本建设投资为167亿元，比1960年减少103亿元；大中型项目900个左右，比1960年减少700个左右；精减下放职工502万人。

为了保证1961年国民经济按照上述方针顺利发展，贯彻全国一盘棋的精神；要加强集中领导，改进经济管理体制，把某些下放过多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三级，而在最近两年，权力更多地要集中到中央和中央局；要经常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及时解决问题；要搞好经济部门和企业的整风，在坚持克服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对生产瞎指挥风等不良作风的基础上，改进管理体制和健全管理制度，严格质量检查和加强经济核算，纯洁职工队伍。

会议决定在农村深入贯彻《十二条》，进行整风整社运动。确定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各行各业要加强农业的支援，尽最大努力争取农业生产获得好的收成。要努力搞好综合平衡，使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趋于协调。要改善商业工作，活跃农村市场，逐渐改善供应状况。会议还听取和讨论了邓小平关于1960年11月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并且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对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议期间的工作表示满意。全会还批准了中央政治局1960年9月关于成立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个党的中央局的决定，并明确指出，各中央局以建立本地区的

比较完整的经济体系为其主要任务。

鉴于“大跃进”以来许多决策严重脱离实际的经验教训，毛泽东一再强调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他在讲话中指出，做工作要求三点：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情况是第一条，是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谈起。因此，就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他号召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搞一个实事求是年”。

八届九中全会，是在我国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时刻举行的，会议确定了对国家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一系列具体政策，是党纠正“左”倾错误，克服经济困难的重要决策，基本上终止了长达3年的“大跃进”运动，实现了经济建设方面指导方针的重大转变。

## 云压得很低

当你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你是否能发现它的真正内涵——陈云。

陈云同志建国后曾长期主管经济工作，为新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几个紧要关头，为把我国经济从危局中扭转过来，使其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陈云同志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辩证方法出发，表现了高超的经济工作领导艺术和才能。

关于解决吃饭问题，压缩基建规模，合理安排钢铁生产，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的一系列决策使我国渡过3年困难时期发挥了巨大作用。

陈云同志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经济工作能力，给毛泽东同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60年代初，毛泽东同志谦虚地说，做经济工作他不如陈云同志。

50年代后期，受“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国民经济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此后3年的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更使我国的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难，人民共和国再次面临严峻的考验。危难时刻，陈云同志又一次挑起了克服困难的重任。

当时的经济困难，首先表现在人民生活的困难。因此，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陈云同志首先注意的就是人民生活，特别是吃饭问题。正如他所说的：“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6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

1959年，困难时期刚刚开始，陈云同志就敏锐地注意到粮食问题的重要性。他在给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的信中指出：“我认为不管今年粮食增产多少，都必须省吃俭用，控制销量。抓住这一头十分重要。我国粮食问题还没有过关。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粮食现在仍然是稳定市场最重要的物资，一定要做好这一方面的工作。”1960年到1961年是我国粮食最紧张的时期，陈云同志经过再三考虑，主张进口一部分粮食。在当时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很不容易的，一来我们的粮食一直是出口的，靠出口粮食换取外汇，购买工业设备；二来进口粮食名声也不好听。因此有些人认为吃进口粮就是“修正主义”。为此，陈云同志专门请示毛泽东，希望通过法国转口购买美国的粮食。这个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成。后来，我国进口了大约1000多吨粮食，这对缓解当时粮食供应的紧张局面，稳定人心，起到

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陈云同志还提出了压缩猪肉出口，每人每月供应半斤肉；每人每月供应3斤大豆，增加半斤鱼，开高价饭馆，制作高级糕点等办法。这些办法在改善人民生活，稳定人心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生活上的困难是由于生产上的问题造成的，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的生活困难，还必须解决生产问题。而生产上的问题，首先是钢铁生产的高指标问题。当时的方针是“以钢为纲”，指标定低了，通不过，还有可能被扣上右倾的帽子；定高了无法完成，还会继续造成浪费。这样，1959年的钢铁生产指标直到5月份尚未落实。陈云同志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反复研究和反复论证，提出1959年的钢铁生产指标为1300万吨。为了说服大家接受这一指标，陈云同志从矿石、焦炭、耐火材料、冶炼、运输等5个方面进行了强有力的论证。

关于矿石，陈云同志指出：我们有14个机械化装备的大型采矿企业，19个中型采矿企业以及214个小型土法采矿点，加起来全年只能开采7100万吨矿石，而能运出来的只有7000万吨。炼1吨生铁需要3.5吨矿石，因此，从矿石生产条件看，我们只能生产2000万吨生铁。焦炭的生产也是这样，炼焦的关键是洗煤，炼1吨铁平均要1.5吨焦炭，炼1吨焦炭需要1.5吨洗煤，而我们的洗煤能力是怎样的呢？大型的机械洗煤厂1959年大约可以生产1950万吨，新建的洗煤厂当年可以生产550万吨，两项合计是2500万吨，还差2000万吨，这2000万吨要用土法来造大约需要60万个劳动力生产200天才能完成。就是说焦炭的生产也是非常紧张。另外，耐火材料、炼钢、轧钢设备、交通运输等也都非常紧张，根据这些情况，1959年生产2000万

吨生铁（1300万吨钢）可以说已经是满打满算，再增加是相当困难的。1959年，陈云同志在关于钢铁指标问题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指出，去年“小高炉炼出的900万吨铁，目前含硫量超过冶金规定千分之二标准的有40%以上，有的说至少50%，那就是说，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将有4、5百万吨生铁含硫超过标准，既不能用于铸造，也不能在炼钢后轧成有用的钢材，这是劳民伤财。”由于陈云同志做了大量周密细致的工作，提出了有说服力的论证，他提出的1300万吨的指标被政治局采纳。此后，我国的钢铁生产逐步转入正轨。

生产上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现在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从1961年起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2年2月，在北京中南海西楼举行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进一步讨论了整个经济形势和如何调整的问题，陈云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最近几年工业建设的大发展，是建立在1958年生产7000亿斤粮食，7000万担棉花的错误估计上的。当时以为粮食过了关，可以大办工业，所以大量招收职工。这几年增加了那么多职工，绝大部分是1958年下半年招收的。从过去的经验看，今后几年即使恢复到年产3200亿斤粮食，同现有的建设规模还是不相适应的。”“已经摆开的基建规模，不仅农业负担不了，而且也超过了工业的基础。”从这一观点出发，陈云同志认为，必须大幅度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压缩基建规模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对重工业和其它一些基本建设项目的指标“伤筋动骨”；一是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两项动作难度相当大，但陈云同志依靠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都出色地完成了。重工业和其他一些基建指标

都相应得到了调整，降到了与国力基本相适应的水平。1962年以后，2000多万城市人口回到乡下。这样，粮食供应的紧张局面得到了缓解，工业对农业的压力也减轻了。

如果说压缩基本建设指标，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只是克服困难的一些暂时的、消极的办法的话，陈云同志还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对策，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发展农业，加强这一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1961年6月，陈云同志亲自到上海市青浦县小蒸公社进行了15天的调查，调查中他发现当时的农业生产中存在着许多问题：第一，生产中瞎指挥的现象非常严重，例如，本来只能种单季稻的地方，干部却强迫农民种两季稻，本来种竹林比较合算的地方，却要农民砍去竹林种粮食等等；第二，减少或者完全取消了自留地，使农民丧失了自由劳动的空间，降低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第三，副业生产都由集体组织，猪、牛、羊都由集体饲养，由于管理不善，使得产量下降。针对这种情况，陈云同志提出，种两季稻不合算的地方要恢复种蚕豆和单季稻；母猪要下放给农民饲养；另外，要为农民留足自留地。这些措施都对农业生产的恢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发展农业方面，陈云同志还特别注意化肥生产。1961年后，他在杭州召集化肥小组的同志开会，决定集中力量，建立大型的氮肥厂。他强调，为了发展农业，增加粮食产量，必须尽可能地加快氮肥工业的发展。陈云同志倡导的氮肥工业的兴起，对于我国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许多国外专家认为，60年代初，我国化肥工业的兴起，标志着我国农业开始了现代化的里程。

回顾这一时期，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陈云同志卓

有成效的工作，我国的经济恐怕不会恢复得那么快，困难时期可能还会长。

## 梨酸不酸，一尝便知

以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为开端，我国国民经济进入一个调整阶段。已经由“以钢为纲”的“大跃进”转向“调整”，重新恢复了八大确定的综合平衡稳步发展的经济建设方针。

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统一全党的认识。从1960年冬重新纠“左”开始，毛泽东反复强调调查研究。他在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做工作要有三条，一要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情况明是第一条，这就要搞调查研究。毛泽东希望领导干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乱发言，不要下决心，他号召各级党委书记和部门负责人都要进行调查研究。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以后，他亲自率领三个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广东等省农村进行调查，发现中央发出“紧急指示信”之后，主要解决了公社与生产队之间的“共产风”的问题，但没有解决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的问题。3月10日至13日，毛泽东在广州召集的中南、西南、华东三个地区的中央局和省、市、区党委的负责人会议（即“三南”会议）上，再一次强调了调查研究，特别是领导干部做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说：第一书记要亲自动手，第一书记不动手，第二书记就动不起来，只要省、地、县第一书记都

亲自动手做调查研究，那就好办了。毛泽东在会上宣读了他写给参加“三北”会议（即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在京主持召开的东北、华北、西北三个地区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会议）的中央同志的一封信，建议他们到县、社、队进行调查研究。

广州会议还起草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调查工作》，要求县级以上各级领导机关，联系这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深入地学习和讨论。信中还从认识论的高度，初步分析了“大跃进”以来所犯错误的原因及其教训。要求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深入基层蹲下来作系统的调查研究，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要使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成为全党干部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

广州会议后，刘少奇到湖南长沙、宁乡，周恩来到河北邯郸地区，朱德到四川、河南、陕西，邓小平、彭真在北京顺义、怀柔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向党中央提出许多正确的建议，对系统解决人民公社中存在的问题，有重大意义。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大力倡导和以身作则带动下，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对全党端正思想路线、恢复实事求是优良传统，对正确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确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更积极地贯彻执行“八字方针”，都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邓小平  
PDG

## “食”不我待

1961年上半年，党中央重点抓了农村政策的调整工作。为了总结人民公社建立3年的经验教训，系统解决上述问题，3月14日至23日在广州举行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研究了农村人民公社的有关问题，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为“农业60条”。

《条例》的主要内容是：（一）规定了人民公社的性质、体制、规模和分配原则。《条例》规定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其现阶段的根本制度是以生产大队所有制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生产队是直接组织社员生产和生活的单位，人民公社必须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分配原则。（二）规定了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职权。《条例》规定人民公社可协调、组织和指挥各生产大队的生产，但在制定生产计划、组织农业生产和推广农业技术等方面不得瞎指挥、强迫命令和限制太多太死，在兴办公社工业等社有事业时，不得无偿抽调大队和生产队的人力、财力，损害社员群众的利益；生产大队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在全大队内实行统一分配，同时又要承认生产队的差别，对生产队真正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制，避免产生平均主义；生产队必须实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和评工分制度，公共食堂可根据情况来办，真正自愿参加，以避免社员之间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三）允许和鼓励发展农民家庭副业。指出，人民公社社员的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它附属于集体

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它们的助手。允许和鼓励社员利用剩余时间和假日，发展家庭副业，增加社会产品，补助社员收入，活跃农村市场。（四）保障社员的私有财产。规定，要保障社员个人所有的房屋、家具、衣被、自行车、缝纫机、存款等一切生产生活资料和小农具、工具等一切生产资料，永远归社员所有，任何人不得侵犯。

这样，广州会议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就全面继承和系统发展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纠“左”成果，正确地作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一系列政策规定。经过两个月的调查研究，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根据广泛调查研究过程中征得的意见，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中关于供给制和公共食堂等方面的规定作了重要修改。关于供给制，《条例》原规定在社员的收入中应占3成，会议取消了这一规定，强调“生产队必须认真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避免社员和社员之间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关于公共食堂，《条例》原规定要积极办好，社员口粮分到食堂，会议改为“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口粮必须分配到户，对于参加和不参加食堂的社员，生产队同样看待，不能有任何的歧视”，这在实际上就等于允许停办公共食堂。另外在山林、工具的所有权和生产责任制等方面，作出了更完善的规定。进一步作出了取消供给制和解散公共食堂的决定，基本解决了在分配方面社员和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

1961年6月19日，中共中央还发了《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下最大的决心，贯彻执行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反复多次的指示，坚决纠正平调错

误，全部、彻底进行退赔”。在此前后，中共中央还批转了安徽省委和河北邢台地委的报告，肯定和同意了安徽和邢台农村实行的包工包产责任制、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以及大包干等做法。这一切，对于切实纠正“共产风”等错误，提高社员群众的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积极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除继续从各方面精简和节约劳动力、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以及加强各行、各业，尤其是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外，1961年中共中央还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 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1月15日，中央决定，在继续实行粮食超购加价5%的奖励政策的同时，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其中粮食收购价提高20%。3月到夏收期间，中央又提高了猪、禽、蛋、油料等的收购价格。为了鼓励农民种植经济作物的积极性，4月3日，中央还发出了《关于收购重要经济作物实行粮食奖励的指示》，决定对收购棉花、油料、烤烟、麻类等重要经济作物，实行奖励粮食的政策。收购一担棉花，奖励35斤粮食；收购一担花生仁、芝麻或烤烟，奖励20斤粮食。执行结果，1961年全国粮食收购价格平均提高了25%，生猪提高了26%，禽蛋提高了37%，油料提高了13%。农民从提高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中，大约增加了30亿元的收入。

(二) 减少粮食收购。由于农村极度缺粮，中央减少了农村的粮食征购量。1961年，国家共征购粮食809.4亿斤，比1960年的1021亿斤减少了212亿斤，占当年粮食产量的比重，由1960年的35.6%下降到了27.4%。

(三) 降低农业税率。6月17日，财政部提出并经中央批准，降低了农业税率：农业税的实际负担率，即农业税正税加地方附加税额占农业实际收入的比例，全国平均从1957年的11.6%降为不超过10%；各地的地方附加相当于

正税额的比例，由过去的15~30%，一律降为不超过10%。调整后的新税率，3年不变，增产不增税。按照新税率计算，1961年农业税的征收额计划为240亿斤，比1960年减少98亿斤，减少了29%。比1957年减少153亿斤，减少了38.9%。

“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全党已开始大办粮食，大办农业，加强农业战线是全党的长期的首要任务，为发展农业作出了艰苦的努力。主要措施有：进一步调整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修改完善农业六十条；从各方面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劳动力，充实农业战线；压缩农村的基本建设战线；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工业部门应该把支援农业的任务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反对官僚主义，安排好农民生活；适当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等。这些措施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 注入“强心剂”

调整国民经济的关键，在于压缩重工业生产，调整工业内部结构，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1958年的“大跃进”，是从钢铁翻番开始的。钢铁的高指标降不下来，整个重工业战线就不能缩短，重工业孤军突起破坏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关系的状况也不能根本改变。所以必须首先坚持把钢铁指标压下来。1961年初确定的钢铁指标仍为1900万吨，到7月调整为850万吨，实际完成870万吨。煤原定指标为4.36亿吨，7月调整为2.7亿吨，实际完成2.78亿吨。1960年自觉性提高了，年初就确定了比较合乎实际的指标，钢750万吨，略低于1958年的实际完成数；4月又降为600万吨，实际完成667万吨。煤为2.5亿吨，

后又下调 1100 吨。这样，各部门的比例关系趋向平衡了。

1961 年 8 月下旬至 9 月中旬，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认为，从我国经济发展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来看，1960 年春就及时对工业进行调整，放慢重工业的发展速度。经过讨论，会议通过并发出了《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作出了对工业进行调整的一系列规定：（一）所有工业部门，在今后 7 年内，必须毫不动摇地切实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在今后 3 年内以调整为中心。要下最大决心把工业生产和工业建设的指标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二）在工业管理中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改变过去一段时间内权力下放过多的现象。各地区、各部门在生产、基建、物资、资金等各方面，必须接受中央的统一安排、统一指挥。（三）在全面安排的基础上，要抓住中心环节。今后一个时期内，必须集中力量，抓煤炭的数量和质量，抓钢铁的品种和质量。为了保证那些必须继续生产的企业的正常生产，对缺原材料资源的企业和消耗物资多、产品质量低、成本高、长期亏损而短期又不能改变的企业，应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对待，或者暂时停产，或者关闭，或关闭一部分。（四）努力增加生产日用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稳定市场。过去转产生产资料的轻工业和手工业企业必须限期恢复原来的生产。会后，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补充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大幅度压低了八届九中全会确定的工业生产指标。

全国的工业企业 1959 年共有 31.8 万多个，经过调整，减少到 19.7 万个，减少了 38%，基本上改变了工业战线过长的状况。

与此同时积极发展轻工业，优先发展了塑料、化纤、电子

等急需的新兴工业。调整并不是一刀切，一律下马，而是有上有下，使整个国民经济结构更合理。因此，在整个基本战线大大压缩的情况下，急需的新兴工业还是加速上马的。这些工业的兴建和投产，对平衡各部门的比例关系，缓和 market 紧张，保证商品供应，改善人民生活起了积极作用。

加速了动力工业，特别是石油工业的发展。1960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大庆地区进行石油勘探开发大会战。在经济困难的形势下，石油工人头顶青天，脚踏荒原，爬冰卧雪，英勇奋战，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石油工业的迅猛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调整，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为了改变“大跃进”以来工业企业规章制度废弛、生产秩序混乱、设备遭到损坏、经营亏损严重的局面，1961年党中央还加强了企业的管理工作，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

1961年初，李富春直接组织和领导调查组到北京第一机床厂等单位调查，广泛了解企业的各方面情况。6月，中央指定薄一波负责研究各方面的调查材料，主持工业条例草案的拟定。8月，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对条例草案进行了认真修改。8月下旬至9月中旬在庐山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则正式通过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要求国营工业企业普遍试行。《条例》规定：企业必须完成国家计划；必须建立健全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必须加强技术管理；必须实行经济核算；必须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必须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这些规定，对于扭转企业管理混乱的局面，恢复和建立正常的生产秩序，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经营管理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

## 喝点减肥茶

1961年1月23日，国家计委和国家建委联合发出通知，将原定的1961年第一季度基本投资28.8亿元、大中型项目855个的基本建设计划压缩为20亿元左右和不超过500个。2月2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安排1961年第一季度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通知》，要求1961年第一季度的基本建设，除原定855个项目外，其余项目坚决停工；855个项目中，除煤炭、木材、运输、矿石等重点项目外，其他项目也要缓建；一律不得安排自筹资金的建设项目；除已有材料的校舍、宿舍和民房外，其他非生产建设一律停工。对于国家计委安排的1961年的年度基本建设计划，中央还提出了有多少材料、设备，就办多少事情的原则。

遵照中央的指示，国家计委调整了1961年的基本建设计划，将预算内投资由原定的167亿元缩减为129亿元，比1960年预计完成数减少216亿元，减少62.6%；大中型基建项目由原定的900个减为771个，加上少量施工的收尾，维持和筹建等项目325个，共为1096个，比1960年预计完成数减少739个。

为了尽量减少停建所造成的损失，当时，中央对停建项目所采取的措施是：（一）长期停建的项目或单项工程，现有的生产准备人员和设备、材料等物质尽量调出，以免长期积压；短期停建的项目，生产准备人员和设备、材料等物质积极调剂使用，并维护好尚未完工的工程。（二）停建、缓建和维持项目所

结存的设备、材料,应按建设项目的隶属关系,分别由中央主管局和有关省、市、自治区组织清理和调剂使用。(三)停建项目生产准备人员的工资和工程维护费,首先用本单位结存材料、设备的变价款抵充,本单位解决不了的动用地方或部门的内部资源解决,再不够由国家预算另行拨款。经过多次压缩,到年底全国基本建设投资完成127亿元,比上年减少216亿元。全年施工的大中型项目1409个,比上年减少406个。固定资产支付使用率,由上年的68.8%提高到74.5%,积累率由上年的39.6%降到了19.2%。缩短基本战线的工作取得很大成绩。

同时,又进一步调整管理体制。196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文件规定:(一)经济管理大权应当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委三级,特别是中央和中央局两级;(二)1958年以来放得不适当的人权、财权、商权和工权,一律收回;(三)收回过去下放的国防、铁路等部门的企业;(四)中央统一管理重要物资的调剂和分配;(五)货币发行权归中央,财权必须集中,各级财政不许搞赤字预算;(六)国家规定的劳动计划,各地区、各部门不许突破;(七)所有生产、基建、收购、财务等工作,必须执行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本帐的方针,不得层层加码。

为了解决企业留成利润太多,各地区、各部门将其大量用于计划外基本建设的问题,国家计委、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还经中央批准,作出了调低企业留成利润、加强对企业利润留成资金管理、严格基本建设拨款监督以及加强对企业流动资金和成本计划的管理等方面的一系列规定。这样,通过上述规定的执行,中央就基本上收回了过去不适当下放的各种权力,加强了对国民经济的统一集中管理。

3年“大跃进”的实践，在计划工作方面给党中央以深刻的教训。因此，在不断压低生产指标，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的同时，中央还注重了对计划工作经验教训的总结。1961年10月国家计委提出，中共中央同意并转发各地试行的《关于改进计划工作的几项规定》，就集中体现了党中央对计划工作经验教训的深刻认识。国家计委等单位在初步安排1962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时，完全改变了“大跃进”期间首先安排过高的钢铁等重工业产品产量指标，然后再根据实现这些指标的需要，安排其他工业产品的产量计划，即所谓“一马当先，万马齐奔”的错误做法，而是先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然后再根据财力、物力的可能来安排生产和基建。这样，就使1962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建立在比较稳妥可靠、综合平衡的基础之上。它的执行，缓解了国民经济的困难，加速了调整工作的进程。

### 锅、碗、瓢、盆

为了缓解供应紧张局面，改善人民的日常生活，首先发展日用工业品生产，缓解市场供应紧张局面的最有效办法，是发展生产，增加商品的供应。1961年党中央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粮食等农副产品供应的同时，还注重了日用工业品生产的恢复发展。当时中央一方面制定了《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手工业35条》，调整了对主要生产日用工业品的手工业的政策，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又在人力、资金、动力、设备和原材料等方面，尽可能满足了轻工业和手工业等日用工业品生产的需要。这

样，就使1961年日用工业品的生产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日用工业品供应的紧张局面。

其次改进商业工作。1961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又称《商业40条》，制定了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政策：坚持等价交换原则，推广产品收购合同制度；恢复供销合作社和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开放农村集市贸易；恢复同农村商业有关的农产品加工作坊；改善商业企业的经营管理等。这些政策规定，对于增加流通渠道，活跃城乡市场，改善供应状况，起到了积极作用。

接着又需大力压缩社会购买力。1961年初，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的决定》，要求从1961年的社会集团购买力的80亿元中压缩到50亿或40亿元左右，减少40~50%。为了完成上述任务，制定了若干规定，经过一年的努力，到1961年底，社会集团购买力压缩到49.4亿元，比1960年减少了26亿元。

然后还高价供应部分商品，进口一些急需物资。为了调剂人民生活，增加财政收入，加快货币回笼，陈云建议，中共中央批准，在对粮食等18种基本生活必需品实行平价定量供应的同时，在全国的城市、农村，以原材料成本的4.5倍和5.8倍的价格敞开供应糖果、糕点，各地还陆续开办了高价饭馆。在农副产品出口减少，偿还苏联债款，外汇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为了缓和粮食等物品供应的严重困难，国家大量进口了粮食和其他一些急需物资。

# 原书缺页



# 原书缺页



导经济建设的经验不够；另一方面，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这几年我们在某些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

关于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初步总结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所提出的多快好省这几方面是相互制约、互相促进的。以农业为基础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是我们的一个根本方针。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在我国的现有所有制中居于领导地位。社会主义经济，要有统一的国家计划，计划必须符合实际，并且适当留有余地。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必须同经济建设的发展相适应。必须充分发展商品交换，加强和改进全民所有制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我们的交换原则是等价交换。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彻底的民主集中制，是在人民内部实行的根本制度。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自力更生，必须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中建立起强大的经济体系，勤俭建国是我们长期坚持的方针。

刘少奇在报告中指出：“全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踏踏实实地干劲十足地做好调整工作。”“1962年是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最关紧要的一年。要求全党团结一致，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保证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会议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对书面报告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修改。会上中央领导同志的自我批评精神，教育了与会同志，中央各部门和中央局的同志也作了自我批评，开展了相互批评。

强调1962年必须做好以下各项调整工作：（一）从各方面

加强农业战线；（二）积极增加轻工业和手工业生产；（三）继续精减职工、压缩城镇人口；（四）继续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五）调整工业企业的生产任务；（六）努力改善城市供应；（七）尽可能增加原材料生产；（八）切实改进企业管理工作；（九）彻底清理物资，由国家统一调剂使用；（十）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制定的农业、工业、商业等各项工作条例和规定，整顿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为了保证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会议还强调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并作出了国家计划必须完成、重点企业上收中央、基建投资和项目一律纳入计划、财经制度必须严格遵守等 10 项规定。

这样，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就较为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总结了“大跃进”运动的经验教训，提出了 1962 年的各项调整内容，作出了完成这些任务的一系列规定。这次大会，是“八大”以后我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对统一全党的思想，动员全党坚持全面地贯彻“八字”方针，战胜困难，争取国民经济的好转，起了重大作用。

## 不平静的中南海

1962 年 2 月 21 日至 23 日，在北京中南海西楼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讨论 1962 年国家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问题。会议由刘少奇同志主持，在讨论中发现当年的预算有很大赤字，商品供产和社会购买力之间有很大的逆差，会议分析了经济形势，进一步研究了财政经济方面存在的严重困难。刘少奇指出：我国现在处在经济困难的非常时期，要采取

非常措施。会议认为，目前财政存在赤字的局面，必须扭转，要求中央财贸办公室重新提出预算报告。

陈云作了题为《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他在论述了我国财政经济困难的形势和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后，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六点意见：一、把10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从1960年算起，大体要5年，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恢复是为了发展，有了前一阶段的恢复，才能有后一阶段的发展。二、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如果不减人，财政会继续亏空，粮食供应困难，市场发生动乱，就会更加被动。因此，对于减人一定要下决心，否则没有出路。三、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1962年和1963年，必须做到财政、信贷收支平衡，制止通货膨胀。四、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五、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生产，这是根本大计。要研究粮食和经济作物的增产措施，可多进口粮食，保证经济作物的增产；要拨出一部分钢材、木材，制造中小农具，支援农业。六、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上来，目前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是第一位的问题。他并指出“我们工作的基本点应该是争取快，准备慢”。会议一致赞成陈云的意见。

2月26日，根据“西楼会议”精神，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陈云又阐述了他的意见。李富春作了《关于工业情况和建设速度的报告》，李先念作了《关于当前财经、信贷和市场方面存在问题和应当采取的措施的报告》。“西楼会议”后经毛泽东同意，恢复了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任组长，李富春任副组长，统一管理财经工作，3月，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上

又作了重要讲话，周恩来说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观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高度概括了陈云讲话的基本精神。

5月7日至11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和政治局书记处的成员，各中央局书记、中央和国务院的各部负责人共一百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4月下旬，由周恩来、李先念提出的《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案）》。这个报告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当时国民经济的基本形势，如实地指出了经济上的困难，提出了克服困难，争取财经情况好转的方针和重大决策。会议通过了这个报告，并确定把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作为克服困难的关键问题。

会议还讨论了发展农业政策问题。邓子恢再次提出农业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问题，并提出要适当扩大自留地，应允许社员私养耕牛，社员养猪不应该受限制，房权、林权也要解决。朱德提出要鼓励农民发展家庭副业生产，他尖锐地指出：农民的衣、食、住、行光靠正当分点粮食解决不了，一定要靠家庭副业来解决。

经过“西楼会议”，及5月中央会议，全党对财政经济方面的问题和困难的認識深刻了，克服困难的措施明确了，决心也大了。从此，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得到了全面贯彻。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全面展开。



## 伤筋动骨的再调整

7000 人大会和西楼会议后，进一步加深了对国民经济困难程度和调整迫切性的认识，正确作出了对国民经济进行大规模调整的战略决策，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伤筋动骨的调整措施。

(一) 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这是调整国民经济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措施，1961 年就精简了大批职工，减少了大量城镇人口。1962 年 2 月，中央又作出了决定，在 1961 年的基础上，1962 年上半年再精简职工 500 万人，减少城镇人口 700 万人。5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又进一步作出决定，两年内全国职工和城镇人口分别在 1961 末 4170 万人和 1.2 亿人的基础上再减少 1056~1072 万人和 2000 万人。

大批地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是一项困难和繁重的工作。为了安排完成这项任务，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以及各级政府做了大量具体细致的思想教育和组织安排工作。广大被简职工及其家属，也表现了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他们顾全大局，体谅国家困难，自觉服从党和政府的调动和分配，愉快地从城镇回到了农村。到 1962 年底，全国精简职工 935 万人，减少城镇人口 1200 万人。1963 年又继续精简职工 100 多万人，减少城镇人口 300 多万人。这不仅减轻了国家的财政困难和粮食供应的压力，支援了农业生产，而且还配合了对基本建设规模的压缩和对工业企业的关停并转，对促进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 加强农业战线，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党中央采取的主

要措施是，充实农业战线的劳动力，将精简的职工和城镇人口2000多万人送回农村生产，使农村劳动力增加到21278万人，超过了1957年的数目，解决了农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国家向农村调拨了大批钢材、木材、毛竹等物资，并将机械工业的110个企业，5500台机床，约3万人转产农业机械。1962年底，农村铁制小农具基本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同时增加了化肥、农药的生产量和供应量，减少粮食征购，让农民休养生息。1962年国家只征购了640.4亿斤，比1960年少征购280多亿斤，减少了农民的负担。为了解决粮食不足，1961年和1962年，进口粮食167亿斤。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粮食的收购价格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五。银行发放农业贷款，1962年各项农业贷款累计近20亿元，约占当时农业生产资料总值的三分之一。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进一步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到1962年底，农业生产情况已有明显好转。

在农村政策上继续调整。在广泛进行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的基础上，1962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认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有很多好处：一是能够比较彻底地克服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二是生产队的自主权有了很好的保障；三是更加适应当前的农民觉悟程度；四是更有利于改善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要求改变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做法，普遍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农村人民公社3级集体所有制。

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除正式规定了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外，还进一步规定：（一）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不经过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审查和批准，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二）生产队的劳力、农具、耕畜等，都由生产队支配，公社或者生产大队不得随意抽调；生产队对生产的经营管理和收益的分配，有自主权。

这样，便统一了组织生产和进行分配的单位，解决了从1956年高级社以来即已存在，而在人民公社成立后更趋严重的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三）稳定市场，回笼货币，消灭财政赤字。党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切实加强银行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和《关于严格控制财政管理的决定》。一面严格控制货币发行，一面缩减财政开支，同时加强物资管理，清查仓库。并在稳定18种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基础上，对部分消费品如针织品、自行车、茶、酒、糖果、糕点等实行高价出售。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回笼货币60亿元。对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等犯罪活动，进行了严厉打击，因而稳定了市场价格。1962年收支相抵尚节余8.3亿元，实现了党中央1962年初提出的“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要求

（四）压缩教育事业规模、调整知识分子政策。“大跃进”期间，由于不切实际地要求全民大办教育，教育事业的规模也有了急剧的膨胀，超过了国家的经济负担能力，降低了各类学校的教学质量。因此在压缩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规模的同时，也对教育事业的规模进行了大幅度的压缩。分别裁并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445所和1459所，减少学生12万人和32万人，中等以上学校的教职工也精简了34万人。

从1961年7月开始，中央还先后制定和转发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14条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以及《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等文件，总结了1958年以来科学、教育、文艺等工作的经验教训，规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在1962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和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周恩来还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重新宣布，经过建国12年来的锻炼和改造，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已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改变了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对知识分子的错误定性。

对国民经济进行大规模调整的同时，还对在“大跃进”以来的历次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的党员、干部进行了甄别平反工作。这一工作，从1961年就已开始，1962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平反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对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方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另外，党中央还调整了党的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并为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帽子。以上各方面的工作，对加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从政治上保证了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起了重大作用。

（五）继续压缩基本建设规模，降低工业生产发展速度，调整工业内部结构。除大量减少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外，1962年主要抓了压缩国家预算外投资和控制计划外基建项目的工作。当时为了压缩国家计划外基本建设的规模，中央主要作出了以下几项规定：（一）收回下放过多的财权，基建单位订货必须持有银行签署的证明，银行贷款不得用于基本建设；（二）大

中型建设项目要报中央审批，地方的小型项目由各中央局审批，各部直属小项目由国家计委审批，凡未经批准的项目，各级财政部门 and 银行不得贷款；（三）必须在资金、物资、施工力量等落实后，才能动工兴建；（四）所有正在施工的计划外工程，特别是楼、堂、馆、所，不论建设到什么程度，一律停止施工。由于采取了以上坚决措施，1962年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样的基本建设规模，一方面同当时的国家财力、物力基本相适应，从而置于一个可靠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也使国家有可能腾出力量来加强农业和轻工业的生产，逐步恢复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为了切实按照农轻重的顺序来安排国民经济，使工业生产的发展能够同农业所提供的粮食、原料相适应，党中央对工业战线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工作。（一）是压低工业生产指标。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指标都有较大幅度的降低。（二）是调整工业内部结构。从原材料、燃料、动力和资金的供应等方面，重点加强轻工业和支农工业的发展，加强国防工业的发展，加强原材料、燃料工业的发展。（三）是关停并转工业企业。到1962年10月止，全国县以上的工业企业减少1.9万个，加上1961年减少的2.5万个，共减少4.4万个，相当于1960年底工业企业总数9.6万个的45%。全国多数地区的企业数量减少到了1957年的水平，工业生产的规模基本上适应了农业和燃料、动力等的负担能力。

由于党中央在各方面的努力和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全国呈现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加快国民经济的调整，战胜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 “航空母舰”与“护航舰”

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发挥统一战线的革命性，是我党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重要策略，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均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在为克服暂时困难而进行艰巨斗争的3年中，作为统战部长的李维汉和各级统战部门在中央和有关党委领导下，适应暂时困难时期国内外的形势和任务的要求，在工商界、知识界和民主党派等方面，贯彻政策，调整关系，调动服务，促进改造，对于保持和发展国内局势的稳定，加强全国人民的团结，使全党能够集中力量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迅速克服暂时困难，作出了贡献。

从1959年进入暂时困难的开头一段时间，由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影响和“反右倾”运动在党内开展，由于连年“大跃进”和掀起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再加上教育革命、学术思想批判、拔白旗、破权威等“左”的错误做法的连续不断的冲击，工商界、知识界和民主党派大多数人思想上相当紧张，怕批判斗争，不敢讲真话，心情不舒畅。他们对于国内形势和当时称作“三面红旗”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许多怀疑、不满以至抵触；对国际形势和中苏两党大论战有很多疑虑和担忧。在生活上由于供应紧张，也有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看待当时的阶级关系，如何看待工商界、知识界和民主党派多数人的紧张？成为当时统战工作中一个重要的方针问题。统战部门的有关负责同志经过调查研究，注意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分清多数和少数、主流和支流；区分反动和落后、思想认识问题和政治立场问题等……，判明了多数人的基本动向，提出要区别两种不同性质的紧张：一种是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向工人阶级进攻引起的紧张，属于敌我矛盾的性质，另一种是由于我们革命和建设工作中急躁前进的“左”的错误而引起的紧张，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工商界、知识界和民主党派大多数人的紧张，是属于后一种性质。他们是跟而不是反，现在看来，他们的紧张，固然有世界观没有很好改造，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的一面，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党的某些“左”的错误，使他们无法跟上，不可能不感到紧张。但在当时，以李维汉为首的中央统战部门的领导同志主要是强调了他们世界观上的原因。针对工商界、知识界和民主党派的这种基本动态，中央在统战工作中一般实行了主要方面抓紧，次要方面放松的方针，主动缓和同他们的关系。在走社会主义道路，大的政治方向上一致的前提下，政治上予以信任，工作上使他们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在生活上予以适当照顾。为了帮助他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中央统战部向党外人士提出了改造世界观的任务，采取和风细雨，神仙会的方法。同时，采取许多具体措施，切实纠正过去由于“左”的错误所造成的不得人心的事，认真贯彻政策，增强团结，尽可能地把最大多数人团结在党的领导周围，为克服暂时困难而共同努力；使极少数坚决反抗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陷于孤立。由于判明了形势（是跟不是反），提出了任务（改造世界观、进行形势教育），采用了新方法（神仙会），因而逐步出现了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新局面，不仅为保持这条战线的稳定作出了贡献，而且调动了党外人士的积极性，为克服暂时困难增加了助力。实践证明，统战部门在暂时困难时期所

采取的方针、政策和措施是正确的，符合党和人民的要求。

## “洗 澡”

人们平时洗澡的目的是为了洗去全身的泥垢、汗碱，以达到清新、爽快、舒服之功效。面对暂时困难时期统战方面的多种问题，中央统战部也采用了形如“洗澡”的方式，利用神仙会形式，大抓形势教育和思想教育。

神仙会是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一次会议上讲的，是对党内而言。中央统战部在暂时困难时期把神仙会的方式运用到工商界、知识界和民主党派，并且经过党内外共同努力推广到全国，获得完全成功。

神仙会的基本特征就是在党领导下的“三自”和“三不”。“三自”即：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三不”即：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用“三不”来保证“三自”，用“三自”来达到敞开思想，讲心里话，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三自”的“自”是个集体。实行“三自”就是主要依靠一定的集体自己的努力，来解决他们政治思想方面存在的问题。

神仙会首先从工商界开始。1959年底到1960年2月，民建和全国工商联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有将近2000名工商界人士参加。当时党内正在开展“反右倾”运动，有的地方把运动推到党外，在党外人士中搞了重点批判。因此，会议开头的时候，与会人员思想很紧张，怕在会上搞批判斗争，有些人来开会前就准备好了自我检讨的书面材料。进步分子则准备在会上大批大

斗一场。这种形势如不及时扭转，势必形成乱批乱斗，而且势必在全国范围造成阶级关系新的紧张。这在当时是非常不利的，也是违反中央不在党外人士中开展“反右倾”运动的指示的。当时两会领导人准备的会议开法，仍然是谁致开幕词，谁作报告，小组讨论，大会通过等一套程式化的方法。这样开下去，不能解决什么问题，而且势必出现乱批乱斗和被迫检查过关的情况，结果将是很不好的。为了帮助开好这次会议，李维汉同志在他们的会前和会议过程中，多次同两会领导人陈叔通、黄炎培等谈话和举行座谈，建议并且帮助他们改变那套程式化的开会方法，采取和风细雨、神仙会的方法。发扬民主，让大家讲话，讲老实话，讲心里话，坚决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引导大家通过自由交谈、讨论和辩论，达到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的目的。对与会的进步分子，也帮助他们提高认识，端正态度，放下棍子和帽子。这样，与会的工商界人士逐步解除顾虑，敞开了思想，展开热烈的争论，小组会漫谈，会后自由结合漫谈，走廊里、饭桌上到处都在交谈、争辩，相互间有批评，也有自我批评，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大家心情舒畅。

会议集中讨论的主要问题是：（1）对工商界的估计问题。多数人可否说已经基本站到社会主义立场？还是基本站在资本主义立场？（2）当前的任务问题。今后应着重为社会主义服务还是着重改造？服务与改造的关系如何？今后应着重改造政治立场还是着重思想改造？（3）工商界的前途问题。主要是1962年定息到期以后有关的生活待遇，如高薪、定息、政治安排、生活福利等如何处理？

针对会议讨论的问题，李维汉同志于1960年1月18、19两日在大会主席团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坚决靠拢共产党，努力

自我改造，一心一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讲话。内容共有5个部分：(1)大有进步，(2)努力改造，(3)改造的任务，(4)改造的途径和方法，(5)坚决靠拢共产党。这个讲话根据毛泽东同志1959年9月11日在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关于工商界、知识界和民主党派都“大有进步”的指示，充分肯定了工商界的进步，指出他们中“一部分人已经是基本上社会主义立场，一部分人是半社会主义半资本主义立场，一部分人还是基本上资本主义立场”。同时，针对他们中高估进步的倾向，指出工商界还有消极一面，指出需要进行世界观改造的任务。李维汉同志还针对他们在接受党的领导问题上存在的种种疑虑，如认为“寄人篱下”，怕“过河拆桥”，担心“党是不是信任”……，进行了解释，鼓励他们坚决靠拢共产党，诚心诚意接受党的领导，一心一意为社会主义服务。

在两会的神仙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刘少奇同志于1960年2月20日接见了全体与会人员，并同领导人举行座谈。少奇同志在讲话中向他们重申了党的“包一头，包到底”的根本政策，号召工商界“顾一头，一边倒”。对于定息问题，他说“毛主席有过指示，7年定息，到1962年取消，必要时可以留尾巴”。对于高薪问题，他说，“我们的政策是高薪不降，调职不减薪，减者补发”。谈到辞职退休问题时，他说，“将来要拟个办法”，“目前临时怎么处理？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就不一定去上班，请个假，薪水照发。”谈到病假期间工资的问题时，他说，“国务院曾有个规定，就照那样办好了。”“总而言之，工商业者只要跟着人民政府，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同共产党合作，不论老、病或者有其他困难，国家都负责到底。”会后，中央统战部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工商界应当顾一头，一

边倒》的社论，同时，对工商界的病假、工资、福利待遇等问题分别起草了文件，根据中央批转各地执行。这样，就使工商界的主要问题，获得圆满解决。

1960年夏季，民革、民盟、民进、农工、九三和致公党分别召开中央会议。参加这些党派会议的共有1800多人，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实际上是一次全国性的知识分子的会议。中央统战部建议和帮助各民主党派这些会议同样采用神仙会的方法。

各党派举行这次会议的时候，国内困难还在发展，国际上我们同苏共的分歧和斗争扩大到国家关系，更加尖锐、激烈。面对这样的国内外形势，知识界和民主党派多数人忧心忡忡，亟需进行一次形势教育，以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增强信心，稳定情绪。我们在会前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提出了对于帮助民盟、民进，农工和九三等党派开好中央会议扩大会议的一些带方针性问题的意见。这个文件是在北戴河起草的，对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进步作了充分肯定，指出“从政治上说，他们中间的多数人基本上已经转过了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这个大弯子，这是他们主要的一面。”文件对帮助开好这次会议提出如下几点意见。

(1) 通过这次会议对他们进行一次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的正面教育，从理论上和政策上把这些问题讲清楚，在将来的政治形势的演变中，力求使他们中的多数人能在思想上、政治上有更多的精神准备。

(2) 为了使他们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应该帮助他们进行世界观的改造。但这是一件长期的、复杂的、细致的工作，绝不能简单急躁。只要他们同我们在大的政治方向上一致，对他们就应该在政治上、工作上和生活上，予以适当照顾。至于参

加体力劳动，不要勉强，年老和身体衰弱的人，可以少参加或者不参加，使他们能够安下心来，进行工作，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3) 他们反映当前知识分子对合作共事关系问题的意见比较突出，如在机关、学校和厂矿中同党组织的关系问题，新老关系的问题，在三结合中如何发挥他们的力量问题等，中央统战部打算通过这次会进一步调查研究，再提出具体措施报中央请示。

(4) 今后仍应继续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重申民主党派在协助我党推动其成员及其所联系的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进行自我改造方面的作用。

(5) 这次民主党派会议采用开“神仙会”的方式，和风细雨，敞开思想，提出问题，辨明是非，提高认识，进一步推动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加强自我改造。

在各党派会议过程中，周恩来同志应邀到会作了国内外形势的报告，向他们讲了我们党同苏共的分歧和争论的性质、党的基本方针等，进行了形势教育。周恩来同志在报告中还回答了民主党派“后继无人”的问题。他说：毛主席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的，不是偶然的。中国的人口很多，共产党要以无产阶级面貌改造社会，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吸收到党内来。民主党派只要继续前进，社会上会有人继续参加进去的。问题不在于有无后继的人，而决定了你们愿不愿意前进，愿不愿意改造。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周围有各民主党派，共同进行政治教育、思想教育，这就是民主党派的作用。

各民主党派的这次中央会议开得很成功。与会广大知识分

子讲了心里话，摆出了疑虑、苦闷和担心，互相帮助，互相启发，提高了认识和信心。对于会上反映出的大量合作共事关系方面的问题，他们提出要反求诸己，而不是着重责备党员和青年。会议开出了两个积极性，即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积极性和自我改造的积极性。各党派会议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负责同志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同他们照了像。毛泽东同志在同各民主党派见面的谈话中，称赞了神仙会，给了很大支持和鼓舞。

工商界和民主党派、知识界两个全国性的会议表明，神仙会是贯彻和风细雨、深入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的一种好形式，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人们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和推进自我改造的好方法。神仙会决不是无风无雨，更不是什么“自由化”，而是充满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过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在“三不”的条件下进行的，比较自然，能够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党外人士反映神仙会是“有斗争，无压力”，因此，可以把话说得比较深透，增强了团结。这两个全国性神仙会的召开及其在全国范围的广泛传达和层层召开，缓和了党同工商界、知识界和民主党派的关系，增强了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使党外人士在国内物质生活条件十分困难和国外的压力面前，能够经受考验，紧紧地团结在党的领导下，为克服暂时困难贡献力量。这是统战工作的一项成功的经验，也是统战工作的新发展。



## 一个好汉三个帮

“大跃进”以来，由于“左”的错误影响，党内滋长了包打天下和宁“左”勿右的思想倾向，统战政策的贯彻执行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受到严重干扰，或者擅自修改，任意违反，或者搁在一旁，或者乱出点子。许多机关、企业、学校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排斥党外人士，不信任他们，不尊重他们的职权，不给必要的工作条件，甚至任意批斗的现象，严重损害党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关系。在1960年各民主党派中央的神仙会上，对这方面的问题反映相当突出。因此，中央统战部确定在1960年把检查政策执行情况，改善合作共事关系同大抓形势教育，列为全年必须集中力量抓好的两件大事，《中央统战部关于1960年工作的总结和1961年工作的安排》中说，“努力做好这两件大事，就能稳定和团结资产阶级的多数人，为当前中心工作发挥积极作用。这就更有利于全党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的中心工作，在国家建设的各个战线上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就是当前统一战线工作服务于全党中心工作的最基本的任务。”

1961年，统战部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强调调查研究要与解决问题相结合，发现违反政策的问题，要会同当地有关部门及时解决。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针对许多地方党内存在的把统一战线同阶级路线对立起来，借口贯彻阶级路线而在人事安排上挤掉党外人士的清一色倾向，起草并经中央批发了关于继续贯彻对资产阶级人士安排政策的意

见，提出了以下的措施：一、已经安排了的，只要工作上，政治上表现一般，没有违法和严重的错误，一律不应降低和撤掉他们的职务。二、几年来表现较好、工作上有一定能力的，应酌情提拔。三、对上面两种人，如果过去把他们换下来了或者挤掉了，应该要按其他相应的职务或恢复原来的职务。四、对于他们中下放劳动的，必须明确期限，下放期满的，应由原单位负责安排他们的工作，原来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应恢复原职或分配相应的职务。这些规定，对于纠正当时盲目排挤党外人士的“左”的错误，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961年夏季，李维汉同志从东北回来，向中央书记处汇报所了解的东北地区统战工作中的问题和“拔白旗”的影响。邓小平同志说，中央已决定对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受批判的人的问题，将采取县以下一风吹，县以上的逐个甄别。“拔白旗”的问题也可以参照这个指示办理。小平同志又说，现在各部都在制定工作条例，统战部也可搞一个。党外人士有职有权，是中央既定的政策，可以做些规定，这次汇报之后，经李维汉同志提议，部里成立以金城、于刚同志为首的小组，进行调查研究，起草改善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关系的文件。李维汉同志当时提出，这个文件对当前统一战线的形势与任务作出明确的规定，对存在的主要错误倾向，要敢于批评、揭露，提出有力的改进措施，决不要遇到问题和困难就绕着走，要使之成为管一个时期的指导性文件。

这个文件稿经过起草小组和部分会议的反复讨论、修改，1962年4月形成《改善党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关系的意见》提交全国统战部长会议讨论。文件着重反对几年来统战工作中“左”的错误倾向。重新肯定1956年以来统一战线内部的深刻

变化，提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一般说来，政治面貌已经起了根本变化。他们的绝大多数人已经转变为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大部分跨进了重大的一步，有一部分人已经改造成为名符其实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文件稿提出当前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应当是“进一步发扬人民民主，主动改善合作共事关系，对于一切愿意跟着党走的人，都要加强团结，积极使用，逐步改造”。还针对几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总结统战工作的十条基本经验：

(1) 必须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加以正确处理。

(2) 处理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必须坚持说服教育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

(3) 必须全面地贯彻阶级路线，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两个联盟的关系。

(4) 必须充分地实事求是地估计党外人士的政治进步和业务作用。

(5) 必须充分调动党外人士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充分使用一切有用的力量，把使用和改造结合起来。

(6) 对资产阶级人们的改造，必须区别一般要求和更高要求。

(7) 调动党外人士为社会主义服务和促进他们的改造，都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

(8) 必须把提高同盟者的政治水平和照顾同盟者的合法利益正确结合起来。

(9) 必须坚持扩大提高左派、争取团结中间派、孤立分化和改造右派的工作路线。

(10) 必须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反对一切“左”的或者右的倾向。

文件稿的第二部分，提出了进一步改善合作共事关系的七条主要措施。文件稿的第三部分，专章论述进一步活跃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的工作，切实贯彻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整个文件抓住了当时合作共事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破有立，提出具体有力的改进措施。但在统战会议讨论时，有些同志认为广州会议已经解决了问题，这个文件，作用不大了，因此未被采纳。现在看来，这个文件对当时统一战线形势的分析和采取的方针和措施，基本上是正确的，如经修改报请中央批准下达，对于党的统战政策的落实和统战工作的推进，是有积极意义的。李维汉同志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谈到对这个文件稿的看法：“文件今天我又看了一下，从一条一条来看，许多东西是不能推翻的。……因此，不能统统报废。比如‘一视同仁，有所不同’的原则，如果不搞清楚是不行的，这次是写得比较充分的。又如把政协、民主党派放在合作共事关系中，对于我们是有好处，非常重要，是完全对的，就是要整我们自己，要坚持把这个问题放在里面。这个文件是不成熟的，通过则太早了，但是全部推翻是不行的。我们要继续搞。”会后不久，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了，这个文件就没有再搞下去。

## 媳妇有身孕，丈夫倍体贴

精简、下放主要涉及工商业者。1960年有些地区在精简机构、下放人员支援工农业生产一线时，精简、下放了一批原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在工商界中引起相当大的震动，多数人心情非常紧张，怕被精简，更怕下放农村，最怕到农村安家落户。针对这个情况，同时考虑到下放农村不利于他们的改造，中央统战部提出，对于有定息的私方人员和资方代理人不下放农村安家落户，已经下放的应明确期限，定期调回。中央同意了这个意见，并且进一步指示：这些人原则上一律不要下放农村，而在必需精简的单位，在完全自愿条件下，可以下放一些人到城市企业。1962年中央决定压缩2000万城市人口下乡时，有些地区又在工商业者和党外人士身上打主意，把他们下放农村或者精简回家，引起他们很大震动。中央统战部提出了在精简机构、压缩城市人口中对工商业者和党外人士做好安置工作的意见，重申了中央关于他们不下放农村的指示，纠正了某些地区的错误作法，使工商界人士和党外人士逐步稳定下来。但是有些地方还是下放了一批工商业者，长期在农村劳动，成为粉碎“四人帮”后需要抓紧处理的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对知识分子，中央书记处于1960年8月批准了齐燕铭同志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1961年12月，中央批转了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北京市委关于在北京的高级知识分子和一部分负责干部副食品供应问题的请示，指出各省、市、自治区也可以参照这一办法

执行。给高级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以特殊照顾，送去了党的温暖，产生了良好影响。

## 发现误诊

1958年以来，各地在历次运动中错误地批判、斗争了一批党外人士。如在整风交心运动中把一部分党外人士自己交心的材料作为根据，给他们处分或者把他们划为“右派分子”。在“拔白旗”运动中，把一些知识分子当作“白旗”拔了。在“反右倾”运动中，有的地方和单位在党外人士中进行了重点批判，斗争了一批党外人士。这些都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增加了同党的隔阂，很不得人心。1962年4月中央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以后，我们提出了在党外人士中进行甄别平反工作的意见，确定凡是在交心运动中受到处分或者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一律平反，在“拔白旗”、“反右倾”运动中受到了批判、斗争、处分或者戴了帽子的，凡是批判错了或者基本错了的都预平反。凡是平反的，都摘掉帽子，恢复原来的工作或者安排其他相当的职务。对一般非党人员，采取召开会议宣布平反的简便办法。对中上层人士，则逐个甄别，逐个处理。对于1958年以来在其他运动中受过重点批判、处分或者戴帽子的党外人士，经过甄别，凡是完全错了或者基本错了，也坚决予以平反，不留尾巴。由于这项工作的进行，解开了不少的思想疙瘩，更好地增强了团结。

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多数是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有广泛联系和影响，是一支不小

的社会力量。做好他们的工作，对于社会稳定和国家经济建设是非常必要的。这项工作在统战部内部分工中由牛杰之同志主管，他抓得很紧。中央统战部从1959年国庆节开始，根据中央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分期分批进行了摘掉帽子工作，到1962年共摘了四批。在全国55万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们中，大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为了做好这一大批人的工作，统战部还在1961年9月和1962年9月，先后召开了两次“全国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集中地向中央反映了当时不少单位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们宁“左”勿右的问题，并在对他们的生活、劳动、政治学习、工作安排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改进措施，经中央批准在各地贯彻执行。在当时的形势下，尽管还未能为他们进行甄别和改正，但这样做也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对于团结工商界、知识界、民主党派，调动他们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有很好的影响。

## 拨云见日

1962年从2月到4月，周恩来同志在国家科委于广州召开的科学工作会议上，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和三届全国政协四次会议上的报告中，分析了我国阶级关系的变化，提出了统一战线的新发展和新任务。他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已经同解放初期有了很大的不同。新社会培养出来了大量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正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成长。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12年的锻炼，一般地说，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同时，他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绝大多数是爱国的，”“他们在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过程中是有成绩的，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自觉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关于统一战线的任务，他指出，“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任务就更重要了，就要负起新的任务（当然，同时还有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要有新的发展。就是说，它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果的基础上，现在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更多的可以动员的力量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扩大我们的民主生活。这就是我们的新任务。”周恩来的这些重要讲话，为当时的统战工作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适应这种新的形势，统战部于4月23日到5月21日召开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以周恩来同志的讲话为指导，研究当时统战工作的形势与任务。

这次全国统战会议，部领导商定由徐冰同志主持。为了帮助徐冰同志准备会议的总结报告，李维汉同志在5月7日提出了《关于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任务》的书面意见。这个书面意见根据周恩来同志的上述讲话精神提出“我国统一战线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且具体分析了知识界的根本变化和工商界的重大变化。讲到民主党派问题时，指出，“各民主党派的政治面貌和组织面貌都起了根本性变化，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同时指出现在还不能说各民主党派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政党。理由是：“各民主党派历来就具

有统一战线性质，并且包括一批共产主义者，这不仅没有妨碍，而且恰好有助于他们做好团结、教育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阶层的工作。现在有更多的成员转到劳动人民的队伍中来，这就更有利于他们联系，团结和教育更多的人，走社会主义道路，为社会主义服务。相反的，如果我们现在宣布各民主党派或者某几个民主党派已经成为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并且去这样去要求他们，那反到把他们的工作弄得狭小了，同时也不完全符合各民主党派的实际情况。”

这个书面意见在分析了知识界、工商界、民主党派、宗教界和民族关系的变化之后提出，经过20年来尤其是近年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理由说，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实质上已经是社会主义统一战线。根据是：第一，“阶级关系已经起了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深刻变化，第二个联盟已经有相当大一部分转化为第一个联盟，而且必然会继续转化；第二，社会主义，即六条标准，已经成为统一战线中各方面公认的政治基础；第三，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成为统一战线的中心任务；第四，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已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统一战线，它和无产阶级专政在阶级关系上是同一的；第五，共产党在社会主义事业各方面的领导权已经普遍建立，并且日益巩固。”同时又指出，“我们说，现在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主义统一战线已经大体形成，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统一战线内部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没有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了。”“阶级斗争仍然存在，并且仍然是长期的，但是阶级斗争的形势则已经起了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深刻重大的变化。由于两条道路决战取得了基本胜利，阶级斗争的基本战役已经过去，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

已经基本结束，阶级斗争的总趋势将向着缓和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即在六条标准的范围内，关于方针、政策、工作方法、学术见解的批评和争论，则日渐增多和活跃起来。这种争论和批评，正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正常现象，是我们国家繁荣兴盛的必要条件。毛泽东同志早就提出，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应当用民主的方法，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处理。在现在的形势下，我们应当更广泛更充分地运用这个根本方法，应该更加强调团结，强调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并且把它们贯彻到人民内部关系的一切方面。这就是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指南。这个书面意见还对今后统战工作的任务提出以下意见。

(1) 调整关系，加强团结。

(2) 发扬民主，实行互相监督的方针。

(3) 认真改善合作共事关系。

(4) 充分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积极作用。更加活跃人民政协、民主党派和有关人民团体的工作。

(5) 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充实民族区域自治的实际内容。

(6)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7) 继续组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和时事政策的学习，逐步改造世界观。

(8) 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第一，全党尤其是各级党委都抓统战工作。第二，重新教育干部。第三，中央统战部和各级统战部门，应当发扬成绩，认真纠正缺点和错误，改进工

作方法，在党中央和各级党委领导下，团结全党同志，努力做好工作。

这个书面意见提交李维汉同志主持的，有徐冰、牛杰三、许涤新、孙起孟、于刚、黄铸同志参加的小组进行讨论。由于有不同意见，这个书面意见没有提交统战部长会议讨论，其中有关今后统战工作的任务的意见，由徐冰同志在这次统战会议的总结报告中采用了。

这次统战工作会议根据周恩来同志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讨论了当前统一战线的形势、任务和主要工作，一致认为周恩来同志的报告，对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任务，已经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明确的规定，是统战工作今后一段时期内工作的指针。会议确定以发扬民主，调整关系，充分使用，耐心教育作为当时统战工作的基本任务。会议过程中还对民主党派的性质、统一战线新阶段的内容以及知识分子工作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决定会后继续进行研究。

5月17日，中央统战部向中央书记处汇报了这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情况。中央书记处对这次会上提出的具体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如精简涉及资产阶级分子的处理原则问题、党外人士的甄别平反问题、对右派分子的工作问题、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关系问题、政治学校问题等，给了明确指示。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对当时统一战线工作作了高度评价，指出：还是讲老话，统一战线是长期的，50年以后再说。统战工作是得到益处的，是三大法宝之一。现在讲政治形势好，也就是说统一战线的形势好。要重申统战工作的长期性。这是对为克服暂时困难而斗争的3年中统战工作的最好总结。

## 两个“三七开”

1962年12月间召开的扩大中央工作会议，是建国以后我党历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当时，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农业生产已经连续3年歉收，粮、棉、油料都减产，粮食产量1961年比1957年减少了1000亿斤，家畜、家禽越来越少，不少农村发生了饥荒，城市口粮也减少了供应，副食品也非常紧张，许多人得了浮肿病。以农业原料为主的轻工业生产，从1960年起就急剧下降，重工业生产从1961年起也下降，1961年工业总产值比1960年下降40%，许多工厂停产，市场上日用百货严重短缺，商店货架上空空如也，连买一双袜子也很困难。

面对这样严重的经济困难，干部和群众、党内和党外议论纷纷，思想相当混乱。特别是在党内，一种互相埋怨的腐蚀党内团结的情绪在滋长。党中央在准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过程中，特别是在讨论全国农业会议和全国工业会议要解决的问题时了解到：许多干部对当前经济困难的形势看法不一致，对“大跃进”以来的十年工作评价也褒贬各异。虽然中央自1960年冬起就开始纠正对过去工作中的错误，接着又发了一系列指示，重新规定了许多旨在纠正过去工作中“左”倾错误的正确方针政策，但党内许多干部，包括相当一部分负责干部很不理解，因而贯彻执行也很不得力。

考虑到这种情况，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这次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着重总结4年来工作的经验教训，开展批

评和自我批评，统一思想，以便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集中力量，克服当前的困难，争取整个国民经济早日好转。

会议是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召开的。在整个会议过程中，刘少奇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发挥重大作用，对会议的成功作出了卓越贡献。

刘少奇同志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负责准备提交会议讨论的全面报告的。邓小平同志协助刘少奇同志起草这个报告。刘少奇同志从一开始就明确提出：报告的主旨是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作风，无论总结4年工作，分析当前形势，提出克服困难的方针政策，都要实事求是，在报告初稿的起草过程中，他对参加起草工作的同志反复强调这个思想。

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主持起草的报告初稿出来以后，原先设想，先送给毛泽东同志看，等主席看过并认为大体可用以后再提交政治局讨论。但主席的意见是不要等他看了，也不要等政治局讨论了，就把初稿直接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请大家提出修改意见。与此同时，成立一个由刘少奇同志主持的起草委员会（包括政治局、各中央局以及有关负责同志共21人），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讨论通过，再向七千人大会作正式报告。

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个不同于往常的开会方法，可能是考虑到大会要解决的问题关系重大，有必要充分发扬民主，听取各种不同意见。事实也正是这样。刘少奇同志的报告涉及对过去4年工作成绩与缺点错误的分析和经验教训，涉及对当前经济困难的看法和今后的任务，涉及加强集中统一和反对分散主义，涉及党的作风和党内生活的重大问题，而参加大会的7千人，真是来自五湖四海，工作岗位不同，工作阅历不同，自然而然地

对上述问题的看法不完全一致，甚至完全不一致。这些不同的看法，既反映在大会的分组讨论中，也自然而然地反映到起草委员中来。这也就使起草和修改工作显得更加复杂，统一思想难度增大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少奇同志坚持实事求是作风的气魄与毅力也就显得特别突出。

最典型地显示刘少奇同志实事求是作风的，是他在会议中提出的两个“三七开”的观点。一个“三七开”是对过去4年工作的成绩与缺点错误的估计。当时，有相当一部分同志认为，报告初稿中成绩讲得不充分，缺点错误讲得过多，这种思想状况，严重影响认真总结这4年的经验教训。对于这个问题，少奇同志多次引用主席关于我军打仗报战果一定要真实的意见，反复说明：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两者都摆开来讲，有多少讲多少，既不夸大，也不缩小，都要实事求是。他指出，成绩是跑不了的，缺点错误也是不能否认的，两者都是客观存在。当前的问题是不少同志不能正视或者低估“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缺点错误的严重性。他尖锐地指出，不能用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套话来概括4年工作中成绩与缺点错误的关系。这4年我们犯了那么多错误，讲成绩与缺点的关系，就全国总的情况看，“三七开”比较合乎实际。就是说，成绩是七分而不是九分，缺点错误是三分而不是一分。这样实事求是的估计，广大干部和群众才心服。这两年大家饿肚子，心里都有数，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用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说法来掩盖实际情况，掩盖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严重错误。

刘少奇同志还进一步分析，“三七开”是就全国总的情况说的。至于有些地方，也许工作得比较好，缺点错误比较少，那里可能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或者是八个指头与两个

指头的关系。同时，也可能有些地方工作做得特别差，错误犯得特别多，那恐怕连“三七开”也打不住，甚至可能是倒“三七开”。各地情况不一样，要实事求是，由干部和群众去评价。

刘少奇同志这种实事求是的分析，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使许多同志思想通了，气也顺了，能够比较冷静地来思考这几年工作的经验教训了。

与此有关的另一个“三七开”，就是对造成当时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的分析。当时，干部（包括相当负责的高级干部）对这个问题看法不很一致。当前的困难，究竟是连续3年（1959~1961）自然灾害造成的，还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造成的，哪一个为主要原因？七千人大会初期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大家都承认，自然灾害和缺点错误都是原因。至于哪一方面是主要的原因，意见就不一致了。弄清楚这个问题，不仅可以充分认识工作中缺点错误的严重性，而且可以增强克服困难的决心。因为自然灾害是难以避免的，而缺点错误却是可以纠正的，由它们所造成的困难因而也是可以克服的。

刘少奇同志对这个问题是坚持尊重事实，坚持实事求是。他认为，农业连续3年遭灾减产给我们带来很大困难是事实，但是，过去4年工作中的错误，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继续大刮“三风”（共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风）所造成的危害更加严重，他尖锐地指出，当前严重经济困难主要是我们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造成的。用湖南农民的话来说，叫做“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就是说，困难的原因，三分是自然灾害，七分是缺点错误。少奇同志提出的这个“三七开”。对许多同志来说，一方面震动很大，破除思想上种种清规戒律的顾虑，另一方面又信心倍增，扭转困难局面大有希望。

刘少奇同志是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才得出这样的结论的。他从1960年冬率领我党代表团参加八十一党莫斯科会议和访问苏联回国后，很快就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领导干部要认真搞调查研究的倡议，到湖南等地基层去做了几个月的调查研究。他家乡的农民对他说，这几年天灾有一些，但不大，困难主要是干部刮“三风”造成的，可以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后来又到处到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去调查，这些省的负责同志也说，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刘少奇同志早在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提出了这种看法。

刘少奇同志提出和坚持这两个“三七开”的观点，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很不容易的，需要非常的胆略、卓识的韧性，又需要十分耐心和细致的说服工作。经过充分的讨论，这两个观点先在起草委员会，后在中央政治局得到了一致赞同。只是在书面报告最后定稿时没有直书两个“三七开”，而是用比较委婉的词语来表达。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同志用两个“三七开”实事求是地指出我党在过去十年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同时也实事求是地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在大会过程中，一般说来，对批评违反实事求是作风和群众路线作风的种种错误，大家思想上比较容易接受，认识也比较一致。但是，对于报告初稿中批评的某些错误，特别是着重批评分散主义倾向，大家认识相当不一致。许多同志，特别是在地方工作的同志，对于把分散主义作为一个突出问题加以讨论和解决，缺乏思想准备（在中央各部门工作的同志会前或多或少听过中央负责同志有关这个问题的议论），感到很突然。他们认为，这几年犯过很多错误，主要是高指标、共产风、浮夸

风、瞎指挥，不是分散主义。

在会议过程中，中央领导同志反复强调克服分散主义问题，特别是刘少奇同志，可以说，他的大部分精力是花在引导大家充分认识分散主义的危害和加强民主集中制，特别是加强集中统一的极端必要性。

刘少奇同志针对许多同志的疑问明确提出他的基本观点，这就是：高指标、共产风、瞎指挥当然是过去几年工作中的主要错误，但分散主义倾向也是主要错误，特别是在目前，它已经成为我党纠正各种错误的最大障碍。

刘少奇同志的这个观点，是根据大量事实提出来的。当时，分散主义倾向已成为全国普遍的严重现象。其突出表现是许多地方和部门拥权严重，既各自为政，政出多门，形成许许多多小天地，对中央闹独立性，对下级和群众则独断专横、压制民主。中央的许多政策，尤其是1960年冬以来为纠正“左”的错误而重新制订的一系列政策，遇到重重阻力，贯彻不下去。有些地方和部门，对这些政策采取置之不理，或者各取所需的态度，有的甚至索性另标一套，党中央1960年11月接连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关于贯彻纠正五风问题》等指示，有些党委和部门竟然加以封锁，不往下转发，也不往下传达。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确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许多地方就迟迟不贯彻执行，或者在执行中大打折扣。当时党内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瞒上欺下、弄虚作假的歪风邪气，相当严重。少奇同志在报告初稿开始起草时，曾要求起草工作同志广泛收集和严格核实有关分散主义的事例，而且要指名道姓地写出来，使大家触目惊心。

刘少奇同志在会议中反复严肃指出，不论纠正“三风”、

“五风”也好，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也好，首先必须克服分散主义。无论何时都不能没有党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当然同时也应该注意发挥各地方、各部门的积极性和因地制宜）。尤其是在革命事业遇到严重困难的时候，更需要加强这种集中统一领导。少奇同志尖锐地指出，分散主义能否克服，对社会主义事业能否继续前进关系重大。闹不闹分散主义，是考验每个共产党员是否真搞社会主义的试金石。

刘少奇同志这种严肃、尖锐地批评分散主义倾向，对许多同志来说是非常有效的清醒剂。少奇同志还指出，反对分散主义只在党内干部中进行，不要反到一般干部和群众中去，更不允许采取过火的粗暴的党内斗争方法，绝不能重犯1959年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至于报告初稿中列举许多分散主义的事例，刘少奇同志指出，各地方各部门认为不适当的可以订正，还可以自己选择自己认为适当的举例来代替。后来，初稿中的不少举例更换了，但最后定稿时，考虑到这类性质的错误不是被指名的某个地方或某个部门所独有，还是泛指较好，于是就把全部指名道姓删去了。这样，既批评了分散主义倾向的种种表现，又缓和了曾被点名的地方和部门的紧张情绪。

刘少奇同志批评分散主义令人折服，还在于他自己也作了自我批评。刘少奇同志在起草委员会中实事求是地指出，分散主义现象这么普遍而严重，不能完全要怪各地和各部门。这种倾向的产生，首先应由中央负责。自从“大跃进”时候开始，中央做过多次决定，把许多原属中央直接掌握的权力下放给地方和部门。他自己就曾批发过好几个这类文件。下放权力过多，给分散主义的滋长造成了条件。这是中央犯的错误。一年来中央决心改正这个错误，把下放不适当的权力收回来，并且重新制

订改正其它错误的方针政策，要求各地方和各部门贯彻执行。这时候就特别需要各地方和各部门克服分散主义倾向，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

在七千人大会中，刘少奇同志不仅仅是对下放权力过多作自我批评。他还代表中央宣布，过去4年工作中的主要错误，首先由中央负责。

早在七千人大会之前，中央书记处检查了这几年中央发出的文件，向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出一个报告。报告中指出这些文件中反映的中央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并且说明首先由中央书记处负责。这个报告后来在会议中分发了。邓小平同志在大会讲话中精辟地论述了党内生活的重大原则，批评了种种不良现象，提出了纠正错误、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并且作了自我批评。刘少奇同志在书面报告中谈到此事时还声明，中央书记处检查报告中说到的有些事情，是经过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政治局应该担负责任。刘少奇同志在党的八大以后逐渐代替毛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会议，因而政治局的责任首先由刘少奇同志主动承担下来。

## 走出沼泽地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党、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国民经济经过1962年的大规模调整，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农业生产开始恢复。196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3200亿斤，比上年增加250亿斤；油料产量达到4007万担，比上年增长10.5%；生猪年末头数达到近1亿头，比上年增长2440多万

头。全国约有 1/4 的县农业生产总量已经恢复到或超过了 1957 年的水平。

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有所改善。1962 年农业生产总值 430 亿元，比上年增长 6.2%。工业生产总值 850 亿元，比上年降低 16.6%。工业和农业的产值比例，由 1960 年的 4 比 1 改变为 2 比 1。在工业生产中，重工业总产值 455 亿元，比去年下降 26.6%，轻工业总产值为 395 亿元，比去年下降 8.4%。轻重比例由上年的 42.5 比 57.5 改变为 47.2 比 52.8。

财政收支基本平衡，通货膨胀得到控制。1962 年财政收入完成了 13.6 亿元，支出 305.3 亿元，收支相抵，结余 8.3 亿元。货币流通量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同上年基本持平的情况下减少 19.2 亿元，减少 15%。全国集市贸易的价格也比上年下降了 35%。

人民生活水平略有回升。1962 年全国人民人均消费粮食 329 斤，比上年增加 11 斤；消费猪肉 4.4 斤，比上年增加 1.6 斤；消费棉布 11 尺，比上年增加 2.5 尺。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比上年提高 4.5%，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实际工资由上年的 415 元增加到了 440 元。总之，调整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全国的经济形势正在逐渐好转。

1963 年至 1965 年，是调整国民经济任务的基本完成阶段。在这一阶段，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调整措施，全面扭转了国民经济困难局面，基本完成了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

1962 年 9 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决定，进一步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位，正确地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坚决地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

轨道上来。1963年9月的中央工作会议较为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国民经济形势，作出了再用3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的重大决策，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的方针任务，这对争取国民经济形势的根本好转起到了重要作用。

1961年和1962年的调整，主要是压缩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规模、精减职工和城镇人口，而1963年以后，因为国民经济形势的好转，则基本停止了上述工作，对国民经济重点进行巩固，充实和提高。1963年至1965年，党中央主要采取了以下调整措施：一、加强薄弱环节。经过两年的大规模调整，解决了“大跃进”所造成的一些问题，但是生活用品仍然紧张，人民生活水平仍旧很低，损坏的设备尚待修复，新建项目未能充分发挥效益，钢材等工业原材料的供应，也严重不足。这些都是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有待于在继续调整中得到加强；二、扭转亏损局面。1962年，通过清仓核资和关停并转，又对企业进行了一次普遍整顿，使企业管理面貌大为改观，经济效益明显提高，亏损企业有所减少。经过努力，1963年底工业可比成本比上年下降了9.5%，工业亏损额减少了一半多，到1965年，全部工业亏损额只有4.9亿元，基本消灭了经营性亏损，工业利润则逐年增加，1965年的工业产值税率达39.8%。三、改革经济体制。在经营管理体制方面，前两年主要是上收一些下放不适当的权力。1963年以后，则对企业管理体制、物资管理体制和劳动教育制度等进行了一系列新的改革措施。在企业管理体制方面，主要是试办一些托拉斯性质的大企业，改变过去单纯用行政办法管理企业的体制，这些托拉斯性质的公司，是全民所有制的集中统一管理经济组织，是在国家经济统一计划指导下的独立经济核算单位。在物资管理体制方面，打破了行政

区划和行政部门的界限，实行按经济区组织物资供应，同时还设立许多生产服务公司，协助物资管理部门组织经常性的物资调剂。这种改革，不但减少了物资运输的浪费，而且还流通了物资供应渠道，大大方便了企业。

经过1963、1964两年继续调整，国民经济的形势有了全面好转。周恩来指出：“经过调整，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比较协调了，工业内部的关系也比较协调了，工业支援农业的能力进一步加强了，企业内部的生产能力绝大部分已经填平补齐、成龙配套。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并将要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经过1961年到1965年5年的艰苦努力，“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国民经济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 工农业生产接近和达到历史最高水平。2. 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基本恢复正常。3. 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4. 文教卫生等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总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 三十年以后才知道

连续3年的“大跃进”运动，给党和国家、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经济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大跃进”期间，仅直接经济损失就高达1200多亿元，间接损失更是大得无法数计；政治上，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后期错误发动了对彭德怀等同志的批判和全国范围的反“右倾”运动；理论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一些“左”的错误观点，给其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大跃进”还破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和作风，损害了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降低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声誉，对于我国的国际威望，也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发动“大跃进”运动，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在主观方面：长期落后挨打的历史和遭受包围封锁的现实，使他们急于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和社会主义制度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不切实际地套用了革命战争年代的成功经验。在目标方面，确定以钢等主要重工业品的产量为中心的高指标。在方法方面，大搞以各种“大办”为主要形式的群众运动。在思想方面，以不断开展反“右倾思想”的政治斗争来开道。在体制方面，用大量下放管理权力的方式来提高地方的积极性。在计划方法方面，搞生产计划三本帐和所谓“积极平衡”。这种思想，明显带有浓厚的经验主义色彩。

“大跃进”运动之所以能够发动并延续3年之久，还有客观方面的原因：1. 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在政治上，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集中于中央，实质上是毛泽东一人手中。在经济上，所有制基本只有全民和集体两种，而以全民所有制为基础，国家统得太多，管得过死，一切权力集中于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2. 民主制度的不健全。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内没有建立起一个健全的党内民主制度。而反右派斗争和对反冒进的批判，又使这一不健全的制度遭到破坏。可以说，“大跃进”运动的错误始终同政治上的不民主紧密相连的，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损害了人民民主权利，为错误决策得以顺利推行提供了条件，毛泽东对党中央集体决定的反冒进的批评，导致了“大跃进”运动的错误发动；3. 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社

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以广大农民为代表的小生产者虽然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但其小资产阶级的特性却并没有随之发生多大的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使广大农民群众急于改变自身的贫穷状况，易于响应为建设理想社会而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另一方面，又使他们能够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为达到美好的前景而接受瞎指挥、“共产风”等各种超经济的强制。

对于“大跃进”的严重错误，毛泽东应负主要责任，但是从中央到地方党的一些领导人也都程度不同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它带有严重的主观唯意志论和经验主义的色彩，它想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经济建设新路，但除了搞一些主观蛮干的“创见”之外，最终也未能摆脱旧的经济传统模式。“大跃进”运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

第一，经济建设必须坚持稳步发展的方针。为了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面貌，社会主义建设应该力争有一个较高的稳定增长速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调动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也能够使社会主义建设得到较快的发展。但是，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毕竟要受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人口多、耕地少、工业交通基础差、农业生产和教育科技长期落后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不可能很快，必须采取稳步发展的经济建设方针。

第二，必须搞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必须切实以农轻重为序，先安排人民生活，后安排生产建设；先安排农业、轻工业生产，后安排重工业和基本建设；计划指标要留有余地，财力、物力不要留有缺口。否则，如果错误地强调“以钢为纲”，“一马当先，万马奔腾”，搞所谓“积极平衡”，实行国民经济计划三本

帐，就必然会造成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使国民经济的发展陷入困境。

第三，必须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为了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中央有必要下放部分管理权力，改革过于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但是，改革的重点应是增加企业的自主权力，从微观上搞活经济，而在基建规模、货币投放、劳动计划和生产计划等方面，中央则应始终保持有效的管理和控制。

第四，不能套用革命战争年代的成功经验。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是两个不同性质的范畴，都各有其本身的内在的发展规律。不能把对革命战争行之有效的鼓舞干劲热情、大搞群众运动等办法套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生产建设。

第五，生产关系的调整不能超越生产力的现实水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仍然需要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但必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如果超越生产力，一味追求生产关系的所谓“先进”，依靠不断变革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甚至于超越历史发展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那就必然受到历史的惩罚，使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

第六，必须建立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等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影响。”因此，为了有效地防止重大决策失误的产生，保证党和人民各项事业的正常发展，必须切实消除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建立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

“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运动”，发生在20世纪50年

代末、60年代初，对社会主义新中国来说，可真是“天灾人祸”，是一场大规模的带全局性失误的经济建设。春去春又回，经过贯彻“八字”方针，实行全国大规模的经济调整，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全国上下齐心共努力，终于渡过了国民经济极度困难时期。30年后，当我们再次回顾这段历史，值得深思、借鉴的东西很多。前车之鉴，让我们记住历史留下的教训和经验，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把我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



## 主要参考文献

1.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胡绳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年8月
2.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中共党史研究室著  
人民出版社 1991年7月
3.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中共中央  
文献研究室编  
人民出版社 1983年8月
4.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 马齐彬、陈文斌等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89年10月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年10月至1984年  
9月）》  
北京出版社 1985年
6. 《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

数字图书馆  
PDG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10 月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 1949——1980》  
新华出版社 1982 年 6 月
  8. 《回忆刘少奇同志》 吕振羽等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0 年
  9. 《彭德怀自述》  
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12 月
  10. 《在彭总身边 1950——1966》·景希珍等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6 月
  11. 《陈云同志文稿选编 1956——1962 年》  
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3 月
  12.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年 6 月
  13. 《1949——1989 年的中国》丛书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14. 《庐山会议实录》 李锐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15. 《中国农业年鉴》1958—1962
  16. 《新中国大博览》  
广东旅游出版社 1994 年



# 后 记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承受过经验和教训，中华人民共和国 40 多年的历程，也是在曲折坎坷中走过。中国人民在风雨的冲洗中逐步成熟起来，坚强起来。

对于 3 年自然灾害这段历史，人们不会轻易忘记。尽管提起它是那么沉重，那么痛心疾首，然它毕竟是现实的一面镜子，时时提醒人们防患于未然。

选择这个难度较大的主题，作者踌躇再三。多年后终受责任感驱使，在研读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搦管下笔，并严格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尽可能准确、客观地描述当年的情景。书中所引用材料全源于近年的公开出版物，所述方式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其效果如何，有待方家评说。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作者

1995 年秋月于北京

PDG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国，1959-1961——三年自然灾害长篇纪实

作者=楚汉著

页数=364

出版社=成都市：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

SS号=10965458

DX号=000000513579

URL=<http://book.szdnnet.org.cn/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0513579&d=DCFD58EB637FD202867A2B386459402D>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前言

第一章 红灯，在1959年的日历上闪烁

第二章 在饥饿与死亡的边缘

第三章 农业大国究竟怎么了？

第四章 苦果早已种下

第五章 左右倾的庐山

第六章 釜底抽薪的震荡

第七章 走出乌托邦

第八章 春去春又回

参考书目

后记

附录页